
金　日　成
回 忆 录
与世纪同行
5

金 日 成

与世纪同行

5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 ・平 壤
1 9 9 4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5）

온 겨레의 단합된
힘으로써만 조국의
운명을 구원할수
있다는것이 간고한
항일혁명투쟁의
력사적교훈이다.

김일성

（前页的译文）

只有全民族团结的力量才能拯救祖国的命运，这是艰苦的抗日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

金　日　成



在西间岛临江五道沟密营

祖宗山——革命圣地白头山

朝鲜革命灿烂的
明天始于白头山麓

难忘的抚松

我在这里度过了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
挺进白头山时也曾在此发出过枪声

傍着头道松花江的抚松县城的旧貌

我家曾住在抚松县城。图为
当时我家门前的街道

我曾就读的抚松第一小学

当年抚松县城的城墙和炮楼

二千の共産匪
撫松を狙ふ
わが飛機爆撃を加ふ

千餘名聯合共産軍
撫松縣城을襲撃
一部는驗參한警備隊와交戰
一部는松樹鎭을占領

有关抚松县城战斗的
报刊资料

抚松县城的小南门炮楼


游击队“女将军”金确实


机枪手 金明柱


排长 金泽龙

漫江——演出过歌舞和话剧的地方

漫江村

漫江村村长许洛汝



上演过《血海》的地方

坚持民族魂



洪命熹的长篇小说
《林巨正》



“卡普”作家李箕永



第十一届奥运会马拉松
冠军孙基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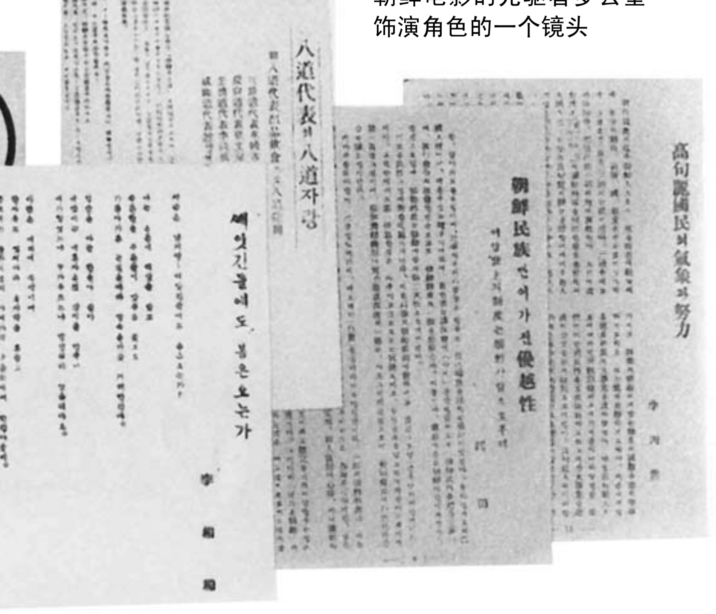
“卡普”作家宋影



无主的渡船

朝鲜电影的先驱者罗云奎
饰演角色的一个镜头





弘扬我们民族的
气概和爱国精神
的国内杂志

建立白头山根据地

历史性的“迁都”——朝鲜革命的
心脏从北间岛移至白头山原始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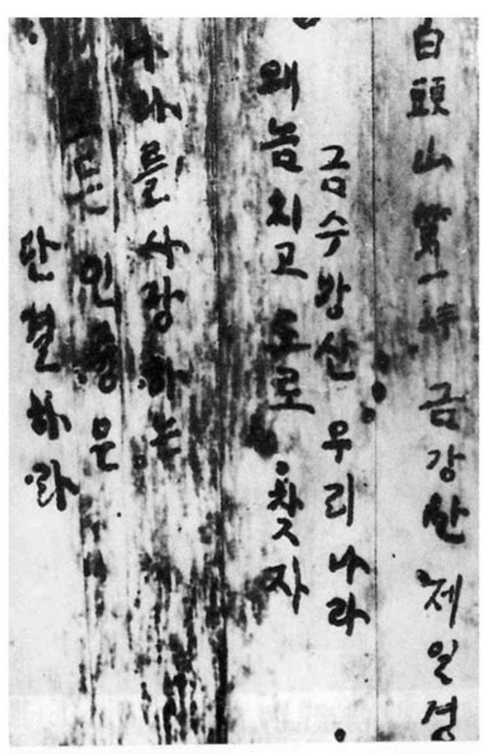
白头山密营里的司令部

司令部的内部



看望当年的白头山密营

黑瞎子沟密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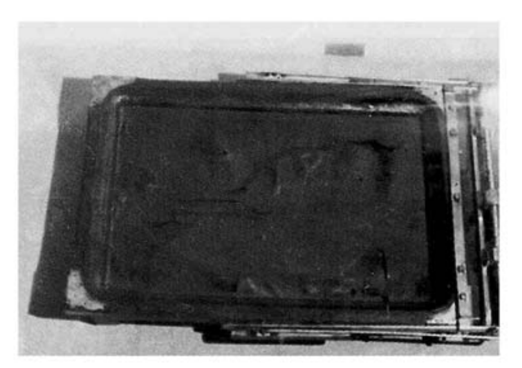


白头山密营里的标语树

狮子峰密营的出版所

祖国光复会的机关刊物——《三·一月刊》

《三·一月刊》



印刷《三·一月刊》的油印机

同长白人们在一起



李悌淳

祖国光复会长白县
委员会委员长



朴禄金

朝鲜人民革命军女兵连第一任连长



金寿福

朝鲜人民革命军
女政治工作员

革命化的王家沟



李柱翼

祖国光复会二十道沟特殊会员



廉宝见

她积极支援抗战，把全家人都献给了革命



金龙锡

珠家洞的“短刀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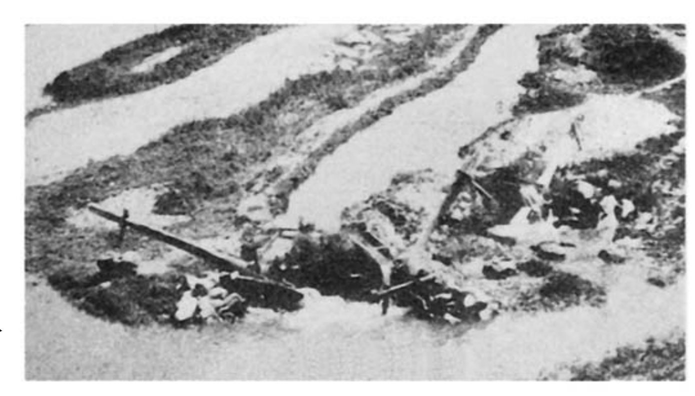
金得铉

小德水的“驼背老头”



李　勋

十九道沟区长、祖国光复会特殊会员



长白的水碓夜以继日地舂米，送给游击队



金 正 淑



金在水

派到长白县下岗区的政治工作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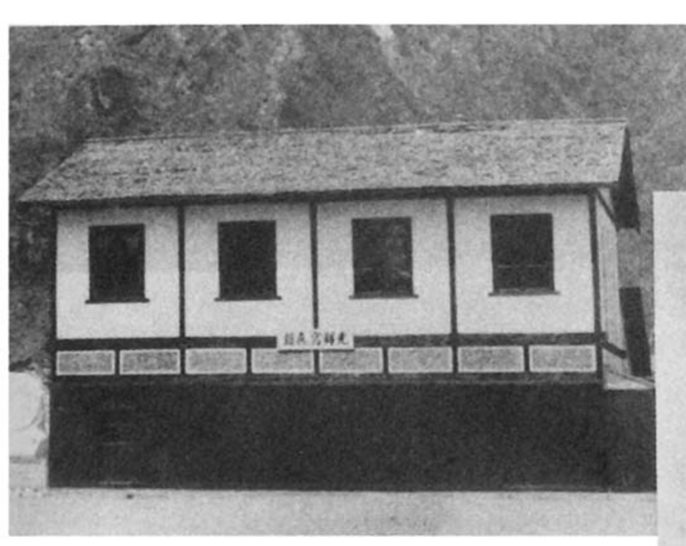
桃泉里的胞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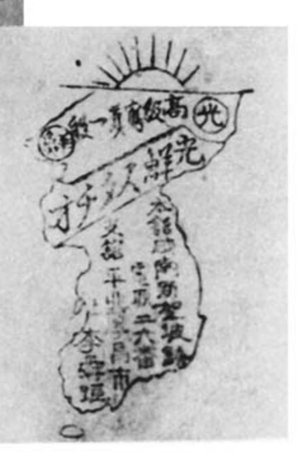
祖国光复会长白县下岗区委员会在此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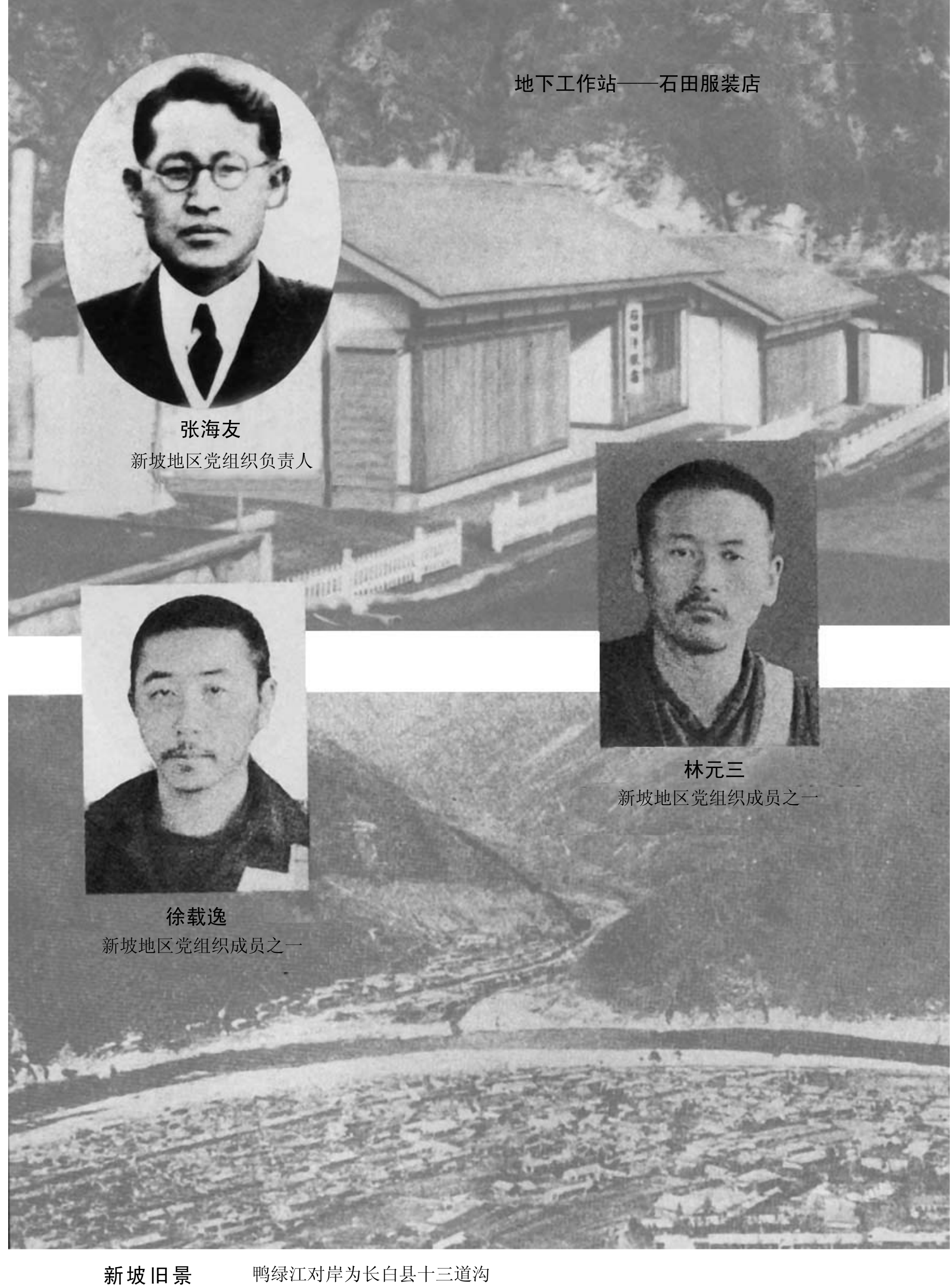
郑东哲

桃泉里区长、祖国光复会特殊会员





新坡的光鲜照相馆和盖在相片背面的图章



地下工作站——石田服装店

张海友
新坡地区党组织负责人

林元三
新坡地区党组织成员之一

徐载逸
新坡地区党组织成员之一

新坡旧景　　鸭绿江对岸为长白县十三道沟

扩展到国内腹地的光复战线

조국을 사랑하며 일제를 반대하여
싸우는 국내의 애국자 동무들 앞

국내에서 간악한 일제원수들과 싸우는 동무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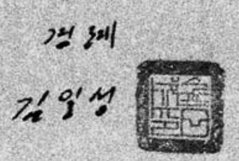
우리는 조국의 광복을 위하여 무장을 들고 만주광야에서 일만군경들과 싸우고있습니다.

우리는 동무들과 손을 굳게 잡고 모든 힘을 합쳐서 일제를 반대하며 조국을 광복시키는 투쟁을 진행할것을 충심으로부터 원합니다.

나는 우리의 대표를 직접 동무들에게 파견하오니 서로 만나서 사심없는 토론들을 교환하여주시기 바랍니다.

경례

김일성



致国内爱国者的信

国内党组织的建设



金　平

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
朝鲜人民革命军团政委



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与
国内革命组织的密营联络站



朴　达

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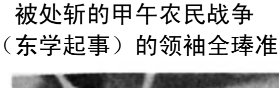
普天堡一瞥

朴达的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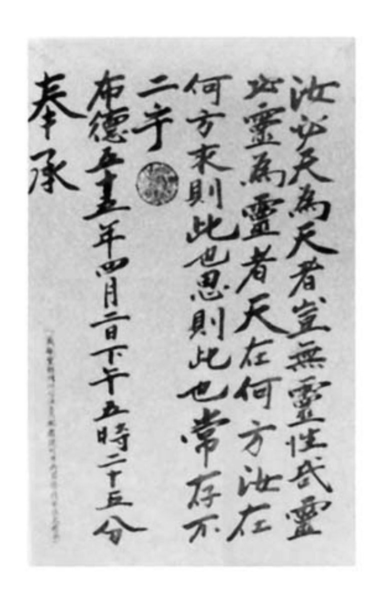
高举“辅国安民”、“斥洋斥倭”旗帜的民族宗教——天道教


东学第一代教祖崔济愚


东学第二代教祖崔时亨在狱中


被处斩的甲午农民战争（东学起事）的领袖全琫准





将东学改称为天道教的第三代教祖孙秉熙的笔迹



天道教中央大教堂

李敦化和他的著述

引导上百万教徒投入反日战线



朴寅镇
天道教道正



李昌善
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



李铨化
天道教宗理院长

天道教秘密组织致共产国际的请求书

急转直下的国内外形势



苏联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日、德签订
反共协定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
朝鲜总督举行“图们
会谈”



日本关东军
“讨伐队”

日军越过“满洲国”国境，
侵占华北地区

迁移到东满洲的日本人开拓
团妇女进行军事训练

出征前的革命军队员

1936 年 11 月，给日本帝国主义“冬季大讨伐”以沉重打击的黑瞎子沟口战场

红头山战场



三千里

金日成會見

长白县地主金鼎富。左图为1937年10月的《三千里》杂志封面和该杂志刊登的金鼎富的回忆资料

北部边境的大江
载着抗日大战枪声奔腾不息的

李红光

南满游击队创建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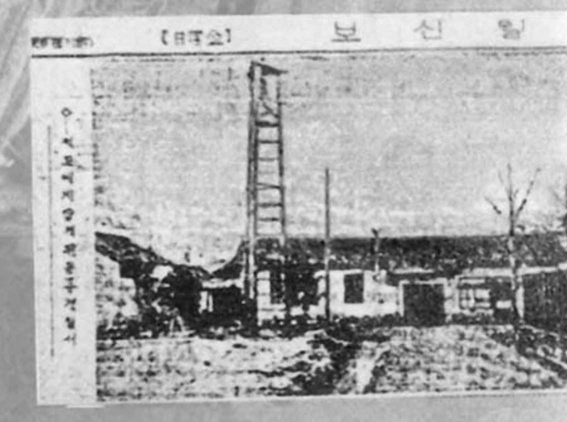
訪日飛行

咸北穩城郡下に
又も匪賊來襲
我警官隊に追散

人質を奪還
共匪を追つて越境
訓戎署員の大手柄

穩城署越境
隊の活躍

有关抗日游击队偷袭咸镜北道稳城地方的报刊资料



有关李红光部队偷袭平安北道东兴镇的报刊资料

南满诸勇士



李东光
在南满活动的党的政工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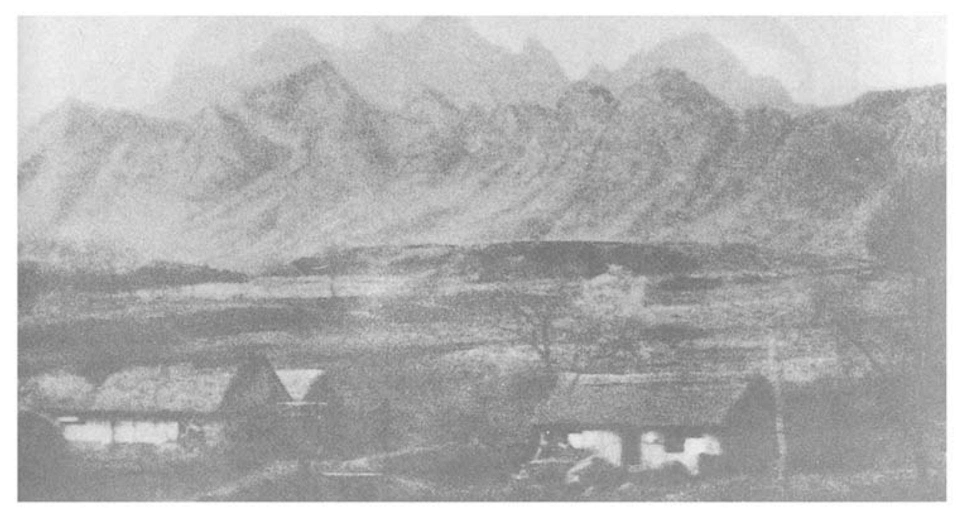
宋茂璇
南满游击队的政治干部



姜曾龙
我们派到南满部队
去的机枪手



孙溶浩
南满游击队的参谋人员



渗有南满战友鲜血的山野

纵横驰骋白头山



崔　光

青年义勇军出身的
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



白鹤林

我在白头山时期的
传令兵



李斗洙
朝鲜人民革命军连长



朴洙环
朝鲜人民革命军缝纫队员

在东方革命的洪流中


片 山 潜


库 西 宁

他们在共产国际多次参与过与东方革命和
朝鲜革命有关的工作

休戚与共的中国战友


魏 拯 民


陈 翰 章


曹 国 安

目　　　录

第十五章　扩大地下战线

第十三章

开往白头山

一　打击汪队长，争取万顺

二　在难忘的城市

三　《血海》的首次公演

四　女兵连队

五　白头山密营

六　爱国地主金鼎富

时期 ：1936.5～1936.8

一　打击汪队长，争取万顺

1936年的春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春天。当时，我们计划了许多工作：组建新师、成立祖国光复会、准备建立白头山根据地……。此外，马鞍山等抚松的许多地方又发生了种种重大变故，使我们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重重叠叠的难题。

要处理这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然而当时的形势不让我们有片刻的安静。盘据在抚松地方的两股势力分别给我们制造困难，妨碍我们的活动。这两股势力，一个是以汪队长为首的伪满警察“讨伐队”，另一个是以万顺为首的救国军山林队(反日部队)。

汪队长，这是指一个姓汪的警察队长，而这个“汪队长”的称呼还带有“讨伐”王的意思。因为他从在军阀张作霖部队当兵时起，就是专门“讨伐”土匪的能手。九·一八事变以后，唐聚伍组织自卫军的时候，他也曾加入，举起了反日的旗帜。所以，我们在远征南满时曾同他接触过，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但是后来，唐聚伍退到中国关内，自卫军土崩瓦解，他就投降了日军，举起伪满洲国的旗帜，当上了伪警察队长。从此，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大大施展了从前练就的“讨伐”本事。

汪队长出去“讨伐”，从不空手而回，每次都能咬住“讨伐”对象，割下脑袋或耳朵，拿回来交给主子。日本主子就大加赞扬，赏给他巨额的奖金。这个汪队长对万顺部队特别狠毒，只要碰上万顺部队，他就穷追不舍，十分凶残。在抚松一带，只要姓汪的一来，反日部队就吓得闻风丧胆，怕得要死。这一带的反日部队，都把这个汪队长称做“抚松的李道善”。所谓李道善，就是安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杀人魔鬼，他愚顽执拗，阴险毒辣，惨无人道，是间岛一带无人不知的穷凶极恶的害人精。而汪队长，是与之不相上下的汉奸走狗。

就是这个汪队长，这年春天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主要障碍和敌人。

其次，救国军的万顺，也开始妨碍我们的活动，其恶劣程度跟汪队长相差无几。其实，当时我们到抚松方面来的时候，是打算把万顺的部队争取过来做我们的主要友军的。然而万顺不但不把我们当朋友看，反而像对待敌人一样地来对待我们。过去，金山虎为马鞍山儿童团员购买衣料，在回来的路上被山林队抢劫了的时候，我们的队员本不该惩罚他们，但因为气愤难忍，就狠狠地惩罚了他们。结果，把关系闹僵了，使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麻烦。

“‘高丽红军’很淳厚，不容许任何人随便碰穷人的财物，可是对我们山林队的困难，却连理都不理。他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合不来。”

这是山林队员普遍的看法。他们碰到我们单独行动的人，就故意寻衅闹事并企图将其杀害。本应联合起来并肩战斗的人竟然如此愚顽，对我们来说不能不是又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我们的处境

又变得同在间岛创建游击队的初期差不多了。要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已经不小了，而且我们在军事上的威望已经为大家所公认，连敌方的汪队长、可以做我们同盟者的万顺队长也都怕我们了。

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妨碍，争取到安静的时间呢？我经过反复的

思考，决定不跟汪队长作对，适当地应付他，而对万顺队长，则要争取他，同他建立统一战线。

于是，我先给汪队长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我同你是老相识，彼此都很熟悉，因此愿同你开诚相见，谈几点意见。

“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军队。对伪满军警，只要不伤害我们，我们无意作战。只要你同意我们的要求，愿意同我们讲和，我保证不攻打你手下的警察队和各警察支署。”

接着，我对他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你们要停止对山林队的“讨伐”，准许人民革命军的工作员自由出入并停留城市和村庄，停止对积极支援人民革命军的爱国人士的镇压，立即释放在押的爱国人士。最后指出，只要你答应这些要求，我们保证尽可能不扰乱抚松县境内的“治安”。

去信没过几天，汪队长回信答复我们说，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全部答应我们的几项要求。

这样，我们和汪队长之间就订立了互不干扰的秘密协定。以后双方都很好地遵守了这项协定，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按照我们的要求，汪队长停止了对山林队的“讨伐”；我们的工

作员或联络员出入他管辖的城镇和集团部落，也不加过问；收敛了对朝鲜爱国志士的镇压和检举。我们也没有袭击他管辖的部队或搅扰他管辖地区的“治安”。

当我把一大堆“民生团”档案袋烧毁之后，派队员们去夺取武器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绝对不要在抚松县境内闹出乱子来，只能到抚松县境外的地方去打仗夺取武器。

那个汪队长并不愚笨，是个十分机灵敏感的人。他知道我们在

间岛和北满的活动，知道我们的实力有多大。因此他根本就不愿跟我们交锋。他一得到我们来到抚松的情报，就警告他的部下说：

“千万不要跟‘高丽红军’作对，别以为他们兵力少就胆大妄为。要是贸然触犯了他们，你就别想活命了。最好别惹他们，远远躲开他们才是上策。没有胜算的仗，干脆别打。”

他一见到我们穿黄军装的部队，就退避三舍，装作没看见。但是，一见到穿黑衣服的山林队，他就拼命追打。同拥有一千多人枪的万顺部队相比，我直接带领的兵力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被汪队长欺侮，受损失的却不是我们，而是万顺的山林队。

实际上，我们同汪队长讲和的时候订了一项不伤害万顺部队的条款，其目的就在于保护和壮大反日力量。

到了30年代后半期，反日部队的活动逐渐减少了。因为救国军的主力王德林、唐聚伍、李杜、苏炳文等的部队经过山海关或苏联退到了关内，王殿阳、殿臣等坚决抗日的武装队伍抱着誓死为国尽忠的决心进行了浴血奋战，最后都被敌人消灭了。丁超、王玉振等人的部队

则打着白旗归顺了日本。驻在抚松、临江县界的万顺手下的各小股部队和友邻部队也陆续出现了归顺者。1935 年秋，在初水滩就举行过欢迎马兴山部队的九十多名士兵向日寇投降的所谓归顺仪式。救国军的其他残余部队，也都分崩离析，各自组成小集团，逃入深山密林，消极抵抗，有的变成了土匪。

这种情况，使部分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忽视甚至认为无须同反日部队搞统一战线的思想倾向。如果让这种思想任其自流，就说明我们对反日联合战线的立场是不够坚定的。

于是，我们一方面同汪队长订立“和约”，另一方面开始对万顺部队做工作，以实现同他们的联合战线。

我的部队里有一个从山林队过来的年岁较大的队员。我通过他给万顺送去了一封内容如下的信：

“你的名声，在我们革命军中也是尽人皆知的。我们来到抚松，本想立即同你会见，互通姓名，共商反满抗日共同斗争的对策。不料，我们还未及会面，就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致使我们未能如愿，深感遗憾。

“据我们的政治委员对抢劫革命军后勤物资时受枪伤的山林队员的审讯，得知他们是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就已经逃离你的部队沦为土匪的逃兵。尽管如此，有人却造谣说，我们的士兵伤害了你手下山林队的现役军人。这是害怕我们两军友好的敌人施展的奸计。

“我诚恳地希望我们两军解除误会和不信任，消除反感和敌意，成为战友和兄弟，共同参加反日联合战线。”

万顺无视我们的建议，没有回信。其实，他的无言的答复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没有我们，他们照样能活下去。的确，那时万顺在抚松一带已经有了能够有恃无恐地对待我们的条件。因为汪队长根据对我们许下的诺言，放缓了对万顺等所有反日部队的攻势。他只在表面上装模作样，继续“讨伐”，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讨伐”。因此，万顺的山林队，即使没有后援，也能安心度日子。这种情况反而促使山林队的零零星星的妨碍活动更加放肆。经过我们一再警告，他们的活动才逐渐地有所收敛。

虽然当时还未能实现联合战线，但却赢得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汪队长的部队和万顺的部队都不再打扰我们，使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做我们的工作了。

无论是到漫江，还是到大营，我们都先同当地的伪满军警举行和平谈判，建立了互不侵犯的关系。

我们第一次去漫江，是 1936 年 4 月底。当时盘据在那里的警察队只有三十来人，要消灭他们，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派代表去同他们举行谈判。

我们的代表对他们说，我们不打你们，你们能让我们驻在这个村子里放心地过些日子吗？你们只管装聋作哑，蹲着别动，等我们走后，如果你们的上司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就说，他们游击队兵力雄厚，没敢抵抗。这个你们能办到吗？

他们一口答应了。我们不仅不打他们，而且跟他们举行谈判，这就够他们感恩戴德，乐不可支了。

李东学在靠近保卫团的地方架起机枪，派机枪手穿上便衣日夜把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漫江整理好了准备提交东岗会议的有关成立祖国光复会的大部分文件。因为没有敌人打扰，工作很顺利，进展很快。

对不愿跟我们作对的敌人，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我们从开始抗日武装斗争以来就作为铁的原则坚持执行的对敌方针，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整个抗日武装斗争期间始终一贯坚持的军事行动准则。

我们拿起枪杆，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自救。拯救祖国，拯救民族，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目的和使命。我们的刀枪只用于惩罚侵占我们祖国、残杀我们同胞、侵犯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敌人。因此，我们军队的正义的剑，对值得保护的人来说，是仁慈的宝剑，对穷凶极恶的反抗分子来说，却是无情的利剑。

这年春天一直安守本分的那个汪队长，不知受了什么煽惑，入夏以后又对反日部队开始了“讨伐”。可能是驻在抚松县城的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对他施加了压力。抚松街头的电线杆上又挂上了被砍下的反日部队士兵的首级。这样一来，万顺手下各山林队里就又开始出现了逃兵。这些抗日救国的意志不坚定的山林队的见利忘义、目光短浅的本性重又滋长起来，再一次阻碍着我们争取联合抗日力量的努力。不制止姓汪的“讨伐”，万顺部队的瓦解是无法避免的。于是，我又一次给那个姓汪的队长送去了一封信：

“我们得到令人不快的情报，说你调动你手下的警察队重新开始了对山林队的‘讨伐’。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说明你撕毁了同我们的协定。我劝你深思熟虑，慎重处事，不要自食其言而损伤了自己的名誉。要记住，

对顽固不化，蓄意挑衅反抗的人，我们是绝不宽容的。”

过了一个星期，姓汪的仍没有回信，也没有停止对万顺部队的“讨伐”。那个姓汪的可能心里想：我不怕你们的威胁，要打就打吧！

抚松县的各个要隘，都增加了几百名关东军的“讨伐”兵力。姓汪的更加骄横放肆了。

7 月初，我又给姓汪的去信，对他做了最后一次的警告。可是过了四五天，他不仅没有回信，反而袭击了万顺部队驻大碱厂附近的一个宿营地。这个消息，是我们在抚松县和临江县交界的某树林里听到的。

姓汪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我和我的战友。当然，我们根本就没有期待一个受日本主子操纵的伪满警察队长，会忠实地履行对共产主义者许下的诺言。但是，我们曾认为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会有一点理性。我们对伪满军进行瓦解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理性有某种程度的信任。我们说服姓汪的同我们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也是从这种信任出发的。我们表示信任的敌军中下层军官，大部分忠实地履行了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在额穆偶然同我结了缘的伪满军团长、系统地给我们送来了杂志《铁军》的大蒲柴河伪满军营长，都是这样。然而那个姓汪的，作为我们的老相识，居然弃如敝屣一般背弃了同我们的“协定”。没有信念的人，最后必然是要背信弃义的。我认为，那个姓汪的人，就是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必亡、朝中两国人民必胜的信念。

他的背叛，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尤其是他以枪声回答我们的诚意和耐心的期待，是我们更不能宽容的。

我把金山虎叫来，交给了他这样的任务：选拔英勇善战的三十来

名战士，到第十团去，同该团协同作战，严惩那个汪队长。与此同时，我们也率领主力部队，隐蔽地开到了西南岔附近的嘴子山。

西南岔虽然是一个不大的集团部落，但却是敌军“讨伐队”的重要出征基地。这里还有警察支署和自卫团的兵力。

我们准备打西南岔战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严惩背信弃义的汪队长，从军事上压制敌人，同时解决武装新师所需要的武器。

新组建的师，打过了头道松花江战斗以后，又在老岭打了一次大仗。要是打好了这一仗，是能获得大批武器的。我们本来周密细致地订好了作战计划，做好了准备，但是突然发生的情况，使我们没能按计划打好这一仗。敌军斥候队的一个鬼子，慢慢腾腾地走进我们的埋伏圈里撒尿，猛然发现了我军队员，吓得慌忙放了一枪，我军队员也随着开了一枪，战斗就这样打响了。结果，虽然杀伤了几十名敌人，也缴获了一些武器，但未能按计划干净利索地消灭敌人。

为了好好地补偿在老岭战斗中未能完全消灭敌人的遗憾，我们准备了西南岔战斗。

当时，我们部队里有个曾在西南岔当过伪满警察的中国人，他是因为恨那个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警察支署署长才投到我们这边来的。那个署长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恶棍，他对老百姓自不消说，对他手下的警察也极端残暴。那个中国人队员愤怒地说，他投到我军来，头一个目的是在解放中国以前先处决那个警察支署的杨署长。我们打过老岭战斗之后所以要打西南岔，也是因为考虑到了那个队员对西南岔了如指掌。

我们决定大白天打西南岔。中午 12 点到 1 点，是警察吃午饭、擦拭武器的时间。只要当敌人把武器都拆卸下来擦拭的时候打进去，我们就不会受到敌人多大的抵抗而压制住敌人。

我们的游击队员装扮成庄稼人，头戴草帽，手拿农具，靠近土城，迅速地通过城门，闪电般地打进了警察支署的兵营。支署长和警察都来不及抵抗，就做了我们的俘虏。自卫团也都被俘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警察支署的前院搭起露天舞台，为群众进行了文艺演出。然后放火烧了警察支署的建筑。

我们向西岗撤走以前，向警察们讲了话，然后发给他们路费，放他们回家。这时候，一个俘虏悄悄地问我们的一个队员：

“游击队老总，你们是怎么进了城门的呀？”

“飞进来的呗！”我们的队员开玩笑说。

“真是活见鬼，哨兵干什么来着？”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对西南岔警察支署的袭击，大大激怒了那个姓汪的队长。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更加疯狂地进行了“讨伐”。

为了诱敌上钩，金山虎带着三十来名诱敌小组来到抚松县城附近，让队员们都换上了山林队的服装，自己也穿上了山林队排长的服装。我们知道，最能使那个姓汪的眼馋的诱饵就是清一色穿黑衣裳的山林队。

金山虎在半夜里带队闯进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学着山林队的样子，到一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闹腾了一阵，接着又到黄泥河子去照样闹了一阵，然后悄悄地撤到了村后的山沟里。

姓汪的得到这一情报，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部队杀气腾腾地来到了黄泥河子。

他对村里的人们夸海口说：

“别怕，我马上就去把那些土匪斩尽杀绝，你们就等我回来好啦。给我好好准备一顿午饭吧。这些不逞之徒！我保证午饭前就砍下他们的脑袋回来。”

他说罢就带着部队循着我诱敌小组的足迹往后山上爬。

半山腰，早有我们的第十团设了埋伏。清晨，又有金山虎的诱敌小组上来加入了这个队伍。我们的队员预先在这里立好了稻草人等诱敌的伪装物。当敌人上来时，掩藏在这些伪装物后面的我军队员先开了枪。

那个姓汪的和他的警察“讨伐队”，朝着树林中那些黑糊糊的稻草人，一面大喊大叫，要他们投降，一面气势汹汹地往上冲。然而，那些“山林队士兵”既不投降也不逃跑，更不倒下。这更激怒了姓汪的队长，他两手各握着一支匣枪，发疯似地连连发射，但他终于被我军队员击毙了。

究竟他在绝命时悟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无从知道。如果他悟到了背信弃义的人最后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应该说是他的幸运。但是，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已经太迟了。

各地反日部队的指挥官，听了姓汪的队长被击毙的消息，都纷纷赶来找金山虎，要求把那个汪队长的首级卖给他们。他们说，作为报复，要把姓汪的首级挂在天下人都能看得见的抚松城门楼上，让人看到这个过去残杀了许多反日部队官兵的杀人魔鬼的下场。

我指示金山虎对姓汪的尸首不要动一根毫毛，设法把它完整地送回抚松县警察队去。

后来，我们听说，抚松县为汪队长举行了很排场的葬礼。这个葬礼实际上替我军作了广泛的宣传。敌人的阵营里广泛传开了谁跟革命军作对谁就只有死路一条的风闻。

对严惩姓汪的西南岔战斗和黄泥河子战斗，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历史》已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除掉了姓汪的队长以后，我们订出了压制日军，变抚松一带为我军天下的计划。为此，我们派侦察兵到四处去收集情报，了解到有六十来名日军从抚松乘船到临江方面去。我立即组织了伏击战。这场战斗，也打得很痛快。除了十来个敌人乘着被打坏的船逃命以外，其余全部被我歼灭。

打了几场这样的胜仗，抚松一带就变成了我们的天下。这一年夏天，我们在大营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靠近温泉的地方，搭起帐篷，做了许多工作。诸如建立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在抚松和临江的森林地区建立印刷所、缝纫所、武器修理所、后方医院和其他各种密营，等等。

从我们的驻地，翻过一座小山岗，就是敌人的驻地。我们一到大营，就用书面通告敌人说，我们准备在温泉住一段时间，望你们既不要在我们面前露脸，也不要向别处逃窜，要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虽然近在咫尺，敌人却始终没敢碰我们，也没敢向别处逃跑，乖乖地给我们送来了我们指定要的物资。我们要胶底劳动鞋，他们就送胶底劳动鞋，要面就送面。

就在这个时候，万顺派他的使者前来向我致意，并祝贺我消灭了汪队长。之后不久，万顺这老头子还亲自来到大营温泉同我会晤。过去，我们给他送去诚挚友好的信,甚至派使者前去呼吁他同我们建立联合战线的时候，他连理都没理，更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如此高傲的老头子，这回居然亲自登门来访，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在这以前，为了建立联合战线，我们曾去找过于司令和吴义成，而如今，消灭了汪队长以后，这个闻名遐迩的万顺，竟然亲自登门拜访我们了。

万顺，一眼就看出是一位五十多六十来岁的人。他眼睛无神，许是吸鸦片中了毒的缘故吧。他见了我，开口就说：

“金司令为我们除了姓汪的这一大害，我们反日部队的官兵都把您奉为天下第一大恩人。我此次专程登门拜访，一来是向司令表示感谢，二来是向司令表我一项心意，愿同司令结拜为兄弟。请司令忘了我过去老迈糊涂难为了您的诸多事情，宽大为怀，同我共结家家礼吧。”

他的要求，使我犹豫了片刻。我向他提出了过去同于司令和吴义成建立联合战线时提出的几项条件，然后说，如果答应这些条件，我可以考虑家家礼问题。我提的条件是，反日部队要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作我们的友军，绝不可向日寇归顺投降，不掠夺人民的财产，积极保护我们的工作员和联络员，同我们经常交换情报，等等。

出乎我的意料，万顺欣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每当我对

各项条件作补充说明的时候，他都频频点着头说“达见”、“达通”，表示赞同。

这样，只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两军就建立了联合战线，成了友军。

从此以后，万顺一直忠于我们之间的誓约，一次也没有违反过。

打击汪队长、争取万顺，这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于南湖头会议[1]以后的路程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其意义不仅在于我们从军事上压倒了敌人，显示了人民革命军的威力，而且在于我们在抚松地区进行的不懈的努力，为进军白头山地区搭跳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努力，在实现我们朝中两国人民和爱国力量的联合战线的行程上谱写了难忘的一页历史。

二　在难忘的城市

万顺对“家家礼”和拜把子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主动提出要和我们结拜，是为了同人民革命军建立友好关系，想在这个背景下对敌人保持军事优势。吴义成也曾要求我们加入“家家礼”。要利用“家家礼”这个杠杆实现同人民革命军的联合，再用这个联合束缚共产主义者。这曾是一些反日部队共同的想法。

当然，我们很清楚，入了“家家礼”或结拜了盟兄弟，并不等于反日联合战线真正形成，更不会顺利发展成巩固的联盟。

巩固的联盟关系，只有在实战中才能发展，只有通过不断的考验才能检验联盟的真实价值。我们在向白头山挺进的新形势下，为压制敌人而开展联合作战，这将会成为把反日部队变成人民革命军的忠实同盟者，把同他们的联合变成巩固的联盟的很好契机。

1936 年 8 月的抚松县城战斗，是在巩固我们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场有代表性的战斗。

“趁我们结成了联合战线的机会，要不要攻打一座大城市？”

我试探地这么一提，万顺不假思索就痛快地回答说：

“打吧！和金司令部队一起，什么大敌还打不垮？现在我好像能够力挽天下大势了！攻打一个大城市吧。”

曾经是只要听到来了日军，就闻风丧胆、逃之夭夭的山林部队首领，居然这样信心十足地回答，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不知是不是吸大烟来了劲，故意虚张声势。

万顺在我们面前也毫无顾忌地吸大烟。这是他特别信任我们的表示。本来，中国的大烟鬼是决不在还不十分熟悉的人面前吸大烟的。万顺当面吸大烟把我们看成毫无隔阂的知己，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好事。本来他在当反日部队队长之前是不抽大烟的。起初他打仗很出色，每场战斗都立功，很快就当上了一个大部队的指挥员。

有一次，他的部队陷入日军的包围，险些全军覆没。突围时伤亡惨重，他本人也死里逃生，总算活了命。这场风险，一下子使他变成了悲观主义者。每次冲锋都像一群豺狼似地哇哇呐喊着扑过来的日军，对当时军纪涣散、装备低劣的反日部队士兵来说，是力难制胜的对手。加上，汪队长的伪警察队也到处跟踪打击他的部队。

于是，万顺就进入深山筑起土城，蹲在里面避战，靠搜刮和抢劫民财来勉强维持部队。这样过日子，只能滋长土匪劣根性。山中的老“武将”万顺只落得终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以吸大烟解除烦闷。万顺的部下有不少人对部队生活产生了厌倦情绪，放下武器回老家去了。有些士兵沦为土匪，有些士兵打着白旗投到伪满军兵营去了。指挥员们以赌博度日，对时局一无所知。他们动不动就打骂士兵，官兵关系非常不好。万顺部队陷入行将溃散的境地。

要想挽救厄运临头的万顺部队，只有实现联合，并通过联合作战给他们树立能够战胜敌人的信心。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同万顺部队就

合作达成协议后马上向他们提议，要攻打一座大城市。由于万顺痛快地表示了同意，这个问题就顺利解决了。

“我手下的官兵看到金司令消灭了汪队长，都表示钦佩。要是和金司令部队一起攻打城市，我的部下都会举双手欢迎。请你快订个作战计划吧！”万顺说。

他非常佩服和羡慕我们在老岭、西南岔、西岗、大营等地取得的战果，对我们在这些战斗中运用的战法和战术感到很神秘。他问道，远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名将每以智谋制胜；日本人凭勇猛作战，金司令每战必胜，到底用的是什么战法？

我笑着回答说，战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军人的精神状态。

他长叹一声说：一眼就看得出金司令的部下个个都是无比勇敢的强兵，可是我的部下却个个都是庸碌无能之辈，根本不可靠。

“队长，不必太伤心。只要我们搞好联合作战，他们也会成为勇敢的士兵的。该攻打哪个城市，由你选吧。”

我这么一说，他马上摇着手说，还是金司令选为好。

那天，我们就攻打对象问题交换了意见，可是没能作出决定就分手了。万顺好像有攻打抚松县城的意思，可是没有明说。这对我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抚松县城和吉林市一样，是我毕生难忘的可亲可爱的地方。

抚松是在满洲大地到处可见的普通县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这里没有一座楼房，也没有电。抚松市街几百座房屋，大都是草房或者是窝棚。砖房、瓦房、四四方方的木造房屋是屈指可数的。可是，

我像珍爱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珍爱那些贫穷笼罩的草房和窝棚，无论到哪里都像怀念自己的故乡一样深情地怀念我经常去过的小南门和松花江。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我接受了成为我一生的罗盘的父亲遗嘱。我心里怀着这个遗嘱把父亲灵柩送到阳地村墓地。时光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已流逝了十年。俗语说，时过十年江山也要变，那个墓地周围的风景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呢？

在实现我们向白头山挺进的战略意图方面，制服抚松的敌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可是不知怎么，总不能痛快地做出攻打抚松的决断。

跟万顺分手后，我们一面领导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一面为选定合适的攻打对象，在各地大力进行了城市侦察。

当我们紧张地准备着同万顺部队进行协同作战的时候，吴义成部队的第一支队长李洪滨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带队来找我。他冒着三伏天的炎热强行走了遥远的路程，满脸大汗，军服上沾满灰尘，汗碱斑斑。

李洪滨的第一支队是吴义成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基干部队之一。李洪滨本人是忠于上司的人，被称为吴义成的一只胳膊，也是深受上司宠爱的得力的指挥员。他跟我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老相识。

在北满的青沟子见过面就分手的吴义成的部队，怎么又跟踪南下的人民革命军部队出现在抚松了呢？

“金司令！是吴司令派我到这里来的。他说，金司令部队可能朝

白头山南下，叫我一定要找到你们，进行协同作战。”

支队长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兴致勃勃地转达了吴司令的问候。接着说：“老头子叫我找金司令部队，起初我实在感到渺茫。我跟他说，‘在这个像茫茫大海的满洲大地神出鬼没的金日成部队，叫我上哪去找啊？’老头子就说，‘你这个傻瓜，真是笨，不管你横走竖走，只找枪声最响的地方，金司令准在那里。’我一想，老头子的话确实有道理。……我发现在满洲大地上枪声最响的就是这抚松一带。”

“倒也是，我们部队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发出枪声。我们准备不久后和万顺部队一起攻打一个大城市。如果李兄不反对，我希望李兄带来的支队也参加这次战斗，怎么样？”

“我怎么会推却这样的幸运呢。吴司令也一个劲地催我开展协同作战嘛。老头子说，他处理好那边的善后问题就马上找我们来。”

正当同万顺部队联合成功的时候，又有李洪滨的支队前来汇合，对我们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了。

我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可是吴义成派李洪滨千里迢迢来找我们真的是为支援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吗？回想在青沟子和我见面的时候，吴义成情绪显得非常消沉，他埋怨周保中不承认他是反日军的前敌司令。那时，他对同我们合作的问题，并不怎么感兴趣，只是一味地发泄对周保中的愤懑。这样的人，现在居然把李洪滨派到我们这里来，说要同金日成共产党搞一辈子统一战线。这应该看成是他支持我们，始终信任我们的表现。自从王德林经由苏联进关后，吴义成确曾一时发生过动摇，但他最终没有背弃统一战线的大义，始

终如一地祈求同我们合作，这的确是值得敬佩的。

恰巧万顺也在，李洪滨顾不得歇口气就参加了关于协同作战的讨论。

我们重新讨论了攻打对象问题。

我提了濛江。1932 年夏我们到通化同梁世凤部队会晤后，归途上曾在濛江停留一个来月，扩大了队伍，恢复了地下组织。濛江是个有群众基础，又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攻打它是很容易奏捷的。

万顺却不以为然，说距离太远，即使打赢了，也有可能在归途上陷入敌人包围。他还是想攻打抚松县城。

“金司令，打抚松吧！”李洪滨也攥紧拳头怒冲冲地喊道。

他要攻打抚松县城，是有原因的。李洪滨在离开额穆的时候，为了寻找我们的去处，先派个叫牟振兴的连长作了斥候。可是这个连长在执行任务中被抚松的宪兵队逮捕了。

敌人强迫他供出来抚松的目的和接头人。他以沉默回答了他们的审讯。宪兵队的恶魔们对他严刑拷打，甚至往他的嘴里灌开水，他的口腔和喉咙顿时被烫烂，嘴唇也全起了泡。这位刚强的连长没有屈服，始终以沉默抗拒。敌人最后把他和被扣上“通匪分子”的“罪”名在押的抚松地区一些爱国农民拉到抚松县城北郊枪杀了。可是子弹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有位善人把倒在别人尸体上的牟振兴背回去治好枪伤，送回了部队。通过这位不死鸟般的连长的口，抚松地区日本军警的杀人黑幕就大白于天下。

李洪滨谈了牟振兴被押在宪兵队时看到和听到的敌人残害人命的几个例子。

自从姓汪的队长死后，日寇军警加紧“搜查通匪分子”，给出入城门的居民发出入证，然后，凡是出入证过期的人，或没有出入证的人，全都抓去严刑拷打，对稍有抗拒的人，则用史无前例的极其凶残的手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加以杀害。

敌人把在城门逮捕的人先押在西门桥附近的旅馆，第二天大清早就把他们拉到西门外头道松花江畔的池塘边“试斩”。所谓试斩，是日军为培养军人气质，用军刀生砍活人头的最野蛮的杀人行为。杀掉后就把尸体扔进头道松花江畔的池塘里。后来，抚松的人们把这个池塘叫做杀人坑。敌人对透露了这种秘密的人，也用同样的方法加以处置。

我听了，胸中腾地升起了熊熊的怒火，同时也有一种自咎之感无情地撞击着我的心窝：不愿用枪声打破或以硝烟冲淡我对抚松的珍贵回忆，我的这个想法不过是一种无谓的怜悯。

事实上，抚松和临江、长白一样，是在白头山周边的各城市中敌人特别重视的军事要冲之一。日本帝国主义把抚松作为“东边道治安肃正”的中心据点之一，派驻了关东军、伪满军、警察队等较大兵力。

所谓在实战中受到锻炼的高桥的精锐部队也盘踞在抚松县城。因此，从军事上控制抚松，对我们掌握白头山地区具有很大的意义。

“要消灭盘踞在抚松县城的万恶敌人，替人民报仇雪恨！”

“要拯救在地狱般的城里听候试斩的无辜群众！”

我心情无法平静，好像从哪里不断传来这种急切的呼声。先攻打抚松吧！在这个和我有血泪因缘的城市里，每天都有无辜的人死在日寇的屠刀下，这种悲剧就在眼前，为什么要到濛江去呢。攻打抚松，

既可以替这里的人们报仇雪恨，又能把同反日部队的统一战线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更容易掌握白头山地区，难道这不是一刻也不容推迟的战斗吗。

于是，我改变了想法：攻打抚松县城，是我对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的人所能作的最亲切的问候，是我能够给予他们的最热烈、最真诚的爱。

我决心攻打抚松，为掌握白头山西北部一带打开决定性局面。

就攻打对象达成协议之后，我们再次组织了对抚松县城的详细侦察。

我综合分析了侦察材料之后，预感到这将是一场极艰苦的战斗。抚松县城的防御工事比我们预想的坚固得多。和满洲的其他所有城市一样，抚松也筑有坚固的土城，四围修筑了炮台。

如果说有对我们有利之处，那首先是负责守城门的伪满军连队是受我们影响的连队，其次是我对抚松市街比较熟悉。那个伪满军连队里有由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员建立的反日会组织。反日会负责人王副连长答应：在我们攻城的时候派可靠的会员站岗，让他们同时敞开所有城门。

我们召开作战会议，给各部队指定了战斗任务。我们部队的战斗任务是，攻占东山炮台，朝大南门、小南门方向进攻，消灭城里的敌人。反日部队则攻东门和北门。为了转移守城敌人的注意，我们还准备派人民革命军小分队在攻抚松的前一天攻打松树镇和万良河(万良乡)。

作战准备，可以说进行得很理想。我们确信这场战斗一定会以我们联合军的胜利结束。

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抚松县城战斗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困

难，主要是因为反日部队任意行动，没有遵守指定的集结时间。李洪滨部队过于“积极”，没有经由集结地点——碱厂沟，就径直开往东门；万顺手下的部队也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使我们焦急万分。派出传令兵去联络后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万顺的部下在碱厂沟露面。

进攻日期和时间并不是我们单方决定的，而是同万顺及其他所有反日部队头领占卜过吉凶祸福，充分讨论之后定的。反日部队的指挥员选定作战的日子也多受迷信的束缚。李洪滨支队长就非常重视进攻日期和时间是以什么数字构成的。据阴阳论，偶数属阴，奇数属阳，因此，一切大事都应定在 1、3、5、7 等奇数的日子，这样才会走好运。这是李洪滨一贯的主张。根本没把阴阳论放在心里的我们，碰巧把战斗开始的时间定为 17 日凌晨 1 点，这正是阴历七月初一，李洪滨十分满意。

本来万顺带着部分兵员先到了碱厂沟，他看到自己的部队还没到，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便让自己带来的部下都朝东下跪，双手合十，喃喃地念起什么咒来。大概是祈求神明保佑吧。其他各部队的指挥员都齐声指责这位老头子，说他的部队干出了背信弃义的行为。万顺急得满头大汗。

我看到这位老头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禁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说也奇怪，此刻我想为万顺辩护的心情胜过要追究其责任的想法。老实说，这次联合作战，没有人像万顺那样积极，也没有人像他那样提出很多妙计。他多次对他的部下强调，要严守作战时间和作战纪律。他这样做对特别重视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

的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他虽然影响了作战的部署，但他为实现同人民革命军的联合而带头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正是这一点，使我不能不同情他。这确是一个令人难为情的不协调。

其实，我的处境使我无法顾及对谁的同情和怜悯。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担任这次战斗总指挥的我，心情越发焦急。我虽然打过几百次仗，可是从没有像这次这样焦急和慌张过。我后悔在作战会议上没有特别着重地强调严守时间的问题。我在会上特别着重强调的是，不要侵犯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要给军民关系留下污点。我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在东宁县城战斗时反日部队士兵干下的那类违犯军纪的行为在抚松重演。

万顺部队迟到，这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正因为事先没有重视，所以对我们的冲击就更大了。

由于发生了有可能使战斗失败的非常事故，我们面临着要么采取随机应变的对策，要么放弃战斗的严重情况。但是放弃煞费苦心准备好的战斗是不可取的，因为反日部队士兵和人民革命军队员正为着联合作战而群情振奋、士气昂扬的时候，如果放弃了战斗，就有可能招致给他们泼冷水的后果。

万顺部队没能按时到达，是因为抽大烟。他们的指战员中有很多大烟鬼，因为没有大烟抽了，所以未能保证行军速度。

为了联合作战的胜利，我们不得不给行军中的万顺部队送去了鸦片。假若我们不采取这一紧急措施，他们就会在路上消磨一整天的。

记得在额穆县城战斗后，王润成曾对我说，在联合作战中反日部队所以打得比较好是多亏他们抽了大烟。那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这次听说万顺的部下吸不到大烟，无法保证行军速度，才想到当年王润成的话并不是开玩笑。

所有部队都比预定时间晚了很多才来到了集结地点。率领万顺的基本部队的团长最后才气喘吁吁地来到万顺队长面前作了到达报告。

万顺拔出匣枪，威胁要枪毙那个团长。

我从没有像那一时刻那样痛切地感到吸鸦片烟的危害。所以，后来我们不得不制定了在游击队伍中对吸毒者处以枪毙的规定。

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色苍然的清王朝这座大瓦房的瓦片罩上灭亡的征候，椽木开始塌下来，据说，也是因为鸦片。清王朝曾同把鸦片贩运到中国的英国进行过两次鸦片战争。在印度种出来的鸦片流入中国，致使中国的几百万人变成了鸦片烟鬼，白银大量外流。英国贩运鸦片，获得了暴利。

清王朝的林则徐等人同人民一起为反对鸦片输入，同英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抗战十分激烈，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背叛行为，清政府被迫给英国割让了自己领土的一部分——香港。

可以说，鸦片吞噬了中国。鸦片是清政府给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带来的最大的耻辱和痛苦。进入 30 年代，满洲地区仍有大量鸦片私贩。别说是有钱人和官吏，就是饿肚子的平民也有不少吸大烟的。我每当看到流着清鼻涕，以呆滞无神的眼光毫无表情地望着世界的鸦片中毒者时，就想起友邦人民漫长

的血泪斑斑的苦难史，不禁感到心情沉重……

按计划，所有部队都跑步行军，跑得嗓子都要冒烟了，可还是成了马后炮。原来在城门站岗等着我军信号的伪满军连队的反日会成员们，一直等到交班时间也不见我军信号，只好往机枪的机槽里倒进了砂子后撤走了。原想隐秘地通过城门，冲进城里一举消灭敌人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碰了壁。老实说，当时我的脑子里甚至闪过了是不是应该放弃战斗的念头。在那种情况下，把战斗改在他日进行，也许更明智一些。

可是，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太强烈，我们为掌握白头山地区而对这次战斗所寄予的期待太大，不容眼看着血泊中的抚松而放弃战斗。

如果我们用一千八百多名兵力还不能攻打一个城市而撤退，那将会怎么样呢？人们不就会责难我们是不足挂齿的乌合之众吗？反日联合战线的大义就会变成泡影，将来我们在白头山发出的枪声就会变得无力了。

我号召人民革命军指挥员们说，虽然情况变得困难了，但是由我们打先锋，誓死也要把好不容易准备的这次战斗引向胜利。

抚松县城战斗的序幕，就是经历了这样复杂曲折的过程才被拉开了。

我的进攻命令一下，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就一口气攻占了东山炮台，接着朝小南门方向冲去。反日部队士兵也朝北门和东门进攻。在小南门前展开了白刃战。敌炮台的机枪疯狂扫射向城门逼近的我军。我把指挥处设在小南门近处，敌人的机枪声几乎把我的耳朵都给震聋了。

人民革命军部队在机枪连的掩护下，打开城门冲进了城里。

就在我们的指战员展开肉搏战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的时候，有人向我报告，进攻北门的万顺部队被敌人的炮声吓得开始后退了。我命令李东学连长急速率连队赶往北门支援万顺部队。

稍后，进攻东门的李洪滨的部队抵不住敌人的反击，开始退却，而冲出了城门的敌人全都朝小南门方向扑过来。真是雪上加霜，我又接到一项报告说，全光负责的小分队放弃万良河袭击战，撤回来了。这使我心里十分不安。他们是因为头道松花江的水涨了，无法渡过，才撤回的。进攻北门的万顺部队向后退却的原因，并不只是被敌人的炮声吓坏了。他们把不战而回的全光小分队误认为是敌军的援兵，深怕自己腹背受敌，才慌忙后退的。

万顺部队的进攻序列一陷入混乱，其影响波及到侧翼，李洪滨部队也乱作了一团。

全光放弃袭击战却没有及时报告，给整个战斗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还没来得及扭转战局，天就已经开始麻麻亮了。情况越来越对我们不利。这时，李洪滨跑到我跟前说：

“司令，情况不妙。再迟疑就会全军覆没!”

他的意思是要立即总退却。

“咳，完了!”他仰起头望着开始麻麻亮的晨空绝望地喊道。

我一把扯住李洪滨的肩膀大声说：

“支队长，不要灰心!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要振作起精神，转祸为福嘛!俗话不是说，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吗？”

我对他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可以转祸为福的妙计。我不过是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利用反日部队的退却，运用诱敌战术来掌握主动权。

情况变得不利时，诱敌出城，拉到山沟里去加以围歼，这既是游击活动的战术原则，也是我们预先订好的第二战斗方案。不过，这种诱敌战术，在夜间运用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在天大亮之前撤离战场，二是用正面冲锋的方法打一场殊死战。

我在下定了诱敌出笼的决心之后仍怕我军有伤亡，犹豫着没有下令撤退，这时，发生了“天公”助我的奇迹：县城及其周围突然浓雾弥漫，咫尺难辨。

我命令各部队率领分散的士兵迅速向东山和小马鹿沟山脊撤退。

敌人疯狂地追击撤退的我军。

在我们开始攀登东山的时候，从那座山的中心突出部分的山口传来了一声枪响。我感到不安，停住了脚步。因为那个山口有我们七八名女队员，正在准备着部队战斗后的早饭。看来，敌人看出我们的主要撤退方向是东山，便企图抢先占领山口，从两个方面夹击我们的指挥部和主力部队。

山口的枪声更加密集了。显然是我们的女队员正在同敌人大部队进行着激烈的枪战。

我派传令兵去了解了山口的情况。传令兵回来转达金确实和金正淑等同志的决心说，她们为司令部的安全要誓死守住山口。应该说，那天我们

指挥部是由英雄地守住了山口的女队员们挽救的。如果她们没有抵住敌人，我们就不可能比敌人先登上东山。和那些女队员一起，我们部队的七团四连坚决守住了东山。

在山口进行激烈的攻防战的时候，七团主力就利用浓雾掩护在东山南面的高地布下了埋伏。反日部队也隔着山沟占据了对面山坡。掩护主力撤退的连队，这时才引诱敌人撤到浓雾弥漫的深山沟里来了。最后他们也登上山沟尽处的山脊隐蔽起来。

以“试斩”恶名昭著的高桥部队全部被诱入了死亡的陷阱。胜负就等于已经决定了。

我们在山上俯射，敌人在山下仰射，震天动地的枪声持续了一阵。高桥的士兵，就像万顺说的，凭着勇猛，用恶毒的战术进行了波浪式冲锋，可是每次都丢下一片尸体退下去。敌人看到冲锋无效，就停止射击，趴在山脚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我下了反冲锋命令。

嘹亮的号声一响，我军勇士们冲入敌群纵横刺杀。打白刃战最勇猛的是外号叫“延吉监狱”的七团班长金明柱。他曾参加“五·三〇”暴动被逮捕坐过延吉监狱。他和监狱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起在五年中曾组织了六次越狱。用斧头砍倒典狱，越狱成功的就是他。战友们给他起了“延吉监狱”的外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除“延吉监狱”这个外号外，还有一个外号叫“七星子”。他七次参加大战斗，七次立大功，负了伤，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七星子”这个外号。七星子是一种可装七发子弹的手枪。金明柱是我们部队里一只不怕死的雄狮。

在这场战斗中，八团的连长吕英俊也打得很好，不亚于“七星子”。金明柱在延吉监狱组织越狱时，吕英俊曾奋不顾身地帮助过他。他们俩是在斗争中建立了友情的至交。

游击队的女将金确实始终瞪着两眼打机枪。战友们问她为什么不闭一只眼睛，她就回答说，要看清日本鬼子的丑恶嘴脸。她每次扫射，都有成群的敌人发出悲鸣倒下去。这天，她还端起刺刀参加了白刃战。

金正淑两手各握一只匣枪，像打机枪一样连续开火，打死十多个敌人，这个故事也发生在这次抚松县城战斗中。

因吸鸦片险些尝到匣枪滋味的万顺部队的那个团长，也冒着弹雨登上岩石下口令，指挥他的团。这天，所有反日部队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实力。

高桥的“精锐部队”在东山山沟遭到全军覆没。这一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后来，看到《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才知道，当时，在新京机场为增援抚松驻军满载炸弹和子弹的军用飞机起飞，通化、桓仁、四平街等地紧急出动了增援部队。中江镇守备队也紧急开往抚松。

看来，高桥也和罗子沟的闻营长一样向上级打了大大夸张的报告。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增援兵力从四面八方乱哄哄地拥向抚松呢？敌人为解救高桥而出动的兵力从临江、长白、濛江等邻县也像洪水一样涌来。但是，敌人以极快的速度采取的这一疯狂对策，都未能把高桥从陷阱中搭救出来。8 月 17 日下午，部分增援部队到达抚松的时候，战斗的胜负早已决定了。

当我们打扫了战场向深山密林撤退的时候，从新京飞来的敌机向被我们摧毁的东山炮台和县城附近的民房，盲目地投下了炸弹。

“金司令，敌人的飞机是不是也中了司令的催眠术啊？”万顺以高兴的目光望着疯狂俯冲的敌机说。

我只凭他这一句话，就断定抚松县城战斗的目的已经充分达到了。

万顺的数百名部下，由团长带领，个个都满满地背着战利品，像凯旋将军一样雄赳赳地走在万顺前面。他们的表情和步伐变得使人无法相信，他们就是那些因吸不到大烟而误了集结时间，一度给作战造成了严重混乱的人。反日部队的行军队伍里不断地发出了笑声。

“如果我们继续打这样的仗，他们就会戒掉鸦片烟的。”我指着那个队伍满怀信心地对万顺说。“我还有件事求你，是不是该饶恕那个团长啦？”

万顺听我这么一说，眼里噙着泪水说：

“金司令，谢谢您。其实，这是该由我求司令的。司令的这一句话，等于把我们都饶恕了。今后我的部下好像也能做人了。我决心像吴义成那样，一辈子跟金司令搞统一战线。”

的确，抚松县城战斗同东宁县城战斗和罗子沟战斗—样，是给反日部队官兵开辟了思想改造道路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们经过这场战斗，第一次尝到了统一战线的甜头。实践总是给人们以比理论更生动、更坚定的信心。通过抚松县城战斗再一次证实：我们关于同反日部队结成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理论并不是空谈，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从战术上看，抚松县城战斗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直到那时，我

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可是从没有经历过像抚松县城战斗那样战况多变的战斗。在战争中，战况的变化通常是随着敌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可是，在抚松县城战斗中却由于我方的过失而发生了不正常的事态，因而造成了暂时的混乱。

战况越是发生意外的变化，越是遇到困难，指挥员就越要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胆力发挥明智的思考力，用随机应变的方法沉着地克服逆境带来的困难。我想，无论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敌斗争中，还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灵活地应付情况的变化，必要时迅速下定决心，这是所有指挥员都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

对抚松县城战斗的结果，我感到十分满意。老实说，我们重视这次战斗胜利的政治意义，甚于重视其军事意义。

这次战斗的政治意义可以概括为：加强了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把白头山西北地区更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至于我们消灭的敌军人数和所缴获的战利品数量，我都记不大清了，可是我丝毫也不为此而感到遗憾。

三 《血海》的首次公演

我认为，关于抗日革命时期的文学和艺术，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原著大部分均已发掘了，根据现代美感改编原著的工作，也可以说差不多都完成了。在抗日的烈火中产生的文学和艺术，现今成了我们党的文艺传统，成了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宝贵财富。

我不打算像专业学者那样对我国的抗日革命文学和艺术作什么理论上的阐发，只想谈谈我们部队在漫江进行的演出活动。我认为，介绍了我们在漫江进行的演出活动，对了解抗日革命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是会有所帮助的。

我们不是不知道，完成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其难度并不亚于攻打一座城市，是需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的。因此，我们为了创作和演出，不惜花费时间，竭尽了一切努力；只要有助于这类活动，无论什么事都去做。如果我们的游击队伍里哪怕有一名随军作家或专业文艺工作者，我们也许可以不必直接体验创作和创造的阵痛和苦恼了。遗憾的是，我们的部队里就是没有一名专业作家或艺人出身的人。

当然，有一些文人，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战果和盛名所鼓舞，为参军作过努力。如果他们的愿望都圆满实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就会

组建能够记录我军战斗历程的军史记录组和刊行队内出版物、开展演艺活动所必需的创作集体，开展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没有专攻史学的人。因此，部队的历史，就由非专业人员来记录。记录我们部队历史的代表人物，是李东伯和林春秋。他们努力记录了大量史料，但后来多半都被遗失或烧毁了。

解放后，我们的学者们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了抗日革命历史的研究。大部分历史资料都靠抗日革命斗争参加者的回忆来编写，也大量参考了敌人的文件。但因为有一些资料被歪曲、夸张或庸俗化了，所以系统地整理并核定历史资料的工作就碰到了不少困难。加之当时窃据宣传部门要职的反革命宗派分子对此漠不关心甚至横加阻挠，直到本世纪 50 年代末才开始了全面收集抗日革命历史资料的工作。

在叙述抗日革命历史的书籍中，偶尔发现时间、地点上的某些出入，可以说就是上述特殊情况的反映。

抗日战士们进行斗争，是为了创造历史，而不是为了留名史册。我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是抱着后代对我们纪念不纪念都无所萦怀的态度去排除万难的。假如我们是为了青史留名而持枪上战场的人，那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出后辈们称为抗日革命历史的伟大历史了。

我们打游击的时候，需要在敌人的包围和尾追中不断地变换地点，因此，连一份机密文件都无法保管好。从敌占区送来的字条，也为了防备万一，看过后就立即烧掉。凡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文件或图片，就装在背囊里送到共产国际去。

1939 年，我们就曾把许多装有文件的背囊送往共产国际，但都没

能运到目的地。当时遗失的资料中的许多内容，后来出现在日寇军警的文件和出版物里，可见当时护送文件的人们都在中途被敌人杀害了。我们凯旋归来时，带回祖国来的不是历史记录或组织关系文件，而只是一些抄录了革命歌曲的手册和记有战友姓名与住址的备忘录。

我们的学者们在研究抗日革命历史时最感到困难的就是缺少资料。

那些对我国革命的特殊性和错综复杂的内情浑然无知的帝国主义走狗、文痞和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们，利用从几篇文件中摘取某些数字和事实而把它拼凑起来的方式，处心积虑地诋毁和篡改无限忠于祖国和革命事业的朝鲜儿女们用生命开创的抗日革命历史，企图把它变为不足挂齿的东西。

不喜欢我们的理念和社会制度的人，为了诋毁我们党的革命历史，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这已不是什么值得惊异的稀罕事。历史，原不是可以用墨汁涂掉，用烈火烧掉，用利剑砍掉的。不管谁说什么，我们的历史仍将保持其本来面目。

我记得，我们是在开完了东岗会议后不久开始构思并执笔创作话剧《血海》的剧本的。而创作这部剧本的主要动因，则可以说是由《间岛讨伐歌》所引起的。

我小时候，父亲曾教我学会了《间岛讨伐歌》，还常常给我和我的朋友讲述有关间岛“讨伐”的事情。在安图组建了游击队之后，我率部到东满去时，看到那里的人们在日寇军警的“讨伐”中遭受着难以言状的灾难。每天都有几十几百名群众惨遭“讨伐队”的杀戮，间岛地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片血海。

每当这一片血海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父亲教给我的《间岛讨伐歌》；一想起《间岛讨伐歌》，我就为我们民族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禁不住义愤填膺。

令人惊叹的是，侨居间岛的绝大多数朝鲜人，都没有为这种残酷的遭遇所屈服，他们反而奋然站起来，手持刀枪和棍棒投入了抗战。甚至连那些被“三纲五常”和“三从”之道所束缚的妇女和偎在她们怀里哭着要吃的孩子们也参加了这个抗战。她们的豪气深深地感动了我。

妇女们跳出家庭的小圈子，投入到变革社会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个革命。我对这些革命的主人公，产生了无限的尊敬和热爱。在支持和同情她们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渐渐酝酿成熟了一个继承其亡夫未竟事业走上革命征途的妇女以及她的子女们的形象。

老实说，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想写一部以这样的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

我们利用在抚松停留多日的机会，每到一个地方都搭起舞台举行文艺演出，教育人民群众。打过一仗，我们也在驻地那里演出节目；如果情况不允许，就向群众作一番鼓动性的讲话，然后才撤离。每当革命军指战员把俭朴的文艺节目搬上舞台的时候，观众就报以热烈的鼓掌。有一次，我们的人在打完仗之后开娱乐会时，唱过《间岛讨伐歌》。听了这首歌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噙着眼泪，诅咒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参加抗日。只唱一首《间岛讨伐歌》，整个会场就骤然变成一片泪海，这使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冲动：要用话剧的完整舞台形象，更积极地启迪人民

群众。然而，当时时间不允许，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东岗会议闭幕之后，李东伯突然给这个埋了好久的火种点了一把火。他那时从一个村子里弄来一本新出的文艺杂志给我看。这本杂志中有一篇小说，描写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妻子在丈夫坐牢后，就把孩子送给别人，而后嫁给了另一个男子。

我问李东伯读过这篇小说后的感想，他带着惆怅的表情苦笑道：

“深感凄凉。难道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先生，那么你以为这篇小说反映了真实吗？”

“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片断。我就认识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件可悲的事情，他的妻子也跟另一个汉子发生感情，丢下孩子跑掉了。”

“那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怎么能说是真实呢？我在朝鲜和满洲看到的绝大多数妇女，都是既忠于丈夫和子女，也忠于邻居和祖国的人。丈夫坐牢了，她们就替丈夫抱着炸弹和传单，不怕粉身碎骨，为革命事业奔波；丈夫为革命牺牲了，她们就穿上军装加入丈夫所属的队伍，拿起枪杆子去打击敌人；孩子们啼饥号寒，她们就不顾千辛万苦，拎着叫花子口袋挨门讨饭，不叫孩子们挨饿。这就是朝鲜的妇女。如果不去看这一真实，而像李光洙那样丑化革命者的妻子，那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像他发表《民族改造论》时在汉城市街上受到啤酒瓶洗礼那样，会受到捣衣棒洗礼的。我们的母亲和姐妹们的捣衣棒，可不仅仅是用来夺取武器的呀。这就是真实。东伯先生，你以为如何？”

李东伯用新奇的目光望了我一会儿，突然肯定我的话说：

“对。这才是真实！”

我认为，反映真实是文学的本分。只有反映真实，文学才能引导读者走向美好而崇高的境界。而通过反映真实来引导人民群众走向美好而崇高的境界，正是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

这天，我们就我们所熟识的优秀女战士、妇女活动家以及在品德与气节方面堪称榜样的烈女，交谈了很长时间。

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李东伯突然望着我说：

“将军，想不想编一出话剧，描写一个女革命者的遭遇？”

“你怎么忽然想到写话剧来了？是不是想起了你在间岛教书时带着学生演话剧的事儿？”

“我很想给那些写这种一钱不值的小说的人一个刺激。”他说着，还用指头使劲戳了戳那本有问题的杂志。

我对他说，写一个女革命者，这个想法很好。不过，要写一部话剧作品，就必须有个主题。你有想好的主题，请说说看。

他回答说：

“真正的朝鲜妇女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主题。为的是把朝鲜妇女的真实面貌告诉人们。朝鲜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必然使妇女也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只有斗争才是活路。这就是主题。您看，中不中？”

我不禁吃了一惊。我在间岛时曾构想过一个以妇女为主人公的剧。而李东伯所想的主题恰好跟当时我所要表达的主题是很接近的。

“既然如此，那就干脆由你来执笔好不好？”

我这么一问，李东伯这个“烟斗老头”慌忙回答说：

“我只会吹毛求疵，不会创作。这出话剧应当由将军写。只要您写出来，我就负责塑造舞台形象。”

我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可是听了李东伯的这一要求以后，我的脑海里更清楚地浮现出了构思已久的一个淳朴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她强忍着在血海中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悲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斗争的道路。主人公富于魅力的形象，使我十分兴奋。我开始奋笔疾书。当部队抵达漫江的时候，剧本已经写好一多半了。

对我们来说，排演话剧倒并不觉得陌生。我们在抚松的时候，演过话剧；在吉林和五家子的时候，也积极进行了话剧演出。只是自从开展武装斗争以来，就很少演话剧。不错，30 年代前半期，游击根据地的一些人也曾掀起过话剧运动的热潮，但没有像吉林时期那样活跃。对需要大量时间和极大努力的节目来说，游击区的文艺爱好者们是不可能充分倾注精力的。

那么，为什么在朝着白头山南下的艰难行军路上，偏偏要坚持不懈，呕心沥血，一定要把话剧创作提到日程上来并付诸实现呢？

因为我们对话剧艺术在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工作中所具有的非凡吸引力和效果寄于了极大的期望。在那个时候，直到电影从无声片发展到有声片，并超越一国的范围普及到全世界以前，话剧之于群众是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感染力极强的艺术。

当时，只要有话剧演出，我总是不惜花费时间去看的。我在彰德学校时的同学中，也有许多话剧迷。每当有名的话剧团来平壤搞巡回演出的时候，我就同康允范一起进城去观看。

诚然，话剧是一种通俗的大众艺术，谁看了以后，都能当场作出“好”、“不好”、“一般”等评价的。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是话剧的开花期、全盛期。我念彰德学校时，从前的“新派剧”已被排斥，新剧兴起，使观众惊叹不已。

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们，为发展无产阶级话剧运动而倾注了心血。他们组织剧团，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巡回演出。这种剧团也频繁地到平壤来公演。

解放后，在我国话剧界享有盛名的黄澈、沈影等人，也是从 20 年代或 30 年代起，致力于话剧运动的艺术工作者。

当时，到处都提倡话剧。哪怕只有五十来名学生的山区学校也演话剧，而且搞得很热火。随着这股时代潮流，我们也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开展了话剧运动。

完成《血海》剧本的过程，也是发挥集体智慧的过程。不仅对话剧的结构，就是对一个细节、一两句台词，我们的同志也都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东岗为总结抚松县城战斗胜利而同反日部队指挥员开过联席会议之后，我率主力部队开往了白头山西方卫星区漫江。

漫江位于抚松县南端，是高耸在广阔高原上的白头山山脚下的第一个村庄。从这里向南越过多谷岭，就是长白地区，朝西南攀过老岭就是临江。

1936 年的漫江，还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是只有八十多户人家分散居住的小村庄。它同南甸子、阳地村、万里河、杜集洞一样，在抚松

地方算是为数不多的朝鲜人村庄之一。因为与安图不同，抚松这个地方朝鲜人很少。

漫江离县城很远，山间僻壤，人烟稀少，就连过路的人也很少涉足。因此，乍看起来，甚至给人一种海上孤岛远离人间的印象。间或有外乡人来，不是肩挑叫卖的木梳贩子，就是盐贩子。抚松的绅士们出入漫江的也没有几个，大概只有崔辰庸总管来过一两次，他的后任延秉俊可能去过五六次。

这里提到了延秉俊，我不妨简单介绍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原在洪范图麾下当过一支部队的队长。洪范图的独立军转移到滨海省之后，他不知靠了什么关系，一度来到抚松当了总管，做了正义府的地方长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后来，他辞去总管职务，带着针疗用具到位于安图和敦化之间的大蒲柴河从医治病。有一次，金山虎从大蒲柴河庄上回来，对延医生的医术赞不绝口，还一再劝我找他去治治病。

于是，我去访问了他。他诊过我的脉，说我元气亏损，若能弄到鹿茸或山参，他就可以给我开药方。我吃了他开的药，才好容易恢复了健康。此后回到祖国过了好长时间的某一年，我看到一个干部身体衰弱，深受痛苦，不由得回忆起延秉俊在大蒲柴河给我开的方子，便把它告诉了那个干部。过了几个月，他对我说，我开的那个方子非常灵验。我回答说，那不是我开的药方，是几十年前在满洲时一个叫延秉俊的医生给我开的。

就是这个延医生，不知什么缘故，很熟悉漫江的情况。

漫江的特产中，值得夸耀的是马铃薯。这里的马铃薯，和奶头山的马铃薯一样，有的跟婴儿的枕头一般大。漫江川里还有很多细鳞鱼。

村民们用的器皿，全是用木头削的，还有把桦树皮卷起来做成的。调羹是木头做的，酱缸、泡菜缸也都是用木头做成的。

漫江村的人们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要来的消息，当行军队伍抵达村口由两棵桦树形成的天然大门前的时候，以许洛汝村长为首的村民们早把盛满凉爽的甜酒和米黄酒的木盆、木坛子放在那里等候我们。农民们说，他们有个人去县城买食盐，带回了抚松县城战斗的消息，村长就开始盯着敌人的动静，看到敌机频繁地飞到漫江上空来打转，便确信革命军一定会到他们村里来。

我喝了一小瓢米黄酒之后，问村长道：

“你们这样全村出动，欢迎我们，不怕有后患吗，”

“这不用担心。自打春天革命军来过这里，漫江的警察在我们的面前也是唯唯诺诺的。尤其是听到‘姓汪的队长垮了’抚松县城的鬼子全被消灭’等等消息之后，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从漫江川的桥头传来一个农民的喊声：

“革命军先生们，你们这次也跳一场踢达舞吗？”

记得今春在漫江村搞文艺演出时，来自珲春的几个游击队员曾登上舞台跳过俄罗斯舞。凡是在苏满边境地区珲春生活过的队员们，都善于模仿俄罗斯的歌曲和舞蹈。村民们看到那个踢达舞，都瞪大眼睛，同声叫好：“啊呀，真新鲜！我原以为跳舞就是摇着手臂晃动肩膀头得了，可是瞧，双脚嗵嗵嗵踢蹬呢。没的说，这玩艺儿可真好看哩。”

“对了。不光是踢达舞，还要给你们看看更精彩的节目。”

李东伯所谓“精彩的节目”，就暗示了话剧的演出。

我们的指挥部就驻在许洛汝村长家的上屋里。他家曾跟我父亲交往甚密。十年前，孔荣救出被马贼扣住的我父亲，最先投奔的就是这一家。当时，许洛汝跟孔荣一起把我父亲一直护送到抚松。

我在他的家里继续写《血海》的剧本。当时田国振已经牺牲，后来在人民革命军主管队内报纸《曙光》并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的金永国，这时候还没有入伍。因此来到漫江，也只能由我来写剧本了。

李东伯收集在国内发行的多种书报，不断地送给我，作我写作时的参考。

我靠这些书刊具体地了解了国内的政治事件、社会经济状况和文艺状况。

当时进步的文学艺术运动的内容与形式，大体上都贯穿着热爱祖国和民族的精神，即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使之免遭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扼杀政策的危害。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我国的进步文学始终以热爱祖国与民族的精神和自主独立思想教育人民，在为话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所有艺术形式提示其应有的内容、指明其前进的方向方面，起了先导作用。

被称为“新倾向派”的进步作家的文学运动，到了 1925 年，便建立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卡普”)。“卡普”成立之后，朝鲜的进步文学为发展体现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作出了贡

献。由于有李箕永、韩雪野、宋影、朴世永、赵明熙等优秀的“卡普”作家，我国的文坛上出现了许多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作品，如《故乡》、《黄昏》、《拒绝一切会见》、《山燕》、《洛东江》等等。

有的作家在汉城钟路街卖小豆粥勉强维持生计时，也写出了作为人民群众精神食粮和向导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成了威胁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炸弹。

哪里有“卡普”作家的呼声，哪里就有红着眼睛镇压思想犯的日寇军警特务的魔爪。“卡普”的呼声越响亮，敌人就越穷凶极恶地把绞索套得更紧。由于经过了两次大搜捕，“卡普”惨遭破坏，在它成立十周年的 1935 年，终于终止了自己的存在。

在要么从事日寇强制推行的“国民文学”(转向文学)，要么弃笔停书这样的岔路口上，大部分“卡普”作家都坚持了进步文人的良心。李箕永隐居在内金刚的一个深山沟里，靠刀耕火种勉强糊口度日，但他始终保持了热爱祖国和民族的知识分子与爱国作家的气概。韩雪野和宋影虽然生计艰难，也恪守了爱国的节操。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扼杀了“卡普”，但未能扼杀朝鲜文学坚持不渝的反抗精神，也未能斩断朝鲜文学在爱国爱民族的基础上茁壮成长的命脉。

当“卡普”作家被捕入狱或被赶到穷乡僻壤的时候，抗日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和北部边境地区的作家，在中国的红区和社会主义苏联进行活动的我国流亡作家，创作出了大大有助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新颖的战斗的革命文学。

他们把纵横驰骋、浴血奋战在白头山等险山峻岭和满洲旷野上的抗日战士誉为民族的健儿，对他们表示了无限的热爱和深情。

以小说《人间问题》而著称的女作家姜敬爱，在龙井写了一部描写间岛人民援军运动的中篇小说《盐》。诗人李灿和金岚人在国境地区进行的创作活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开到西间岛之后，李灿住在鸭绿江对岸的三水和惠山镇，写出了无限向往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优秀抒情诗《宝城雪夜》。我们在东岗成立祖国光复会的那年 11 月，金岚人就在临江对岸中江镇创刊了封面上画有一面红旗的同人刊物《诗建设》，发表了许多向往抗日武装斗争、渴望朝鲜独立的革命诗篇。他还在自家的印刷厂里秘密印出两千多份《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送给了我们。

在作家当中，还有一些是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战果所鼓舞而试图参军的。小说家金史良决心参军，走遍了满洲旷野，但因为没找到我们的部队，就去了延安，在那里写了长篇游记《驽马万里》。

在建设新朝鲜的时期和抗美大战时期，我国文坛中出现的《白头山》、《雷声》、《朝鲜在战斗》、《钢铁青年部队》等成功的作品，都是由那些光复以前参加革命组织的和渴望参军的文人们创作的，这并非偶然。

他们虽然没能参加我们的武装队伍，但以持枪从戎的心情紧握笔杆，为民族的觉醒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因为有这样的作家，我们能够在解放初期只用短暂的时间就迅速地建设了朝鲜人所喜欢的新文学。

连日本都在发展电影业，难道我们朝鲜人就不能摄制电影？我们

也要像先进国家那样，为人民群众大量摄制出电影来，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电影艺术领域也具有自立的能力。我国的爱国艺术工作者和先觉者们都满怀着这种雄心壮志，开拓了电影艺术建设的创业道路。罗云奎[2]等有良心的艺术工作者，摄制了《阿里郎》等富有民族感情的影片，显示了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实力。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我国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在日寇的乌烟瘴气、污泥浊水的嚣张中为维护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艺而艰苦奋斗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崔承喜在实现朝鲜民族舞蹈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她深入研究民间舞、僧侣舞、巫婆舞、宫廷舞、艺妓舞等，从中一招一式地找出富有民族情调的优美的舞蹈动作，为奠定现代朝鲜民族舞蹈发展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民族舞蹈还没有进入舞台艺术的阶段。在剧场舞台上，有声乐、器乐、说话艺术等作品的演出，但没有舞蹈作品的演出。自从崔承喜完成舞蹈动作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出符合现代人感情的舞蹈作品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舞蹈也同其他姊妹艺术一样，毫无逊色地走上了舞台。

崔承喜的舞蹈不仅在国内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在自诩为文明国度的法国、德国等国家也受到广泛欢迎。

我们正在向西间岛挺进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抹掉膏药旗的事件，这则消息甚至飞到了白头山脚下。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东亚日报》介绍1936年8月柏林夏季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孙基祯时，

在刊载的有关图片中，抹掉了他胸前的膏药旗。总督府当权者为此勃然大怒，给《东亚日报》以停刊处分，还监禁了有关人员。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举行讲演会，介绍了孙基祯的比赛成果和抹掉膏药旗的经过。这样一来，我们部队的所有队员都对《东亚日报》编辑部所采取的正直立场，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和声援。

当时，我已把《血海》剧本写好，于是拿去交给“烟斗老头”看。他看过后连说好得很，还把一叠稿纸举在空中，挥动着跑到外面去找人。

在漫江把这个话剧搬上舞台时发生的一些插曲，已经通过战迹地考察记录和有关回忆录作了广泛的介绍。其中，有些事情因为记忆模糊讲得不大准确，而有些事情就忘掉没有记载。尤其遗憾的是，对李东伯的辛劳全然没有记录。

自愿承担舞台监督的“烟斗老头”，一开始选拔演员，就碰到了困难，因为谁都不愿扮演“讨伐”队长这个角色。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让急性子的李东学去演。乙男的母亲，先是叫张哲九演，后来叫金确实演了。甲顺，则由金惠顺扮演。最让李东伯感到为难的是，找不到一个可以扮演甲顺的弟弟乙男的人。乙男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而我们的部队里没一个适于演这个角色的身材矮小的人。别无良法，只好从漫江村的儿童中选了一名来填补空额。

“烟斗老头”在指导排练时也吃了不少苦头。他原本最担心的是扮演乙男的漫江儿童。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山沟里的孩子却十分机灵，很快就把握住了导演的意图。反之，大人们的演技却很不称心，

害苦了李东伯。几乎所有的表演者，一登上舞台，就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就连心灵眼尖、多情善感的金惠顺，上得场来，也显得两眼发直，口齿不清，该哭的时候干脆闭口不语。不管李东伯怎样哄她夸她，甚至对她发脾气，用尽了种种办法，也毫无效果。

金惠顺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频繁地受到指责？我怎么也想不通。她小时候家贫上不起学，只好在校门外偷听偷看，学了点文字和唱歌。想到这，我就启发她回忆起她在祖国和间岛亲身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对她说，这出话剧，正是反映你这样的人的生活的；日寇打死的乙男，是你的亲弟弟；你想想，刚才还是口口声声喊姐姐的弟弟死得这么惨，姐姐的心里怎能不淌出悲愤的血泪呢？这个谈话很有效，金惠顺的演技，霎时发生了变化。

我对李东学则给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对"烟斗老头"宣布说，宁可去抓几个"讨伐"队长来，也不演那个"讨伐"队长，怕弄脏了他的嘴。为了不让他再说二话，我叮嘱他说，你要演好"讨伐"队长的角色，这是你李东学的战斗任务。

当我们这些只带着枪和背囊来的游击队员，眨眼之间就搭起临时舞台演出了新鲜的话剧时，漫江的人们都惊呆了。舞台上出现了跟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一样的场面，人们的心给紧紧抓住，不觉之间被引进话剧的境界里，同剧中的甲顺和母亲一起痛哭、呐喊。乙男被日本"讨伐"队长打死了，有一位老人竟忘记自己是在看戏，跑上舞台，举起烟袋锅，就照化了装的李东学的脑门狠狠地击了一下。

我们在舞台上第一次演出了话剧《血海》的那一天，漫江的人们

整夜没能入睡。午夜都过好久了，这些淳朴的山民仍聚在油灯下谈论着感想，不时可以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人们的谈笑声。

这天晚上，我也踏着夜露久久地徘徊在村间小路上。我听着老乡们兴高采烈、津津有味的谈笑声，简直无法躺下睡觉。

目睹艺术的不同凡响的力量，我不禁吃了一惊。拿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漫江演出的话剧，是异常简陋的。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人们看着如此简陋的话剧，居然能同剧中人物一道，时而哭泣，时而捶胸顿足，时而鼓掌欢笑。

当时，我漫步在漫江村的小路上，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这样的冥想中：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演话剧，老乡们这时候该做什么呢？也许像许洛汝村长所说的那样，天一黑人们就吹灭了油灯准备睡觉或者已经进入了梦乡吧。可是此时此刻，漫江村的家家户户却依然亮着灯光。这不是等于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灯光吗？就是我们给他们送来一百麻袋大米，他们恐怕也不会这样激动兴奋吧？

在漫江的话剧演出，对深山沟的睁眼瞎子、男女老少是一场很好的启蒙教育，这使他们变成了抗日革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援者。当时村里的许多青年争先恐后地跳上舞台，踊跃报名参军。漫江成为应征入伍者众多的地方之一，成为我们可靠的后勤供应基地之一。

当时上演的话剧给漫江的人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通过下述事实充分了解到。从那时过了 20 多年后，当革命战迹地考察团访问漫江的时候，村里的人们不仅还记着演话剧的地点，而且对剧中人物的名字、话剧的具体情节，甚至部分台词，都记得清清楚楚。

革命军的思想和感情，通过《血海》的演出，如同漫江的流水一样流入了人们的头脑、胸怀和肺腑。

一句话，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艺术，可以说是划破黑暗的灯火，是号召人们投入斗争的战鼓声。我们把艺术活动称之为“鼓大炮”，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恰当的。

我认为，现代艺术也负有与之同样的使命。为人们创造作为人能过到人的自主生活所需要的正确的思想、高尚的道德、优秀的文化，这就是现代艺术的基本使命。

我们的人确实是有才干的。细究起来，艺术固然是高尚的，但也绝不是什么神秘之物。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人民不仅是艺术的真正享有者，而且是艺术的真正创造者。

话剧《血海》的演出，对于从思想、文化和情操上锻炼游击队员来说，也是个很大的贡献。

解放后一些作家到我家里来看我，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漫江开展的文艺活动，对他们说，我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因为没有专业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不知费过多少心思，只好自己作曲，写剧本，当导演。可是从现在起，你们是主人了，你们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鼓舞奋起参加新朝鲜建设的人民群众。

的确，一部优秀的诗作、剧作或小说，能打动千万人的心；一首革命歌曲，在刀枪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也照样能刺穿敌人的心脏。这是我们通过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所证实的真理。

提高人的革命觉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用革命的思想感情感动

人们，使他们引起共鸣的过程。在感动人方面，最有力量的手段之一是文学和艺术。

我记得，我同日本著名声乐家、前参议院议员大鹰淑子(李香兰)说过这样的话：人的生活里既有歌也有舞蹈。哪里有人，哪里就应当有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应当有艺术。没有艺术的世界，怎么能说是人类世界；没有艺术的生活，怎么能说是人的生活呢!

因此，我一向对人们说，要热爱文学艺术，并勉励全国人民要成为善于享受和创造文学艺术的人。

今天，我们在这块疆土上建立起了万民都能歌善舞的世界性的艺术王国。这是我们在漫江简陋的临时舞台上，点着松明和罩子灯演出《血海》时怀在心头的殷切愿望和理想。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可容纳几百几千名观众的高大美观的剧场、电影院和文化馆。每个道还都有一所艺术大学。我希望我们的后代在这些殿堂里，纵情演唱他们的前辈未能高唱的歌，不断地创造出喷发着白头山浓郁芳香的艺术。

《血海》在漫江演出后，当时看了话剧的人和参加过演出的人，又以《血海歌》、《血海之唱》为剧名，在许多地方继续进行了演出活动。在这过程中，一些情节和剧中人物的名字有了一些变动，有的地方还用更接近于当地实际生活的情节替换了原剧中的部分场面。

继《血海》之后，我们还把《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也搬上了舞台。演这出话剧的时候，许多没有加入过《血海》剧组的游击队员也争相参加了演出。

解放后，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把在漫江演出的作品全都发掘出来了。

金正日同志把我们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创作的戏剧作品规定为我国革命话剧和革命歌剧的鼻祖和先河，并积极领导了把这些作品改编为电影、小说、歌剧和话剧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创造了根据原作改编的革命电影、革命小说、《血海》式歌剧、《城隍庙》式话剧，确立了新的抗日游击队式艺术活动方式。

电影《血海》第一次出现于银幕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漫江村简陋的临时舞台上的罩子灯和那些坐在草席上看着话剧时哭时笑异常激动的人们。

我很想再看到我们在漫江演《血海》时热烈祝贺演出成功的那些难忘的人们。岁月流逝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时的老年人都已去世，和我同辈的人和当时的孩子们，料想还有不少仍住在漫江吧。当时演乙男的那个孩子，如果还在世的话，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四　女兵连队

有一度，朝鲜人把朝鲜独立军的唯一女将李宽麟誉为“万绿丛中一点红”；而在以游击队为骨干的抗日队伍的万绿丛中，却有由我们民族培育的千万朵美丽的红花。

满怀爱国热情的我国母亲和女儿们，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忍受着连男子汉都难以忍受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道路上，毫不踌躇地献出了生命，献出了青春和家庭幸福。

每当想起那些值得引以自豪的女战士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出现了1936年春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师时组建的女兵连队。

南湖头会议后，我们在挺进白头山途中建立了新的主力师，同时又组织了一个女兵连队，这可以说是标志着游击队伍的迅速壮大和整个抗日武装斗争掀起新高潮的惊人事件。

女兵连队的诞生，作为一件大事，表明几千年来被封建桎梏束缚得蹲在闺房里不得出门的朝鲜妇女，昂然奋起站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来了。

现在我们谈到妇女的社会地位时，常说“妇女是革命的半边车轮”，但在抗日革命时期，承认这一点的人却是不多的。即便说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妇女也能拿起枪杆子同男子一道长期进行武装斗争，也并不过甚其词。

坦率地说，起初我也认为妇女参军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这样的成见：妇女体质比男子弱，她们那纤弱的身体承受不了游击斗争的一切重荷。

当然，我们知道过去有过几个妇女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战斗中建立了奇勋，留下了令人惊叹的故事。譬如为砍掉倭将小西飞的头创造了条件的平壤名妓桂月香、晋州的论介等爱国妇女的功绩，都是举世皆知的。

读过《壬辰录》[3]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幸州山城之战是多么激烈，妇女们在那场激战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权慓将军在京畿道高阳郡幸州山城摆下背水阵，同三万多名倭兵进行殊死战，当地的妇女就把石头包在裙子里送给了打投石战的士兵。这些爱国妇女穿过的那种短裙，后来变成了朝鲜所有家庭妇女做厨房活或作为装饰都喜欢穿的围裙。这个围裙是因为出自幸州山城战斗的，所以被后人称之为“幸州裙子”。

高丽时期，女扮男装奔赴战场在打退契丹侵略者的战斗中立了大功的雪竹花，也是遐迩闻名的。

历史上确曾有过雪竹花那样的女杰参军作战的事例，但是，由妇女组成一支战斗部队奔赴战场打白刃战，却甚属罕见。

然而在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中，妇女不仅要做护士、缝纫队员、炊事员等辅助性的工作，而且还要执行战斗员的使命。一旦参了军，妇女也必须按着严酷的战争规律行事。战争决不会对妇女格外开恩，只要形势需要，妇女也必须和男子一样带着沉重的武器装备，一连几

天强行军，或者冒着炮火趴在冰冻的地上打仗，有时甚至要投入白刃格斗。她们有时候被派到敌占区去做政治工作和筹措口粮，要不就在寒冬腊月从事土工作业。这场战争需要在数九寒天风餐露宿打游击，可谁也不知道要打几年、几十年。这一切艰难困苦，妇女们受得了吗？把妇女拖入这样的刀山火海，是对的吗？我这样思量了好久，还是下不了决心。

早在吉林时期和我们一起参加过社会运动的同志当中，也有不少向我表示要参军的女同志。韩英爱就曾流着泪要求我准许她参加游击斗争，可是我去东满的时候，还是硬把她留在了北满。在吉林参加过少年会的人当中，有的女同志竟一直跟到敦化来要求参军，有的还从中部满洲写信来要求入伍。这都是充满爱国热情的要求，但我没能让她们遂心如愿。

当时我的脑子里还有过这样的想法：妇女要参加武装斗争，是过高的欲望；武装斗争是男子汉做的事，妇女有妇女做的事。把妇女从闺房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参加社会革命，固然是好事，但怎么能让她们参加武装斗争呢!

武装斗争已经准备就绪，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了游击队，随之，妇女们要求参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从事地下活动的妇女当中有不少同志不顾别人的劝阻，也不经批准，就找到游击队来赖着不肯走。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得不正式讨论妇女参军问题了。

可是这个问题一提到议程上来，有些已婚的人就一口否定了妇女参军的可能性。他们说，女的管家务，男的管外事，这是祖传的习俗；

李宽麟曾佩着手枪，跟着独立军活动过，这是事实，但那不过是千人中的一人，普通妇女哪能翻山越岭和男人一样打游击呀!把女的带到战场去，等于是冒险。有人甚至说妇女参军问题根本无须讨论。

车光秀和其他同志当场驳斥了这些意见。车光秀说，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过母权制社会，当时男子受到了女子的保护，你们承认有过这种时代吗？当孩子被投进烈火里的时候，奋不顾身地最先扑上去抢救的是母亲；她们看到国家被陷于泪海血泊之中，能袖手旁观吗？要知道，妇女参军，不仅是我们的姐妹们的要求，而且也是时代的召唤。

对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们决定暂且不讨论，先用男青年组建游击队，以后看形势再议。

这个暂时被搁置的问题，后来居然在毫无分歧、一致赞同下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为此创造了条件的是间岛妇女夺取武器的斗争。当着整个间岛奋起夺取敌人武器的时候，和龙县的两个胆大无比的姑娘用洗衣棒打死日本警察，夺得了步枪，这一喜讯封住了反对妇女参军的人的嘴。

十八岁的姑娘金寿福，通过组织了解到夺取武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便开始动脑子想办法，随后和另一个要好的姑娘一起，头顶着洗衣木盆到河边去了。前几天发大水，河上的独木桥被冲走，只剩了几根木桩。她们在桥头装着洗衣服，整天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日落时分，来了一个日本警察，强令她们把他背过河去。金寿福就背着他向河心走去，另一个姑娘装着帮她也跟在后面。到了河心，那警察两脚乱踢蹬，嚷叫皮鞋被打湿了。金寿福趁势把他掼倒在河里，两个姑娘劈头

盖脑挥起洗衣棒就打。她们就这样替被杀害的父母报了仇，夺取了武器，于 1933 年夏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从此，金寿福就得了个叫“洗衣棒”的昵称。

我们主力部队的缝纫队负责人朴洙环，原先也是用洗衣棒干掉了敌兵，夺取了武器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女同志事先订好计策，把警察都给灌醉了酒，然后一下子夺取了好几条枪。

作为我们的妇女已经达到的精神境界和刚强意志的证据，还有什么能像她们夺来的武器那样有力呢？于是朝鲜北部国境地区和满洲许多地方的好多朝鲜妇女，拿起自己夺来的武器加入了武装队伍。

妇女的这种激进的行动和耐人寻味的变化说明什么呢？只会侍弄菜园哀叹命苦的妇女，怎么能如此大胆无畏地砸碎几百年来一直束缚着她们的封建枷锁，踊跃地投入武装抗战呢？这可以说是朝鲜妇女的苦难所逼出来的结果，她们除了手持武器参加斗争之外就再无更好的道路可走。

妇女们代代继承的遗产，只有束缚她们的枷锁和怨恨。朝鲜封建社会所犯的滔天大罪之一，是以男尊女卑的教条，束缚和虐待了所有妇女。妇女只被当作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织布耘田的家庭长工。年轻时丧夫要终身守寡，还不起债时以身抵债，受这些苦楚的都是妇女。

霸占了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给遭受这一切不幸的朝鲜妇女又加上了更大的不幸，把她们当作工具和商品任意摆布，同样给她们打上了亡国奴的烙印。

抗日革命是根除这一切厄运的风暴，是把我国妇女引向革命道

路的历史性变革。朝鲜的妇女在这块大地上开始用鲜血谱写了自己的新历史。

妇女参军越多，我们就越想到要更好地照顾她们。她们虽然拿起了枪杆子，但毕竟是妇女，因此尽管是在打游击战的艰苦情况下，还是应当给她们保障妇女特有的生活条件。

自从游击队吸收了女兵以来，我们始终以对待亲姐妹的心情给了她们特殊的照顾。枪，发给她们最好的；住处，给她们指定最安全舒适的地方；战利品也挑最好的分给她们。

在这过程中，我渐渐感到，有必要再提高对她们的特殊待遇，那就是另编一支女兵连队，把她们的生活单位和军事单位加以一元化。我认为，组建女兵连队，就能在进一步激发她们干革命的自觉性和自豪感，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积极性和战斗力的同时，又能减少她们生活上的不方便。不论是到缝纫队、医院或是炊事班去，女队员都异口同声地提出要当战斗员，要求发给她们枪，好让她们去打死几个鬼子，替被杀害的父母兄弟姊妹报仇雪恨。

我们到抚松去建立新师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另编一支直属司令部的女兵连队。

当时作为新师骨干的一百多人，都曾被错划为“民生团”嫌疑分子，其中就有张哲九、金确实等不少女队员。当他们的冤案一经平反，所谓“民生团”嫌疑分子的档案被一把火烧掉，那些隐藏在各地的“民生团”牵连者也陆续闻风找我们来了，其中也有李桂笋、金善、郑万金等不少女同志。像头顶着被褥赶来的朴禄金那样个别地来找我们的

女同志也有好几个。还有一些女同志是在单独活动在大碱厂和五道扬岔的小分队编入新师时前来参军的。

我们到了迷魂阵密营的时候，缝纫队的金哲镐和许成淑缠着我，要求把她们调到战斗部队去，不管我怎样劝止她们，都无济于事。后来全体缝纫队员也都不顾一切地要跟着我们走。我说，你们都跟我们走，谁来缝制军装呢？她们回答说，有人替她们，病弱的女队员有的是。据了解，迷魂阵密营里确实有很多女队员，给缝纫队、医院、炊事班分配足够的人员之后还有余。应该把她们分配到战斗连队去，或者采取别的更有效的措施，于是我就想作为示范另组建一支女兵连队。而建立一个连队单靠迷魂阵的女队员是不够的，所以我就悄声告诉崔贤说，往后要是女同志们老要求当战斗员，你就先组织一个女兵排试一试吧。

有一天，我试探着对朴禄金说："要是完全用女同志建立一个战斗连队，会怎么样啊？"她听了就乐得欢呼起来，表示绝对赞成。但金山虎和李东学却一个劲摇头。金山虎说："光是女的凑在一起，能打仗吗？我看她们是对付不了凶神恶煞似的日本鬼子的，要是由男子指挥连和排，也许还凑合……"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说：

"由男子指挥那还算什么女兵连、女兵排啊？既然是女兵连，指挥员也该由女同志来当嘛。"

"这是可能的吗？"

"怎么不可能？难道你们是念了什么士官学校或者军事大学，才当上指挥员的吗？"

金山虎被问得无话可说了，可他的眼神却是不以为然的。李东学则连连摇着头咕哝：“女兵连、女兵连……”

金周贤对组建女兵连更是跳起来表示反对。他说，完全用女的编一个连队，让她们上战场，肯定吃败仗，那样朝鲜人民革命军就该威名坠地了。

可就在这时，记得是1936年4月我们在漫江的时候，一支男女混成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虽说是男女混成队，实际上男队员只有四五个，其余全是女队员，其中有金哲镐、许成淑、崔长淑、黄顺姬等。

我问金哲镐，你怎么撇下卧病的崔贤同志，到这儿来了？她说就是崔贤让她们来的。原来是这样：已经病愈的崔贤，受不了女队员要求当战斗员的纠缠，便挑选闹得最凶、体质又好的女队员，组织了一支小部队，然后让她们来找我，说是到了我这儿自会有办法。显然，崔贤是存心把这些闹得令人伤脑筋的女队员的大麻烦全都推给我，连她们的命运也都交给我，自己好落得个一身轻。

这支小股混成队的队长，是个姓赵的一脸稚气的小伙子。我看这么一个年轻轻的新队员带领一大帮女同志来，觉着有点不相称，便跟许成淑问了下原委。她气呼呼地回答说：“哼，在崔贤同志眼里，还能有我们这些裙钗吗？他顶多让我们做做饭，还能让我们女的当队长？”

这支混成队的副队长也是个身材矮小、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名字叫太炳烈，也是个新队员。

实际上，真正带队的是身材魁梧的女队员崔长淑。她除了枪和背囊以外，还扛了装有一袋米的铁锅、炊事用具、斧头和锯子，带的东

西竟比她的身材还大。许成淑带的东西也不比她少。坦率地说，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游击队里有谁带着这么沉重的东西行军，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过。我帮崔长淑把东西放下来时，觉得很沉，连我都感到吃力。

“你真是个大力士啊!”我不禁赞叹了一句。

太炳烈接口说：“这位大姐，一顿就能吃一百个饺子。她先一口气吞掉了六十个，出去站岗回来又是四十个，可都消化了，是女大力士嘛。”

在众人的哄堂大笑中崔长淑朝太炳烈斜了一眼，说这是地道的谎话。

“不是吧，一顿吃不了一百个饺子，还能扛得动这么重的东西？”

我这样一袒护太炳烈，大家又出声笑了。

这天，我顺势安排了一场男女队员的力气比赛。

我把一个男队员喊出来，叫他把许成淑的背囊背起来试一试。他从小在地里掌锄，长大成了汪清一带出名的摔交手，是个公认的大力士。饭量也大，能一口气把三十五个糯米糕蘸着凉水吃掉。

他背着许成淑的背囊轻捷地站起来。我再给他加了两支老套筒，问他说，你带着这些东西，中间不休息能走多远。他回答说，能走十里左右。

接着，我让他背上了崔长淑的东西。这次，他可用一手撑着地，吃力地站了起来。我再给他加上了两支老套筒，问他这会儿能走多远。他说顶多能走五里左右。

我回头问崔长淑说，你背着这些东西走了多远。她不好意思，没有回答。金哲镐替她回答说，大蒲柴河战斗结束后就一直行军，没有间歇过。大家听了，都瞪大了眼睛。从大蒲柴河到这里，有将近一百里路啊!男队员和崔长椒两人的力气比赛，算是崔长淑赢了。

我接着叫许成淑讲讲她们在大蒲柴河附近打的一场战斗。

许成淑面色微黑，身材敦敦实实，待人又热情又直爽，平时寡言少语，但一到关键时刻，就敢于直言不讳。她讲了战斗的经过情形。

以崔长淑为“先锋”的小部队，在找我们来的路上断了粮，吃了大苦，后来在山里遇到了一支反日部队，便跟他们联合起来奇袭了大蒲柴河附近的一个集团部落。在这场战斗中，女队员并不比男队员差，表现了顽强的斗志。

反日部队的士兵都带着精良的新式武器，但是伪满警察队一开始反扑，就吓得仓皇逃跑。而崔长淑她们的小部队虽然只有旧式套筒，却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还打退了敌人向反日部队的进攻。特别是这天放哨的一个女队员，她肋下中弹，鲜血直流，却奋不顾身顽强应战，一连击倒了好几个敌人。敌人见势不妙，就开始拖着尸体逃窜。女战斗员们立即发起冲锋紧紧追击。反日部队的队长向逃跑的部下高声大喊：“兔崽子们，朝鲜女人拿着套筒还那么英勇冲杀，你们跑什么!”逃跑的反日部队士兵们这才一个个掉过头来，回到队伍里加入了追击战。战斗胜利结束了。

听的人都对女队员们英勇无畏、坚忍不拔的精神赞叹不已。

1936 年 4 月，在漫江附近的一个树林里，正式宣告了女兵连队的

诞生。我们决定把这个连队直属于司令部，并直接给她们编制了排和班，还任命朴禄金为首任连长。

这个女兵连队是我国建军史上的第一个女兵战斗部队。

女兵连队的诞生是一件大事:它打破了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和陋习,把妇女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地位真正地提高到和男子平等的水平线上。

自古以来，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军事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严重。妇女固然在政治领域也几乎没有参政权，然而，妇女对男人的不露声色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却犹如魔法一般作用到政治领域和政治家身上，由此决定了国家兴亡的事例，倒是很多的。不过，即使是在政治领域有时拥有比帝王或统帅更大权力的妇女，一到军事领域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军事，几乎成了男子垄断的禁地。而我们在军事领域实现了男女平等，亦即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妇女的解放。当然这也只是就我们革命军内部情况而言的。

女兵连队的诞生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还清楚地证实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基础是建立在全民族范围的，其性质是人民性的。

革命军里出了女兵连队，而且她们都英勇善战，不亚于男队员，这件事一时成了全民族所知晓的、世人所惊叹的有意义的话题。

30 年代后半期，我国的报纸上登载了题为《金日成部队里女队员也有十多名》的消息。报道虽短，但在我国人民心中却激起了极大的振奋。

女子同男子一道并肩抗战的喜讯，有力地鼓舞了朝鲜妇女和人民

群众，激发了国内外广大群众志愿参加人民革命军的热望。

我们组建女兵连队以后，便悉心地照顾和帮助她们用自己的脚走路，通过实战锻炼她们。为了从政治上增强她们的热情和自觉性，还抽空给她们讲了许多英雄事迹。

我还记得在小汤河给女兵连队讲过金•斯丹科维茨的故事。

金•斯丹科维茨生于俄罗斯，原籍为咸镜北道庆原郡(赛别尔郡)，是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著名的朝鲜女战士。

她师范大学毕业，早年做过小学教师，后来，随着侨居俄罗斯的朝鲜流亡者和侨民越来越多，她就辞去原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为维护分散在俄罗斯各地的朝鲜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忘我的斗争。

沙皇被推翻后，金•斯丹科维茨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丢下丈夫和孩子，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她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部负责对外工作，同时积极推动李东辉、金立等朝鲜人独立运动者建立韩人社会党。

她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博得了滨海省等俄罗斯境内所有朝鲜人的赞叹，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当远东的形势变得有利于反革命，布尔什维克远东部不得不撤出哈巴罗夫斯克的时候，金•斯丹科维茨处理了善后事宜才乘船最后离开。不幸在阿穆尔河被白匪军捕获枪杀了。她在牺牲前对敌人怒吼道：

“我不怕死，你们这些卑鄙凶恶之徒，死期不远了。你们这群疯狗要摧毁共产主义，那是痴心妄想。”

她当时才三十四岁。

金·斯丹科维茨、雪竹花、桂月香、柳宽顺、李宽麟等女杰，成了我们女队员心中亲密的朋友。

女兵连队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她们所到之处都博得了人民的爱护和尊敬。只要远远地看见头戴光闪闪的五角星军帽，肩上挎着马枪的女队员，人们就奔走相告："女兵来了!"

女兵连队之所以受到人们格外的爱护，首先是因为她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了优良的思想作风，诚心诚意地帮助群众，尊重群众，待人处事无懈可击。我们驻哪个村庄，哪个村庄就有我们的女队员替房东扫院子、打水、刷锅洗碗、在宅旁园地里除草。她们还为群众唱歌跳舞，向群众讲演，教群众识字。总之，女兵连队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骄傲，珍贵的花朵。

组建初期，女兵连队武器说不上精良，大部分是旧式套筒，个别队员连个套筒也没有。我们决计要给她们弄一些轻便而漂亮的马枪。于是组织了几次战斗，但总是碰不到马枪。后来，我们收到一份情报，说是驻在西南岔附近的伪满军守备队骑马巡逻。而据侦察，守备队正在修筑兵房。我决定袭击工地，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女兵连队。为了给她们鼓劲，我还跟她们一同到了工地附近。

这是一场印象很深的战斗。那天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大雨了，敌人便停止了作业，哨兵也放松了警惕。连长朴禄金的信号枪一响，埋伏在工地附近的女队员们就如一群猛虎，飞也似地冲上去把枪口对准了敌人的胸膛。到处响起了女队员清脆的喊声："别动!""举起手来!"一个敌兵正要从枪架上拿下枪来反抗，张正淑一个箭步扑过去用

枪托把他打倒了。不到十分钟，战斗就宣告结束。杀伤了几个敌人，其余全部被俘，还缴获了几十支狙击武器，可惜没有一支马枪。据俘虏们说，马枪，骑兵巡逻队都带走了。敌人看到袭击和俘虏了他们的竟然全是女游击队员，都不禁大为震惊，目瞪口呆了。

此后，女兵连队在多次战斗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可以说每打一仗都写出了一首壮丽的战斗诗篇。尤其是在大营战斗和东岗战斗中，更显示了她们特出的本领。大营战斗时张正淑舍不得用子弹，竟用拳头打死敌军哨兵，为全连打开了突破口。金确实等三个女队员，一次在灰蒙蒙的月光下，一人一枪就打断了敌人的军用电话线。这是东岗战斗留给人们的神奇故事。据历史学家说，朝鲜总督府属下咸镜南道警察部留下了许多有关女兵连队活动的记录。其中有关于金日成部队的朴禄金等四十多名女队员于昭和 11 年(1936 年)阴历 5 月初攻打抚松县西南岔伪满军守备队的记载，有同一个时期这支部队奇袭大营缴获十多支步枪和军装的记载，还有关于女兵连队投身抚松县东岗战斗的记载。

每当怀念为祖国献出了大好青春的抗日革命烈士时，我就回想起活跃在他们当中的那许多巾帼英雄。

女兵连队的首任连长朴禄金是个出色的指挥员。战友们都根据她的特点称她是女丈夫。如果听到她穿的是四十一号大的劳动鞋，人们会大吃一惊的。游击队的战利品中虽有很多劳动鞋，但这么大号的却很难发现。所以她常穿草鞋。

朴禄金是曾任过汪清一个区妇女会主任的妇女活动家。她家境贫

寒，结婚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身上只穿着破旧衣服举行了婚礼。丈夫姜曾龙的家也是贫无立锥之地，新婚之夜连一床新被都没得盖。他们一起在同一天入伍，被分配在汪清游击队第一连。

有一天，一连政治指导员找我来，忧心忡忡地说朴禄金刚刚分娩，可她娘家连一块做襁褓的布头都没有。我急忙赶去一看，果不其然，只见婴儿被破布裹着，家里连个像被子样的东西都没有。朴禄金的父亲鳏居多年，此刻正为照料女儿进进出出。他不知所措地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生活翻了几个跟头，连个被子是啥样子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立刻派小分队弄来了布匹，叫缝纫队员们连夜缝好厚实绵软的被褥、襁褓和婴儿小衣裳送去了。

朴禄金两口子只用了为孩子准备的小衣裳和襁褓，而给他们缝的被褥却用大布精心地包好放在柜子上面，即使在寒风刺骨的隆冬里挨冻也不肯用。姜曾龙被调到安图独立团当了七连的排长以后，朴禄金一直在汪清部队工作；后来听说丈夫所属的部队要编入我的部队，她也决心到我的部队来。她离开娘家时想把我们给她做的被褥让给父亲。但她父亲硬是叫她带走，说这是金队长送给你们的珍贵物品，应该由你们夫妻用。朴禄金只好头顶着一包被褥来到了部队，这个大被包就成了她的外号。战友们从此都管她叫“被搭子”。朴禄金看上去似乎冷漠严峻，实际上是一个心胸开朗、善良温柔、富有人情味的妇女。她善于接近群众，最适于做地下工作。

考虑到她的这些长处，1937 年初我们派她作为政治工作员到长白

县新兴村去工作。她的任务是帮助权永壁、李悌淳把长白县上岗区一带的妇女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组织里。不幸在执行这项任务时被敌人逮捕关进了监狱。

她也像李悌淳一样，被提审时把别人做的事也都说成是自己干的，救出了不少革命者。同志们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无力地躺在牢房里，她就给他们唱革命歌曲，鼓舞他们的勇气。

朴禄金后来从惠山警察署被押送到咸兴监狱。敌人把她和一个结核病患者关在一间牢房里，想把不治之症传染给她，同死在牢里。那个姓金的结核病人是参与过定平农民组合事件的妇女，病情十分严重。朴禄金不怕这些，像亲骨肉一样护理她。不久，那个濒危的同牢女囚因病被保释出狱，而朴禄金却被感染病倒了。那位妇女的家属为了报恩，带着绸衣和米糕来探监，监狱当局却不准给她送东西。这位一生一世把全部的爱献给了别人的游击队女丈夫，最后连难友临终前送来的一片赤诚都没有收到，终于含恨病死狱中。

我们的女队员中还有马东熙的妹妹马国花。我们在西间岛活动时，马国花是在十七道沟坪岗德受到我部政工人员金世玉的影响参加了游击队的。金世玉既是她的恩师又是她的情人。为了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约好解放了祖国再成家，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未来。

有一天，在厨房里做饭的马国花给战友们分玉米粥，最后发现缺两个人的份。她想，缺一份，自己饿一顿就算了，可另一份让谁来饿肚子呢？她左右为难，犹豫了半天，才决心去征求金世玉的谅解。

她把金世玉从营房里叫出来把她的难处告诉了他：

“世玉同志，请原谅，今天的晚饭，就当没有你的一份，饿一顿吧。实在对不起你。”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这种时候嘛，理当由我来少吃一顿。”金世玉说着忽然笑了起来，“不过，我要事先声明，祖国解放后，你一定要顿顿给我吃双份。”

这天夜晚，马国花不顾饥肠辘辘，只记挂着饿了一顿饭的情人，久久未能入睡。

这一对要好的情侣，都未能看到祖国的光复，就牺牲了。

马国花牺牲时，女战士们在她的背囊里发现了绣有一对仙鹤的被面。这是她在那凄风苦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精心置备的嫁妆。世上还有比这更珍贵、更令人悲泣的嫁妆吗？女战士倒在荒凉的异国土地上，只留下了她那美好的梦想，这事该怎么办才好啊！女队员们用那床被面裹了她的遗体。

女兵连队诞生后只存在了半年左右，但它建树了一座战功卓著的丰碑，祖国将永远记住她们，人民将永远学习她们。

在抗日革命的第一线上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劲敌进行了浴血战斗的女战士们，是现代朝鲜妇女的好榜样，是在人类解放斗争史上堪称光辉典范的女英雄。她们是带头实现妇女的社会地位平等，用鲜血开拓我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先驱。

我们劳动党时代培育出了数不胜数的继承当年女兵连队的白头山革命精神和斗争传统的女英雄、妇女活动家和女劳动模范。举例而言，像安英爱、赵玉姬、李洙德、李信子、郑春实等女英雄，她们都是以

白头山精神进行思考和活动的。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妇女今天仍以这个白头山精神建造着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的社会主义堡垒。

今天，我们的人民军拥有许多继承抗日革命传统的女兵部队。不仅人民军有手持武器保卫祖国的女战士，而且工农赤卫队和红色青年近卫队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女队员。在实现了全民武装化的我国，占人口一半的一千万妇女都做好准备，一旦发生大事，就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手持武器进行战斗。

这支一千万妇女武装队的原型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直属女兵连队。

五　白头山密营

8 月底，当晚熟土豆盛开着花，苦苦等待收获季节到来的火田农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辞别了漫江村，默默地往南行军。

我的战友们，上自团政委金山虎下至年轻的传令兵崔金山、白鹤林，心里都很明白向白头山地区挺进的意义。

从军事地形学上看，白头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要塞，是我军易守、敌人难攻的天险。扩大游击战，再没有比白头山更合适的基地了。高丽时代的尹瓘[4]和李朝时代的金宗瑞[5]也正是以这白头山地区为据点完成了辅国开拓重任的。南怡[6]将军也在白头山的浮石上做了平定天下的宏伟构想。

白头山正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可以依托的天下最好的堡垒。但也不能因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在白头山建立新形式的根据地，加紧向国内挺进，就抛弃过去在满洲大地上好不容易开辟的活动舞台。我们的意图是以白头山为据点，在朝中两国边境纵横驰骋地开展战斗。

我们不仅把天险白头山作为军事要塞予以重视，而且特别重视它所具有的精神上的意义。白头山是我国的祖宗山，是朝鲜的象征，是有五千年之久的朝鲜民族史的发祥地。

朝鲜人多么崇尚祖宗山白头山，这一点只看刻在白头山将军峰下

天池畔岩石上的《大太白大泽守龙神碑阁》字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国家处于存亡关头的 20 世纪初，与大倧教或千佛教有关的人物天和道人建立的这座石碑表明，祈求守护白头山的天池龙神保佑这个国度的百姓永远安宁。

对白头山的崇尚，就是对朝鲜的崇尚，就是对祖国的热爱。

我们从小特别热爱和崇尚白头山为祖宗山，这是朝鲜民族很自然的感情。我们听着高句丽扩张领土时代的扶芬奴和乙豆智的故事，吟咏着南怡将军气壮山河的诗句，听着尹瓘和金宗瑞辅国开拓的故事，深受感动，十分向慕凝聚在白头山的先烈们的爱国精神。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的心里越耸越高的白头山，是朝鲜的象征，同时也成为光复祖国大业的象征。只有占据白头山，才能号召民族的一切力量奔赴抗日的战场，才能保证抗战的最终胜利，这一思想是 30 年代前半期抗日革命斗争的总结，是其当然的归结。

从漫江到白头山，要越过多谷岭。多谷岭覆盖着无边的原始森林，山里的老猎人都很难辨别方向。现在由金周贤做向导，为部队带路。他曾在三个月前作为先遣队被派到长白地区去。他率领的小分队到白头山方面去侦察那一带的敌情和地形，了解居民的动态，探寻适当的密营预备地，还成功地开辟了部队的通路。

我们沿漫江溯流而上，经过幽深的山谷，进入了多谷岭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论季节，当时还是夏天，可是在高山地带，阔叶树已逐渐披上了红叶，开始感到凉意袭人了。

我们在翻越多谷岭的行军路上，迎接了第二十六个国耻日。

我们离开漫江马不停蹄地向南急行军，同被任命为第七任朝鲜总督的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进入汉城，几乎是同时。我们在抚松县城战斗前，已通过报纸知道南次郎将接任宇垣的总督职务，也预计到在我们挺进白头山的时候，他可能同时进入朝鲜。

南次郎进汉城的时间和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白头山的时间几乎一致，这对我们的心理给了微妙的刺激。

日本霸占朝鲜是厚颜无耻的强盗行为，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们一开始就把这一侵略行为说成是合法的、正当的，但是，所谓“合邦”，彻头彻尾是强盗行为。强盗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哲学。他们抢了别人的东西，反而把要求退还东西的主人硬说成是强盗。惯于贼喊捉贼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成是“匪贼团”、“马贼团”、“共匪团”，都是按照他们那种强盗逻辑造出来的。在强盗横行霸道的世道，一切都是被颠倒的。

不速之客南次郎以主人自居，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汉城，而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却要穿过杳无人迹的密林悄无声息地进入自己的国土，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一越过多谷岭，我就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决定经由鸭绿江沿岸进入白头山。为的是要同边境地区人民见面，让国内同胞听到我们的枪声。

我们首次落脚的地方是德水沟。我们部队有一个来自大德水的新队员，他曾在李济宇和亨权叔领导的长白地区地下组织做过多年的青年工作。他名叫姜现珉。他是我们在抚松地区活动的时候参加了革命

军的。他本是牛贩子，带着鸦片做牛的买卖，经常来抚松，后经我们工作员介绍，见了我，参加了游击队。

我们通过姜现珉和金周贤先遣队，具体地了解到了德水沟一带居民的政治动向。德水沟是在长白地区的所有居民区中农村革命化搞得最好的地方。那里有“三·一”人民起义后独立运动者树立的反日爱国斗争传统和通过这一斗争不断得到锻炼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德水沟曾经是姜镇乾领导的独立军的据点。独立军曾在德水沟开办四年制小学，对青少年和农民进行了启蒙活动。

我家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我父亲也曾多次来过这个地方。

由于独立军团体的解散，独立军运动开始衰落的时候，李济宇的武装小组打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纲领的旗帜，开进德水沟进行了军事政治活动。李济宇被捕后，亨权叔就同崔孝一和朴且石一起，以德水沟为据点，在这一带进行了群众思想、组织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在长白地区成立了白山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这个同盟开办政治军事训练所，培养了许多政治工作员和游击队后备力量。朝鲜革命军武装小组进入国内，同盟干部中有很多人被捕，但同盟成员仍在地下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斗争。

我们对受到许多爱国志士和共产主义者的启蒙和教育而革命化的群众基础寄予了期望。

部队一走进德水沟，金周贤就把我安排到他率领先遣队在这一带活动时认定为可靠人物的廉仁焕老人家里。这家是个家徒四壁的农村医生的家。听说，他针法高超，闻名远近，不仅是德水沟一带人，而且长白、临江甚

至鸭绿江对岸的人也拉着扒犁或牛车来请他去看病，可是，他连药钱都收不回来，所以这家老大娘只好每顿饭都用裙子藏着空瓢去讨米。他的家境，跟我家在八道沟和抚松开医院时的情况差不多。

廉老人主动给我诊脉，说我因过度劳累、疏忽饮食而肾气亏损，然后送了我一根山参。听说，漫江的许洛汝老人跟我们分手时也给张哲九和白鹤林各送几根山参，供补养身体之用。

廉老人问我说："听说，日军和满洲国军在抚松被金将军率领的抗日联合部队打得好几百个归了西天，是真的吗？"

看来，抚松县城战斗消息已经传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一回答说是真的，老人就拍着大腿说：

"好了，这下朝鲜可有救了！"

就因为他让我们在他家里住了一夜，给我们做了一顿土豆大麦饭，后来竟被二道岗警察署抓去杀害了。一想起老人遭到的不幸，我现在还心痛欲裂。有一次，我率领小分队经过这个地方，特意到他的坟墓去祭奠。

第二天，我们踩着晨露向大德水进发。到了可以俯瞰村子的山梁上，每人吃几颗煮土豆代替了早饭。我指示李东学连长准备好旗杆，以便高举红旗，吹着军号开进大德水。我是想让那些一时垂头丧气的群众看一看朝鲜人民革命军威风凛凛的雄姿。

大德水群众迎接了我们，个个惊喜若狂。他们说，用一色的新式步枪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几百名朝鲜军队，在大白天，高举红旗，震天动地地吹着军号出现，自从有了这个村子以来还是头一次。

我指示队员架设了临时舞台，准备像在漫江那样为这里的人们演出话剧。可是，准备在午饭后演出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当我们刚刚准备吃午饭的时候，敌人突然扑过来了。双方隔着黄澄澄的大麦地交上了火。

我现在还忘不了当时因为怕已熟的庄稼受害而费心的事。

敌人从大麦地对过顺着地垄向我们逼近。我等到敌人快走出大麦地的时候，发出了射击信号。

这一仗，我们的队员打得挺漂亮。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向二道岗方向逃窜。这是我们挺进长白地区后的第一场战斗。我们在大德水发出第一声枪响，向祖国人民、也向敌人宣布朝鲜人民革命军已开进了白头山。

村庄像过节一样热闹起来了。邻村的人们也都聚集到大德水热烈祝贺我们的胜利。人民打土豆糕、压淀粉面来盛情款待我们，我们的队员以唱歌、跳舞来回了礼。我作了鼓动演说。

对这一演说的反映很好。

有一位蓄着八字胡须的老人说：

"请将军在白头山喊一声'愿意为朝鲜独立而战的人都到这儿来集合！'人们就会从三千里江山各个角落云集白头山的。我虽然年老，驼背，但不管什么事，我还能帮一把。"

原来，讲这些鼓舞人心的话的是小德水的"驼背老头"。这位"驼背老头"，"烟斗老头"也很熟悉。"烟斗老头"任军备团的咸镜南道通信局局长的时候，"驼背老头"在那里当过中队长。"烟斗老头"自豪地介绍了这位阔别十多年的老战友。

“驼背老头”的本名叫金得铉。金世铉是他当了独立军后用的别名。他不是天生的驼背，本来是个身板挺直、膀阔腰圆、十分匀称的青年。他成了驼背，是有令人起敬的缘由的。他是咸镜道生人，在“韩日合并”初的黑暗时期，为了找一条生路，背井离乡，迁到德水沟来。这里是念念不忘家乡和祖国的流浪民开拓的村庄。在这里，他听说成立了一个要光复祖国、开辟回乡之路的军备团，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团。他为了筹措团的经费，甚至不惜让自己心爱的十三岁女儿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为了弄到武器，他还到正在打内战的遥远的俄国去参加了战斗。

可是，他十多年的忘我奋斗，却使他坐了比别的团友更长时间的牢。

每天被迫做十四五个小时的工，用手摇织布机织布。稍一伸腰，监工就用皮鞭和棍棒无情地抽打。如此残酷的劳役持续了七八年，终于压弯了金得铉的腰。

“驼背老头”外表上是个残废，可是他心里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热情却丝毫也没有减弱。他最先被吸收到李济宇的武装小组，并不是偶然的。他说，从见到金周贤的时候起，就一日三秋地盼望着我们挺进到白头山来。金周贤率领先遣队来到长白地区的时候，就已经同他建立了交情。

表演了简单的节目，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我向部队下了撤离命令。村民们恳求我们一定要住一宿。他们说，刚建立了感情就要走开，太不近人情了。我只好向大家说明了部队不得不离开村子的理由：不知敌人什么时候会带着增援队扑过来，所以，只有我们离开村子，你们才能免遭敌人

的洗劫。我们离村的时候，“驼背老头”做了向导。

我送给金得铉老人一本印有《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的小册子。我们挺进到鸭绿江沿岸后第一个送给这种小册子的就是他。不久，德水地区成立了祖国光复会的下级组织。

“驼背老头”是十六道沟一个分会的成员。德水地区的许多基层组织中，他的分会是个最得力的骨干组织。如果当时像现在的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那样制定了模范分会称号的话，他所属的分会就会第一个荣获模范分会称号的。金得铉老人养着好几条狗，都是嗅觉特别灵敏的猛犬，密探和警察都不敢随便靠近他家。

他家的狗很神，能辨别好人坏人。对我们的人，即使是第一次去的人，它们也不吠。金周贤、金确实和金正淑等单独执行任务的小分队成员和联络员，到德水地区，都得到了“驼背老头”的很大帮助。

有一次，金正淑只身到长白县中岗区执行任务。那时正是我们挺进到白头山的那年初冬。当时，单独执行任务的同志不带生米，都带饭团或煮土豆等熟食。在间岛的抗日根据地，单独执行任务的通信员也都是这样。几个人一伙执行任务时，还可以让一个人放哨，另几个人做饭，可是，单独一个人是不能生火做饭的，因为会暴露出是“山里人”。正淑也带着几个煮土豆离开了腰房子，在路上见到饿得嚼着冻干菜叶的老太太和孩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把自己带的煮土豆全都给了那个老太太和流浪孤儿，自己却拖着饿得发软的腿，吃力地走在山路上。她后来说，真不知道怎样走到了“驼背老头”的家。她从昏迷中醒过来一看，“驼背老头”夫妻俩坐在她两旁，手里端着一

碗米汤拿着羹匙抽泣。他们老两口子见正淑苏醒过来，赶忙熬米汤、烙绿豆饼、还杀了一只抱窝的母鸡做炖鸡，尽心尽意护理了正淑。正淑在解放后也曾多次说过：当时如果没有他们的精心护理，她是不可能活着回到白头山密营的。

“驼背老头”多次来过我们的密营。他身体不灵便，却背着支军物资到密营来，还曾瞧空背着人来看我。我们进行半截沟战斗时，也是由他领路的。1939 年，我们在小德水的树林里举行庆祝五•一节大会的时候，他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使我们非常高兴。

1942 年初，我接到了“驼背老头”因病去世的噩耗。

我们在白头山和离开白头山以后，常常回忆起“驼背老头”。

1947 年 11 月，我接到刚建立的万景台革命学院的校服已做好的报告，很想看看穿上了校服的学生，便指示学院派几个学生来。当时，到我家来的孩子当中就有“驼背老头”的儿子金秉淳。后来，金正淑到学院特意找秉淳，把她从游击队时期起一直爱惜使用的自来水笔送给他，嘱咐他好好学习。

1949 年 8 月，金秉淳穿着新军官服，带上排长肩章出现在我和金正淑面前。原来他是被任命为警备排排长来到任的。真可以说是奇缘。从那天起，他一天也没有离开我们身旁。他和我一同为失去了正淑同志而悲伤，也一同去过忠清北道水安堡的前线司令部，又同到慈江道高山镇的最高司令部共过患难。后来他长期在我的身边工作。

我每当感到“驼背老头”的身影萦绕在我心头的时候，就回忆起他在大德水村说的话和小德水台地的月夜……

在小德水台地宿营的第二天，我带部队转移到马登厂树林里休息，我也躺在草地上看书，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时突然响起了枪声。从十五道沟方面和二道岗方面拥来的敌人几乎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扑过来。树林茂密，很难分辨敌我。这是只要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去，就能使敌人对我们的夹攻变成他们自相厮杀的绝好机会。于是我们悄悄地撤出马登厂的树林，登上了十五道沟的台地，在那儿观看敌人的自相厮杀。这就是世称小德水战斗的马登厂观望战斗。

这一天，敌人激烈地自相厮杀，足有三个多小时，连我们旁观者都看腻了。从二道岗方面来的敌人可能支持不住了，先吹起了退却号。听到这号声，从十五道沟方面来的敌人才知道是自相厮杀，于是停止了射击。

“几百名游击队到底哪儿去了？难道升天入地啦？真是活见鬼！”后来听说，对这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敌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敌人找出的答案就是我们会使用“变身法”。从小德水战斗后，在边境一带就传开了我们会使用“变身法”，能“升天入地”、“神出鬼没”的传闻。

那天，敌人担架不够用，把新昌洞老百姓家的门板全都拆去当作担架，抬着尸体慌忙逃走了。从此，新昌洞老百姓有一度不得不用破草袋代替门板。

人民革命军在大德水和小德水发出的枪声，在长白地区和对岸的祖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战斗结束后，我们为土豆地被糟踏而忧虑时，新昌洞的一位农民说：

“土豆地被糟踏了，可是，看到万恶的鬼子兵尸体狼藉，比

看到丰收的土豆地还高兴哩。”

从那以后，德水沟一带有好几个青年报名参加了革命军。这成了在长白地区急剧扩大革命军队伍的大规模参军运动的序幕。

人民革命军的挺进长白地区和显示的军事威力，使敌人大惊失色。长白地区警察机关里刮起了离职隐退风，警察集体地提出辞呈，回避任公职。敌人的统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在二道岗，警察出入集团部落，不敢从前门走，而从后门走。

我们挺进到长白地区后，不仅要行军打仗，还要做教育和团结群众的组织、政治工作。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在德水沟和地阳溪一带都建立了祖国光复会的下级组织。在国内也开始建立了这样的组织。

白头山一带处处成立的这些组织就成了新建立的根据地的可靠政治基础。

小德水战斗后，我们辗转鸭绿江沿岸许多村，在长白县十五道沟东岗、十三道沟龙川里、二十道沟二终点等地连续打了好几仗。敌人统治的鸭绿江沿岸一带就像捅了马蜂窝似地乱成一团。

我们在选择迂回路程时提出的目的，就算圆满地达到了。开进白头山去建立密营的时机到来了。我让金周贤和李东学领路，向白头山密营后备地出发。和我同行的有部队的主要指挥员、警卫队和一些战斗连。对其余人员，我要他们留下来，在长白地区再扰乱一阵。

金周贤、李东学与金云信等人发现的小白水沟是我们在白头山地区选定的第一个国内密营后备地。小白水沟西北四十里左右的地方耸立着白头山，二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仙五山；东北十五里左右的树林中

耸立着间白山。横在小白水沟后面的山，叫狮子峰。

我们率领部队挺进到小白水沟，是同离家很久的主人回到了家一样的喜事。从抗日革命这一历史洪流来看，可以说是把活动中心从东满移到了白头山。

离家在外的人回到家来，对邻居也是个喜事，这是常理。然而在这个一位诗人在诗中描写过的“飞鸟也忍受不住孤寂终于飞走”的白头山深处的小白水沟，连祝贺我们的邻居都没有。迎接我们的只有激荡的树林和潺潺的溪水。祖国同胞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小白水沟。

假若排成队从这里走出一百里地，就可以见到伸出双臂热烈拥抱我们的祖国人民。然而，在那一百里地外却有着用刀枪瞄准我们的来自岛国的不速之客。如果没有那些不速之客，我们就会像白头山的雪崩一样滚下山去激动兴奋地同亲爱的同胞见面拥抱。不过，那个时候，只有打仗才能同祖国同胞见面。我们就是为了打仗才开到白头山地区来，为了打仗才在小白水沟建立了密营的。

那时跟我一同到小白水沟的人们，从未想到过他们视为“温暖的家”的这个深山幽谷，后来居然会成为全世界人民纷纷前来瞻仰的著名史迹地。

我们为了不留足迹，蹚着落叶漂浮的小白水河，逆流而上，走进了山沟。

今天到小白水沟参观的人们，恐怕想象不到这个地方在半个世纪以前还是一个多么原始荒僻的去处。今天，旅游汽车和参观者络绎不绝的硬面公路、不亚于高级饭店的夏令营和宿营村，四季不断的参观

队伍和歌声，代替了过去的寂寥和荒凉。而在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连野兽的足迹都很难看到的原始森林。当时的小白水沟保持着洪荒时代的面貌，它那引人入胜的风景和堪称天险的地势，都被我们看中了。

在小汪清马村时期，我们的游击队指挥部所在的梨树沟，位置很好。谷深、山势险要，敌人不敢轻易进犯，即使敌人进犯，也容易被打退。从狮子峰下的汇流处到白头山密营之间的小白水沟的地形与山势恰似小汪清梨树沟。

梨树沟和小白水沟稍有不同的是，小白水沟比梨树沟更幽深、更优美。越往深处去，这一差异就越明显。到底是白头灵峰的千山万壑中的峡谷，沟壑深邃，山峰巍峨。

天黑之前，我们在将帅峰对面山下和小白水河边搭起帐篷过了第一夜。

我平常很少一夜睡三四个小时以上。同样，我在山里打仗的时候，也是凌晨两点钟左右就醒来，点上灯看书，可是，这一天太累，睡得很沉，没有做到早上看书。

早上醒来一看，夜里下了霜。白头山地区比别的地方冬季长、雪也下得多。这个地区下的雪不容易融化。6 月末或 7 月初还可以看到陈年的雪，9 月下旬或 10 月上旬就可以看到山顶上新下的雪。雪常常积得有一人多深，这种时候，只有在雪里挖隧洞才能通行。到密营外去，就得穿雪鞋套才能走动。否则，就会陷进深雪坑里去，发生意外。

可是，这个时常受到狂风暴雪威胁的高山地区，也有四季的区别，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季节给予的好处。

在进行老黑山战斗的时候，我头一次吃过紫菀，很好吃。用它包饭吃，比用莴苣包饭更好吃。我在长白县十九道沟李勋的家里还头一次吃过北沙参，也别有风味。这种野菜，在白头山地区很多。紫菀，大红丹平原多；北沙参，三池渊附近多；风毛菊，枕峰多。炊事员采来的野菜常常使我们这些白头山“居民”的饭桌别有风味。

在白头山密营定居的时候，炊事员们还在长着拂子茅的地方开了一片菜地种了各种蔬菜。白菜和萝卜都长不好，莴苣和茼蒿却长得很好。有时，小白水的嘉鱼也上了饭桌。当时，小白水嘉鱼并不多，如今，养鱼发展了，嘉鱼也多起来了。

来到白头山密营地的第二天，我和指挥员们一起视察了密营后备地和先遣队选定的兵营位置。而后，开了干部会议，总结了从南湖头到白头山的远征，认真地讨论了准备以白头山为据点进行的工作，并分配了任务。这个会议讨论的以及会后立即付诸实践的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加紧进行白头山根据地建设，这是当时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这包括两个内容：密营建设和组织建设。也就是说，建设白头山根据地，意味着在白头山地区建设密营，在白头山山麓的居民区建立地下革命组织。

我们在 30 年代前半期在东满地区建立的游击区和在后半期在白头山地区新建立的白头山根据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相当的差别。前半期的东满游击区是以固定的游击区作为游击活动的据点的根据地，是有形的公开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我们在后半期

新建立的白头山根据地是依靠隐蔽的密营和地下革命组织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的无形的革命根据地。

在前半期，根据地人民是在人民革命政府的领导下生活的，而在后半期，参加地下组织的人民在表面上受敌人统治，实际上则按照我们的指示和路线行事。

前半期，为坚守游击区而致力于防御，而后半期，就无须那么做了。这样，我们就有了在广阔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由于改换了根据地的形式，因而站到了主动的进攻者的地位。所以，根据地越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也越扩大。

我们的计划是：以白头山密营为中心把根据地扩大到长白的广大地区和国内的白茂高原、盖马高原、狼林山脉以至国内腹地，进而，把武装斗争的烈火烧到北部朝鲜、中部朝鲜、南部朝鲜等全国各地；同时，扩大和发展党组织的建设和统战运动，强有力地推进全民抗战的准备工作。

建立密营网和地下组织网，是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和抗日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首先对解决这些问题予以关注。首先，把建立密营规定为首要的任务，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各部队。解决吃穿问题的任务就交给了金周贤。这两个问题，通俗地说也就是我们的吃穿住问题。

积极物色帮助我们建立地下组织网的人材，开展必要的战斗活动，以鼓舞人民的士气，使他们积极参加光复祖国的事业，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两项任务交给了李东学的连队。

指挥员们立即开始执行为建立白头山根据地而承担的任务了。金周贤和李东学率领各自的连队出发了。其他一些人则单独交给任务派出去。之后，我也带领警卫队和七团的部分人员向黑瞎子沟出发了。黑瞎子沟是我们同在黄公洞分手的部队基本力量约好会师的地方。从小白水沟到黑瞎子沟的路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路上，我看到了仙五山和三段瀑布，的确像是进入了仙境。我们一行找不到路，在树林里消磨了很长时间。我至今难忘的是去大泽温泉的事。我们在树海里，找不到方向，彷徨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向几个方向派出了几个侦察组。其中一个侦察组带来了一位老人。原来老人孤单一人居住在白头山山脚下，到漫江去弄到食盐和小米，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我们的侦察组。我们由老人带路到了他住的大泽的草棚。草棚旁边有一个很好的温泉。温泉的水特别热，把蝲蛄放进去很快就熟得通红。我们在那里洗了温泉浴，用温泉水洗了衣服，煮蝲蛄吃。前些时候，我在电视里看到冰岛人寒冬腊月在野外洗温泉浴，这时，在我眼前活生生地显现出在大泽洗温泉浴的情形。

我跟大泽的老人谈了很多话。我问老人怎么来到白头山山脚下住？老人回答说，原来住在平原地区，看到世道不济，就到祖宗山来住了。

“当然，无论死在哪儿，亡国奴的耻辱是洗刷不掉的，可我还是想到白头山下生活，死也死在白头山下。教我千字文的私塾老师说过，朝鲜人应当心怀白头山而活，枕着白头山而死。他的这些话，真是值得刻在石碑上的金玉之言。”

老人蹙着眉头，凝望着白头山的方向。我仿佛觉得顺着他的视线

望去，就能看到他走过来的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要在白头山下生活，枕着白头山死，老人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人家，您在白头山的偏僻山沟，过得怎么样？”

“挺好。靠种土豆、打狍子过日子，生活虽苦，可是，看不到鬼子的熊样，身子倒好像胖起来了。”

跟老人的谈话，使我再一次确认白头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的坚强支柱，更加确信把白头山确定为革命的策源地是完全正确的。老人在这荒无人烟的白头山下坚强地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真是一位爱国老人。很遗憾，没有问到他的姓氏就分手了。和罗子沟台地的马老人一样，他也有很多书。当我们洗过温泉浴离开大泽前往黑瞎子沟的时候，老人把他的几部小说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后来，我们在大泽温泉办了伤病员的疗养所。

我们一行到了黑瞎子沟后，有一天，在蛟河地区活动的二团的同志也来到了这里。权永壁、吴仲洽、姜渭龙等同志也和这些人一同来了。他们和我开怀畅谈积在心里的话。

他们说，为了找我们吃了不少苦。在这大冷天，他们仍穿着单衣，饿着肚子，奔白头山来，在途中袭击一个木材所弄到了几头牛，其中两头没有宰，给我们牵来了。我看到他们瘦骨嶙峋的模样和破烂不堪的夏装，心里很难受。他们也握住我的手，流下了眼泪。

我让他们换上了新军服，内衣、护腿和劳动鞋也都换上了新的，还给他们发了整套盥漱用具、香烟和火柴。

从蛟河回来的姜渭龙同朴永纯一起，遵照司令部的命令，在黑瞎

子沟、横山、红头山地区的许多地方建立了密营。朴永纯和姜渭龙有一手好本领，只用一把斧头就能在两三天内盖上足以容纳一个团的大原木房。在长白地区建立密营，他们两个人最辛苦了。曹国安的部队来到黑瞎子沟时，看到我们部队的人只用一天就给他们盖上了宿舍，惊叹不已。其实，这也可以说多亏他们两个人。

我在黑瞎子沟住了一些日子后，回到小白水沟的时候，已有许多地点的密营地建起了新的原木房。密林各处出现了司令部和部队的营房、出版所和缝纫所的房子、卫兵所和关卡。

密营的原木房用狍子蹄做门把手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个不值一提的狍子蹄门把手儿，像划分一个历史时期的里程碑一样铭刻在我的脑子里。从狍子蹄成为我们的白头山“住宅”的门把手儿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我们在小白水沟“安家落户”的时候起，白头山密营就成了朝鲜革命的根据地、领导的中心据点。

白头山密营是朝鲜革命的策源地，同时也是中心，是我们的核心作战基地、活动基地和后勤基地。

不久，从这个白头山密营起，密营像扇子骨一样向朝鲜的北部和中部扩展，出现了许多秘密根据地。

权永壁、金周贤、金平、金正淑、朴禄金、马东熙、池泰环等许多政治工作员，为了在三千里江山各个角落燃起革命烈火，从这些密营走向了全国各地；到白头山来找我们的李悌淳、朴达、朴寅镇等许多人民代表也从这些密营带着新的革命火种重新深入到人民中去；我们的部队也从这些密营出征去打击敌人。与革命的命运直接有关的一

切大小事情，几乎全都在白头山密营规划并付诸行动。

朝鲜一边和中国一边，都有属于白头山密营网的卫星密营。

狮子峰密营、熊山密营、仙五山密营、间白山密营、无头峰密营、小胭脂峰密营等是建立在朝鲜一边的密营，黑瞎子沟密营、地阳溪密营、二道岗密营、横山密营、鲤明水密营、富厚水密营、青峰密营和抚松地区的各密营是建立在西间岛的密营。我们根据需要利用了所有这些密营。

白头山地区的密营各有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密营并不只是单纯的秘密兵营，有的还起到缝纫所、修械所、医院等后勤密营的作用，有的起到工作员的中间联络站或住所的作用。

白头山密营网的中心是小白水沟密营。所以，当时，我们把小白水沟密营称为“白头山一号密营”。现在称为“白头山密营”，也称为“白头密营”。

为了保证安全和秘密，这里只有司令部直属单位、警卫队和部分骨干部队驻扎，而且出入也严加限制。当时，不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的部队或个别人来找司令部，我们也没有在小白水沟密营见他们，而到二号密营(狮子峰密营)去见他们。二号密营，迎送来找司令部的部队和个别来访的客人，让他们休息，有时，还为他们举办讲习，对他们进行训练。二号密营是来找司令部的人的报到处、等候处、面谈处和宿舍，也是讲习所和训练所。当时，来找司令部的通信员也为了不留痕迹，从鲤明水方面走到小白水沟口，就蹚着小白水上来。密营的地点，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要是谁都知道了，那就不是秘密，也不是什么密营了。

对白头山密营及其周围密营的地点了如指掌的人，只有金周贤、金海山、金云信、马东熙等执行联络任务的几个人和少数指挥员。

白头山密营和其他密营以及我们住在那里的“居民”，能把自己的存在隐秘地保持到抗日革命胜利，这实在是万幸。

白头山是我青春时代的“家”。这个家的人口，比我小时候故乡家的人口多得多，他们跟我一起在那里沐浴着白头山的雨雪，想象着今天的祖国。

跟我们同甘共苦的白头山开拓者们，现在还在世的已经不多了。这使我们无法及时而圆满地完成作为先辈向后代介绍充满在白头山的山山谷谷的我们党的革命历史和先烈斗争业绩的使命了。

我也没能及时找到白头山密营旧址。

建党、建国、建军、战争、恢复建设等繁多的工作落在我的肩上，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无法抽出时间去看白头山时期的根据地。

朴永纯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叫他们为了后代去找出白头山密营旧址。可是，过去那么机智敏捷的木匠也只找到了亲手盖的黑瞎子沟、地阳溪、横山的密-。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从未去过那个密营。

白头山密营旧址，到底还是我找到了，虽然晚了些。有一次，我好容易有了点空，很想看看经过整修的白头山地区密营，便到那里去了。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有小白水桥的一个地方地势觉得很眼熟，于是我派考察人员到小白水沟去了。我对他们说，到了有一个一百多丈高的峭壁的山沟里，就会有一块不怎么宽的拂子茅地，去找一找。还特地向他们强调，那个山沟山与山相连，从外面看，很难发现。当时，

这一地区还是个那么险峻、令人生畏的去处。有一次，为了开辟鸭绿江沿岸参观路，我曾派责任秘书和武官到现场去考察，不料，他们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吃了很大的苦头。后来，派警卫连去才好不容易找回了他们。真是个不亚于迷魂阵的令人迷惑的去处。被派到小白水沟的考察人员终于在那里发现了标语树，接着，找到了房址和宿营地址。这样，白头山密营的旧貌就展现在我国革命的后代面前了。

今天，白头山成了我国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学习革命的第一代人的白头山革命精神的学校，广阔的白头台地形成了大型露天革命博物馆。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头山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了。实际上，已从 30 年代后半期起，白头山除了自己固有的象征意义外，开始具有了新的意义。

曾是死火山的白头山喷出的“光复革命”的熔岩，引起了两千万同胞的注意。曾考察过抗日革命的烈火燃烧过的各地的作家宋影，把自己的考察记行文集的标题定为《白头山从哪里都望得见》。正如这一标题说明的，从我们占据了白头山时起，白头山就成了无论从哪里都望得见的光复的活火山、革命的圣山。

六　爱国地主金鼎富

自共产主义者登上世界的政治舞台，全世界无产者就提出了“打倒地主、资本家”的口号。我国的劳动群众也高呼这个口号，长期进行了埋葬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剥削阶级的严峻而尖锐的阶级斗争。

有个时期，连国民府的政党组织——朝鲜革命党的左派人物也曾把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宣布为他们的斗争目标，掀起了打倒旋风。

我们并不隐瞒自己的理念和斗争目标。反对那些榨取别人血汗过寄生生活的地主、资本家，这是我们一辈子坚持不渝的原则。我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剥削者。当亿万劳动群众饥寒交迫的时候，挥霍着劳动群众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人，今后我也将继续加以憎恨的。

对于主张公正分配物质财富和实现社会平等的人道主义理念，全世界进步人民都是肯定的。我们反对一小撮有产者及其代表的政治独裁、经济垄断和道德败坏，认为为这一切敲响丧钟是自己的神圣义务。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打倒剥削阶级和对待这个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各个有产者的问题，是要严格加以区别的。比如，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只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和给它当走狗的恶毒的有产者作为斗争对象的。

但是，过去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关系上不进行具体分析，只强调斗争一面，在对待具有爱国反帝思想的地主和民族资本家方面犯了左倾错误。由于不考虑具体条件，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了不分青红皂白，对有产者一律加以清算、剥夺和歧视的死板的政策，在一些国家造成了对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这给疯狂反共的人提供了诋毁共产主义的借口。

现在，共和国北半部已不存在地主和资本家了。阶级教育在高水平上不断深化，所有的干部都把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所有富人都一律当坏人看的片面的见解；认为对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不管其经历如何和有无功劳，都应该一棍子打死的狭隘观点，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

曾因出身成分不好而苦闷的一些人入了党，或者被提拔到适合自己专长的岗位，乐观地生活——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时，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喜幸而感到高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群众心理。这是朝鲜劳动党的宽幅政治结出的宝贵果实。

我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实施了这种宽幅政治，现在也在实行这种政治。真正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们早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就举起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为了把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程度不同的各阶层群众团结成统一的力量而进行了斗争。

我想，介绍一下有关我们同地主金鼎富交往的故事，会有助于理解我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具体看法和我们实施的宽幅政治的历史根源。

我们和金鼎富初次见面，是在 1936 年 8 月底。到地阳溪村去募捐

的小分队，一天深夜里带来了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和其他几个人，说他们是亲日地主。当时我们正在二道岗附近的一个叫马家子的林业村做群众工作。

我在被带来的人的名单中发现金鼎富的名字，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过去对他有所了解，觉得如果连他都被当作“亲日地主”看待，那怎么行呢？听说有些人回忆当时的小分队负责人是李东学，可我记得当时把金鼎富抓来的是金周贤。

我把金周贤叫来，严词责问：

“你决心要打倒金鼎富的理由是什么？”

“那个老头子，土地就有一百五十垧。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地主竟有那么多的土地。”

“我问你，有一百五十垧地的地主就都属于打倒之列，这个法是谁制定的？”

“司令官同志，您说什么法呀？俗语说，一个富翁要灭三个村子。像他这样的一个富翁不止要灭十个村子呢。”

我问金周贤还有什么证据。

金周贤滔滔不绝地说，金鼎富同日本领事馆分馆参事员很亲密；那个参事员从庆尚北道的永川还是什么地方请来一个叫伊藤的日本资本家，叫他给金鼎富提供六千圆巨款经营木材商；金鼎富所以能买辆汽车做大买卖，也是因为投靠了日本鬼子，等等。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还有啊。证据不止一两个。听说，金鼎富当了护林会长兼农村

组合长，三天两头地出入‘满洲国’官厅。他的儿子金万杜也靠他的老子当了几年二道岗的区长。”

那么说，金鼎富连一点长处都没有吗？我这么一问，金周贤有点发蒙。看来，他根本没有收集关于金鼎富的优点的反映，也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些问题。

“优点？那种亲日地主还会有什么优点？”

这位小分队负责人的汇报，句句都是否定金鼎富的。他那自始至终充满主观解释的汇报，不知怎么，使我心中很不舒服。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眼中只有阶级斗争和阶级性的惰性，对金鼎富又没有具体的了解，因此，给我们在向长白地区挺进时定为重要统战对象的金鼎富扣上“亲日地主”、“反动分子”等可怕的帽子，不仅把他本人抓来，连他的儿子也给抓来了。这既不符合我们的统战方针，也违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的精神。

他们甚至把金鼎富家有电话机也当作亲日的证据。说他家安电话，不能看作纯粹是为了过优裕生活的，一定是为了便于搞密探活动的，他打电话，除了领事馆、警察和“满洲国”官厅外，还能给谁打呢，给这些地方打电话，除了告密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呢——小分队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说。的确，当时私人家安电话，这是普通老百姓梦想不到的。

但是，把家里安了电话看作是亲日的标志，甚至看作是利敌活动的工具，这难道不是牵强附会吗？如果所有队员都这样评价人，那么，我们的统战政策就会在实践中碰到严重的困难。这不只是对金鼎富一个人的问题。

在申斥小分队成员之前，我首先在心里责备了自己没有深入地教育下面的人。我在抚松同张蔚华来往的时候，也曾有一些人抱着成见，表示了忧虑。当张蔚华赠送的好几个扒犁的支援物资和巨额的钱到了我们手里的时候，他们才承认资产阶级人物中也有好人。

可是，他们来到长白地区看到占有一百五十垧土地的地主，眼里又生了刺。

承认张蔚华是同行者的人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金鼎富是可作统战对象的人物呢？

这说明，我们有关统战政策的教育工作有漏洞。

我们所说的各阶层群众中，有经历和生活处境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人。做所有这些人的工作，不可能有万应灵丹似的唯一处方。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参考的原则是应该有的。

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政治标准应该是什么呢？那就是，亲日还是反日，是否有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凡是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可以和我们携起手来，相反，眼中没有祖国、民族和人民，只为一己的享乐和安逸搞亲日的人，都是斗争对象，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对金鼎富，我们也从这种观点看待他，把他作为统战对象，而且计划到了长白就致函呼吁他协助，或者把他请到密营来会面。

“依我看，你们对金鼎富的评价是公式化的、不科学的。看人不能那样肤浅。你们以为是亲日地主的金鼎富，实际上是爱国地主。他的历史，我很清楚。你们到地阳溪只听一两个人的话，就随便给人作

结论，说金鼎富如何如何，金下士又如何如何。这都是皮相之见。如果金鼎富是那么坏的地主，那么地阳溪的群众为什么在他们的村子里为他立了颂德碑呢？你们知道地阳溪有金鼎富的颂德碑吗？”

小分队成员们回答说不知道。

于是，我对小分队成员们说：你们如果了解了金鼎富的经历，就不会认为他是亲日地主了；我在这里保证他不是打倒对象，而是团结对象，不是反动地主，而是爱国地主。

“司令官同志，我们不了解司令官同志的意图，错待了金鼎富。我们以小分队名义向他道歉，把他送回地阳溪去吧。”金周贤不禁自咎地说。

我没有表示同意。

“本来我也很想跟他见一面的。不要把他送回去。既然事到如今，我想索性把他带到密营去，豁出工夫跟他谈谈。我替你们向他道歉。”

那天，我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给小分队成员们谈了把金鼎富可以看作统战对象的根据。于是，那个地主的经历，当天就传遍了全队。

金鼎富的出生年代，大概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们到长白地区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的老家是平安北道义州郡清水洞。我在吉林念书时，出生在义州的张哲镐常常很有感情地谈到金鼎富不拘富豪身分投身于独立军运动的往事。金鼎富的儿子金万杜是张哲镐和吴东振在清水洞时的竹马之友。

独立军在长白地区蓬勃开展活动的时候，金鼎富是军备团的南部部长。他拿出家产来给独立军提供了布匹、粮食和其他各种后勤物资。他在地阳

溪开淀粉厂制造淀粉，开水碓房舂好米供给军备团做口粮。

当时金鼎富的家成了在吉林、抚松、临江、八道沟、桦甸等地进行活动的独立运动者来往于长白时的宿舍和会场。从这种关系来看，我也不能对金鼎富老人漠然置之。

金鼎富为后代教育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1920 年左右在地阳溪开办的旧式私塾就是他主管的。他很想让自己的佃户的孩子们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有文化更开明，于是把旧式私塾改为以教授新学问为主的四年制小学，不久又采取革新措施，把这个学校改编为六年制的宗山私立学校，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他把邻村的孩子也都收进了学校。他用收缴的佃租来支付这所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薪金。学校实行民族教育，培养学生自主独立、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

金鼎富家的佃户自愿地缴纳佃租。根据收成，愿意缴纳一草袋就缴纳一草袋，愿意缴纳十草袋就缴纳十草袋。这是因为，金鼎富没有给佃户规定按土地面积和地力交租的具体数量。也就是说，地主和佃户之间连一年的收成中几成给地主、几成留佃户这样的租佃契约都没有订。

曾在地阳溪给金鼎富当过佃户的抗日革命战士李致浩说：从没听说过世上有像金鼎富那样善良和宽宏大度的地主；我们租种他的地，可不知道要交多少地租；我家多次借过他家的米，也从未付过利息，他也不追究，凡事都凭佃户自愿；群众在他家的前面给他立了颂德碑，这不是偶然的；虽说他在地阳溪有一百五十垧台地，其实还不如平原地区的十五垧沃田。

地阳溪的人们一致赞扬金鼎富，称呼他是“我们的大伯”、“我

们的部长大人”、“我们的校主大人”。这的确是少见的事情。

邻近的地主们对金鼎富的德行深为嫉恨。他们怕自己的佃户憧憬地阳溪，羡慕金鼎富的佃户。所以，他们劝戒金鼎富说，不订立契约，让佃户愿交多少租就交多少，你这样发善心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样下去，不到三四年就会倾家荡产的。对这种劝告，金鼎富根本不加理睬。他说，难道没有租佃契约，我家三口人就会饿死吗？佃户的肚子饱了，我的肚子也会饱，佃户饿了我也饿，我就是照这个道理跟佃户互做人情嘛。因为金鼎富是具有这种品德的富豪，所以，“满洲国”的官厅和日本领事馆也不敢慢待他。

小分队成员带来的地主当中还有一个叫金下士的地主，他也是个爱国的地主。他之所以有金下士的外号，是因为他在旧韩国的新式军队中当过下士。他的本名是金鼎七。

金下士十几岁就自愿参加李朝军队，开始了军人生活。他参加过我国第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开化党举行甲申政变[7]时，他曾表示热烈同情。

他那像农村樵夫一样淳朴、纯洁的面貌，流露着坚定的政治信念。甲午改革(1894 年的资产阶级改革——译注)时他属专门保卫王宫的侍卫团，后来转到镇卫队，亡国后投身于义兵活动，义兵运动衰亡，就埋头于生计了。

金下士是在旧韩国末期新式军队所存在的几乎整个期间勤勤恳恳老实服役的军人，是亲身体验了李朝军队的灭亡过程和近代朝鲜所经受的艰危国难的历史见证人。据金鼎富说，他长期满勤，却只当上了

下士，再没有被提升，是因为他是北关人。在李朝当权者眼里，北关是流放地，而金下士正是北关的甲山人，因此而受到歧视。看来，封建朝廷虽然标榜过军政改革，也喊过废除门阀，却没能清算不任用西、北关人的旧习。

金下士虽然是有十垧地和好几头耕牛的地主，却是个思考和行动都进步的有进取心的爱国者。然而，当时我一说金鼎富、金下士这样的人也是统战对象，有不少人就感到莫名其妙，说把有那么多地的人也说成是团结对象，这不是“阶级调和”吗。

当时，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和列宁的论断在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的心目中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指针。因此，我们想同开明的地主携起手来，有些人就责难说这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想把某某资本家变成我们的同盟者，有些人就怕得发抖，说这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实际上这是离开我国的具体特点和我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绝对化，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所造成的后果。

看了说明解放前朝鲜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土地占有关系变化过程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知道，当日本人大地主增多的时候，朝鲜人大地主却急剧减少，沦为中、小地主或者破落了。

日本帝国主义用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办法，打下了总督政治的基础。在这过程中，部分土著地主在总督府的庇护下增加土地和资本，成为向工商业投资的大地主，甚至成为买办资本家。但是，大部分朝鲜人地主仍处在中、小地主的地位。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推行殖民统治而零落的部分中、小地

主趋向反日、爱国(虽然是消极的)，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在我国的地主、资本家当中，既有积极支援了抗日革命的人，也有刚一解放就把土地和工厂全都献给国家，成为普通劳动者投身于新朝鲜建设的人。视祖国和民族的兴盛重于个人致富的这些有民族良心的有产者，没有政治理由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政策，也没有任何感情、心理基础，阻挠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运动。

我小时候也曾认为，凡是地主、资本家全都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虫。

我开始认为有产者当中也不无具有民族良心的人，可以把有产者区分为爱国的有产者和反动的有产者，是我在彰德学校念书时得知白善行给学校捐赠了大量土地的情况以后。

我同张蔚华的关系，成为使我批判地分析研究那些把有产者一律看作打倒对象的人的见解并从理论上加以否定的契机。而通过同陈翰章的关系就更明确地树立了对有产者的看法。

如果我们对这些爱国的人，因为他们是有产者就打倒或加以排斥，那会怎么样呢？那是排斥革命的支持者的行为，那样做不仅会使我们失去这些爱国的有产者，而且会失去更多的群众。群众是不会理睬那种毫无人情的革命的，为之而感到高兴的只有敌人。在阶级斗争中，小小的错误或脱轨，都会成为配合敌人推行其战略的最严重的利敌行为。

我作为游击队队长陷入了不得不为我们人的过失而向金鼎富一行道歉的难堪的处境。

我一下命令，小分队负责人马上就去把金鼎富一行带到我的房间来了。

我为我们的人深夜突然无礼地把他们带来，深深地向他们道了歉。

金鼎富默不作声，以敌意和不安的神情望着我。其他人的表情也都一样。看来，都在担心事情会怎么样。我很想跟他们亲切温和地谈一谈，可是感情不通。在那样冷淡的气氛中，是无法谈下去的。

“不知你们是什么队伍，如果是独立军，就说出需要的军费款额，如果是胡匪，就说出绑票的要价吧。”

在冰冷的气氛中最先响起的是金鼎富带刺的声音。他的话使屋里紧张的心情绷得更紧了。显然，金鼎富及其一行是把我们当独立军或胡匪看的。

所谓绑票是指胡匪和反日部队常用的人质战术，绑票要价是指把人质放回去时要的赎身钱。金鼎富也曾有两三次被胡匪绑架，吃过大苦。

地主一行屏住呼吸盯着我。看来，他们怕我们要多得吓人的赎身钱。

这时，小分队负责人拿来十盒香烟向我报告说，地阳溪村的小铺主人说什么也不要烟钱，只好没有付钱就拿来了。

我问地主一行，地阳溪村的那个小铺主人是什么人。

金万杜说：

“他叫金世一，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是个残废，靠他的妻子替人舂米，勉强糊口。看他家境太可怜，我们给他一些钱，叫他开个杂货铺，于是他就用那笔钱开了那个小铺子。”

我责备小分队负责人说：

“他家那么穷，我看你做得不对呀。因为主人推让，你就不付钱，白白地拿人家的东西回来，这怎么行？”

出乎意料，屋里的气氛为之一变。

不知地主们受了什么冲动，用意味深长的目光面面相觑，喁喁耳语。好像在责备我的申斥太过分了。这是个重新跟他们搭话的好机会。

“这么阴沉的天气，让老人们黑夜里走了远路，实在抱歉。我们常走不熟悉的地方，有时就犯这样的过失。即便我们的同志有些不礼貌的地方，我相信老人们也会海量包涵的。”

我用这些话再一次道了歉，地主一行好像这才放下了心。

“那么，你们这个部队究竟是什么部队？看你们的装束，既不像胡匪，也不是往年独立军的服装……”

金鼎富也好奇地端详着我。

“我们是为朝鲜独立而战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我们的这一回答，就算和长白的乡绅们互通姓名了。

“什么，人民革命军？那么说，就是前几天在抚松打得日本鬼子落花流水的金日成将军的部队啦？”

“对，是那个部队。”

“金日成将军现在还在抚松吗？”

“不，金先生，我没有先报我的姓名，失礼了。我就是金日成。”

金鼎富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会儿，有些不高兴地说：

“不要因为我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就小看我。使用缩地法的金日成将军还会这样年轻？金将军可不同于我们这些凡人。他是连牙齿都长了两行的奇人。”

这时，金周贤插进来说，大家对面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金日成司令官。

金鼎富这才承认我是金日成。他说：我有眼不识泰山，实在惶恐不安，请你原谅。

他朝着金下士说：

“弱冠将军比老将更好嘛!”

金下士也说：光复祖国的斗争不是一两年就能结束的，有了健壮的青年将军，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我们在亲切和蔼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交谈。地主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金万杜甚至提出出乎意料的问题，问我说，有些人说金将军能预卜三日的天气，是真的吗？这使我十分难为情。虽然是荒唐的提问，但我又不能不忍着尴尬的心情回答他：

“说我能预卜三日的天气，那是无稽之谈。不是我能预卜三日的天气，而是我们人民革命军同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能及时得到情报，所以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罢了。我看，人民群众就是诸葛亮。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寸步难行的。”

“将军把我们老百姓视如上天，我们实在惶恐不安。我们理当为将军的大业效劳，望将军不吝赐教，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

“老实说，我们来长白的时候，也很想和诸位见面，商讨这些问题。多年来，我们拿起武器在满洲旷野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血战。我们人民革命军虽然是白手起家的，但现在已经壮大起来，能够到处狠狠地打击敌人。我刚才也说过，要是没有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革命军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强大的力量。为了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解放祖国，全民族就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凡是热爱祖国的人，就不管他是地主还

是资本家，都应当动员起来支援人民革命军。”

看来，地主们从我的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力量。

“凡是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无论谁都有支援革命的义务和权利。金先生在地阳溪台地开了几十万坪火田，不就是为了用钱和粮食支援独立运动吗？正是因为这样，佃农和独立运动人士才齐心协力为金先生立了颂德碑吧！”

“恕我冒昧，将军对我这个老朽的经历怎么如此熟悉？”

“您的大名，通过我先父和吴东振、张哲镐、姜镇乾等先生，熟知已久了。”

“请问先父大名？”

“叫金亨稷。先父在八道沟和抚松的时候，常谈到金鼎富先生。”

“唉呀，真没想到！”

金鼎富眨巴着眼睛呆看着我说：

“我竟不知金将军是金亨稷的儿子……我这个老朽，多年埋没草野虚度时光，变成了连时局有何变化都不知道的庸人。不管怎样，将军的先父和我是亲密之交……今天，看到将军带兵来到印有先父足迹的地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激动的心情啊！”

“见到金先生这样的爱国人士，我也不知有多么高兴。我们的同志不知道真情，委屈了金先生。我告诉他们说，金先生可不是亲日地主或反动地主，是位爱国地主。我们虽然不能像地阳溪人们那样为您立碑，但也不会犯把爱国地主看作亲日地主的过失啊。您把全身心都献给了独立运动，您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

金鼎富流着眼泪，一再表示谢意，说：

“金将军说我是爱国地主，我这老躯立地变成尘土也无遗恨啊！”金万杜也跟着他父亲深深地鞠了躬，别的地主们用不安和羡慕交错的眼光望着金鼎富父子。

金鼎富看出他们的心情，指着他们正经地说：

“将军，其实，他们也不是反动地主，我用生命向将军担保。将军如果信得过我，请不要把他们看成叛徒。”

“既然有金先生作保，我怎么会不相信呢。有您亲自担保，我也不把他们当坏人看了。”

那些地主一听这话，就连连叩首，表示感谢。

头次谈话就此结束了。那次谈话的印象，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如果那次谈话，变成我们对所谓亲日分子的审问或者对他们揭发某种罪行的声讨会，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以愉快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了。

他们当中谁怎样剥削了佃户，怎样协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在祖国和民族面前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对这些问题，我们根本没有盘问。相反，我们肯定他们不是亲日地主，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表示了信任。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改变了对共产主义者的看法。

那天的谈话，不过是互通姓名，敞开了大门。我们想跟他们商量的基本问题全摆在前面。我们的目的，首先是根据《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的精神，从思想上引导他们，使他们尽最大力量从物质上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其次是通过他们把长白一带的乡绅们从革

命的旁观者和妨害者转变为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和协助者。为此，还需要进行很多的工作。

可是，我准备把金鼎富和他的儿子马上送回地阳溪去。

第二天，我去看金鼎富老人，劝他回村去。他一听就跳将起来插断我的话说：

“将军，昨夜我想了很多。这次我能见到将军，真是神明的庇佑……我很早就想为祖国和民族做点事，从各方面尽点力，可是还没有做出什么成就。

“我已经老了，精力也衰竭了，我认识到单靠德行是挽救不了民族的。我正因为在人生暮年找不到为光复祖国作出贡献的路子而发愁的时候，见到了将军，这确实是万幸啊。

“只有把我留在这里，我儿子万杜回地阳溪去，才能拿我作借口送支援物资来。只要我的儿子回去对警察说，要赎回我父亲，就得给游击队送物资去，我往山里送粮食、布匹和鞋，你们也不要神经过敏。这么一说，敌人不就没话说了吗。”

老人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他那句句发自内心的呼声，沁人心脾。

可是，我不能照他的意思办。

“您的心情，我很了解。您的一席高洁的话语，就给了我新的力量。

可是，这儿不是老人可以住的地方。既没有可下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口的饭菜。再说，天气也越来越冷，日本鬼子的“讨伐”也将更加猖狂，您还是回家去才好。”

可是，老人非常固执，怎么也不肯走。他恳求说，他虽然不能当

游击队员去打仗，可是不要剥夺他可以为祖国的独立作出贡献的绝好机会。我只好让他暂留在密营，让他的儿子先回村去了。

我们在密营特别为地阳溪的乡绅们准备了住处，尽心尽意地照顾了他们。尽管山中空无所有，部队所有人员都以稀粥充饥，我们还是把储存起来以备急需的大米拿出来，给地主们做米饭吃；给我们的队员只能供应烟叶，而对他们则招待了香烟。金鼎富还在密营过了生日，也过了 1937 年的元旦。

记得他的生日是阴历 12 月的一天。直到那时他也不想回家。他固执地说，在儿子把约定的支援物资送到之前，不能离开密营。我感到自咎，好像得罪了金鼎富本人和他一家似的。没能把七十高龄的老人送回家，而让他在山中过生日，哪有比这更不近情理的事啊。

我托从事敌区工作的工作员弄来一些大米和酒肉等食品，在老人生日那天，让传令兵背着，一起到老人所在的密营去了。那时候我们给金鼎富办的寿筵，虽然不是山珍海味，但在人民革命军的历史上却是没有前例的。就是在祝贺战友们结婚的时候，也没能准备那样的酒席。当时，游击队员办婚礼，充其量也不过是摆上一碗饭和一碗汤而已。

金鼎富看到酒席，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

“春节还早呢，怎么摆这样的盛馔？”

“今天是金先生的生日，我以人民革命军的名义祝贺先生的生日。”

我斟满一杯，向老人敬酒。

“金先生，数九寒天，让老人家在这深山老林里过生日，实在有

罪啊。今天备了一点薄酒，就当我们的一片心意，请您多喝点吧。”

金鼎富接过酒杯，眼里直淌泪水。

“看到游击队员们为光复祖国，喝整粒玉米熬的粥，经受千辛万苦，我这老躯一天吃三顿热饭，咽不下去啊。何况在这个山里，我这样的老朽还过什么生日，将军的恩情，我终生难忘啊。”

“希望您健康长寿，看到祖国独立。”

“我这个老头子，怎样都没关系。可是，将军可要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啊。”

那天，我和金鼎富谈了很多。

因为严寒袭来，山里积雪很深，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让金鼎富回去，怕老人在深山的雪路上出什么事，让他凑合着在密营过冬。

金鼎富坦率地谈了四个多月的密营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象，这既是他对人民革命军的印象的总和，也是他对他长期注视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概括性的评价。

“老实说，对共产主义者，我过去一向是鄙视的。可是，金将军的共产主义和我过去理解的共产主义不同，你们把地主也分为亲日的和反日的，专打亲日的，这样的共产主义，谁能说不好呢。日本鬼子把游击队说成是‘共匪’，这都是鬼话。这些日子，我吃着游击队的饭，想了很多，也下了新的决心。我还能活几年呀，我要让我的晚年过得有意义，把晚年献给革命，死也要死在支援人民革命军的路上。请你们相信，我金鼎富死活都是金将军一边的人。”

金鼎富来到密营后成了我们的积极同情者。

被我们当作教育对象、募捐工作对象带来的地主当中也有一些是农民所憎恨的地主。金鼎富为他们作了保，还作为长者对他们管得很严，不让他们随便乱动，同时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使他们都走上反日、爱国的道路。

金鼎富为支援人民革命军拿出了三千多元的巨款，还提供了布匹、粮食等各种物资。我们用他送来的布，给部队全体人员做了棉衣和军服。

金鼎富的儿子回到地阳溪后，按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大力支援了游击队。他回村就把从官厅领来的牛卖了十多头，换了一大笔钱。当时，县当局说是要安定地阳溪农民的生活，以信用贷款形式给金万杜贷放几十头牛，让他租给农民去开荒种地。在那以后，他又到县署交了一份保证书，要来二十多头好牛，交给了我们，甚至把他家的缝纫机也作为支援物资送给了我们。

人民革命军挺进到白头山地区以后，敌人强化了对长白地区人民的管束和压迫。金鼎富一家也成了敌人的监视对象。

有一天，金万杜被传到长白警察署受审。

“据情报，你同金日成部队有联系，还给他们送去了大量的物资。你要老实交代，跟他们有什么联系？送去了什么物资？送去了多少？”

金万杜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以为我跟金日成部队有什么私通，我说这是误会。你们所说的私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难道共军还愿意把我们这样的大地主当作它的奸细吗？现在我父亲被扣留在共军密营里，这你们也知

道。做儿子的为了救父亲给他们送点东西，这又怎么样呢？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家产全都变卖了，也定要把父亲赎回来。如果你们遇到我这种情况，不也会这样做吗？”

警察署认为金万杜说得有道理，便没有再追问，放他走了。

金鼎富父子就是这样，为了支援革命军卖掉了很多的地和役畜。

早先，金鼎富为了给独立军提供粮食和资金，开荒垦殖，成了地主。他把支援独立军没有用完的物力和金钱，全都用来支援了人民革命军。对地主、资本家来说；致富就是生命，可是他却撇开了这个念头，为了祖国，毫不吝惜地把不断得以致富的手段——财产，全部贡献了出来。这谈何容易！

这说明金鼎富的爱国心多么深沉、为抗日革命立下的功劳有多大。在整个抗日革命期间，我没见过几个像金鼎富那样以满腔的爱国赤忱，那样豁达大度，慷慨地支援我们的大地主。

后来，《三千里》杂志以他同我的会见记录形式发表了他在密营的所见和感受的片断。

下面介绍那篇会见记录的一部分。

“……一提金日成，国境一带无人不知，看过报纸的人都会记得。

“以总师长名义统率近 X 名满洲人和朝鲜人部下，打袭击战，顽强抵抗军队，指挥山中巢穴者，秘密集结同道人，策划各种大事者，乃何许人也？

“金鼎富翁以极大的兴趣会见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颀长的身躯，洪亮的声音，听其口音，好像是平安道人，年纪

比预想的年轻得多，是个血气方刚的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他精通满洲语，看不出队长的标志，吃穿起居都和士兵一样，与士兵共甘苦，看来很有感化力和包容力。

"'老人家，在这寒冷的地方，该多么担忧啊？'他温和地这样问候之后……

"……

"'……我们年轻人，谁不愿意过舒适的日子啊。一连两三顿连大麦粥都喝不上，甘心受这种苦，都是为了……我也是个有泪、有血，有灵魂的人。可是，在这寒冬腊月，我们还是这样到处奔波。'

"他和想象的有些不同，不像个匪首，说话平和，举止也不粗暴。

"他百般安慰金翁，让老人家放心，说现在是严冬，雪深没膝寸步难行，一开春就一定把老人家送回家去。他还命看守给老人家以特别优待……"

这篇文章是在惠山的朴寅镇的门弟梁一泉写的。看来，金鼎富向在日本当局监视和控制下的报界比较坦率而大胆地说出了他的真心。在严格控制报道人民革命军活动的时候，《三千里》杂志竟敢登载这样的文章，是令人吃惊的。

后来，金鼎富按照我的劝告迁居到了汪清蛤蟆塘。他没能看到祖国的解放，就在那里与世长辞了。

和金鼎富见面的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可现在已过八旬了，也就是说，比金鼎富当时的年纪还大十岁左右。如今，我一想起当年他在游击队密营受的苦，就特别感到痛心。我们虽然竭尽诚意招待了老人，

可是由于条件所限，未免会有不少疏忽之处。为没能更亲切、更优厚地招待他，我现在还于心不安。

我没能为金鼎富迁墓，也没能为他立碑。

回顾起来，我们部队初到白头山地区时，情况非常艰苦，要钱没钱，要米没米，要布没布，什么也没有。而金鼎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物资。那是独立运动的前辈赠给朝鲜优秀儿女的、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礼物。我不能忘怀这个恩情。

金鼎富这样的有产者、大地主的良心和爱国壮举，是对加紧准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抗战作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是对我们事业的有力支持。与 20 年代不同，在武装抗战成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主流的 30 年代，地主或资本家从物质上、财力上和精神上支援我们，就不能不冒着生命的危险。可是，金鼎富却做到了。

这就是我们把金鼎富看作爱国者的根据，也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能忘怀他的理由。

在我们国家的另一半边土地上，现在仍存在着地主和资本家。据说，其中还有资产以亿万计的巨富。固然有反动的有产者，但我相信也一定会有不少爱国的有产者。

在将来统一了的联邦国家里，共产主义者对待地主、资本家的立场和态度会是怎样的呢？只要看看爱国地主金鼎富的事例，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第十四章

长白地区的人们

时期 ：1936.9～1936.12

一　西 间 岛

很早以来，人们就把白头山以东、豆满江以北各县称为间岛或北间岛，把白头山以西、鸭绿江以北地区称为西间岛。

西间岛是 30 年代后半期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过活动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我们所说的白头山根据地，就是指以白头山为中心的西间岛和国内广大地区而说的。西间岛广大地区和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国内建立的白头山密营一起，在白头山根据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想，从这种关系来看，白头山根据地只就中国方面的地区说，称之为西间岛根据地也未尝不可。

过去有些人把白头山根据地说成长白根据地，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恰当的，弄不好就会造成把白头山根据地的范围局限在长白地区等西间岛一带的混乱。白头山根据地不是局限在长白地区的根据地，而是以白头山地区为中心包括了松花江上游和鸭绿江以北地区的西间岛许多县以及国内广大地区的大根据地。

30 年代后半期是以金色大字记录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军事政治活动史册上的特出兴盛期。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建成几十个密营之后，以西间岛为活动舞台投入了执行南湖头会议讨论决定的新的战略任务的斗争。从那时起，西间岛就成了交战次数最多、枪炮声最激烈的战场。

我曾不止一两次地说过，西间岛是个好地方。说它是好地方，固然因为这里是山水秀丽之地，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人好。无论山水多么秀丽，如果人都很坏，就不能把那个地方说成是好地方。反之，即便是不毛之地，如果那里的人们心地善良，也可以说那是个好地方。

当时，西间岛有很多朝鲜人居住。这些贫穷的移民习惯用祖国家乡的名字命名他们在西间岛瘠薄的台地和山沟形成的村子：丰山德、甲山德、吉州德、明川德等等；他们刀耕火种，用土豆勉强糊口，夜里就燃上松明讲檀君[8]始祖或《温达传》[9]的故事，吃力地跋涉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

当地的地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也有朝鲜人，但不多，从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来看，都是些与富农差别不大的小地主。

住在西间岛的朝鲜人，大抵都是由于贫穷没有活路而离开了祖国的流浪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我国后为洗雪亡国的耻辱而踏上了反日独立运动道路的爱国志士。到西间岛的火田村去，随时都能遇到参加过或支援过独立军运动的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独立军老将姜镇乾曾在长白县住过，洪范图、吴东振和李克鲁也曾经过宽甸、抚松、安图等地常来这里。我的舅父康晋锡也曾在临江建立白山武士团，进行过活动。

西间岛还有不少曾在国内各地搞农民组合运动失败后携眷移居这里的人。他们在长白的几乎所有村庄都办起夜校开展民众启蒙运动。李悌淳、崔景和、郑东哲、姜炖、金世玉等在长白地区有名的革命者大部分都当过夜校教师。长白地区有很多来自国内的流亡者和爱国士

绅建立的朝鲜人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在学生中大力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夜校的启蒙教育和私立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西间岛的朝鲜人中涌现出了许多爱国者。

住在西间岛的朝鲜人民族性强，反日情绪强烈，这是由于他们不幸的生活处境养成的一种性格，也是爱国的思想家和先觉者不断地进行启蒙工作的结果。因为居住西间岛的朝鲜人民族性特别强，反日情绪强烈，所以这一带只派一个工作员去，就能很顺利地发动骨干分子，通过他们把很多人团结到组织里来。

30 年代初，我们就派朝鲜革命军出身的工作员到西间岛一带吹起了“吉林风”。这些工作员在这一带建立了许多革命组织。在南湖头和东岗讨论建立新型根据地的问题之后，我们向西间岛一带派去了以金周贤为负责人的小分队。他们到以长白县为中心的白头山周边各村去了解这一带革命运动的情况，掌握骨干分子，进行群众教育，为以后主力部队开展政治军事活动做了准备，在这一带打下了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活动、广泛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坚实基础。这是我们能够在西间岛一带较快地实现革命化的主要原因。

选派训练有素的工作员到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地方去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的活动，就能以非常快的速度促进群众的组织化和革命化，这是我们以西间岛地区为据点进行活动时取得的又一条宝贵经验。

我们在西间岛时发现“满洲国”对这个地区的统治非常薄弱。西间岛一带主要种土豆，征税对象也没有多少。长白县，除县长外，其他官吏只有几个，抚松县连个能够办理土地调查和登记事务的人也很少。因此，官

吏们慨叹说，这一带有很多未经许可就耕种无主土地的人。

抚松地区的警察业务是靠血缘或地缘关系来勉强维持着的。加上，招警察只以射击本领选人，所以警察当中有不少是猎人出身。这些人个个都目不识丁，连盘查行人都不会。因此，行政统治就更无能为力了。

我们来到长白一了解，这里的情况也和抚松差不多。这种情况成了我们在这一带开展群众意识化、组织化工作的有利条件。

西间岛既没有人把朝鲜共产主义者打成“民生团”，也没有人对打着朝鲜革命的旗帜为解放祖国而战的朝鲜人加以非难或阻挠。也就是说，没有人因为我们在别国做房客而看不起我们。这是我们按照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以白头山为中心，在鸭绿江沿岸和国内腹地自由地开展旨在发展抗日革命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我们在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方面也没有受到限制，无论在西间岛一带，还是在朝鲜一边，都能按照我们的构想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党组织建设工作。

一句话，西间岛一带没有人扯我们的后腿。我们愿意攻打城市就攻打城市，愿意建立党组织就建立党组织，愿意率领大部队挺进到国内去就挺进到国内去。

可是，我们过去在北间岛游击根据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那时候，我们渡过豆满江去同国内人民见一次面，也被指控为搞民族主义。我们主张要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东满特委和县委领导班子里的一些人却无视我们的主张，硬要我们建立苏维埃政府，说这是中央的路线。

使我们能够迅速促进西间岛人民的革命化，使西间岛人民积极支持我们的自主的斗争路线的又一个有利条件，是这个地方的人们中没有对俄国的事大主义思想。西间岛的人们当然是向往社会主义的，但没有受多少俄国的影响。

与俄国远东地区接壤的北间岛地区则受了不少俄国影响。这里的居民的日常生活用语有不少是俄语词汇。像现在咸镜北道的老年人把火柴叫做“比几盖”那样，当时北间岛的人们也把火柴叫做“比几盖”。汪清、珲春、延吉、和龙一带的人们提及少年团、集体农庄、支部等词汇的时候，多半不用朝语，而多用“毕奥内尔”、“高尔毫兹”、“雅切伊卡”等俄语词汇。虽然有些人为卖弄自己有学问而故意多用俄语词汇，但大多数人是以此表示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对世界上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人民的亲密感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使用俄语词汇，可以说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朴素的共鸣的表现。北间岛的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哼一两首俄罗斯歌曲。俄罗斯舞蹈也跳得好。游击区的演出节目中有很多用两手交替着拍打小腿，忽蹲忽立，像今天在四月之春友谊文艺节舞台上才能看到的那种俄罗斯舞。

到珲春、汪清等地去，往往可以看到穿上俄式衬衫，大喊世界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赶时髦的共产主义者。

用俄语词汇，唱俄罗斯歌，跳俄罗斯舞，穿俄式服装，憧憬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此过程中北间岛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世界上无论什么都是俄罗斯第一、俄罗斯人第一的对俄罗斯的事大主义。

在北间岛的朝鲜人中也有一些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为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朝鲜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朝鲜革命才能成功。他们不仅多用俄语词汇，也多用汉语词汇。那个地方的人，锹也不用朝语而用汉语说“广锹”。

与此相反，西间岛的人们不用汉语词汇或俄语词汇。和在祖国时一样，他们用纯粹的咸镜道话或平安道话。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朝鲜人，在生活习俗、礼节、饮食、语言等一切方面也都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固有的民族性。

我们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后，走遍西间岛，了解了这一带的自然地理和居民动向，在这过程中我们认定这个地区在各方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于是，我们要在白头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力推进武装斗争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不移了。

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挺进西间岛，是开辟了我们的历史家和人民称之为抗日革命全盛期的伟大时代的壮举。这是给黑暗的民族受难史照射了耀眼光芒的历史性的大事。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朝鲜儿女，在民族命运危在旦夕时，并没有只沉浸在悲叹之中。他们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昂首阔步地挺进到白头山。他们的决心是，时机已到，要同敌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

这样看来，我们自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以来，为了挺进到白头山，做了十年的准备。我在桦甸时就下定决心，时机一到，就要在白头山起兵开展争取祖国独立的圣战。这一决心，经历了许多迂回曲折才付诸实践。我们走过来的几千几万里路，没有一条是笔

直平坦的大道，全都是陡峭险峻的山路。

我们在建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之后，如果从桦甸直奔西间岛，只需五六天时间就能到白头山的。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直达白头山的路，而是先到吉林及其周围地区着手进行建设革命力量的基础工作。直到把活动舞台移到东满以后也还是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培养将带到白头山去的这支军队，也是为了形成将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持和声援这支军队的人民海洋。

在安图刚组织了游击队时，我也曾抑制不住要带部队登上白头山的冲动。安图与白头山近在咫尺。可是，白头山是想登也不能随便登的。与白头山无比庄严的伟容相比，我们的队伍是太弱小、太单薄了。我们还不过是刚出生的雄鹰。虽然头顶上展现着蔚蓝的天空，但我们还没有长出能够飞上天空的坚硬翅膀。要想跨上白头山，就必须扩大队伍，积蓄力量。

白头山并不是想去就可以随时去的地方。想去也不能随意去，白头山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越不能去就越想去，白头山的真正魅力就在这里。

白头山等待着能够打败日本精锐之师的革命军的钢铁部队和钢铁战士。

在建设和保卫游击区的日子里，以一当百的钢铁部队成长起来了，在千百次战斗中造就了犹如火凤凰一样的钢铁战士。在沿着卡伦和明月沟、大荒崴和腰营沟、南湖头和东岗会议指明的前进道路怒涛般向前奔驰的过程中，朝鲜革命充分地积蓄了向白头山挺进的

力量。我们以这一力量挺进到了西间岛。

回顾起来，我们的抗日革命史，是给那些背负着亡国的耻辱，像散沙一样分散的同胞兄弟姊妹以旗帜和武器，把他们引向白头山的过程，是在白头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

其决定性契机是通过在南湖头和东岗的树林里召开的会议创造的。这两次会议后，白头山就成了我们唯一的话题。

祖国在召唤我们，白头山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快去占据白头山，有力地推进建党准备，迅速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网，以殊死的全民抗战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让我们在祖宗山——白头山敲响民族复兴的钟，使所有朝鲜人都振作起爱国精神，为救国而捐躯；要由我们给那些失去信念、畏缩不前的人们以勇气，让他们站起来!要由我们煞住民族离散的逆流，带头创造团结起来挺进祖国的历史!

这就是我们在向白头山挺进时的意志和信念。

我们没有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把白头山看作是通天的路。我们是把它看作祖国的大门，看作深入祖国人民中去的桥头堡。白头山是位于联结西间岛、国内和北间岛的三角地带的重要战略据点。

占据白头山，意味着把国内人民、西间岛的爱国者和北间岛的共产主义者以一条纽带联系起来；意味着保证我们对国内的革命运动、西间岛的独立运动和北间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元化领导。占据了白头山，就能以祖国的土地为踏板同日本取得联系，也能隔着山海关同中国关内的抗日运动相配合，还能经过北间岛实现同北部满洲和苏联

滨海省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的合作。

我们充分吸取了在东满建立和死守游击区时的各种教训，没有像在北间岛时那样把西间岛建设成完全游击区，而是把它建设成半游击区。所谓半游击区，就是指白天是敌人的天下，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说的。西间岛一带的十家长、区长、面长几乎都由我们的人担任。他们白天假装为日本军警和“满洲国”官厅帮忙，一到夜晚就忙着开会，办夜校，为革命军收集后勤物资，舂支援革命军的米。

李悌淳、李柱翼、李勋、崔秉洛、郑东哲、李用述、廉仁焕等同志，可以说是体现着半游击区实况的代表人物。

过去，东满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只建立了解放区形式的游击区，对游击区外的人是冷眼相看的。甚至把敌占区的人民说成是“白色群众”而加以敌视；把中间地区的人民则说成是“两面派群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把群众分成“红”与“白”，这是严重的失策。这种做法，实际上帮了敌人的忙，使敌人对游击区的封锁更容易了。其结果是妨碍了更紧密地团结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的实现。

这一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把整个西间岛建设成了半游击区，不分“红”与“白”，把这一带的所有群众都变成了我们的人。

担任集团部落警备的自卫团团员中也有很多我们的人。

有一次，我们曾到一个叫八道江的集团部落去搞粮食。八道江的自卫团里有我们派去的工作员。我们的小分队接到工作员的通知后，唱着革命歌曲，放空枪，袭击了这个村子。我们没有解除自卫团的武装，只运回了工作员预先准备的粮食。

游击队撤走后，在自卫团里的我们的工作员去找日本警察说，游击队袭击村子，抢去了粮食，可是他们没能占领炮台，多亏有炮台，自卫团才活了下来。就这样骗过了敌人。

西间岛的人们对游击队员开诚相见，而对日本军警和伪满官厅就不这样，因此，我们事事如意。

从我们挺进到白头山地区起，直到大部队开始回旋作战时的三四年间，西间岛是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动开辟并掌握的主要活动舞台。在艰难的行军(1938 年 12 月～1939 年 3 月——译注)以后的时期，我们的主要活动舞台又重新移到了东满。在小哈尔巴岭会议(1940 年 8 月 10 日～11 日——译注)后，除白头山根据地外，我们又在苏联境内建立了另一个根据地，为迎接祖国解放的大变革进行了准备。

总的看来，在抗日革命时期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中心，第一是北间岛，第二是西间岛，第三是豆满江沿岸的张鼓峰一带。这些地区是保证了抗日革命胜利的重要活动据点。

我们继东满地区活动之后，来到西间岛，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敌人的攻势越猖狂，半游击区在各方面就越显得对我们更有利。把西间岛建设成半游击区，变成我们的天下，这就是我们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后在各方面取得了成果的秘诀，也使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把西间岛建设成半游击区之后，我们积极地开展了军事活动。由二十人组成的武装小分队，灵活机动地纵横驰骋于西间岛一带，每天都打击敌人。我们向国内也派了许多这样的小分队。

我们没有开展大部队活动，而是组织小分队分散在各地进行活动，

是为了不给那些以土豆和燕麦等勉强活命的人民增加负担。别说是五六百人以上的大部队，就是以二百人左右为一个单位进行活动，吃饭就成问题。到 1938 年为止，敌人在东满和南满地区完成了“集团部落”化，从此，解决革命军的口粮问题就更加困难了。要弄到吃的，就得打较大的战斗，这就等于拿同志们的鲜血去换口粮。因此，我们决定多开展小分队活动来解决口粮问题。当时我想，宁肯饿一点，也不能让同志们流血。

在抗日武装斗争的直接影响下，西间岛一带人民的反日斗争精神振奋，革命活动得到了加强。

我们来到西间岛同老人们谈话，他们说长白的人们早在 1932～1933 年就听到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传闻。

1936 年初，李悌淳、李柱翼同乔装成鸦片私贩来到西间岛的游击队政治工作员权永壁、金正弼等同志见面，听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情况。他们听到游击队正在重编的消息，就猜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可能要挺进长白地区。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白县各地，甚至传到了国内的甲山工作委员会成员那里。

据说，住在天上水的十家长李用述从 1932 年起就向他的同伙们进行了关于我们的宣传。他号召同伙们说，现在金日成将军正在北间岛进行游击斗争，早晚会带队挺进到白头山来的，因此，大伙一定要坚定信念，继续进行反日爱国斗争。

朝鲜人民革命军活动的消息大大鼓舞了长白地区的青年，他们早就为了参加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在大德水村做青年工作的姜现珉托

付他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再坐等金将军来了。我要直接去参军。我走后，请你们多多关照我的家。"然后他就来到抚松参加了游击队。

我们挺进到长白后，整个西间岛就沸腾起来，掀起了参军热潮。很多青年一见到我们，就跟着来到司令部报名参军。当时我们只接收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要加强地下活动，就不得不把大部分青年留在敌统区。

但是，敌人搞了集团部落之后，我们就把凡自愿参军的人都收进部队来了。因为，这些青年被关在集团部落里，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只会被敌人拉去做苦役。

我们挺进到长白在大德水打响第一枪后，西间岛人民的反日情绪就急剧高涨起来。

十六道沟的老人们看到日军在大德水和小德水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禁不住高兴地说，自古以来，折磨百姓的家伙没有一个不灭亡的，难道日本鬼子就能没事了？青年们也欢呼起来：嘿，原以为朝鲜永远没救了，今天一看，朝鲜并没有完全死，心脏还在跳动呢！

朝鲜人民革命军在西间岛一带一开展积极的武装活动，鸭绿江两岸的人民就编出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传说。信仰天道教的一些老人为了宣传我们部队的威力，说金日成队长会用缩地法，神出鬼没地到处消灭日本鬼子。他们甚至还煞有介事地编出了这样的奇闻：有个警察正在派出所打电话，突然出现一个游击队员朝他开了一枪，他的耳朵就掉了，他要逃跑，游击队员又朝他开了一枪，他的腿就断了。

西间岛的人们编出的奇闻飞过鸭绿江很快就传到了国内腹地。只

要长白的人在鸭绿江边喊“昨天夜晚，革命军打了半截沟！”江对岸三水的人们就能立刻听到。

我们在西间岛进行活动时，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援。现在保管在我们党档案库里的大量回忆资料就很好地说明，西间岛的人们是多么热情地支援了人民革命军。

西间岛的人们诚心诚意地支援了革命军。他们把很好地支援革命军看作是良心的标志；而把不关心革命军，自私自利，只图个人安乐，看作是心地卑鄙龌龊。

我们挺进到西间岛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千方百计地企图切断革命军和人民的联系，使人民无法支援革命军。他们把朝鲜人互相见面握手也看作是染上了共产主义思想，加以监视。在西间岛，一般人要到邻村去也须经村长许可。只许每个家庭有和家庭人口同数的羹匙。敌人不时地进行检查，把多余的羹匙全部抢走，说多一个羹匙也会有助于革命军。

敌人贴布告宣称：砍一个革命军的人头，赏 50 元，抓一个活的革命军人，就赏的更多。至于对我的悬赏就更不用说了，许多资料已广泛作了介绍。有个时候，敌人曾迫使老百姓往山里撒了劝诱归顺的传单，还把放了毒的盐作为“支援物资”送进游击队。

这都是企图切断游击队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的诡计。西间岛的人民群众没有中敌人的这种诡计。敌人越猖狂活动，人民群众就越加强了同人民革命军的联系，越积极地开展了支军活动。敌人为了防备游击队的活动，在每个村子里都搞了夜警队，可是夜警队的人假装巡逻，暗地里却为集团部

落里的地下工作员和革命军放哨，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只要哪个村子有点支援革命军的迹象，敌人就放火烧毁那个村子；凡与支援革命军有牵连的人，不管是老人、孩子都抓去杀害。地阳溪、大德水、新昌洞等村子，就是因为这样被烧光了的。大德水村的一个教师因为给游击队送了一支自来水笔，就被敌人枪杀了。但是，西间岛的人民群众宁死不屈，从未停止支援革命军的活动。

敌人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攻势面前总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而他们却在群众面前虚张声势，好像他们的军队连战连胜似的。我们在小德水同敌人交火的时候，群众曾以为革命军失败了。因为战斗结束后敌人像打了胜仗似地吹着号，抖威风。当群众看到战场上横七竖八的几十具日军尸体时，才识破了真相。

敌人搬运自己人的尸体，却说是在搬运共军的尸体。

我们攻打十二道沟后，当地及其周围一带传遍了关于游击队打了胜仗的传闻。敌人急得把一个日军军官的头高高地挂在北门入口处，扬言说他们杀了共军头目。后来，那个日军军官的老婆跑去看到挂在长杆上的人头便嚎啕大哭：“嗳哟，孩子他爹，你怎么落到了这样的下场！”骗局就被戳穿了。

类似这样的鬼把戏，过去在抚松和临江也演过。

有一次，靖安军为了领到日本主子的奖金，在抚松和临江的街头各挂一个人头和一支刻有“金日成”字样的匣枪，并散布谣言说已完全消灭了我们的部队。可是，曾在临江和抚松和我一起念过小学的同学和一些熟人到现场去看过后，传出了靖安军的宣传是谎话的消息。

于是敌人的骗局就被彻底戳穿了。从而使人们更加深信人民革命军及其司令官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抗战。

敌人用任何手段和方法也未能削弱西间岛人民的反日情绪，未能压制人民对人民革命军的憧憬和支援革命军的意志。敌人的镇压越残酷，群众的支军工作就越加强。

西间岛人民支援革命军的活动，以后再详细叙述，这里只介绍几个片断的史料和人物。

我们路过西间岛的村子时，群众总是拿出乌黑的土豆饴糖来塞进队员们的衣兜里。

西间岛的人们在敌人搞了集团部落以后也积极地支援了游击队。日本鬼子把人民群众全都赶进集团部落，按土地面积和产量严格控制粮食，可是群众用巧妙的方法支援了我们。到了土豆收获季节，他们只收茎叶，不挖土豆，好让游击队来挖去吃。还把带皮的玉米穗放进树林中的仓子里，通知游击队来拿。玉米不剥皮可以防止腐烂。黄豆他们也不收，通知革命军来收。所以，有一年，我们一整个冬天都有豆粘儿吃。

用这种方法给游击队提供口粮，是从西间岛开始的。

咸镜南道警察部长到惠山说了一段有名的话。他说：这次视察了这一带，发现西间岛有问题：第一，西间岛的人分明都私通游击队，游击队在西间岛活动的人数至少有几万人，可他们说给游击队提供的粮食只有三斗，假定有三百个游击队员来，一天就要吃好几斗米，为什么报告说只给了三斗呢，这就是西间岛人同游击队暗中有联系的证据；第二，西

间岛的人都赤化了，如果问西间岛的人见过从山上下来的人或胡匪没有，他们就连小孩子都回答说没见过，可是问他们见过革命军没有，他们就回答说见过，这就说明，西间岛人把游击队看作自己的军队，被赤化了；第三，西间岛成了游击队常年的活动根据地，过去独立军和胡匪一到夏天或秋天就到西间岛来，冬天就到别的地方去，而金日成部队冬天也在这里活动，因此，这一带必须搞集团部落。

这是说明革命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多么密切的生动资料，也是证明人民群众誓死拥护和支援了革命军的宝贵资料。

敌人在西间岛的治安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以致发出悲鸣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成了照亮民众前进道路的灯塔，“为了从共匪和反满抗日匪的影响下夺取民众，使那些匪帮崩溃，就必须指出比他们的政治目标更好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的明确途径，实行民众性政策；也就是说，必须指明比共匪吸引民众更容易地、更圆满地动员民众走向满洲国建国理想的前进路程，实施足以吸引所有民众朝这个方向走的政策；只有以这一指导方针为依据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的国民运动的特殊活动领域，即对匪徒的工作，才能击中政治、思想匪的要害，将其克服掉。”

所谓“共匪”是敌人对人民革命军的卑称，“反满抗日匪”是敌人对一切反对伪满洲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的总称。

敌人用尽一切手段和方法企图扫荡人民革命军，切断革命军和人民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一切企图都未能得逞。

由于日本鬼子的“讨伐”，村子全被烧毁之后，地阳溪的农民因

役畜不足，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下就得耕地，还要出去倒套子，可是他们连一头耕牛也没有。他们商量后决定同县公署交涉，解决耕牛问题，便派姓李的青年作代表带几个护卫的青年去交涉。这个姓李的青年可能是这个村子里最能说善辩的人。

他一到县公署就发一通牢骚说，我们村里的人从没有私通过共军，可是，日本军队无凭无据把我们的村子烧成了灰堆。世上哪里还有这样的冤枉事啊，县公署睁着两眼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把我们的村子变成“良民村”，可是你们眼看着“讨伐队”打进来，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现在什么“良民村”不“良民村”的，都吹了，不是有了牛才能种庄稼，种了庄橡才能吃上饭吗？

他这一诉冤，县公署的人也认为讲得头头是道，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居然答应贷给地阳溪农民二十多头牛。

姓李的青年交涉成功，心里却产生了另一个念头。他想起了山里的游击队正在受苦，连一片肉都吃不到。就是没牛耕地，不能出去倒套子，也得把这些牛送给革命军补充口粮！于是，他就通过县城里的地下组织通知游击队，请游击队在路上设埋伏，到时“袭击”他们一行，把牛牵到密营去。

我们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后，便在县城和地阳溪之间的路上设了埋伏。这个埋伏组把“戏”演得很成功。县公署为了让那个青年把牛安全地牵回村去，还派了伪满军武装警备人员护送。当然，这些人也没能逃脱游击队的袭击。

游击队员们解除了护送兵的武装，并且在他们的面前故意把姓李

的青年和地阳溪其他青年绑起来，说他们都是些为日本和“满洲国”效劳的“坏蛋”和“叛徒”，应该通通“枪毙”，就把他们全都带到密营去了。这些青年到了密营就都参加了游击队。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箭双雕的收获。

这不过是说明西间岛军民关系的一段插话。

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到长白地区后，在一直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持和声援了我们的支军运动洪流里，不仅有工人、农民等基本阶级，而且有被那些沾染了教条主义的部分共产主义者视为斗争对象而受到敌视的阶层。

长白县十九道沟有个叫曹德一的中国大地主。他继承叔父的遗产，三十几岁就成了大富翁，土地就有八十多垧。那里的农田，一半以上是他的。他有六个姨太太，跟警察结了把兄弟。从教条主义者的眼光来看，他当然是打倒对象了。可就是这么个人，却还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

人民革命军在大德水和小德水一打败日满军警，他就吓得带着姨太太逃到长白县县城去，让二地主管理他的家产和土地。

区长李勋争取了这个地主。他争取曹德一的经过是颇有戏剧性的。

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建立了密营后，就派后勤人员去筹办 1937 年新年的年货。我十分重视挺进白头山后的第一个新年。队员们也盼望着过个愉快的新年。负责部队后勤的金周贤为了办年货走遍了西间岛各村。长白地方只有鸭绿江流域的十九道沟种水稻，可是种出来的稻子全数进入地主的粮仓。

政治工作员池泰环通知金周贤说，曹德一家有大量的粮食、肉和白糖。金周贤接到通知后同李悌淳商量好，当即以人民革命军的名义给曹德一写了通知单：我们认为你作为中国人并没有完全丧失民族良心；因此，我们按照除了亲日走狗的财产外所有人民的财产都加以保护的原则，丝毫没有损害你的财产；你应该以实际行动来酬谢我们的这一正确做法，你要想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就应该自动支援革命军；请速回答什么时候用什么来支援我们。

从接到通知单之日起，曹德一关起大门，躺在床上发愁。按照通知单上的要求去支援人民革命军吧，怕日本人知道；不理这个要求吧，又怕革命军的惩罚。姨太太们在床前百般撒娇献媚，他也无心搭理，只是唉声叹气。姨太太们慌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李勋接受李悌淳的指示，就到了县城，想摸摸曹德一的底。曹德一的一个小老婆在街上碰到区长，哀求说：我们那老头子，一连几天滴水不进，觉也不睡，请区长到我家去跟他一起吃午饭，安慰安慰他吧。李勋想这可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便装作不得已的样子到他家去了。

曹德一像遇到救世主一样高兴地迎接了李勋。酒过几巡，他就拿出革命军的通知单给李勋看，并说："老弟，这事怎么办才好啊？"

李勋粗略地看了一下通知单，握住曹德一的手说：用不着那么犯愁，革命军不会杀你，几个月前我也被抓到密营去过，革命军与胡匪不同，他们不随便伤害人命，要是大哥慷慨地资助他们一下，革命军也会受到感动，反过来保护你的。

曹德一一听，就说：财产嘛，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就是怕人家知

道，一旦露了馅，就没命了，我怎能不犹豫啊；区长你有什么好办法，就告诉我，我听区长的。

“要是能豁出财产来，那就献出来嘛，还犯什么愁呢？大哥你跟革命军处得好，我也才能在十九道沟再当几年区长，庄稼人也才能安心过日子嘛。”

听李勋这么一说，曹德一就说：给革命军送东西的事就托给你区长了，千万不能出岔子。

我接到曹德一决心给我们送支援物资的通知后，立即派二十多名队员到十九道沟去了。他们用数十架扒犁拉了六百多斗米、许多口猪和大量的白糖，安全地回到了密营。曹德一从那以后还多次给我们送来过相当数量的支援物资。

使西间岛掀起了革命热潮的支军运动的队伍里，既有当过日本警官的人，也有工地的工头。

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威力面前，三水郡某派出所的一个巡警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人生，决心走新生之路，便处决了派出所的首席和次席，缴了他们的武器，找我们来参加了游击队。林铁工地和伐木场的一些工头见我们军队去就装作被逼得不得已的样子，打开仓库痛快地把后勤物资送给了游击队。二十道沟林场的一个工头甚至公开地给伐木工人、农民和附近的山林队员教唱了鼓吹厌战厌军思想的《亲日兵自叹歌》。

积极参加支军活动的西间岛的知识分子，也是我不能忘怀的。当时，西间岛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教师。这些教师当中，至今印象很深的

是宗山私立学校的姜荣九。他和我初见面的时候说，他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帮凶，没脸见将军。

我对他说："不能把执行日本鬼子的教育政策的人一律看成是坏人。为在异国土地上见不到阳光的我国孩子教书的老师们，还有什么罪呀，虽然被迫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但只要有民族良心，就能为独立斗争作出贡献。"

我这样安慰他，可是他仍很紧张，脸色阴沉，小心地察看着我的眼神。我又说，给孩子们教书，常碰到令人费心思的事吧。他苦笑着说，搞日本鬼子的教育，还有什么值得费心思受累的呢。

那天，撤离那个村子的时候，我嘱咐他说：

"我想奉劝先生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先生不要忘记自己是朝鲜人。要想教育学生坚守朝鲜的精神，先生本身就要坚守朝鲜的精神。"

姜先生没有忘记我的嘱咐。在我们离开村子后，他马上加入了祖国光复会。他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积极参加了支援我们的活动。我们要油印机他就送油印机来，要布就送布来，要粮食就送粮食来，有时他还亲自背着支援物资来到密营。他还利用我们提供的电话机偷听敌人的电话，随时把搜集到的敌情告诉我们。

他从步入人生旅途就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回到祖国仍然当教师。我记得是50年代末，有一天我听说，在平壤某高中当校长的那位老师一味迁就学生，不愿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我把他叫来问他这是否属实，他就深深地低下头回答说，是事实。我对他说：

“我无法相信先生任校长的学校竟会有这种事情。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西间岛时期的往事？”

他说，过去我们的父母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受苦受难，手指甲都磨掉了；而我们的孩子，我要让他们在明亮的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念书，这曾是我毕生的愿望。

当然，他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不让孩子们参加劳动，也不管教他们，而是一味迁就，那么这些孩子们将来长大了，该成什么样子呢？孩子们应该经过艰苦锻炼，让他们背背东西，挑挑担，锄锄地……这样，孩子们才会知道汗水的价值，才会尊重工人、农民，才会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要想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把白头山的革命精神、西间岛人的斗争精神传给后一代。

在那激烈的枪炮声震撼大地的难忘的土地上，西间岛人民和我们一起打下了革命的军民关系的基石，奠定了吸收天道教徒以及爱国的有产者、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广大群众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也开辟了同国内革命者以及广大群众取得联系的通路。在这一伟大斗争中，西间岛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以载入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史册的杰出的爱国者和人民英雄。他们发扬的白头山的革命精神、西间岛人的斗争精神，今天仍然在有力地鼓舞着全国人民。

二 水碓声

一走进倚着白头山许多支脉形成的西间岛农村，就可以看到处处有溪水奔流，可以听到以水为动力舂米的水碓声。明月当空的深夜，远处传来的水碓声勾起过多么令人心酸的乡愁啊。曾舂过伴着朝鲜移民眼泪的稻谷的水碓，自从我们挺进到白头山后，它的用途和意义都变了。

从 1936 年秋天起，长白地区的人民用这些水碓舂好大量的粮食送给了我们。长白地区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水碓，几乎没有一个是与支军工作无关的。水碓作为全民支军工作的象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白头山为据点长期进行抗日战争，应该说是因为有了长白人民积极的支援。

在长白地区，最先开始支援人民革命军的是十六道沟德水沟的群众。

我们来到长白地区首先落脚的村子是上新昌洞。包括它在内十六道沟里的村子统称德水沟。上新昌洞是坐落在两条溪水汇合处的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偏僻村庄。这个村子里也有水碓。

那天，这个村的人们用水碓舂荞麦，做清爽可口的冷面招待了我们。

由十六道沟德水沟的人民开始的支军活动逐渐扩大到王家沟、药水沟、地阳溪等整个西间岛。

每隔几天就有一次由好多人组成的支军物资搬运队，人们或扛或

背着米和布，沿着树林里的秘密通路到我们密营来。

为此而惊恐万状的敌人向长白一带增派武装力量，折磨老百姓。哪个村子稍有点可疑的迹象，就把那个村子烧掉，大肆逮捕和杀害那里的人。

“提供共匪以粮食和金钱或与共匪有联系者，以通匪论罪，立即枪毙。”

这是当时在长白县内各地贴出的杀气腾腾的告示。

敌人严密监视白头山附近的村民，连一双鞋、一盒火柴也不能随便带。但是，人民的支军物资还是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的密营来。

长白人民对人民革命军的支援，是他们从切身的要求出发自愿开展起来的。他们认为只有支援革命军，才是复兴朝鲜的道路。因此，只要是支援革命军，他们就甘冒生命危险，更不怕盛夏的炎热和十冬腊月的酷寒。

我每当回忆起踊跃参加支军活动的长白人民的群像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英化洞村长、组织成员李炳辉——李乙雪的父亲刚直而淳朴的面容。他们三兄弟都是长白地区支军活动的先驱。

1936 年底，我们在黑瞎子沟密营的时候，李炳辉带着英化洞革命组织准备的支援物资来到了司令部。他们带来的许多物资中，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布袜，它的棉花絮得比一般的厚，袜筒也比一般的高两倍。我从一个大包裹里抽出一双布袜子往腿上一比，袜筒竟达到膝盖。

英化洞妇女们的赤诚和精细的手艺，使我深受感动，不禁称赞说：

“这布袜子，做得真好啊！”

李炳辉却红着脸说：

“将军，这长白地方积雪很深。冬天不把脚保护好，就要吃大亏的。”

虽然是初见面，可是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诚实而谦逊，不好表现自己的人。他带领搬运物资的人来到密营，丝毫也不摆出领队的样子，而站在人们背后小心地望着我。

我舍不得放下那双袜子，正翻来覆去地端详的时候，不知谁把背囊解开说：

“司令官同志，您看，这样的大麦米，恐怕日本天皇也没见过。”

我一看，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雪一样洁白的大麦米！这真的不是稻米，而是大麦米吗？大麦米，舂得多么精心，竟然如此洁白，如此诱人胃口！

“大伯，您辛苦了，这样的大麦米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是怎么舂的，舂得这样白？”

“舂了四遍。”

“啊？大麦只要舂两遍不就可以做饭吃吗？你们的赤诚可真是非同寻常啊！”

“我们村的妇女，干活就是这样又勤又细啊。”

李炳辉这回也把功劳全都归于村里的妇女：辛辛苦苦舂了这些米的不是男子，而是妇女；米嘛，只要下功夫就能舂好，别说是舂四遍，舂十遍也可以，这是为革命军的事，有什么办不到；困难就是有密探监视，他们在村里转来转去刺探哪家舂米，舂的是什么米，舂出来的米往哪送；妇女会会员们为了避开这种监视，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她们到惠山集市去买了准备送给革命军的布，缠在腰上或做成尿布的样

子给孩子带上，她们每次赶集都背孩子去，不知底细的老年人就数落她们自找苦吃，可是她们还是背着孩子去，这样才容易把买下的布伪装起来。

李炳辉只字不提男子们的辛苦，只谈妇女们的辛苦。

他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我从背囊里抓出一把大麦米闻了闻，向围着我的人们说：

“日本天皇虽高高在上，却是没有根子的树，而我们是从看不见却很坚实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新芽，天皇怎么能见到我们得到的这种好米呢？”

第二年，通过已加入我们部队的李乙雪，我们才又具体地了解了一些英化洞支军的情况。李乙雪和他的父亲李炳辉一样，也是个不爱表现自己的人。他几乎一次也没谈过他父母的劳苦。不过，也许是他说走嘴了，不知不觉之间谈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母亲为筹措做背囊的布，采摘树莓的故事。

英化洞有很多缺粮户，李乙雪一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家虽然以菜粥充饥，但在支援革命军方面却不肯落在人后。他们夏天摘树莓，秋天摘山葡萄和猕猴桃，拿到惠山集市去卖。每当母亲摘来野果，李乙雪的小弟弟们就围坐在挑选野果的母亲旁边馋得直流口水。母亲十分了解孩子们的心思，却不能痛快地抓一颗树莓给孩子们吃。她认为要是给孩子们吃了，对革命军的赤诚就相应地减少了。

李乙雪参军也有一段故事。那年李炳辉从密营一回家就向孩子们夸耀说他见到了我。李乙雪一听这话就要马上去找游击队，在我

手下作战。可是他父亲没有允许。

“将军手下的战士个个都英姿勃勃，枪法高超，你一个穿麻布短裤，只会使用锄头的小伙子，怎么还敢想当革命军呢？多锻炼锻炼再去吧！”

李炳辉当时拒绝了儿子的要求，然后让他加入祖国光复会的分会进行锻炼。第二年夏天，他就把儿子和侄子送进了游击队。送可爱的子女参军，是支军精神的最高表现。

李炳辉把儿子送进游击队后，仍坚持不懈地支援革命军。

1937 年晚春，我在天上水再次和李炳辉见了面。那时他带来的染料，在举行庆祝普天堡战斗胜利的军民联欢大会做装饰会场的花和旗时用上了。

长白地区人民支援我们的物资，宗宗件件都凝聚着人民群众对光复祖国事业的可歌可泣的精诚。

当时，种火田的人家，四个劳力一年顶多只能收二十担到三十担(一担为二十斗)的土豆。要做一斗淀粉，就需要磨十多斗土豆。当时一斗淀粉的价钱是六角钱左右，卖了一斗淀粉还买不到一双劳动鞋。因此，他们用淀粉酿酒或做饴糖来卖，好多收入些钱。当时，即使手中有了钱也不能随意买东西，每件支援物资都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绞尽脑汁弄来的。长白县的人们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筹办各种各样的物资送到山里。

住在长白县的朝鲜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参与支军活动。甚至那些拄着拐杖才能走路的老人，也到山里去剥来椴树皮，熬夜编草鞋

送给我们。妇女们在寒冷的冬天夜里舂米，为了不引起走狗的注意，不敢燃起篝火，还须轮流放哨。

运送支援物资的事，大都由村长安排。长白县的村长几乎都是祖国光复会的分会长、支会长，由他们安排这事从各方面都较方便。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后勤副官常常故意向村长发出威胁性的公文，要他送物资来。这是为了给村长们提供支援革命军的借口，以便在一旦被敌人察觉后，好推卸责任。村长们接到公文，就装作在威胁下迫不得已的样子，秘密地组织了支援工作。每当搬运队上路时，村民都自愿地抢着要背东西。

在长白县，我们的队员像自己的家一样随便出入老乡家。廉宝贝大娘的一家就是我们经常得到帮助的一家。

据廉仁焕说，首次开拓了德水沟的人是姜镇乾。他在家乡活不下去，带着几个亲戚渡过鸭绿江，在十六道沟的山谷里建立了村子。廉宝贝是姜镇乾的堂弟媳。廉仁焕说，廉宝贝夫妻受到姜镇乾的影响，性情刚直，反日思想强烈。

由于这种关系，我到大德水的时候，去探望了廉宝贝夫妻。那时她给我们端来了用土豆、燕麦和大麦做的饭，显得十分难为情。那样子至今还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她经常把大麦米和燕麦米泡在大木盆里，以便我们深夜去就能立刻给我们做饭。她做的燕麦大麦饭，很烂糊，香喷喷的，很好吃。

夜里烟囱冒烟，会引起走狗的怀疑，所以，她的丈夫姜仁弘把烟囱放矮，再盖上麦秸，让烟从下面冒出去。他们两口子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德水沟的人都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他们以帮助革命军为荣，可是敌人却恨之入骨。

有一次，敌人放一把火一下子把大德水村变成了一片火海。这事令人联想起北间岛“血海”的惨案。当人们扫清灰烬，在炕板石上重新搭起了草棚时，敌人就又涌进来放火烧掉。廉宝贝大娘一家只好搬到新昌洞张磨子去了。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张磨子探望廉宝贝大娘。在这里又听到了水碓声。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个好兆头。因为哪里有水碓声，哪里就有斗争，就有把支援革命军当作最大乐事的人民，就有大火烧不掉、狂风吹不动的朝鲜的精神。我们听着水碓声，觉得那声音好像是人民以支援革命军来继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声。

我带着传令兵，首先去看了水碓房，在那里见到了廉宝贝大娘。

大娘一见到我，就蹲下来抽泣。离开了大德水的廉大娘的哭声充满着无限的悲哀。

“大娘，请您镇静点儿！有什么法子呢，要挺住啊……”我这样安慰她。

原来，这个水碓是大娘一家搬到这儿来新架的。水碓旁边的小原木房就是她的家。

那天，大娘到邻村去弄来一只鸡，做鸡汤，用鸡肉做面码儿，给我们做了淀粉冷面。她这样还觉得招待不周，很是难为情的样子。

我忘不了在长白县的许多村子常常吃过的淀粉冷面，所以现在设宴招待贵宾的时候，也作为别有风味的饮食摆上冻土豆面条或淀粉冷面。

那天夜里，大娘怕水碓声妨碍我睡觉，操了很多心。其实，那是多余的。我听着水碓声反而思绪更顺利，睡得也更好。

大娘一家搬到张磨子来，新架上水碓，并不是为了他们一家的生活，而是为了支援革命军。

但是，张磨子这个偏僻山村也不是人们可以安心生活的地方。敌人的魔爪甚至伸到这个深山里来了。一天，二道岗的警察突然闯进这里来，连水碓都捣毁了，把村里的人都拉到警察署去了。廉宝贝一家人一连三天被拷打得半死不活，用牛扒犁拉回家。被拷打得最厉害的姜老人陷于危笃状态。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人给他们送去了一些治淤血有特效的熊胆。他们一家人用了我送的熊胆，都痊愈了。伤势最严重的姜老人也医好创伤，重新开展了支援革命军的活动。

姜老人有木工手艺。他上山砍来檀木，修理了水碓长杆。他的子女劝他恢复了健康后再干活，可他根本不听。他说：

"你们说些什么？眼下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要支援在山里受苦的战士们，编草鞋，缝制布袜，都那么积极，我胳膊腿都齐全，怎么能躺在屋里睡大觉啊。"

张磨子的水碓又开始舂支援革命军的米了。

我们接受姜仁弘老人的请求，吸收他的儿子姜宗根加入了革命军。我把他分配在我的身边，悉心照顾他。后来，姜宗根不幸阵亡。

十七道沟坪岗德的金世云一家也是诚心诚意支援了革命军的好家庭。

金世云是位忠诚的革命者，他让两个弟妹、四个儿女和亲戚都参

加了革命斗争，并积极地帮助了他们的工作。马国花的爱人金世玉是他的弟弟，抗日革命老战士金益显是他的老儿子。他的大儿子也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打仗打得很好。他刚入伍就参加了间三峰战斗，后来到国内进行政治工作时被敌人逮捕。我听说，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和权永壁、李悌淳等同志一起被关在汉城西大门监狱，于 1945 年春被杀害了。

金世云的家在离革命军密营不很远的偏僻山沟里。他家经常有游击队小分队和政治工作员来往。从国内来找密营的革命者也常在他家住一宿。他家是人民革命军队员和政治工作员免费住宿的“客栈”。他租种中国地主的土地，种出来的粮食几乎全都用来招待了革命者。

权永壁也住在他家领导了长白县的党的工作。

我们的同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师傅”。他接待了那么多客人，不愧是一个“大师傅”。他家的锅足有普通锅的五倍大。用这么大的锅做了饭，用大马勺盛出来招待革命军。客人一多，他本人也下厨房，挽起袖子，汗流浃背地帮助妇女们做厨房里的活。他曾受过严重的冻伤，脚后跟都烂掉了，走路很费劲，是个残废，可是，他能扛着米袋一天来往好几趟水碓房。

他常常跟客人开玩笑说：

“我虽然老了点，可是如果脚后跟好好的，还可以参加游击队当个军需官呢……”

一个佃农户一天要做一大锅饭来招待政治工作员，家里能剩下什么粮食呢。金世云本人也挨了不少饿啊！

长白人支援革命的忘我精神，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有的拿出全部家产，积极支援了革命军，如果需要，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1937年5月，在通往二道岗的路上发现了一个女人和婴儿的尸体，这件事惊动了人们。

原来，这位女人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把一个游击队伤员藏在家里进行护理，不幸被敌人发觉。日本宪兵闯进她家里抓住正在治疗的伤员和这位妇女押往宪兵队去。这位妇女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她离家时悄悄地把一把短刀藏在怀里。在路上，她伺机拔出短刀朝宪兵军官的脸上猛刺，然后，从他的腰上夺取了手枪，让革命军伤员立即逃脱了。她握住手枪守着宪兵军官将近半个小时，直到伤员走远看不见了。宪兵军官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扑过去从她手里夺回手枪，用军刀残酷地杀死了她和她的孩子。

这件事不久就被人们知道了。

有一天夜里，那个妇女的尸体突然消失了。宪兵们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似地聒噪着乱作一团。密探每天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的尸体竟突然消失，真可以说是鬼使神差了。显然是二道岗或附近的革命组织伺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走了的。

长白县有个叫珠家洞的村子。这村里有不少出名的革命者。外号“短刀老头”的金龙锡也是在这一带活动的人。他和那位不知名的妇女一样，也用短刀割断绳子，刺死过押送他的日军军官。金龙锡参加游击队当军需官的时候，战友们给他起了“短刀老头”的外号。从那以后，这个外号就成了金龙锡的代称。他晚年住在平壤的

住宅大楼的时候，邻居的孩子们也叫他“短刀老爷”。

可惜，那位“短刀大嫂”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在那位妇女的帮助下逃出了虎口的伤员显然也没能安全归队。

有一次，我把两个同志寄托在珠家洞的地下组织成员池凤八老人的家里。一个是患胃病的金龙渊，另一个是受了伤的新队员，名字已记不得了。池凤八老人精心护理了他们两个月，老人后来遭到敌人的“讨伐”，牺牲了。

当敌人闯进珠家洞的时候，池凤八老人把两个革命军带到后山藏起来，他独自一个人守在家里。他想，要是他也不在家，敌人就会爬到后山去搜那两个革命军。

敌人逼他交出革命军来，可是他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敌人用皮带无情地抽打他的脸。老人的脸上立刻流出了鲜血。敌人的打骂越凶，老人越顽强地闭口不言。

敌人说要活埋他，把他推入坑里，把枪口对准他的胸膛，逼他快说出革命军伤员藏在哪里，说出来就给奖金，不说就把你活埋，让你在土坑里变成蛆虫。

可是，老人坚决不开口。

气急败坏的敌人，终于把老人枪杀在土坑里。老人在断气前给乡亲们留下了朴质的嘱托：

“你们要好好帮助我们的军队，这样才能早日迎来好世道啊！”

有关池凤八老人牺牲的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珠家洞事件”。我听到金龙渊同志的报告后才得知池凤八老人已经牺牲。

一个一辈子刨土种地的老实忠厚质朴的庄稼人，站在将埋葬自己的土坑里，面对着死亡，怎么能那样泰然自若、巨人一般坚定地屹立着，把生命的最后一刻装点得如此光辉灿烂呢？

好好帮助我们的军队，才能早日迎来新世道——池凤八老人的这一遗嘱，沁人肺腑地启发我们大家认识到，对人来说，信念有多么重要，有信念的人能发挥出多么伟大的力量！

长白县人民冒着危险，甚至献出生命来支援了我们革命军，可是他们丝毫也没有指望什么报答。祖国获得解放后，他们没有一个人出头露面，炫耀自己的功绩。

廉宝贝大娘，在祖国刚解放时，就带着子女搬到惠山来住。可是，过了十多年她也没告诉我们她住在哪里。

1958 年，我到两江道去进行现场指导，才得知廉宝贝大娘住在惠山。我在车站见到了老大娘，她的头发已经披上了白霜。

“大娘，宗根先走了，宗根的父亲也先辞别了人世……今天我见到头发已花白的大娘……”

我喉咙梗塞说不下去了。她的丈夫姜仁弘老人因帮助了革命军而被捕，在警察署遭受严刑拷打，吐血而死。

大娘抱住我，泪如雨下。

“大娘，过去我把您的家当成我自己的家随便出入，可是您……哪有这个道理呀，解放已有十多年了，您怎么不来找我，难道连一封信都不能寄来吗？”我抚摸着大娘粗糙的手埋怨地说。

“咳，我怎么不想到平壤去见将军啊，可是想见将军的人何止我

一个人呀。要是都去找您，您天天那么忙，能办好国家大事吗？”

过去，一听说我们来，就不顾跑掉了鞋子，一直跑到村口来迎接的热情的长白人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以后，却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地过着日子。

我很快就把廉宝贝大娘接到平壤来，在风景优美的大同江畔选定了她的住房。

抗日革命的日子里，用鲜血支援了我们的长白人们，都是这样的人。

前面简单提到的金世云，从 1937 年秋季起也回到国内，在云兴、普天、茂山、城津(金策市)等许多地方建立了地下组织，保障了支援人民革命军的工作。后来，他又渡江到图们，乔装成车把式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直到祖国解放。令人惊叹的是，他一个两脚残废的人，居然和健康人一样驰骋于广大地区进行地下活动。他从不显示自己做的事。有关他国内活动的资料，过了好多年才为我们所知，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

这样的人不只是金世云一个人。

当时西间岛的大多数人是祖国光复会会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功臣和英雄。

敌人为了切断人民革命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搞了集团部落，还企图用炮台、土城和铁丝网截断支援人民革命军的洪流，可是敌人未能阻住西间岛人们的心奔向白头山的激流。集团部落里的自卫团长、村长以及城门守卫，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人，因而敌人搞的集团部落，就成了天下大笑料。

白头山根据地比东满根据地离居民区远得多，而军民的联系却可以说更密切，相互的感情也更热烈。相信人民，选定白头山为朝鲜革命新的策源地时，我们寄予人民的期望并不是徒然的。抱有纯洁的爱国衷情和对革命军的无限深情的白头山根据地人民，开展超越我们的期望和想象的支军运动，使敌人大惊失色。

长白县人民是树立并发扬了革命的支军传统的英雄人民。支援革命军的活动发展成为包括了各阶层、各村各户、男女老少的全民运动。我们以这种支援为后盾，在同敌人的艰苦斗争中创造了百战百胜的奇迹。

看着在广阔的西间岛大地上奔腾向前的支军洪流，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组织起来的人民有着多么伟大的力量。只有三家农户的台地和山沟里也都有我们的组织。只要派个通信员给这样的小村子送去一张字条，告诉他们革命军要到他们那里去，那么，即使是深更半夜酣睡的时候，他们也都从卧铺上跳起来奔走相告：革命军已到十里外，要到我们村来吃饭，大家快作好准备让他们吃上一顿热饭。人民就是这样对待革命军的。

一张字条就能发动和号召全体西间岛人民一起奔向白头山，也能让他们攀到白头山顶高呼“朝鲜独立万岁”。因为从 1936 年秋天起，西间岛人民已成为按照我们的口令行动的组织起来的人民。

我国有则俗语说，珠玉三斗，成串才为宝链。西间岛的人个个都可比做珠玉。把这些珠玉变为宝链的正是把西间岛变成了我们天下的祖国光复会组织。

如果我们没有把西间岛人民组织起来，那会怎样呢？那一个个珠玉就会被各个击破或者被埋没在土里失去了光彩。无论是多么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单独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常说，对干革命的人来说，最大的财富是组织。对向往自主化的各国革命者和人民来说，组织的意义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并不因为时代不同了，组织的作用就变小，也不因为革命不断胜利，就可以削弱人民群众的组织化。群众的组织化，不仅为夺取政权所需要，而且在夺取了政权后为国家的建设也需要，在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为在其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革命也是需要的。正如革命没有尽头一样，使群众组织化的工作也没有终点。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生理”，是所有为建设发达的社会而斗争的人必须重视的规律。

我们现在也在使人民群众组织化，而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也将不断地使人民群众组织化，并依靠组织化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永远繁荣发展的自主的社会，铜墙铁壁般地保卫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社会制度。

无论是 40 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抛出“日苏睦邻政策”来欺骗世界人民，叫嚷什么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孤军独战”，对我们的斗争泼冷水的时候，还是德国希特勒以破竹之势向莫斯科进攻，说什么共产主义者到了“悲惨的末日”的时候，我都想着汪清和长白的水碓，从中得到了力量，坚定了信心。

在同自诩为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家的军队作战的、战火纷飞充满考验的日子里，我也回想着长白的水碓，确信明天

的胜利。我说对水碓的回忆使我对胜利坚信不移，也许会有人感到奇怪，但这却是事实。

我在来往于长白地区各村的时候，确实通过那些水碓看到了人民对我们的绝对爱戴、支援我们的坚定意志和宁死不屈的气节。

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曾和李克鲁先生一起在秃鲁江(将子江)畔散步，向他介绍过长白的水碓。

我们在白头山的时候，长白的人们用水碓舂米支援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挨饿，进行了战斗；敌人烧毁村子，破坏了水碓，可是水碓声却没有中断。并一再强调了只要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就能打败任何强敌。我还对他说，当时长白的朝鲜人只要有小溪水就架上水碓，有效地加以利用，而现在放着这么大的秃鲁江不去利用，太可惜了，战争结束后要拦住这个河流建设一座大水电站。

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形成的支援军队的传统、军民一致的传统，经过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更加巩固了。

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所以能够战胜世界“最强”的国家，是因为敌人几乎只动员了纯粹的军事力量，而我们则全体人民发动起来，军民团结一致进行了战斗。

我们的光辉的支军传统、军民一致的传统，今天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更加灿烂地得到继承和发扬。

目前在我国，无论哪里都活跃地开展着“我们的村子、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村子”运动，人民帮助军队，军队帮助人民。特别是，金正日同志被推戴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之后，这

一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的所有工矿企业、农场、街道和学校。

这种军民关系，是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建军史上都看不到的，是朝鲜的巨大骄傲。正因为有着这一军民团结一致的伟大力量，我们在任何敌人的威胁和恐吓面前都是毫不动摇的。

我认为，一心团结、军民一致是朝鲜革命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在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听到的水碓声，现在仍萦绕在我的耳畔，同时许许多多长白人的面容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在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绞刑架上从容就义，有多少人在监狱里牺牲，又有多少人为支援革命军在白头雪岭奔走时受冻而死啊！

一想到他们的恩情，我就不由得肃然起敬，感激不尽。

三　李悌淳

我们一到达白头山地区，就加速推进了密营建设，同时积极地开展了在朝鲜人聚居的居民区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

首次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网的地方，选定了直接与白头山相连的长白地区和国内的甲山地区。若要万无一失地完成这项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找到一些能够豁出生命帮助我们工作的可靠的人。

我在西间岛派遣小分队时，曾对李东学连长一再强调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发掘人材，要找遍长白地区，务必找到可信赖的助手；至于打击敌人是次要的，打得胜就打，否则就避开。

李东学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带着李悌淳回到了密营。李东学，这个人看起来性情狷急，办事操切，实际上倒是个老成持重，做事稳妥的人。他说话非常快，头一次听他说话的人无不目瞪口呆。皆因为他一向以急如星火的言语催促队员，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颇大急”（译音），很可能就是“催人颇急”的意思。

起初，李东学带着自己的连队巡游长白地区时，在二十道沟台地上碰见了一个年轻的村长，就是李悌淳，后者正领着一群青少年做早操。他的村子叫新兴村，他既是村长，又是夜校老师。新兴村的男女老少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先生”。

李东学打算先试探试探他的为人，就跟他要了一个连队够吃两三天的口粮。村长当即用最短的时间就收集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多得全连的人都扛不动——他还说要帮游击队把粮食运到密营去。李东学看他不仅做事很有办法，而且气量也大，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李东学很想把他直接带到司令部去，哪怕以后受到做事冒失的批评，也顾不得了。于是，当村长表示要帮他们运粮食的时候，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颇大急”想，万一敌人知道了村长主动带着村民们帮游击队运了粮食，就会惹出许多麻烦。考虑到这一点，他就让队员把李悌淳捆绑起来，像押送大罪犯似地押着上路了。

从新兴村出动的粮食运输队，第三天才走到了密营。还在离密营二三十里远的地方，李东学就请老乡们都回去。这时，李悌淳恳求李东学准许他跟到密营去。李东学故意作出一副为难的表情，说：

“这可不行。那是我们的秘密据点，我们凭什么信任你，带你去呀？”

李悌淳拉着李东学的胳膊，提出了奇妙的建议：

“那么，你考我一下不好吗？比方说，可以把需要豁出性命来干的事儿交给我去做嘛。”

李东学同意了，限他三天之内做好五双长统棉袜和五副裹腿送来。告他说，你要是把这些东西按时做好送来，就带你到密营去；如果不按时或者空着手回来，你就算落榜了。

李悌淳说，这点儿小事还办不成？拿这种事儿考我，我是有把握考上的。

他回到村里，就叫妻子和岳母把妻子结婚时带来的仅有的一床被子拆

开，连夜做好五双长统棉袜和五副裹腿，赶早儿带到了接头地点。

李东学突然一把搂住李悌淳，作了自我介绍，亲热地告诉了他自己的外号叫“颇大急”，还告诉了自己的老家是什么地方，这才说：“这么着，是我把你家仅有的一床被子毁掉了。”李悌淳就这样被“录取”了。

我在白头山地区转了一圈后回到密营来的时候，李东学对我说，他在新兴村物色了一个好青年，很想给司令官介绍，就直接带到密营来了。接着把李悌淳夸了一番。据他说，李悌淳来到密营后，一连几天埋头阅读队内书刊，一刻也不休息。他性格顽强，勤奋好学，几天之间就跟着游击队员学会了枪械装卸法，甚至学会了方位判定法。

李东学说：“他聪明，耿直，革命觉悟高，是个热情人。而且人很随和，这么几天就跟我们的所有人都搞熟了，是个很有群众观点的人。”

如果李东学没有夸张的话，那么对这个新兴村村长的总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

李悌淳长得清秀，像个女人。他起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对老是微笑的眼睛。看他的外表，好像是个老实和气、心软懦弱的人；实际上，他练就了纯钢一样坚忍不拔的意志、磐石一般不可撼动的信念、冰霜一般冷静而明晰的思考力，是个既刚强又理智的人。

他出生在贫农家庭，从小受尽了苦。因为家境贫寒，从未跨过学校门坎，老早就跟着母亲给别人打短工，除完了草又收割，从十岁起便到邻村给地主扛大活。他十一岁那年，有一天傍晚，正在长工房里打草鞋，母亲突然来看他。是他多么想念的妈妈呀！可是他连头都不

抬一下，直到母亲拉开房门进来坐在他旁边的时候，他也不瞧一眼。母亲问他怎么啦，他仍然一声不响，只顾打草鞋。他那可怜的母亲，连儿子的一句体己话都没听到，就难过地迈出了门坎。李悌淳这才放下手里的活，追上去哽咽着说：

“妈，你再也别来了。妈来，东家就更瞧不起咱们了，他们以为你是来讨什么东西的，小看咱们呐。”

母亲忽然明白了儿子的心境，情不自禁地抱着孩子瘫坐在路边，悲悲戚戚地哭了。她跟儿子说，不管多么想你，我再也不到地主家来了。

李悌淳虽然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是靠自学掌握了中学毕业程度的文化。作为一个勤奋好学的少年，他从十四岁起，上了几年夜校，又跟哥哥学了国文，成家以后又天天夹着词典自学。他没有上过学校，他把这当作一辈子的憾事，所以他很同情穷人家的子弟。他一搬到新兴村来，就为刀耕火种的穷苦庄稼人子弟开办了一所夜校，积极进行了启蒙教育。

他在家乡的时候，加入少年会和青年同盟，过了几年组织生活。自从他哥哥被关进监狱以后，他也受到了日本警察的监视。在敌人不断的迫害和欺压下，他感到了危险，于是在 1932 年初就迁到了有他岳母家的甲山。当时正是朴达等先觉者们在这一带积极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的时候。李悌淳便同他们一起在五丰洞一带组织秘密读书会，进行了对新思潮的研究。

秘密读书会的成员都决心投身于正义斗争，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国家与民族，但都苦于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略。他们为了找到正确的斗

争道路和有声望的领导人，同各地挂上了勾。这当儿，他们偶尔遇到一些在山区活动的农民组合、劳动组合的人，可这些人也没有明确的斗争路线和策略。

李悌淳的注意转向了朝鲜人民革命军。1934 年前后，国内已传遍了人民革命军要开到长白地区来的风声。李悌淳打消了准备到珲春去的念头，一径来到了长白县二十道沟的千哥德。那些开拓了千哥德的移民，后来给自己的村庄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新兴村。

打新兴村到普天堡，直线距离不算远。站在村子里，可以望见枕峰、小白山、坤长德和白头山。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营生，这对于在异国土地上按捺不住乡愁的李悌淳来说，倒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慰藉。然而，官府的压迫和生活的穷困，形影不离地尾追着移民。佃租、拉夫、苛捐杂税，压得可怜巴巴的烧荒农民都直不起腰来。每逢节日，地主逼迫佃户送礼，甚至地主家的烧柴也都叫佃户去打。岂止这些，就连江对面朝鲜境内佳林里、泉水里的警察也发号施令，强迫长白地区的朝鲜移民给他们供烧柴。巡警搜查民房时常常从农民的鸡窝里把刚下的鸡蛋抢去。烧荒农民充其量只能吃到大麦饭或燕麦糊糊。

新兴村六十多户农家，喂牛的却连一户也没有，可见他们烧荒种地该是多么艰苦!他们都用人力拉犁耕田。有一对年轻夫妻在春耕时有过这样的事：他们没有牛，整天靠肩膀拉犁翻土。开始，妻子掌犁，丈夫做牛拉犁；后来，改由妻子拉犁，可是插在地里的犁一动也不动。丈夫急了，不由自主照着在家乡赶牛犁地时的习惯，大喊了一声“驾!”妻子听见这么吆喝，气得趴在地头哭起来了。丈夫很失悔，说自己说

走了嘴，请她原谅。然后自己也颓然坐在地上，叹息道：这个田鼠一样的庄稼人的苦命，到啥时候才能完呐！

这种生活处境，就是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有利基础。

当时，托足在新兴村的大都是从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来的穷苦农民，有些人加入过农民组合或青年同盟等群众团体，进行过反日运动，后来为寻求新的活动舞台，才选择了这条出国流亡的道路。后来在祖国光复会新兴村支会和当地党特别支部工作的金丙哲，也是原在国内进行过活动的流亡者。

金丙哲在国内时常常对同志们说，农民组合要想在斗争中取得成果，就必须开辟一条能够接受朝鲜人民革命军领导的渠道；他坚定地认为，没有革命军的领导，国内斗争必不能胜利。他的这一主张，赢得了许多同志的支持，但也有些人对它表示疑虑，说很难同革命军接上关系。金丙哲下定决心，就是他一个人去找，也一定要找到游击队，于是毅然决然搬到了他的亲人至友活动的长白县新兴村。

在国内人士中，金丙哲第一个认识到了海外的武装斗争和国内的政治斗争二者不可分离的关系和实现其一元化的必要性。他不但是个跳出空谈的圈子，将信念积极付诸实践的人；而且是成功地实现了同革命军的联系之后，在贯彻我们的路线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的先烈之一。

李柱观、李柱翼等朝鲜的爱国者，于30年代初在长白地区组织在满韩人赤色农民组合，开展了群众斗争。这个农民组合先从反对迷信和赌博、反对早婚和买卖婚姻、扫除文盲等启蒙运动开始，逐步开展佃农斗争、反对强制征工等经济斗争，终于把农民运动引向了反对和

破坏军用公路、军事设施的建设这样的反日政治斗争。

我们在长白地区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以前，新兴村周围一带的群众斗争，就是由这个赤色农民组合起主导作用的。

一句话，李悌淳是个像一张白纸一样纯洁的人。他的生活经历也较单纯，没有被赶时髦的社会活动者和宗派分子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斗争方式所污染。对他的单纯我们反而认为是更有价值的。因为移植在没有污垢的头脑里的思想或主张，不会被玷污而变模糊。

在李悌淳所说的他在进行反日爱国运动过程中领会到的人生哲学中，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说，在人所做的事情中，最困难的乃是起到先驱者、领导者的作用。换句话说，别人做一件事的时候，自己做两件、三件事；别人走一步的时候，自己走两步、三步，那是最艰苦吃力的。

他的话，的确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它道出了站在别人前头开拓改造社会的艰险道路的革命者的苦衷。

“是啊，既要种地，又要当村长，还要干革命，苦得很吧。”

听我这么一说，李悌淳又笑着说道：

“的确苦不堪言。不过这个苦，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乐。处在这黑暗的世道，如果干革命的苦都尝不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做群众工作，是最大的乐趣；争取到一个同志，是最大的喜悦。我问他在争取群众方面最难争取的是哪一种人，他回答说是老年人。他还说，只要有个大体育场和大礼堂，别说启迪一个村子的群众不成问题，就是一个面的革命化也能做到。

对李悌淳的群众观点和他对群众工作的看法，我表示了完全赞同。

李悌淳在群众启蒙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办“家庭夜校”。所谓“家庭夜校”，指的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办的夜校。这样的夜校不分男女老幼，一家人全都参加，而且每天晚上都上课。李悌淳也在家里办了这样的夜校，他每天晚上都挽起衣袖给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上课。由于办了这个“家庭夜校”，李悌淳一家成了没有文盲的家庭。

我在了解李悌淳的群众工作时，问到他那些给密营运来了东西的十家长，动向怎么样。

他回答说，他们的表现都好，只有李东学连长带来的千氏地主的养子有问题。那个养子误以为革命军是“土匪”，来到密营后一直显得皇皇不安，害怕游击队杀他。

我悄声问李悌淳说：

“且不提李东学连长是为了募捐才带他来的。我先问你有什么想法，怎样处理那个地主的养子才好？”

李悌淳仿佛早已胸有成竹似的，毫无保留地吐露了自己的看法：

“我想游击队是不会害他的。他在名义上是地主的养子，而实际上跟地主的长工没有两样，是个可怜的青年，而且也没犯过什么罪。”

他那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考察问题的恢宏气度和独特的思想方法，使我不禁感到了惊异。他对那个千地主的养子的看法，是和我们的看法一致的。李东学从多方面进行开导，终于改变了那个地主养子对我们的误解，以至于主动提出了入伍申请。我们根据他本人的志愿，接

收他加入了革命军。我们打二十道沟战斗时，他做了向导，后来却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了。

的确，李悌淳是个人人喜欢的性格特殊的汉子。他是能够使长白地区革命化的最合适的人选。只要教给他必要的知识和方法，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决定交给他在长白地区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可是他本人却渴望着参军。

他缠着我恳求说，他趁我们出去作战的时候做了点准备，要求我准许他参加入伍考试。

听他说入伍考试，我不禁大声地笑了，对他说：

“这倒不必了，‘颇大急’已经录取了你嘛，算你已经有资格入伍了。你要是非入伍不可，我们可以随时吸收你。不过，我倒有个想法，要是交给你别的任务，对我们的革命会有更大的帮助。”

李悌淳摸不着头脑，问道：

“别的任务？是什么？”

“与其当一名射击选手，不如去搞一个大的组织，支援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打败日军。你看怎么样？”

“要我去搞一个大的组织？”他掩饰不住惊讶地问。

“是的，就是要你在你们的新兴村以及鸭绿江沿岸，到处把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建立起来。”

我着重说明了把广大的各阶层群众团结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聪慧的李悌淳说，那就要做地下组织的工作，可是自己没有能

力，能否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自己没有把握。

“这个用不着顾虑，学会了就能做。天生的革命家是没有的。不管是谁，只要抱定干革命的决心，在实际斗争中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学习，积累经验，就能成为一个革命者。有关工作需要的常识，我们会告诉你的。”

我们专门为李悌淳办了一次讲习。讲习的主要内容是朝鲜革命的性质、路线和战略与策略，这都由我讲授。《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祖国光复会章程、共产国际历史，由李东伯讲授。仅仅为一个学生，由好几个有能力的老师轮流讲课，办了一次内容充实的讲习，我记得这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李悌淳在讲习结束后离开密营的时候，充满感情地说：

“我是背一斗米来，满载革命食粮而归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现在，请交给我任务吧。要是交给我一个地区，我就一定在这个地区所有朝鲜人的村庄都把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建立起来。”

我们决定叫他负责做长白县上岗区地方的工作。

李悌淳在动身前要我给他写一份介绍信。他说，只要有一份盖了我的印章的介绍信，就能把大量的群众吸收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而且工作起来也会相当容易。

我照他的要求，给他写了一份介绍信，并且在我的名字下边盖上了我的图章。

李悌淳接过介绍信，提出保证说，半年内一定把上岗区一带变成我们的天下。他的实际工作成绩，证明了这一保证绝非虚夸，此是后话。

那天，李悌淳对我说：

“将军，我有个愿望可以讲吗？不是别的，要是我在离开密营以前能穿一下游击队的军装，就算死也没有遗恨了。”

“这点事还不能满足？你就穿一下好啦。”

我欣然答应了他。由此也不难看出他是多么渴望参军了。他决心为光复祖国的地下工作献出自己的一切，同时也把志愿参军的渴望珍藏在心间，始终不渝。当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抱着进而吞并中国大陆以至整个亚洲的野心，疯狂地奔向新的世界大战的时候，愿意穿上军装投身抗日大战，的确可以称誉为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

那天，我叫李东学连长从仓库里拿出一套新军装给李悌淳穿上了。

李悌淳一穿上军装，显得十分英俊。军装虽不是量好尺寸挑来的，却很合身。

“你好像就是为了穿军装而出生的。穿上军装，非常漂亮。你既然穿上了军装，就算你入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吧。从今天起，你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了。李悌淳同志，祝贺你光荣入伍。”

我走近他，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对他最热烈地表示祝贺的是李东学。李东学把穿上军装高兴得不知所措的村长背起来，跳舞似地绕着我转了好几圈。

李悌淳就是这样，背着米袋子来到密营，加入了我们的游击队。

我们在送李悌淳还乡时，为了伪装他，打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李东学的小分队执行了这项任务。

李悌淳巧妙地欺骗敌人，叫敌人吃了大亏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他照我们出的主意，一下山，顾不得回家，径直跑到二十道沟警察支署去，

不由分说就发起脾气来，大吵大闹，说：“这个村长我不当了，你们光会使唤村长，不知保护村长。我被绑架，你们不会不知道，可一点儿也不想法救我！我害怕，不干了，还是回朝鲜那边去好了。替你们跑腿卖命，只能捞得一个死，这种鬼差事，叫别人去干好啦！”

这一下，把警察们搞得很狼狈。他们连连哄他说：“算了算了，我们不是不替你操心，是因为不知道你的下落，没法动手才耽误的嘛。你要镇静，先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被抓去的，又是怎样被放出来的。”

李悌淳回答说，游击队一直用布裹着他的眼睛，所以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早晨逃跑的地方，是趁着看押他的兵打盹的时候逃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

警察们又问他，游击队有多少人，你逃跑的地点是什么地方。然后叫他给他们带路。

一切都按照我们的安排进行。警察“讨伐队”跑到李悌淳告诉他们的地点，就做了瓮中之鳖。

李悌淳倒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他巧妙地利用这个信任，于这年秋天同金丙哲、李柱观、李三德一起在新兴村建立了祖国光复会支会。这个支会是白头山西南脚下第一个祖国光复会组织。从此，李悌淳叫李三德当了村长，自己则跟权永壁一道，以长白县上岗区一带为中心，开始了扩大组织的工作。当时为了便于工作，我们把长白县划分为上岗区、中岗区、下岗区，再把上岗区划分为上方面、中方面和下方面。李悌淳在新兴村建立了支会以后，紧接着又在珠家洞、药水洞、大寺洞、坪岗德建立了祖国光复会支会。支会下面还有许多分会，并且组

织反日青年同盟、妇女会、儿童团等外围团体，团结了广大的各阶层群众。

果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李悌淳就把整个上岗区变成了密布着地下组织的地方。

围绕着白头山密营的各个村庄，几乎都建立了祖国光复会组织，而且扎根在县内先进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宗教徒等群众中，甚至还打入了伪满洲国的官府、警察机关和靖安军。

祖国光复会下面作为它的外围组织成立了各界群众团体，团结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它的每个支会都有生产游击队，这是一支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配合人民革命军作战的雄厚力量。

祖国光复会组织在长白地区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到 1937 年初我们建立祖国光复会长白县委员会，让李悌淳做总负责人的时候，全县整个地区已经完全变成我们的天下了。这里的各个村庄，基本上都成了“我们的村庄”，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成了“我们的人”，甚至所有地方的区长、村长也都是“我们的人”，他们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上做我们的工作。比如面长李柱翼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在挺进白头山以前把先遣队派到长白地区时，他被金周贤吸收，成了祖国光复会的特别会员。他在隅勒洞开了一个药铺，一面给人治病，一面兼做面长的差事。他巧妙地利用面长这块牌子，为我们做了很有实效的工作。

李柱翼原在国内参加反对水利组合(系日寇组织的剥削机构——译注)的斗争，因而被抓去坐了牢。从那时起，李悌淳就对他很关心。李柱翼也很虚心地接受李悌淳的领导，认真地执行李悌淳的指示和嘱

托。当时，政治工作员要到国内去，或者在鸭绿江沿岸中国境内的村庄进行活动，就不得不持有渡江证或居民证等证件。没有居民证，到了工作地点站不住脚；没有渡江证，就不能顺利通过有税务警察把守的鸭绿江口岸。而这些证件是由警察机关根据面长的保证，只给登记在面长呈报的民籍簿里的人发的。李悌淳和李柱翼为保证我们政治工作员的安全和工作便利，想出一条妙计，给二十四道沟造了一本“幽灵民籍簿”，把活动在长白一带和国内的许多政治工作员的假名都登记在这个簿子上。二十四道沟是通往白头山的最后一道山沟，离警察署远，地势险恶，是连警察都不敢去的地方。

李柱翼就带着这本民籍簿到警察署去，唠叨起来：

“山沟里的穷棒子，个个都是睁眼瞎子，啥都不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们一直蹲在山沟沟里哪儿也不去，对世事一无所知，哪怕连个没有居民证就不能活的道理都不懂。有什么法子呢，都是些笨头笨脑的家伙，只好我来替他们跑腿，给他们开居民证呗。累断了腿也没法子。这个面长，真不好当啊。”

警察署也承认老百姓愚昧无知，害苦了这些面长、村长，只好根据这个“幽灵民籍簿”发居民证。李悌淳带着李柱翼提供给他的很多备用的居民证，随时转交给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带在身上，保证了他们不管到外地去还是通过国境都畅行无阻，到哪里都容易站住脚。

在长白地区，随着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建立和工作范围的迅速扩大，为了巩固新建的组织并以此为跳板深入国内扩大革命运动，我们曾一次就派出了三十多名政治工作员。

头一个女兵连的连长朴禄金(朴永姬)和另外两个少年工作员被派到了新兴村。李柱翼按照李悌淳的指示，给他们三人办了居住手续，发给他们署了假名的居民证。

在十九道沟地阳溪当过区长的李勋，也是在李悌淳的影响下加入祖国光复会的人。李悌淳在密营见过我以后，一回村就去找李勋，先介绍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然后交给他一项任务，说这是金将军的意思，要好好影响可靠的青年，准备吸收他们加入组织。

李勋接受了这一任务后，向李悌淳介绍的头一个人是安德勋。他原在咸镜南道永兴(金野)参与过农民组合运动，后来搬到十九道沟德三村居住。1937 年春，李悌淳组织了以安德勋为负责人的祖国光复会十九道沟支会。支会下面的所有村庄，则在这年夏天都建立了分会。分会长大都由村长兼任。这些组织开展工作十分活跃，以致这些地方的少年儿童都公开地唱着革命歌曲。

我在白头山进行活动的时候，同李勋见过几次面。当时他对李悌淳谈了很多，并说我人缘好。他说：

“将军选材真选对了。这长白地方地广人稠，但像悌淳那样聪明机智、老实忠厚的人，可是不多见的。看到他把燕尔新婚都推到脑后，整日跑东跑西，忙着搞革命运动，叫人肃然起敬啊。我也托他的福，做了将军的部下啦。”

我们的司令部驻在十九道沟地阳溪后山的时候，李勋和他的妻子热情地帮助了我们的工作。地阳溪后山是个有利的地方，可以通过树林直抵黑瞎子沟。当时，李勋的妻子装作到长白县城去卖烟卖豆腐，察看敌人的动

静，一有可疑的迹象，就跑回去在自家院子里点燃篝火。人民革命军的哨所看到篝火，知道有敌情，就立即报告司令部。如果发现敌人调动大部队等特别情况，李勋就直接赶来向我们作详细报告。

长白地区到处都有这样爱国的面长、区长和村长。

长白变成我们的天下，长白的人们成为我们的人，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执行建立白头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从占据白头山的时候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长白及其周围一带完全变成了我们的天下，可以说这是像李悌淳那样忠实、热情而勇敢的革命者的功劳。

李悌淳是在抗日的烈火中诞生的民众的好儿子、真正的忠仆，是为民众的解放而不惜牺牲性命、挺身开辟了革命道路的朝鲜的优秀爱国者、共产主义者之一。

李悌淳还是个充分具备了地下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素养的精干老练的革命者。他同吴仲和一样，家庭革命化搞得很好。他认为，首先把同自己骨肉相连的人用反日爱国思想武装起来，才能使全村革命化，进而使全国和全民族革命化。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革命活动方法。

因此，他在故乡的时候就引导妹妹们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妹妹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到新兴村之后，又引导妻子和岳母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使他的妻子崔彩莲在思想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成长为祖国光复会所属新兴村妇女会的会长。崔彩莲感情丰富，政治上很敏感，感悟性很强，这些优点，使她很快地领会了革命工作的方法，严格遵守了革命者的准则。

李悌淳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但对她要求也很严。他平时对妻子关怀备至，也常跟妻子逗乐打趣，但是一旦进入地下工作，他就公私分明，有关秘密问题，对妻子只字不漏。

有一次，一个姓李的警察的老婆跑来对崔彩莲说：

“喂，彩莲，你一天吃三顿热饭，睁着两只好好的眼睛可啥也看不见呀！你知道咱村酒店里出了什么事吗？”

崔彩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痴呆呆地望着对方，说道：

“不知道。酒店里的事，我怎么知道？”

“真是，你还蒙在鼓里呐。你丈夫天天晚上到那儿去跟别人的老婆子鬼混寻开心呢……”

李警察的老婆说完就悄悄地走掉了。

崔彩莲当天晚上就到那个酒店去，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往里一看，真的，正如李警察的老婆说的，一屋子全是不认识的女人和男人。

只见当中坐着李悌淳，李警察居然也夹在其中，不过看不出李警察的老婆说的那种鬼混的样子。她马上意识到，原来是自己的丈夫选择这么一个不引起敌人注意的地方开秘密会议呢；既然李警察也在座，可见他也是地下组织的一员了。

她又想，可是李警察的老婆为什么说他们在鬼混呢？兴许是嫉妒心使她犯疑吧。

崔彩莲放下心，急忙关上了酒店的门。但是她未能逃脱丈夫犀利的目光。

这天，李悌淳正颜厉色地把妻子斥责了一夜。

崔彩莲静静地听着丈夫急风暴雨般的斥责，痛悔自己听信别人的挑唆，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还认识到巩固家庭关系的根本条件是夫妻间的相互信任，毫无根据的怀疑和嫉妒只会破坏家庭的和睦。

李悌淳虽然把妻子训了一通，却没有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把酒店里的事说出一个字。他就是这样严守组织秘密、一丝不苟的人。我们没有明文规定的凡是革命者特别是地下工作员和地下革命活动家必须遵守的行动规范，但李悌淳却有他自己心中的纪律。

我在长白地区进行活动的时候，曾两次到新兴村访问了李悌淳的家。其中一次，我在他家里吃了冻土豆面条，还住了一宿。每次我去，李悌淳就把门帘挂在厨房和里屋之间，以免崔彩莲看到我。因此崔彩莲虽然顿顿给我做饭，可不知道我就是金日成。

后来，她通过朴禄金才知道这个来人是谁，就流着眼泪向丈夫提出抗议说：

“你口口声声说要相信人，却没告诉我那位就是金日成将军。世上哪有这等不礼貌的事啊？”

“唉，这个秘密可不能告诉任何人。都为的是保证他的安全。你自然感到遗憾，但是要多加谅解。”

这就是李悌淳式的工作方法。

他所表现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原则性，给崔彩莲的性格发展和世界观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李悌淳在白头山密营见了我，回去之后嘱咐妻子说：

“往后，可能有很多客人到我们家里来，所以要准备大量的土豆、

土豆淀粉、大麦米、大酱、烧柴等等，往后你要多辛苦一下。”

后来，崔彩莲为了照料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员，的确很辛苦。她每天都舂大量的米，几乎把臼底都穿透了。

李悌淳完成家庭革命化后，还实现了村庄的革命化。他同权永壁一起，在新兴村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这个支部建立之后，长白地方有很多祖国光复会会员都加入了党的队伍。说到把人们团结到组织里来、支援游击队这件事，新兴村是绝对的首屈一指的村庄。

新兴村的人们一听游击队要来村庄的消息，就炒苏子准备榨油。他们为了筹措支援游击队的粮食，省吃俭用，厉行节约。土豆是该村的主要农产品，但是运输很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做成淀粉送往游击队密营去。新兴村的妇女们给游击队送黄酱也不送生的，而送加了工的。黄酱里掺点白面，烙成饼再送，保管和食用都很方便。这个村庄的人们给我们送来的各种支援物资竟达几万件，那么多的物资，全靠人力背运到密营或游击队宿营地。

可以说新兴村的居民遇到了好领导。李悌淳确是个有能力的人，加上权永壁、朴禄金、黄锦玉又积极地协助了他。

我在普天堡战斗前夕到新兴村去，看到全村居民欢迎革命军的盛况和团结一致的面貌，深受感动。我们一到村庄，他们就拿来四台压面机，很快把几百名份面条压完了。他们的手艺，真是快如闪电。当时，我们的同志说，新兴村是讨人喜欢的村庄。的确，新兴村的居民个个都招人喜爱。据后来了解，李悌淳每当我们去的时候，就事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欢迎办法。

李悌淳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临机应变的本领，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也足以看得出来。

1937 年暮春，祖国光复会长白县委员会在新兴村组织了“五·一”节游行示威。在万民注视的大白天举行合法的游行示威，就得有使敌人无法挑剔的万全之策。李悌淳事先放出风声，以捕捉狐狸为理由，让各村青少年聚集到指定地点来。示威游行队伍排成一行，高举红旗，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沿着能俯瞰鸭绿江的山脊，一直行进到二十道沟南隅村。参加者为了给敌人造成混乱，有时也喊了其他的口号。

那天，鸭绿江左右两岸的行人，都停住脚步，以万分兴奋的心情目睹了这一罕见的示威游行。江对岸佳林川派出所和国境守备队的军警们以为是革命军的袭击，不敢去了解真情。等到示威游行结束，弄清示威游行者是老百姓了，敌人才来到长白地方问是怎么回事。

示威群众回答说捉狐狸。

警察又问道：

“捉狐狸，为什么举红旗？”

“狐狸最怕红色嘛，所以才举起红旗。”

示威群众就这样巧妙地对付了警察。实际上，红旗对捉狐狸和示威游行都是需要的。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镇压达到极点的 1937 年，数百名之众大白天挥动着红旗，高喊独立万岁，固然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日满军警都没有觉察到这是反日反满示威游行，更是令人惊讶。如果没有出众的智谋和大无畏的气概，冒这么大险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打了

普天堡战斗，李悌淳就把新兴村的妇女会员派到现场，了解敌人的损失，搜集群众舆论，并把它通报给我们。这件事不是我们向李悌淳布置的，而是他自己发扬创造精神，主动布置的。

通过这两件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李悌淳是一个具有独到的革命办法的有才能的干部，热情充沛、善于思索的人。他为革命、为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比谁都动了更多的脑筋。如果没有这种不断思索的坚韧精神，他是不可能创造出在短时间内把长白地方彻底变成我们的天下那种奇迹的。

不会思索的人，就不可能有创造精神；没有创造精神的地方，便不可能有创造和革新，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因此，把人造就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和一旦下定决心就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强者，严格地推论起来，也可以说是思索的结果。于是具有意识性的社会存在——人，通过不断的思索和思索的累积，改造了自然、社会和自身，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主人。

我们党之所以号召干部、党员和劳动者成为热情的善于思索的人，是因为绝对重视思索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方面所起的作用。

李悌淳是把思索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富有创造性的人。他在法庭和监狱中，也没有中断过思索。他在法庭里的思索，完全集中在作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

“我在法庭上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宁肯自己受更多的冤枉罪，也要把同志们救出来！”

这就是李悌淳在惠山警察署拘留所时下的决心。事实正是这样，

他不惜牺牲自己，成功地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面长李柱翼被捕的时候，李悌淳对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除金将军、我和你之外，就没有人知道；将军在山里，我绝对不说；因此，只要你咬紧牙，你就不会有事。李柱翼做到了这一点，于是受了几天苦就被释放。由于李悌淳把所有的“罪状”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因而新兴村党组织负责人金丙哲和李柱观也幸免于难。李悌淳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美德，恰恰就在于他的舍己为人。

李悌淳通过权永壁获悉张曾烈在狱中叛变，便焦虑不安，生怕张的叛变会使更多的同志遭到牺牲。他觉得应该尽快给同志们通个信息，可是他连个铅笔头儿都没有。他想了又想，最后用牙齿轻轻地咬破了嘴唇，用指尖蘸上滴下来的鲜血，往布块上写了“张曾烈叛变”的字样，等到上刑讯室时，乘机把它投进另一个牢房。这样，很多同志知道了张曾烈的真面目，得以更积极地开展了狱中斗争。

使我深感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里不能全部介绍李悌淳狱中七年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崔彩莲去探监时，已经看不出李悌淳过去为祖国光复会东奔西走时候那副英俊而丰满的容貌，他全身瘦骨嶙峋，脸色枯黄。然而他对着铁窗外的妻子，却若无其事，含笑相迎。等到跟妻子分手的时候，他泰然自若，不是要她送衣送食，而是叮嘱她弄一份世界地图来。这使崔彩莲一时愣住了。

我认为，李悌淳在狱中要一份世界地图，也许是出自这样的愿望吧：要在世界地图上规划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结构、描

绘解放了的祖国向全世界放出光芒的丰采。这清楚地表明，他受到死刑判决后，丝毫也没有绝望和悲观，而是无限憧憬祖国和世界光辉灿烂的未来。他身陷缧绁，但又确信未来，在死亡面前，仍然向往着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鲜花盛开幸福无边的新生活。正因为这样，当法官劝他转向时，他义正词严地宣告道：“共产主义是永远的青春。”

1945 年初，崔彩莲领着老闺女出现在汉城西大门监狱会客室里。小孩子生下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跟母亲一起坐牢，因缺奶而吃了苦头，可是不觉之间已长成髫龄少女了。这孩子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望着铁窗里满脸黑须的男子汉。

崔彩莲用手指着那个汉子说：“那就是你的爸爸。”

父女俩隔着铁窗相望，但在女儿的嘴里却没有喊出“爸爸”的声音。直到八岁还没看见过爸爸的女儿，怎能突然叫出“爸爸”二字呢？女儿目睹过很多邻居的爸爸爱抚自己儿女的情景，可是眼前这位爸爸却隔着铁窗只是微笑，没法出来抱抱她。

等到喀嚓喀嚓的脚镣声一响，带着手铐的爸爸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女儿头发的时候，她的嘴里才吐出了喊“爸爸”的声音。

李悌淳忍住泪水，对女儿许下了根本无法实现的诺言：“爸爸就会回家的。”对生来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女儿，只能如此安慰她的李悌淳的心情，该是多么难受啊。

当然，他是无法实现跟女儿许下的“诺言”的。1945 年 3 月 10 日，敌人把李悌淳叫到刑讯室来说服他说：今天是我们日本皇军的陆军节，现在也好，如果你转向了，就可以免除死刑。但是李

悌淳却在任何怀柔和酷刑面前都没有屈服。

在一个无名的长白山村当过夜校教师和村长的李悌淳，是把光荣的一生献给了抗日革命事业的热诚的爱国者、坚强的革命战士。

人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成为革命者的，而是通过生活和斗争成长为革命者的。人们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是思想健康、充满爱祖国爱民族的火热心肠的人，如果受到正确的领导，那就无论是谁，都能成为革命者，这是革命的真理，又是历史的教导。因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技术和文化三大革命中，首先重视思想革命。这是因为，这个思想革命才是使人们意识化和组织化，把他们培养成为热诚的爱国者、坚强的革命战士的摇篮，才是大力推进人民群众的自主事业和革命斗争的原动力。

李悌淳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来到我们密营的时候，我高度评价他为祖国光复会组织作出的贡献。可是他摇着双手，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请您不要这样说。这绝不是靠了我的本事或辛苦。您给我那个委任状，把李柱翼面长这样的人也一下子变为祖国光复会会员了。李面长一看那个委任状就求我说，如果金将军是会长，那就帮他也做这个会的会员。再说，长白的人们爱国热情也很高。我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事情。”

李悌淳同时又是这样谦虚的人。

他的小小的半身铜像竖立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里，今天仍然用谦虚的眼光望着后代。他的旁边还有和他一起在刑场上壮烈牺牲的权永壁、李东杰和池泰环。

四　同南满的战友们在一起

回想起来，我们在白头山一带建立了许多密营之后到鸭绿江沿岸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的时候，还有一点印象很深的是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的同志们前来和我们共同生活，并肩作战，加强战斗友谊和团结的情景。

关于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中国共产主义武装力量之间的协作问题，已在 1935 年 3 月召开的腰营沟会议上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我们的部队进行第二次远征开往北满，另一支部队则越过新开岭开往南满。当时在我们的侧翼活动的中国人武装部队中代表性的部队有：宁安地方的周保中部队、密山地区的李延禄部队、南满地区的杨靖宇部队、珠河地区的赵尚志部队。这些部队都积极开展了同友邻部队的联合作战。

开到南满的东满独立第一师，于 1935 年 8～9 月间在蒙江县那尔轰，同第一军的战友们胜利会师。当时我们的部队再次越过老爷岭同周保中部队一起进行协同作战。派往南满的队伍中，有来自汪清的吴仲洽和金平。吴仲洽后来兴奋地回忆说，当时南满的同志们用松枝架起大彩门，挂上旗帜，还摆上讲坛致欢迎词，十分热烈地欢迎了东满的同志。据说，那一天的欢迎会十分隆重热闹。杨靖宇代表南满部队

致欢迎词，李学忠代表东满部队致答词。他们两个人的讲话时时被好几百人的掌声打断。我记得，当时《人民革命报》的号外登过一幅成功地描绘了这一场面的画。

曹国安率其主力来到黑瞎子沟密营的时候，我们正在别的地方打仗，不在密营。金周贤派通信员来给我们报信，我们才知道南满部队来了。当时负责部队后勤工作的金周贤，为了盛情接待贵宾，费了不少心血。我们也为了尽早会见来自南满的同志，打完仗就急急忙忙回到了密营。

同友邻部队的战友们见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快乐。对人的怀恋，是我们大家时刻不离心间的可贵而炽热的感情。在杳无人迹的山中生活里，我们怀恋的何止是一两样？对故乡的怀恋、对骨肉亲人的怀恋、对学友的怀恋、对爱人的怀恋、对一切文明的怀念。这一切怀恋中最令人难耐的是对同志的怀恋、对人的怀恋。正因为这样，部队在居民区停留一天，我们大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听到曹国安部队的战友们到达密营的消息，我和我的战友们都齐声欢呼着拥抱通信员，正是这种感情的流露。

我们一回到密营，从南满来的七八十名同志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跑出兵营把我们团团围住了。我们还来不及定定神，就被淹没在握手和拥抱的旋涡中。如果当时有第三者看到了这个情景，他可能会产生错觉，以为是我们来到南满部队的密营受到了欢迎。

通过这次会师，我和曹国安师长才第一次见面。

我看曹国安像一个意志坚定、要求严格的军校教官。这就是我对

他的第一个印象。可是几天来的共同生活改变了我的这个看法。他还是一个非常多情、平易近人、稳重沉着的同志。他比我大十来岁。

他说他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念了吉林师范学校，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与同乡重逢的亲切感。他说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吉林第一中学任教。后来，他还念过山东军政大学，又在北京念过书。曹国安专心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这个时期。他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后，曾任过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团政委，从 1934 年秋起，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

“金司令，我们来同贵军协同作战，装束却如此寒碜，请不要见怪。这都是我领导无方所致，请多加谅解。”

曹国安指着围着我们的自己人，现出了赧然的表情。从南满来的人，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穿着褴褛的夏装。从他们那露着衬衣的破烂军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的长征的痕迹。

“金司令，实感惭愧，我们还没有给队员们穿上棉衣。”

曹国安很羡慕地环视着我们的队员穿着的厚厚的棉衣，带着凄凉的微笑说。

“这有什么惭愧的。衣裳这样破烂，可见你们打了多少仗，吃了多少苦啊！我们的部队远征北满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二师同志们不见外，我们部队里还有一些冬装，其数量我不详细，先给你们拿去穿上，好不好？要是不够，就再做吧。”

我这么一说，曹国安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他说：

“这样帮忙，我就可以睡上安稳觉了。”

我同曹师长一起，在密营住了二十来天，就联合斗争问题交换了

意见。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我们从两支部队的协作问题谈起，对部队的管理、队内的教育、兵员的补充、群众工作方法、游击战术以及朝中两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直至个人的家庭琐事，都毫无拘束地交流了情况和意见。

我认为曹国安的品质中有魅力的是坦率和洒脱。他的坦率和谦逊，是令人钦佩的。我们年龄相差十几岁也绝不成为谈话的隔阂。他一旦看中了对方，就不问年龄的差距或职位的高低，总是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他对我毫不犹豫地谈到了部队所经历的挫折和所受的损失。

曹国安指挥的第一军第二师是以在磐石由朝鲜人组建的反日人民游击队为母体，吸收以伪满军的起义兵和从山林队过来的人组成的第一师第一团来组建的。这个师的主要活动地区，是磐石县及其周边一带。

据说，部队编成师以来，按照军部的作战计划，每年夏季远征到辉发河北边，一到冬天就返回来，弥补远征中的损失，补充兵员；到下一年夏天，再朝江北出征。这是在扩大游击活动地区的名义下，每年必须定期进行的运动战。可是这个有规则的作战，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其固定不变的活动路线被标在敌人的作战地图上。从此，敌人把守路口，出其不意地加以打击，所以这个部队每次远征都受到很大的损失。

据说，在那一年(1936 年)夏天，部队在远征过程中损失了不少的兵员。曹国安率领师的部分力量，在东满第一师的协同下，一直出征到额穆县杉松。结束这一远征后回来，到桦甸县会全栈一带集结，再路经抚松县径直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没有到第一军的后勤基地蒙江县那尔轰，因而也就没能给队员们穿上冬装。

正当曹国安为克服部队面临的困难，费尽心思想办法的时候，有一天，他听到了我们打抚松县城战斗的情况，这是到抚松县三道砬子河一带搞粮食工作的宋茂璇小分队回来告诉他的。

曹国安说，他听到这场战斗的胜利，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心想，别人用新编的师还能连战连胜，而我们的部队为什么每次打仗都那么艰苦？为什么每次远征都蒙受不少有生力量的损失，而每到夏天却又要机械地往江北出征？这里难道没有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吗？他抱着这些问题，召开了指挥员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从根本上改变部队军事活动的各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要尽早同我们的部队进行联合作战。大家一致主张：只要进行联合作战，就能在战术和战法上取得进步，还能积累有益的经验。这个方案的倡议人是宋茂璇，最积极的支持者就是曹国安师长。

曹国安立刻挥师离开桦甸县大东沟，向我部驻地进发。

我估计，第二师的战友们虽然艰苦奋战，却没打过一场痛快的仗。听了他们经受的艰难困苦，我总觉得那一切都不是别人的事。

一般称之为南满游击队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实际上和北满的游击队一样，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重要侧翼。我们从抗日战争初期起，就对南满游击队的成长壮大予以深切的关注，并为实现同他们的联合作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还为他们输送了许多在游击战中得到锻炼和培养的东满的优秀朝鲜人干部。1932 年夏，我们开往南满的时候，派代表到李红光、李东光那里去要实现同他们的合作，也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曾和他们一起进行过联合作战。

直到南湖头会议之前，我们是侧重于同北满游击队的合作的。因此，我们率领远征部队去过两次北满。我们在那里，同共产主义者搞过协同作战，也同反日部队进行过联合作战。尽管有过沉痛的损失和牺牲，但是同友邻部队的联合还是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我们在间岛依靠游击根据地作战的时候，北满比南满离我们近得多，翻过一个岭就是北满。

到了我们把西间岛作为新的活动舞台进行战斗的 30 年代后半期，南满就比北满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在白头山西南部地区连续发出的枪声，更激发了南满部队尽快实现同人民革命军的合作的强烈欲望。同南满部队的联合，成了刻不容缓的迫切问题。曹国安的师，可以说是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实现师一级部队联合作战的第一支部队。

和在东满和北满一样，在南满的游击战争也可以说是由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开始并主导的。从活动在南满的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二、三师的民族构成来看，朝鲜人占了多数。除杨靖宇、魏拯民、曹国安等人外，大部分军事、政治干部也都是朝鲜人。

1945 年 12 月，周保中在吉林的一次集会上作报告时说，1932 年建立的东满游击队和 1933 年建立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以及汤原游击队，都是由朝鲜同志和革命的朝鲜群众建立的。这些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的各个军，第五军也有过不少优秀的朝鲜同志。他还说，抗日联军的各级军政干部，上自各军长、政治部主任，下至排长、指导员，很多都是朝鲜同志。他在这里提到的磐石游击队，就是南满游击队即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

正如磐石游击队这一通俗的名称所表明的，南满游击斗争的发祥地是磐石地区。

磐石县党委会刚组建的时候，共有四十来个党员，也都是朝鲜人。李红光在这里吸收十来名朝鲜人组建了第一支武装队，这就是南满游击队的母体。由三十多人组成的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批成员，也都是朝鲜人。磐石游击根据地内的反日会、妇女会、少先队和农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大部分也都是朝鲜人。在开拓和发展南满游击运动中，朝鲜人起到了先锋的、核心的、主导的作用。

曹国安的师，也是朝鲜人多的部队。宋茂璇、朴顺一等半数以上的指挥员和多数队员都是朝鲜人。这是能够更顺利地实现同我们的联合作战和共同斗争的条件。

南满的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同我们的直接联系下，有时还靠他们独立自主的判断、决心和行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政治上的沉重打击。他们还常常渡过鸭绿江奇袭国境对岸。

30 年代前半期，是我们频繁地从东满挺进国内的时期。仅在 1935 年 1 月这一个月里，人民革命军的小分队对稳城郡这一个地方就袭击了四次。在这些小分队开到稳城郡南山里、月波洞、世仙洞和美山洞一带同敌人的军警交战的时候，汉城的各家报纸大书特书，报道游击队大举袭击咸镜北道稳城、训戎等地。

1935 年 5 月，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一支部队在茂山郡三长面农事洞一带进行了群众政治工作，之后在安图县大马鹿沟附近同尾追而来的日寇警察展开枪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乘着一年比一年汹涌澎湃的向国内进军的激流，在鸭绿江对岸以战斗解乡愁的李红光，率部渡过江来袭击了厚昌郡东兴镇。1935 年 2 月 15 日夜，他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小分队，由两挺轻机枪打头，包围东兴镇，袭击了警察署、金融组合等，使敌人魂飞魄散。

敌人为人民革命军接连不断地进军国内而惊慌失措，大声疾呼说，这是在国境警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件。

袭击东兴镇立下赫赫战功，驰名内外的南满部队，怎么会有曹国安师长所遭到的那种失败呢？我望着他瘦削的面孔，不禁产生一种愤懑的心情。

“我最近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展同友邻部队的协同作战，才是保证我们存在并发展的唯一出路。可是吸取这个教训未免太晚了。说老实话，我后悔过去忽视了与金司令的联系。”

曹国安好像对一切都有体会似的，长叹了一口气，用双手抚摸着脸。

“曹师长，你就在我们这里好好休息几天，恢复元气吧。俗语说得好，天塌下来也有个洞可以钻出去。人不是神，怎能万无一失呢？暂时的失败，用不着气馁。”

我给曹师长讲了我们在罗子沟的山脊上，在饥寒交迫中被敌人包围，整个部队濒于灭亡境地时的严酷考验，还讲了第一次远征北满时的情况：当我得了伤寒，在暴风雪中艰苦跋涉，敌人又穷追不舍，我们陷入无法挽救的处境时，一个恩人帮助我们脱离了危险……

因为突然来了众多的客人，首先住处就成了难题。我指示指挥员们，把我们的队员住的原木房全都让给客人，主人燃起篝火在帐篷里

宿营。我的指示一传下去，我们的指战员就立刻腾出原木房，搭起帐篷，燃起了篝火。客人们看到他们人人心灵手巧，个个都赞不绝口。

在我们的队员当中，有许多燃篝火的能手。他们发明了独特的点燃原木篝火的妙着，还把它普及到整个部队。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很奇妙。先把五六根一般长的原木放在底层支起来，第二层再放四五根，第三层又放三四根，这样都支起来，堆成金字塔形，最后把两三根放在顶上，再把干树枝当引柴放上去，然后点火。用这种方法燃起篝火，好处多，不仅燃烧时间长，而且湿柴也跟干柴一样好烧，还不大迸出火星，火力又很旺。第二师的同志们起初不大相信用这种方法能把原木烧着，可是过不一会儿，看到金字塔形原木堆熊熊燃烧起来，就惊奇地“呀”“呀”喊叫起来。

曹国安也很赞赏。他望着篝火，意味深长地向我微笑道：

“这回我在漫江见了魏拯民，您猜他跟我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到了金司令部队，要我们先学好燃篝火的方法。我看你们的人点篝火，真是妙极了。”

曹国安说，他来到我们的部队，印象最深的是篝火和原木房。他坦率地说，他到我们密营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只要有篝火和原木房，部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中，也满可以活下去。

第二天，我选了几名盖原木房的能手，指示他们和第七团第四连的队员一起，当天给第二师同志盖好营房，好让他们在我们密营住得舒服一些。盖房能手们砍来原木，仅用一天工夫就盖好了一座宽敞的

原木房。二师同志们也兴致勃勃地帮了他们的忙。

曹国安听到白头山密林里到处都有这种密营，禁不住羡慕地说，原来他认为白头山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是部队无法宿营的，所以专找有人家的地方去住，基本上没有在山里盖过密营。先前到江北去的时候，他也是把队员们分派到各家去住的。

南满的同志们来我们的密营“安家”了，我便让管后勤工作的金周贤和金海山给他们筹备足够的粮食和炊事用具，还把我们后勤部仓库里的几十套棉军装全都送给了他们。可惜缺几套，未能给每人发一套。朴洙环负责的缝纫队熬夜搞突击，赶制了缺少的棉军装，第二天就给每人都发了一套，把破烂的夏装扔进篝火里烧掉了。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值得称道的大事，但总算我们尽到了主人的一份心意了。

我们还安排二师同志们洗了澡，理了发。当时黑瞎子沟密营有一口很大的烧水锅，是吴仲洽他们打横山木材所时缴来的煮牛饲料的特大铁锅，此刻派上了最要紧的用场。客人们擦洗干净了，我们再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整套洗脸用具和几盒香烟。

曹国安到我们的司令部来代表他的部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说，他们空手来到金司令部队，受到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深感不安，不知怎样报答才好。

我对他说，都是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理想而战的战友，还谈得上什么关怀和照顾啊！如果我们到曹师长部队去作客，你不会给我们这点帮助吗？不要以为来到别人的部队添了麻烦，要当作串亲戚嘛；如果一定要报答的话，就在我们的密营住些日子，多给我们讲讲有趣的人生体验。

曹国安说他是书生出身，哪里会有能引起金司令兴趣的人生体验，要说有一点异样的本钱，那也不过是在山东军政大学学到的一点东西，要是能对金司令有所帮助的话，可以讲一讲。

这以后，他给我们的指挥员上了多次有关正规战的战术课，讲得很有深度。他的讲课对进一步深入掌握敌人运用的正规战战术，完善对付这一战术的我们朝鲜式游击战术，起了不小的作用。

作为回礼，我们给曹国安部队连长、政治指导员以上的指挥员，讲了我们创造的游击战的经验。因为结合了生动的实战经验，南满客人们都深感兴趣，聚精会神地听讲。

我嘱托二师同志们要特别重视拥军爱民：

“要牢牢记住，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智慧和生命；因此，要相信人民，向人民学习，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群众来进行斗争；要得到人民的帮助，就要赢得人民的爱护；要赢得人民的爱护，就要首先爱护人民；因为只借住一夜，你就随便给当地居民增添负担，群众就会讨厌你；如果随便动用或损坏人民的财物，其后果将是无可挽回的；如果你像亲骨肉般地爱护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主动地跟着你走，这样的军队是一定会百战百胜的。”

南满同志们在黑瞎子沟同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多次参观了我们的部队，看了我们每天的学习、开会、训练等作息的安排。他们的反映很好，都异口同声地赞叹说，从前听人说你们是大学生部队，今天来看果然名不虚传。

曹国安真诚地对我说，直到不久前，他还习惯于像浮萍一样漂泊

在江南、江北，未曾考虑到要建设密营来自力更生，也未曾想到要在以密营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地区建立地下组织网点，依靠以密营和地下组织网点组成的根据地扩大和发展武装斗争。

有一天晚上，曹国安看了我们部队的娱乐会之后，同我在树林里漫步时说：

“金司令的部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富有军队的气派。现在，我知道了金司令部队连战连胜的秘诀。”

南满的战友们为了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极大的努力。他们照我们的方式修改了作息表，也用我们的方式进行学习和训练。在逗留我们密营期间，他们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军事纪律，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了。

“依我看，现在已经到了两个部队联合起来和敌人大打一番的时候了。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对那些疯狂进行‘冬季大讨伐’的敌人来一个左右夹攻吧。包括桃泉里在内的长白、临江县界地区群众基础很好，又能得到我们组建的地下革命组织的积极帮助和支援，可以很快地吸收优秀的青年来补充队伍。我想，我们两支部队紧密携手，在左右两侧展开不断的消耗战，就能取得赫赫战果的。”

曹国安欣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还决定根据需要进行协同作战。

二师战友们离开我们密营的时候，都依依不舍，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们也都抑制不住惜别之情，流下了眼泪。

临别时，曹国安向我提出要求说：

“金司令，能不能给我选派一个可以做传令兵的人？”

我又碰到了同我在北满碰到的完全一样的问题。在北满，周保中曾向我要过朝鲜族指战员。我接受他的这一要求，把东满部队的朴洛权、全昌哲、安正淑、朴吉松等很多朝鲜族指战员派到北满部队去了。

“谢谢曹师长如此信赖我们的同志。你是不是和朝鲜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我问他说。

曹国安回答道：

“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自从认识了李红光和李东光之后，我就被朝鲜同志迷住了。当李红光打垮了邵本良部队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惊叹不已，恐怕间岛人是不会了解的。”

邵本良跟安图的李道善和抚松的姓汪的队长一样，是在柳河县一带肆意残杀人民群众、掠夺百姓财产的穷凶极恶的伪满军高级军官。邵本良率领的伪满军部队在柳河县三源浦、孤山子和凉水河子一带，被李红光消灭掉了。

李红光打败了邵本良之后，当第一军指挥部在凉水河子附近被敌人的大部队包围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机智与勇敢救出了杨靖宇。从这时候起，杨靖宇等第一军的干部都把李红光作为救命恩人和勇敢的象征，衷心地热爱他。

曹国安说，李红光阵亡时，杨军长和第一军的所有干部和队员，都悲痛欲绝，其情一言难尽。

我决定满足曹国安的要求：

“我有一个从汪清时代起就一直非常爱护的机枪手，不知你喜欢不喜欢。他姓姜名叫曾龙，是排长兼机枪手，又是个大力士。”

原来姜曾龙是曹师长的老相识，跟二师组织科长宋茂璇也很熟。我们商定把他编入第二师。

姜曾龙得知这一决定之后，坚持要留在我的身边。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去了二师。他到曹国安部队之后，听说当了第二师指挥部警卫队机枪排排长，战斗得很好。

此后，曹国安部队在长白、临江县境，开展了猛烈的军事、政治活动。他们离开我们的密营，径直到桃泉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补充了队伍，选定了密营的预备基地。与此同时，我用书面指示金在水发动祖国光复会基层组织好好支援曹国安部队。桃泉里等下岗区的各个村庄，都充实了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积极开展了支军工作，尤其是对二师给予了真诚的大力支援。

在他们的支援下，南满部队同闯入桃泉里的靖安军作战，取得了胜利。那是 1936 年 11 月中旬的某一天，指挥部按到群众的敌情通报，就决定以夜间伏击战消灭敌人，于天黑以前在桃泉里炮台街的角落设了埋伏。埋伏地点定在离村庄最尽头一栋房子只有十多米的地方。敌人的大部队一进村庄，就把每一家的老百姓都拉出来逼他们供出游击队的去向。老乡们明明知道游击队埋伏在眼前，但都一口咬定说不知道。这是多么令人感激的群众。他们面对着一不小心泄漏了秘密就会使全村遭殃的岌岌可危的情况，都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一直没有说出游击队的去处。

在人民群众忘我的声援下，二师同志们在这一天的伏击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第二天，他们又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当敌人派二十

多辆汽车前来拉运前一天战斗中毙命的尸首时，以密集的火力重重地打击了敌人。

在桃泉里补充了队伍，取得了巨大战果的曹国安，给我来信说，我们在黑瞎子沟密营住了一些日子，收获很大，其效果已经开始发挥出来了，我曹国安不会忘记金司令的帮助，今后将继续给你报好消息。

然而很可惜，曹国安没能实现这一美好的心愿。第二师在开往临江的途中，在长白县七道沟木材所附近突然与敌人遭遇，展开了激战，曹国安不幸受了重伤。他把指挥任务暂时交给宋茂璇，然后跟警卫队一起隐蔽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养伤。后来，有个叛徒向敌人告密。敌人为了活捉曹国安，从四面包围了他们。为了救出曹师长，警卫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却未能奏效，曹国安终于多处中弹，壮烈牺牲。

我听到曹国安阵亡的噩耗，不由得想起他对我说过的一段话：

“金司令，将来进行解放朝鲜的决定性作战的时候，你要叫我一声，我一定率部去找你。”这是他和我道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可是，曹国安已经无法实现这一诺言了。他不仅没有看到朝鲜的解放，而且也没有看到自己亲爱的祖国——中国的解放，就溘然长逝了。我为此感到无比的悲愤。

1937 年初，第二师军需部长朴顺一带着宋茂璇通知曹师长阵亡的信件，来到了我们的密营。

宋茂璇在信中毫不掩饰地谈到了失去师长的悲痛和自己因不知今后应当怎样指挥部队而焦躁不安的心情，并要求我们帮助他确定活动方向。

我给他写了一封在当时看来是颇长的回信，向为失去指挥员而悲痛的同志们表示同情。我在信中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克服部队面临的危机，在部队管理中要高度发挥集体的智慧。我还向宋茂璇提出了我的意见，在雪下得多的情况下，要在敌人不容易接近的鲤明水山地建立密营，集中力量搞好对新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最后告诉他过了春节后我准备访问他们的部队。

作为一个普通客人去吊唁与我有莫逆之交的战友，是我道义上应尽的义务；对失去了师长的他们来说，我们只是去看望他们，也会使他们得到安慰和支持。

红头山战斗后，我便按照诺言动身去看他们。途中我们打了一场桃泉里战斗，在四门开庭村庄住了一宿，并向鲤明水上游和八道沟派出了侦察小组。

二师同志们通过通信员听到我们来到了四门开庭村庄，就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连夜赶来接我们。过了午夜，我们才接到了他们来到的报告。我叮嘱金周贤为客人准备糕片汤后，就带传令兵去接他们。二师的指挥员们见我离老远就向他们打招呼，都一窝蜂似地跑过来团团围住我，跟我拥抱。他们的脸都冻得冰凉冰凉，每当拥抱时，就像大冰块碰我脸似的。

代行师长任务的宋茂璇，直到我们的宿舍，还不放我的手，说：

“谢谢司令官同志，您是在我们的部队经受严酷考验的时候，给了我们力量的恩人。”

“组织科长同志，这样的夸奖，我可不敢当。我来的是不是太晚了？”

他跟从前一样，这天也待我格外亲切。我曾经像同乡一样对待曹国安，而宋茂璇也像同乡一样对待我。他本来在吉林近郊叫做五里河子的村庄搞青年运动，后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五里河子是李东光领导过青年运动的地方。在他的领导下，宋茂璇等五里河子地方的青年组成一个革新青年会，在其周围团结了不少青年群众。当时，永吉县一带还有叫新兴青年会、前进青年会的青年组织。宋茂璇是革新青年会的组织委员。1928 年春，这个组织由李东光改编为反帝青年同盟，后又改称共青同盟。

当我们开展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和抵制日货斗争的时候，五里河子的青年组织就举行了同情示威。

李东光在五里河子一带领导青年运动和我们在吉林领导青年学生运动，时间恰好是在同一个时期。

宋茂璇每当回顾吉林时期的时候，就非难正义府的一些干部。我责备他说，非难为独立运动不辞辛劳的前辈，不是太过分吗？可是他却脸红脖子粗地说，就是说得更重一点，也不会有损身份的。我又问他，为什么对正义府的干部持有这么不好的印象？宋茂璇谈了 1928 年初由正义府召开的吉林地方会议的情况。看来，当时宋茂璇也作为五里河子的代表出席了这个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双河镇、江东、新安屯等地的代表。议题是征收义务金的问题。在会上，高而虚代表正义府发表过激的讲话，他说，管辖区的百姓不肯缴纳义务金，所以非出动军队征收不可。他的这一讲话，引起了主持会议的一方和与会者一方之间的论战。宋茂璇也代表五里河子发言作了反驳。就为这一点，会

后他被高而虚派的恐怖分子毒打，昏倒了。

宋茂璇对在旺清门发生的国民府的恐怖事件，也十分熟悉。我同他还谈到了吴东振、玄默观、高远岩等人。凡是与吉林有关的事情，连细枝末节都谈到了。在黑瞎子沟密营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吉林时期的往事，都做了回忆。

可是在这四门开庭的农舍里，我和宋茂璇都没有把吉林时期作为话题提出来。我们只缅怀着曹国安师长，就没有曹国安的师的前

途问题进行了交谈。我们请二师同志们吃了一顿糕片汤。被称为大肚子的一个中国人指挥员，竟吃了三大碗。他说，今天才像真正过年的样子。原来他们打了高力堡子木材所之后，归途中遇到敌人的追击，没来得及吃晌午饭。

我们的部队和第二师的指挥员们，在黎明时分召开了讨论鲤明水战斗的联合作战会议。

我根据多年的经验估计到，敌人可能在这一天中午开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在通往鲤明水的路上故意留下了杂乱的脚印。从二道岗方面来的敌人，必然是要到鲤明水这条山沟里来的。因为第二师的同志们打了高力堡子之后，边打边退到了鲤明水这条山沟，所以八道沟方面的敌人也必定打到这个地方来。

最适于消灭这两股敌人的埋伏地点，是鲤明水和北水沟的汇合处。这是我们在进入鲤明水的时候就已经选定的地点。

我在作战会议上向与会者们说明了这一天敌人可能的行动方向，强调了打一场伏击战歼灭大股敌人的必要性。因为伏击战的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保持队伍的隐蔽，所以还强调了如下几点：要在天亮前吃完早饭，火速赶到埋伏地点；占据埋伏阵地之后，绝对不许生火冒烟、说话、咳嗽、擅离阵地；没有命令，不得开枪。关于对敌人进行喊话的内容和方法、处理俘虏等问题，也作了具体的布置。

接着，给各部队指定了战斗任务。据侦察，敌情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根据我的提议，整装待发的两支部队的指战员都集合在一起，为曹国安师长举行了追悼会，我和宋茂璇分别致了悼词。

鲤明水从长白县四登房山脊分水岭往西流入八道沟河。四门开庭坐落在这条江的上游附近。从这里往下游走十五里左右，就有一

个住着十五六户朝鲜族火田民的村庄，这就是鲤明水村。

各部队在天亮以前进入埋伏阵地，挖好了战壕。附近的陡坡都覆盖着积雪，鲤明水已结了冰。天气酷寒，冷风砭人肌骨，但战斗员的士气都很高。二师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我们的部队每次作战都取胜，因此，从接到战斗命令的时刻起，他们就满有把握地说，这场战斗肯定是大获全胜。

我把主力部署在靠近汇合处的山顶上。那里都是新开荒的地，从那里朝谷底射击，是很适宜的。在这高地的中心设了我的指挥部，前面有第七团和警卫连，左侧有第八团，右侧有第二师，沟对面矮山岗上有六七十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这两座山的对面都是森林茂密的险山峻岭，敌人挨了打也不能向那里逃窜。我们的埋伏区的前方是宜于集中射击，全歼敌人的一百多米宽的开阔地。

为了监视和牵制从二道岗和八道沟这两个方向来的敌人，往这两

个方向分别派了各有一个班兵力的阻击队。阻击队用旗语向我们设在后山上的联络哨报敌情。战斗员都趴在战壕里等待敌人。可是过了中午也不见敌人的影子。

“敌人是不是不来了？”白鹤林等得不耐烦了，悄声说着，冻得牙齿直打颤。

“不要着急，敌人是一定会来的。”

实际上，我也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战斗员们伏在雪地上吃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我也用白鹤林从背囊里掏出来的一个窝窝头代替了午饭。天气干冷干冷，手一触到铁器就粘住了。等到下午两点多了，敌人还是不来。在 2 月的严寒中，伏在雪地里八九个小时，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争取胜利，再大的艰难困苦，也是要忍住的。只要在这里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就再也不敢随便来犯了。

下午 5 点左右，八道沟东南方高地上的阻击队发来了出现敌人的信号。我用双筒望远镜一看，前头有由伪满军军官带领的斥候队，后面慢腾腾地跟着由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主力部队。

我派传令兵再次向各部队传达了指示：把敌人的斥候队放过去，等主力部队的末尾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之后，我要下达射击命令，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开枪。

在敌人出现的时候，天气骤变，满天乌云，更加阴沉。如果没有积雪，傍晚的阴沉的大地就会被沉沉的黑暗吞没。凛冽的北风吹打着我们；在狂风暴雪之下，敌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当敌人的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时候，我立即打响了信号枪。随

之四百多支步枪和好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怒火。紧接着，我命令韩益洙吹响了冲锋号。敌人顿时成了瓮中之鳖。

战果很大：敌人死伤一百多名，投降两个连，我军缴获了三挺轻机枪、一百五十多支步枪和大量的弹药。逃窜的只有打头的斥候队。

我们正消灭八道沟方面来的敌人的时候，从二道岗方面来的敌人，听到山谷里激烈的枪声，就吓得不敢前进，停在我们的阻击队守候的山嘴前。我们的阻击队立即朝挤做一团不知所措的敌人开始了密集的射击。敌人丢下被打死打伤的同伴，仓皇逃窜。

我叫我们的队员把敌军的伤号都背到四门开庭，分派到老乡家里，给他们吃了饭，包扎和治疗了伤口，然后打发没受伤的俘虏带着伤号回家去了。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发生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伪满军俘虏说，他被我们俘虏了六次，缴了六条枪，所以他应当受到支援游击队有功者的待遇。

在鲤明水战斗中，八道沟方面的敌人丧失了“冬季大讨伐”的主力。曾吹嘘要全部消灭游击队的敌人，锐气大减，名声扫地，“冬季大讨伐”成了泡影。总之，我们在鲤明水战斗中取得的胜利，给敌人的“大讨伐”作战打上了终止符号。从这种意义上说，鲤明水战斗是特别令人追怀的战斗。二师同志们完全恢复了士气。我和他们同吃同住，为他们将来的活动提出了必要的建议，还帮助他们讨论制定了保证他们在桃泉里和天上水一带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帮助下安全地开展活动的措施。

他们按照我们的吩咐，进入桃泉里山沟的深处，建立起密营，进行政

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直到春天来临，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据说，桃泉里地下组织还给他们提供了棉布、麻鞋、布袜等大量的拥军物资。

后来我和南满的同志重逢，是草木开始泛绿的 5 月中旬在鲤明水村庄以西的一座山岗上。这一程他们在密营里过得安静舒适，气色都很好。

然而，使我十分为难的是，这个部队里的朝鲜同志都不肯离开我。他们都来缠着我，恳求我允许他们编入我们的部队。我为了说服他们，嗓子都快说哑了。

我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跟中国同志组织联军去作战，是因为考虑到了这样一点，在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援方面，这样做要比组织清一色朝鲜人的部队去作战更为有利；你们的部队属于第一军，但朝鲜人占一多半，所以你们可以认为你们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一支别动队；如果你们都要求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到底由谁去同四面八方的敌人打仗呢？南满的敌人，要由包括你们在内的第一军同志们去打，东满的敌人，要由第四师的同志们去打，北满的敌人，要由北满的同志们去打；这样，我们也才能在白头山一带有效地打击敌人；如果你们不到处牵制敌人，那些敌人就为消灭我主力部队而倾巢出动，蜂拥而至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把苦心培养的优秀的军政干部派到北满部队和南满部队去的，而你们却反倒要来我们这里，这不是叫人很为难吗？大家都是为了光复祖国，别离了父母妻子的人，因此，为了争取抗日大战的胜利，撇开个人的感情吧；等光复了祖国以后，我们再聚在一起，回忆往事吧。

为了帮助南满的同志，每当他们要人的时候，我都给他们派了人。其数量是不可胜计的。我们派到南满去的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健儿。李东光和李敏焕，看他们的经历，也是从东满选派到南满去的。1937 年 3 月继曹国安之后接任师长的曹亚范也是老跟我要人，我连我的传令兵金泽万都配给了他。

任过第一军总务处长的孙溶浩，是在念吉林师范学校时就作为我们组织的留吉学友会的会员进行活动的学友。他特别擅长音乐和体育。他体格好，相貌俊秀，是在吉林的女学生中很受青睐的小伙子。他是师范学校的跳高选手和小提琴演奏家。后来，他在搞共青活动的时候被警察逮捕，在新义州监狱受了一段苦。出狱后，在永吉县五里河子致力于农村革命化，第二年到南满磐石县，做了县党委机关报《反日青年日报》的总编辑。从 1937 年冬开始，在第一军指挥部任总务处长。我是在 1938 年冬在南牌子再次见到他的。当时他见到我，十分高兴，说他很想跟我在一起。然而，过了三个多月，我接到了他在富尔河附近的一场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的噩耗。

在南满的游击部队中，我们一向对在我们邻近活动的第一军第二师予以更大的关注。在举行庆祝普天堡战斗(1937 年 6 月 4 日——译注)胜利的军民联欢的时候，他们也找我们来，共享欢乐。间三峰战斗(1937 年 6 月 30 日——译注)，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和第四师、第一军第二师联合进行的战斗。

多年来，第一军第二师和我们的部队在白头山西南部一带很好地进行了协同作战。在本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敌人的警察文件和报刊上不时

地看到我的名字和曹国安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资料，可以说这是说明朝中两国革命者并肩进行联合斗争、协同作战的生动史料。

我每当回忆我们的革命斗争乘胜前进的那些年代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怀念着第一军第二师的战友们。曹国安、宋茂璇、朴顺一……这些只叫一声名字都令人哽咽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好像冒着狂风暴雪，亲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五 《三·一月刊》

古今内外，不论是谁都承认出版物对人类生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有些人说，除了几个未开化的民族之外，过去的整个世界是被几卷书支配过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出版物在改造和发展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出版物是由正义和真理的代言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先驱们编写出来的。推动世界前进的是人，而使人的这种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因素之一正是出版物。我认为这并不言过其实。

我们还把出版物说成是群众的教育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可以说，革命的出版物是把领袖、党和群众紧紧地联为一体的有力手段。

列宁在《星火》报创刊时的题词“星火燎原”成了全世界共鸣的金玉良言。题词中所说的那“星火”后来成了十月的火焰，燃遍

了俄国大地。

可以说，出版物在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世界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剑做不到的事，笔能做到。我们在出版发行《新日》[10]、《布尔什维克》[11]、《农友》[12]等报刊的时候，已经尝到了出版物的甜头，并对出版物寄予了不亚于刀枪的期待。

出版物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它的射程是无限的。

只要我们站在白头山上，通过《三・一月刊》和《曙光》等刊物发出号召：“不要忘记祖国和同胞”，南北满的游击队员和人民就都能听到这一呼声。在能够对千百万群众同时迅速地宣传同一种思想和斗争口号，团结群众，从组织思想上锻炼他们方面，世界上恐怕没有比出版物更能发挥威力的宣传鼓动手段了。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的人常用通俗的语言把口头宣传比作“嘴大炮”、演艺活动为“鼓大炮”、出版宣传为“笔大炮”或“文大炮”。

口头宣传和演艺活动相对地比出版物宣传效果快、鼓动性强，而出版物宣传则具有持续性，不受地区、时间的限制，这是它的优势。

敌人封锁先进的言论，只要认为有碍于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一切言行就用刀枪和棍棒残酷地加以镇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统一领导革命组织而进行的组织宣传活动，不得不用非法的方法秘密地进行。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摸索最适合于游击战争环境的宣传鼓动手段，对我们认为是最佳手段的“笔大炮”的发射予以应有的关注。因此，在白头山密营建成后，我们就在那里办起了出版所，创办了祖国光复会的机关刊物《三・一月刊》。

在东岗成立祖国光复会的时候，我们曾议论过出版机关刊物的事情。要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器皿里盛进各阶层所有民众，使抗日大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就要利用好“嘴大炮”和“鼓大炮”，特别要使“笔大炮”发挥巨大的威力。

30 年代前半期，我们为形成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的政治工作大都带

有地区性。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主要是在满洲和朝鲜北部地区，没能大大超出这个范围。但祖国光复会是要把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插到朝鲜全境乃至中国、日本、苏联、美国等我们侨胞居住的海外所有地方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经常向各地派去工作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适合做这种工作的人有限，供不敷需。在远征北满时，我们就已把不少从游击斗争初期起在东满从事过统一战线运动的军政干部留在那里，所以这类干部更加紧缺。

能补上这种干部空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行出版物。我坚信，只要编写好颇受群众欢迎的报刊向各地发出去，那一张张出版物就能顶替一个个工作员。但是，由于当时有种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未能及时发行机关刊。我们常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频繁作战、不断转移，有时身上背着东西一天得走几十、几百里路。敌人根本不给我们机会，发行出版物。

建立了白头山密营，创办了出版所之后，我们才开始出版祖国光复会的机关刊物《三·一月刊》。《三·一月刊》是大众政治理论杂志，它的基本使命是为实现祖国光复会的宗旨——两千万同胞总动员起来争取祖国独立——而服务。

我们为了选定适合于祖国光复会使命的刊名，费了不少脑筋，终于找到了《三·一月刊》这四个大字。“三·一”是指三·一反日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全体朝鲜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三·一月刊》这个名字反映了民族的意志，还包含着这

样的战略意图和内容：我们坚持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以白头山为据点，把武装斗争扩大到朝鲜全境，使全民族总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抗战。

《三·一月刊》是祖国光复会的机关刊，而它还负有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机关刊的使命，又执行了面向全国和全民族的大众政治杂志的使命。因此，《三·一月刊》必须编成不仅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和共产主义革命者爱读，而且民族资本家、宗教徒和独立军士兵也都爱读的全民族的杂志。

我们以秘书处的成员为主组织了《三·一月刊》编辑部，把有记者经历的李东伯任命为主编。

在李东伯的主管下，编辑人员们积极推进了出版创刊号的准备工作。就杂志的编辑方向和出版业务问题，他们讨论了很多。为了使刊物办得更理想，他们还对国内出版物认真做过研究。

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刮起了黑旋风。只要有点爱国思想的刊物，就残酷地加以镇压和关闭，因此能作为我们工作参考的杂志没有几种。

《三·一月刊》的编辑人员翻阅国内杂志只是为了参考，并没有把它当作标准加以模仿。他们完全是独辟蹊径，一切都由自己来创造。

我们决定《三·一月刊》采取大众政治理论杂志的形式，以爱祖国爱民族、民族大团结的思想为其基本内容。每期除了社论之外还设了若干专栏，诸如：《我们民族祖国光复运动新消息》、《反日民族革命阵线各地胜利消息》、《问与答》、《祖国简讯》、《国际简讯》、《文艺专栏》等。

稿子，主要由秘书处所掌握的一批部队内的笔杆子来保障，同时要向活动在各地的人民革命军部队和祖国光复会组织征稿。为了确保稿源，还向东满、南满、北满的几个主要地方派了《三·一月刊》特派员，鼓励广大读者投稿。

怎样才能把《三·一月刊》的编辑工作变为读者自己的工作，怎样才能使各阶层读者经常投稿，怎样才能使所有读者为不断改进和丰富刊物内容和编辑形式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对这些问题都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最后责成李东伯草拟出征稿启事。

我看过这个征稿启事，觉得很有意思。只要看了这个启事，就是不善写文章的人也都会受到鼓舞，要拿起笔来一泻千里地写出什么东西。启事的头一部分是请托文，为了收集各阶层爱国人士的至理名言，欢迎投稿；接着具体地说明了对稿子的内容、字数和投稿方法的要求，以及对积极投稿者施行奖赏等条款。

我们通过组织系统向各地发下这个启事，并在创刊号上以“欢迎投稿”为题予以刊登。不久，从各地接二连三地飞来了稿子。“烟斗老头”收到了这些稿子，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一情景，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也感到心情舒畅，几乎把各种各样的稿子全都看了一遍。

梁世凤独立军的参谋长送来的贺信殷切地反映了他们热烈欢迎祖国光复会成立的真实心情；介绍祖国光复会南满代表李东光和住在上海的朝侨代表朴某相逢消息的文章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朝侨代表是曾在北京、天津等中国各地多年从事独立运动的人。据说，

他听到祖国光复会成立的消息，便赶到南满来提出建议，要以祖国光复会为轴心在国内外形成统一战线。这是能把祖国光复会组织扩大到中国内地广大地区的良好机会。我们收到这篇稿子后，立刻向李东光派去了一名得力的政治干部。

如上所述，在发行《三·一月刊》的准备过程中，编辑部还起到了通讯处的作用，直接为扩大和加强祖国光复会组织做出了贡献。

祖国光复会某区委会为勉励人民革命军，制作了一面锦旗，同时还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激动人心。

“……发自爱国同胞的火热同情心，我们都解开自己的贫困之囊，捐献出一分两分或一块钱，共积攒了八块七毛一。我们本想用这些钱买点军用品送去，可是钱太少了，所以根据我们和全体爱国同胞的意见，便制作了这一面锦旗……。”

我们把这些信全文登在了创刊号上。

最伤脑筋的稿源问题意外地得到了解决，“烟斗老头”就眉飞色舞地忙于工作。有一天，他出现在司令部，乐呵呵地向我拿出几张白纸，说：

“别的稿子都备好了，只要有创刊词和社论这两篇最重要的文章，就可以编排了。我看，这两篇文章还是请祖国光复会会长同志来执笔，这里有纸。”

“那你当主编的干什么呀？著名的写作家、主编先生不写，难道叫我去包办代替不成？创刊词嘛，还是应当由主编先生执笔才对。”

我就这样鼓励他写了创刊词。因为当时我工作正忙，更重要的是

我想让这位历尽苦难的笃实的写作家敞开胸怀，向两千万同胞放声吐露积压心中的亡国悲愤，尽情倾诉心中的话。我们说定由我来写社论，题为《回顾三·一运动》。但我工作太忙，没能按时写出稿子。我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正要开始写稿，偏巧这时来人报告说抓到了密探，又说敌“讨伐队”正向我密营进攻，我不得不率队上战场。

当时，我最怀念的就是金赫和崔一泉。他们是我在卡伦和五家子时期的知友，这二人是堪称“双龙”的文才，分别担任过《布尔什维克》和《农友》的主编。诗人金赫的文章犹如翻滚的长江激流，豪放不羁，慷慨激昂；而崔一泉的文章则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知识丰富，分析透辟。金赫有时还在《布尔什维克》上登载他亲自作词作曲的革命歌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作品，诸如《资本主义社会诅咒歌》和《反派别歌》等。《资本主义社会诅咒歌》，以诅咒和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心情，辛辣地批判了剥削者；《反派别歌》是一首讽刺歌，它尖锐地揭发了宗派事大主义者拿着用土豆刻的图章，企图依靠别人建立党的真面目。要是金赫和崔一泉还在我们身边，就能大大减轻“烟斗老头”的负担。

回顾三·一运动的社论也罢，祖国光复会成立的文件也罢，都像写《血海》和《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等剧本一样，我是利用同敌人接连不断地进行激烈交战的空隙断断续续地写出来的。

在发行《三·一月刊》创刊号的整个准备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弄到油印器材的问题。当时我们只有一台旧油印机，油墨、橡皮辊筒、蜡纸和纸张也都没有。出版所的工作人员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

这些困难。没有油墨，就用白铁板做成三角盖，烧桦树皮让烟在三角盖上凝成炱，再把它刮下来泡在油里，和油墨搀和着用。油辊坏了，就把阿胶和松香和在一起熔化成液，然后倒入模子里铸出来。铁笔坏了，就用大针改制来用。他们为发行《三·一月刊》而付出的心血和辛劳，可称得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

他们的苦心奋斗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三·一月刊》创刊号于 1936 年 12 月 1 日问世了。

那天“烟斗老头”拿着头一本创刊号来找我说：

“在我那虚无缥缈的人生中，若说干出了什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发行了《三·一月刊》的创刊号。将军，您不管工作多么忙，还是请听听《三·一月刊》这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叫吧。”接着，他以激动的心情放声朗诵了创刊词的头一段：

“强盗日本鬼子霸占了我们朝鲜，两千三百万白衣民族变成了亡国奴，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人权落到了牛马不如的境地。”

《三·一月刊》一问世，引起了军民群众的很大反响。各地祖国光复会组织送来贺信和请托信，祝贺《三·一月刊》的创刊，要求增加印数。有些人还以组织的名义预订下一期杂志。

我们正为解决发行《三·一月刊》所需的器材发愁时，朴达通过在日本留学的人弄来了两台性能很好的新油印机。据说，他们把运到端川车站的两台油印机分别装进土豆袋里，用牛车拉到甲山，可是由于警察监视甚严，只好在山里躲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运到民族解放同盟出版部所在的五丰洞。

朴达原把这两台油印机都送给我们的密营。但我们只用了一台，另一台，就让他们留在甲山用来印发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机关刊——《火田民》。

朴达弄来的油印机性能确实很好，比旧油印机效率高几倍，此后每期都印几百份。

《三·一月刊》深受读者欢迎，超出我们的预料。我认为，它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固然在于其编辑形式新颖，但更主要的是它的内容贯穿着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这就说明《三·一月刊》最敏锐而正确地反映了我们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攻势，朝鲜革命者应首先解决的课题是，把各阶层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打好全民抗战的基础。

《三·一月刊》发行以后，扩大和加强祖国光复会组织网的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报名参加人民革命军的人和支持与同情我们的人也急剧增加了。一两声“笔大炮”的威力，难道就这般大吗？连那些“操炮”人员也都感到惊讶。

据说，有一次朴寅镇在见到权永壁时说，几乎所有岭北的天道教徒在短时期内都加入了祖国光复会组织，在这方面，《三·一月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发行《三·一月刊》，首屈一指的大功臣当然是李东伯了。他在创立祖国光复会时也付出了很大辛劳，但与创办和发行《三·一月刊》付出的辛劳是无法比拟的。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三·一月刊》的发行事业。

我活了八十多年，可从未见过一个人像“烟斗老头”那样爱惜用纸。他把树叶大的纸片也都收拾起来，需要急用时就拿出来，密密麻麻地写上蝇头小字。“烟斗老头”见到有人用可以写字的白纸卷烟抽，就严厉地批评他不节约用纸。他向来是用烟斗来吸烟，可能就是为了节约用纸吧。

不管怎么说，那个烟斗使李东伯节约了很多纸，这是事实。若没有那个烟斗，他一生中肯定会烧掉了几千张纸。

李东伯说，等到祖国解放后，就要写我国的抗日革命斗争史。因此他天天写日记，从未中断过一天。他还广泛收集各种有用资料妥善保管在背囊里。然而他在杨木顶子遭到敌“讨伐队”的突然袭击，不幸牺牲了。敌人杀害了来不及转移的老弱者和“烟斗老头”，烧毁了密营。“烟斗老头”视如珍宝而妥善保管的那许许多多资料、图片和日记，就和他的身躯一起烧成灰烬，没有踪影了。

李东伯认为那些历史资料将是献给独立了的祖国的最宝贵礼物，可惜它们在一朝全都变成了灰烬。我一想到这事，今天仍禁不住万分悲愤。别的不说，只要他那大背囊里的日记本还在的话，我们的后代该多么高兴啊！

后来，我到杨木顶子密营，在那被烧毁的草棚遗址找到他的遗骸，亲手安葬了。他生前爱用的那个烟斗一直没有找到。一切都被烧成灰烬，没有一件东西能作他的遗物保存在这个世上。只有抗日革命战士对这位杰出的老知识分子、老革命家的深切缅怀，没有被烈焰吞噬，而永远留在人间。不过，几年前，我们在白头山密营中发掘了他亲笔

题字的标语树。我好似见到活在人世的《三·一月刊》的主编，久久不能在那棵标语树前挪步了。

我在抗日革命时期所见到的所有知识分子当中，李东伯是最有良心、最有革命性的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之一。

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在社会革命和变革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近代，我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通过互不相同的渠道和方法，为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

李东伯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代表。他走过 20 年代我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平常最普遍的道路，最后加入了抗日武装斗争队伍。李东伯从一个优柔寡断、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成长为献身于最积极的武装斗争的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

白头山时期，在队内的出版工作人员中，仅次于李东伯的写作家便是金永国了。他曾在国内赤色农民组合活动，后来经朴达、李悌淳的介绍加入了我们的部队。

金永国作为一个军人，是排不上“甲”系列的，但他是个文才，在写作能力上是没有对手的。人们看到他刻的钢板字，都咂咂舌说，和机印的字体一模一样。他在一夜间能刻出十多张蜡纸，字体却像机印的一样整整齐齐，因此常受到“烟斗老头”的表扬。说他的毛病，就是有点自由主义，有严重的健忘症。有一次，他在休息地忘了带枪就走了，行军快有二十里路才想起来，又慌慌张张地返回去取。因为

此事，他挨过严厉的批评，还受了处分。

“枪等于是你的命，哪儿还有丢下自己的命走的。你这种精神状态，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撤销处分那天，我这样一问，金永国搔着后脑勺儿，满诙谐地回答说，“世界上著名的大文豪几乎都有健忘症。”他的话使我和“烟斗老头”都捧腹大笑起来。

热诚的写作家金永国一有空就写诗写小说。1937 年，我们发行过队内机关报《曙光》，那里发表了他好些作品。至今，我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在《曙光》的创刊号上登载过他的几节歌词。歌词中有这么两句：“人家的爱郎参加了革命军，我家郎君却入了自卫团。”金永国在发表这个歌词时还加了个脚注，要配《阿里郎》歌曲来唱。《曙光》的第二、三、四号上连载了他写的短篇小说。他是《曙光》的主编，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写作家。1938 年秋，他为那些体弱者和伤病号，在同金周贤一起去采野蜂蜜时受到敌“讨伐队”的狙击，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政治周报《曙光》，为游击队员登载了许多政治、军事学习资料。我撰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发表于《曙光》上。

在《曙光》的热诚编者中，又一个崭露头角的就是林春秋。他积极辅佐了金永国从事《曙光》的编辑和发行工作。

《钟声》是我们在马塘沟密营开始进行军政集训时发刊的队内周报，主要刊载有助于军政学习的政治军事学习资料和教育资料。

《钟声》的主编由崔景和担任。他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却

很好地完成了主办报纸的艰难工作。我认为他能够承担这项任务，其秘诀在于他通过长期的勤勉学习，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他在故乡时就通过自学攻读了考大学的必备参考书。

崔景和善于言辞。他说的话就是听一整天也不感到厌倦。即使是读者看得厌烦打哈欠的通俗小说，一经他的口，就能改编成第一流的名著。口才是他最有威力的武器和财产。所以我们常叫他做鼓动性演说。群众听他讲话时，简直着了迷。

崔景和在故乡时曾积极参与过青年学生运动，后来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才亡命到长白来的。他来长白后就以塾师的身分埋头于群众启蒙工作。当然他后来很快加入了祖国光复会组织。他同权永壁接上关系后，曾担任过十七道沟党支部的组织工作，又做过城津(金策市)地区的政治工作员。但是瞬间的失误使他无法继续做地下工作，便加入了游击队。

他一入伍，女队员们在背后议论说来了个美男子。然而我不是被他的容貌，而是被他的才华和人品迷住了。崔景和确实是个罕见的才子，既善于写文章，又善于画画。《钟声》上的插图大都是他画的。他在政治课堂上是好讲师，战场上是打前阵的先锋战士。1938 年初的静安屯战斗，崔景和自愿参加突击组，开辟了部队的进攻道路，然而却不幸身受致命伤，最后牺牲了。

我失去崔景和这样的优秀战士，心里万分悲痛，在他牺牲的那天，整夜抹着泪赶写出悼词。尽管是寒风刺骨的严冬，我们还是为他庄严地举行了追悼仪式。

队内反日青年同盟机关报《铁血》，是在 1939 年末进行大部队回旋战前夕以快报形式发行的周报。当时，李东伯、金永国、崔景和等得力的写作家已都离开了我们，周报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只好交给新手来做了。

我们把发行《铁血》的任务交给了兼管司令部党支部工作和青年同盟工作的姜渭龙，让他边学边做。起初，他挥起双手说，这种事我干不了，还是交给别的同志来做吧。我们使用了强权，他才接受了这项分工。以后他在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报纸的发行任务。

同《三·一月刊》和《曙光》一样，《铁血》也把编辑的中心放在正面资料上。《铁血》创刊号上登载的介绍李乙雪的文章和有个新队员用刺刀缴获捷克造新式机枪的战斗故事，可以说是这种正面资料的典型。

在快要结束白石滩密营军政学习的时候，为了激发青年的勇敢精神和士气，新定出一种制度，要对在战斗中建立武功的青年授予红带，荣获红带的队员则在节日和部队特定的喜庆日子把红带系在军服上面。

在总结军政学习时发行的《铁血》特刊号上，登载了有关学习总结的情况和新制定表彰制度的消息，引起了读者的关心和兴趣。

如上所述，我们的革命出版物不仅成了面向读者群众的出色的宣传者和教育者，而且成了激发他们建树英雄伟绩的鼓舞者，成了他们积极奋斗的向导和生活的亲密伴侣。

在抗日革命时期，我们出版的《三·一月刊》等出版物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创作、编辑和发行，不是靠几个人材来办，而是靠广大

读者的积极参与。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我们在发刊出版物中也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当作一项铁的原则。

记得还是在我们部队暂留南牌子时，有一天，我在密营漫步，突然发现有个女队员独自坐在林中，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东西。她把铅笔不时地拿到舌尖上沾沾唾沫，艰难地写下去。她贯注全部精力，像点点滴落的屋檐水一样，把文字一笔一画地落在纸面上，连有人挨近都没有觉察出来。我问她写的是什么，她回答说是到农村去进行宣传的讲稿。

我一读她的文章，心里好不惊奇。作为一个小学辍学生，她的笔力如此雄健和精练，可见她平时学习多么刻苦。以《告旅满朝鲜青年书》为题的这篇文章主题鲜明，思想明确。于是我们把它稍加修改后登在《三・一月刊》上。读者们看到这篇文章后都受到很大鼓舞。

总之，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平凡的炊事队员也就这样成了我们刊物的作者。由于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在那一无所有的艰苦环境里，也能发行《三・一月刊》、《曙光》、《钟声》、《铁血》等报刊，牢固地形成了我们革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

今天，我国定有这样一个表彰制度：对有特殊功劳的新闻出版工作者授予最高奖——“三・一月刊奖”。如果李东伯还活着的话，第一个“三・一月刊奖”肯定会授予他的。

让我嘱咐我国新闻出版工作者，请你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未曾佩带过一枚勋章而离开人世的革命出版界的第一代功臣。

第十五章

扩大地下战线

一　不屈的革命战士——朴达

二　国内党工作委员会

三　转战白头山麓

四　朴寅镇道正

五　民族宗教——天道教

六　游击队离不开人民

七　良民保证书

时期 ：1936.12～1937.3

一　不屈的革命战士——朴达

朴达从未穿过军装，自然也没有同我在一个部队里作过战。我在白头山地区时，他多次来找我们，可是有时我不在，因此只跟他见过几次面。

仅仅靠了一两次见面，要全部了解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可不是容易的事。然而俗语说得好，一夜能筑起万里长城，我和朴达就是通过初次见面，相互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的。

朴达跟李悌淳一样，是个一尘不染的纯而又纯的人。他从未参与过任何派系，也没有以主义者的面目摆过架子。我在吉林时期曾多次会见过赶时髦的主义者，如金灿和安光泉，而朴达却与他们截然不同。

他像山沟里的农民一样淳朴，可是学识渊博，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一眼就看出是一位沉稳持重的汉子。他照自己的观点评论过去的各种运动，为民族的未来担忧。他说，为了寻找能够摆脱旧运动方式的好领导，他跑遍了兴南、端川、间岛等好多地方。

当他因为找不到能够引导他前进的领导者而焦心的时候，我们则为了寻找经过锻炼的国内革命者，正从各方面作出努力。

在贯彻执行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方面，我们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一是在国内建立统辖整个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可靠的策源地——秘密根据地，二是准备好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以便自力更生发动光复祖国的全民抗战。

在国内组织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方面为的是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网，把各阶层广大爱国同胞紧密地团结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同时，在国内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从而建设好能够把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抗日革命引向大高潮的骨干力量。论其重要性，可以说这项工作是决定我们占据白头山去进行的一切政治、军事活动成败的关键。

我们扩大和发展国内革命的斗争，并不是从空白点上开始的。国内已有一定的组织基础，我们能够赖以站住脚跟深入发展革命，还有饱尝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刀和棍棒滋味的政治力量。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等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各阶层群众组织；把这些组织引向抗日的经过考验的战士；在反复失败和迂回曲折中经受了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人民；每当受到挫折和损失时用血泪记录下来的沉痛教训……这一切都是能够根据新的战略和策略，进一步深入发展国内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

尊重国内革命运动的功绩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整顿过去的运动，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加以发展，这就是我们在同国内革命运动的关系中所持的态度和方针。

我们从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起，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朝鲜革命军培养出来的优秀工作员派到北部国境地区和国内腹地，首先就进行了奠定政治军事基础的准备工作。要想推动国内革命运动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

——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国内，大力开展政治、军事活动，并积极支持和帮助国内运动。

事实上，屡遭失败和挫折的国内革命运动，早就在渴望着出现新的领导和新的路线。运动的上层集团因派系斗争闹得乌烟瘴气，而下层的先觉者和人民群众却激昂慷慨，准备接受革新的路线和领导，奋起投入殊死的战斗。那些曾经为了重建党而奔波操劳过的人们，也正在地下和监狱里回顾着自己过去的失败，努力摸索着出路。

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实际措施。其中重要的就是实现抗日武装斗争和国内革命运动的一元化，这也就是意味着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领导。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设法找出像李悌淳那样坚定的革命者，跟他们共同作出努力，尽快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网，发动全民族投入抗日圣战。

我们物色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朴达。

把朴达介绍给我们的是李悌淳，他说：

“朴达不愧是一个男子汉，只要是为了正义，刀山火海他都敢闯。他的理论水平也很高。有一次，他跟一个留着狮子头俨然以思想家自居的端川人进行论战，结果把那个人批驳得无地自容、威信扫地。所以要开辟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就得找朴达。”

我听了李悌淳的话，心里很高兴。可是，只听人讲，不见其人，是难以肯定的。老实说，我们曾不问主义主张见过不少闻名遐迩的风云人物，但到头来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他们多么使我们感到失望啊！他们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思考和行动都缺乏创新。

就朴达而言，他并不是像我在吉林见过的安昌浩、金佐镇、李青天、吴东振、孙贞道、沈龙俊、玄默观、玄河竹、高远岩、金灿、安光泉、申日镕、徐重锡那样的第一流名士。朴达这个人，充其量也不过是由地方警察和特高警察监视的对象。

但是后来，他这个憨厚朴实得像一个山村樵夫的人，竟然成了在我国革命征途上留下了巨大足迹的时代精英，成了我至今难忘的莫逆之交和同志。

据李悌淳说，朴达的本名叫朴文湘，因为他长得像檀木一样硬实，所以邻居都叫他“朴达”(朴达是檀木的朝语谐音——译注)，久而久之，朴达就成了朴文湘的外号，后来就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朴达出生于咸镜北道吉州郡德山面。他的父亲在明川经营沙丁鱼厂，说明家境并不贫寒，但他本人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他十一岁娶了亲，十六岁在父亲经营的沙丁鱼厂当了吃薪水的会计。看来他的父亲是决心让儿子早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当时，他为自己的早婚害羞，不敢向朋友们说自己有了妻室。他回家吃午饭，如果家里只有妻子一个人，他都不好意思开口要饭，只在屋里来回打转。

听说，他的父亲性情豪放，很有人情味，但好酒好色，娶了小老婆。朴达的亲生母亲因此受他父亲的欺侮与嫌弃，朴达十分同情自己的母亲。

“我最恨的是娶小老婆的人。”有一天，朴达对我说，“我从小生活在有偏房的父亲的膝下，体验了母亲所受的痛苦，深深地体会到了纳妾制度的不合理。”

他后来还说，解放后，我们从法律上废除了纳妾制，是极为正确的。

他的母亲由于纳妾制而遭到的不幸，给朴达的一生打上了痛苦的烙印。他从母亲得不到丈夫的温存、过得十分孤独悲伤的一生中吸取了教训，对贪杯弄色拒之唯恐不远，对比他大五岁的妻子献出了纯正的爱情。

朴达还轻蔑吝啬鬼。不管地位、职业和性别，凡是吝啬的人，他都弃如敝屣。

“我一碰见吝啬鬼，整天倒胃口。”

我于 1957 年在朱乙跟朴达见面时，他的健康情况略有好转，可以这样聊天了。我听了他的话，感到他最厌恶的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朴达十分仁厚。用通俗的话说，他是个人情味再丰富不过的人。一到收土豆的季节，他就对路过自家门口的人说，今年土豆味道真好，你不想尝一口吗？他这样说得叫人嘴馋了，就把过路人拉进屋里吃土豆。凡是没有种土豆的邻人，他就做土豆糕送去。我常想，如果像朴达这样心地善良厚道的人是个富豪，那么，他准会成为著名慈善家的。他虽然没有钱，但只要是帮助邻居的事情，就往往不惜一切。

朴达小学毕业以后，自学了古文，也精读了中学讲义。他在汉城西大门监狱里坐牢的时候，身残志不残，硬是啃透了《东医宝鉴》[13]，足见他是个勤学苦读的笃学者。

“惠山事件”[14]发生后，警察搜查朴达的家，都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发现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还发现了《社会主义大义》、《社会进化论》、《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知

识》、《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反失业斗争宣言》、《社会主义辞典》、《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关于朝鲜问题的提纲》、《党员基本常识》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家虽然一文不名，空无所有，书却很多，是个知识的富翁。

朴达跟我初见面的时候，说自己不学无术，愚昧无知，希望把他当作目不识丁的文盲，样样都从头教他。但这是过谦的客气话，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很深。不过，他不炫耀自己的学问，也不想用学问压倒别人。尤其是，他一点也没有抓“领导权”的野心。他既不贪金钱，也不贪地位，是个勤俭朴素的人。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人、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革命者朴达的真实面貌。

朴达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学徒，苦苦盼着有人来引导他走正确的路。组织甲山工作委员会的时候，他严格地把这个组织的工作范围限定为“甲山”地区，规定了它的地方性，还用工作委员会这个名称表明了它的临时性。并且一开始他们就决定，朝鲜共产党一建成，这个工作委员会就服从它，组织的名称也将适当修改。当时，他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在没有为反日斗争找到适当的领导者的情况下，先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在特定范围里建立一个组织，进行斗争。

朴达组织甲山工作委员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甲山地方的一些社会运动者被日寇军警的镇压吓破了胆，栽进了投降主义泥坑。

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咎于没有党中央机关这一点上，企图证明自己的错误立场是正当的。他们说：“不要煽动或助长甲山郡内自

发的反帝斗争。我们要等待朝鲜共产党成立，等待它提出新的路线，然后再根据这个路线来领导甲山地区的运动。只有这样做，才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尊重集中制原则的。”

朴达对此提出批评，说这是逃避革命的立场。他指出，甲山郡内自发的运动，必须由我们加以组织化，并努力把它发展成为全朝鲜的运动。只有这样，将来共产党成立了，党中央才能对它更顺利地进行领导。就这样，在他们同主张坐等好时机到来或躲避警察而逃到外乡苟且偷安的人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甲山工作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为了保护甲山工作委员会不受敌人的破坏，朴达给下级组织起了政友会、前进会、反日会等不同的名称。出于唤醒群众的需要，他还毫不犹豫地利用了振兴会、自卫团等官办团体。当他们打着这些团体的牌子举行夜校会、运动会、早会等活动的时候，不明真相的警察却心满意足，认为这个甲山的乡巴佬也开始成为他们的帝国臣民了。

朴达每月都召开一次工作委员会下级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逢到这样的日子他就同时组织一场足球赛。等群众聚齐，开始了球赛，他便悄悄溜出来找人开会，分配任务，把该做的事尽行布置妥贴。他还利用群众办祭祀、举行婚礼、做生日、庆花甲等机会，召集组织的成员和负责人开秘密会议。因为利用了一切合法的可能性，组织伪装得很好，活动也开展得很顺利。

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合法活动的可能性，

还十分巧妙地同日寇警察和走狗建立了关系。大部分的组织成员按照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打进日寇的御用团体和基层行政机关，装作“积极分子”开展了活动。这同对日寇军警和走狗怀着露骨的仇恨，一味采取明显的对立态度的新干会[15]、工总、青盟、赤色劳动组合、赤色农民组合的斗争相比，是很大胆的具有革新意义的举措。

在国内革命者中，朴达最先运用这种外柔内刚的乔装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在警察机关、自卫团等官厅以及农村振兴会、消防组、学校组合、护林组合等团体里，带着村长、区长等头衔，假借为敌人效劳之名开展活动，这有利于从精神上解除敌人的武装，深入掌握敌人的内部情况，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从而把其中一部分争取到我们一边来，还可以减少对人民群众的折磨。

朴达不但是甲山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还兼任该委员会政治部和争义部的领导职务。作为保护色，他又打入敌人的公共团体，居然取得了普天面新兴里一区农村振兴会副会长、一区一新书堂契契长、自卫团副团长、云兴面大五是川里消防组队员等引人注目的官方头衔。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革命者。

因“惠山事件”而被捕入狱的第一批人中有六十三名是自卫团员。

仅仅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他们多么灵活地利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和团体。这六十三人中还有不少人分别兼着形形色色的官衔，如振兴会庶务部长、自卫团五家组长、护林组合评议员、产农指导区指导委员、火田测量总代表、中坚青年讲习会讲习生、书

堂学务委员、简易学校评议员等，不一而足。

甲山工作委员会在工作方法上同样把合法与非法手段熟练地配合起来，提出了适合农村实际的口号，如减租减息、保障垦荒自由、反对拉夫、反对高利贷、反对强迫种植亚麻、反对强迫种植小麦等，广泛开展了积极的斗争。这些口号，乍看起来，好像只强调了经济斗争一面，但实际上它包括着反对强迫种植亚麻、反对强迫种植小麦等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拿强迫种植亚麻来说，由于敌人把这个作物用作生产军需品的原料，所以农民就想方设法破坏种亚麻。比如，把亚麻的种子煮熟了种在地上，或者把种子播得很稀，让亚麻分蘖多，无法使用。

总之，听了李悌淳的介绍，我们断定朴达是我们必须早日携手共事的人。

我们讨论了跟朴达联系的办法，并任命李悌淳为国内联络负责人。李悌淳立刻执行了这项任务，并且通过通信员向我报告说朴达要求人民革命军直接给他派代表去。他那么热切地盼望同我们见面，却并没有径直到密营来。仅此一点，就使我确信他是一个非常慎重、善于深思熟虑、不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的革命者，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信任和渴念。

诚然，我们需要的不是凭一时冲动忽热忽冷或随波逐流的浮躁的思想家，而是做事认真、沉着、思虑周到的革命者。

我们按照朴达的要求，把做党的工作有丰富经验的权永壁派到了甲山地区。当时，我写一封信托权永壁转给了朴达。信是这样写的：

致热爱祖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

国内爱国者同志们

在国内同万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同志们：

我们为了光复祖国，手持武器，在满洲旷野同日满军警作斗争。

我们衷心希望同你们紧密携手，把一切力量联合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的光复而进行斗争。

我现派我们的代表直接赴你处工作，希望你们坦率地讨论工作，交换意见。

敬　　礼！

金　日　成

权永壁去甲山时，李悌淳和他同行。我记得，他们跟朴达见面，是 1936 年 12 月。朴达通过权永壁第一次听到了祖国光复会成立的消息，权永壁还向他介绍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主要活动情况。

权永壁的出现，对渴望同我们取得联系的朴达来说，是一件使他非常激动的大事。权永壁回来说，朴达平时不轻易流露感情，以致被大家称为“木头锁”，但是看了我的信，竟高兴得眼里闪出了泪光。

“他当场要求立即来见将军。只要将军允许，他就要随时来见。”

听了这一报告，我对朴达的思念就更加迫切了。我决定在我们密

营会见他，于是指示权永壁去采取必要的措施。

朴达自己也做了来见我们的准备。所谓准备不是别的，就是设法安全地渡过鸭绿江。当时的形势很严峻，秘密渡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经过多方的研究和思考，决定去找惠山警察署大坑村派出所的一个警察。

“喂，金警察，你听到长白消息没有？”

朴达一进派出所，就像出了什么大事似地大声喊道。金警察和别的几个警察都睁大了眼睛瞧他。

“什么消息？”

“听说，长白地区‘土匪’很多，频繁窜扰，老百姓都往别处逃难，忙着出卖粮食，价钱便宜得很，我想到那儿去运两车大豆来做买卖。要想捞点儿外快，就给我开一张渡江证吧。”

警察们听了他的话，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开渡江证没问题，要给他们顺便带一些做酱的黄豆来。就这样，朴达毫不费事地弄到了渡江证，安全地渡过鸭绿江，来到了李悌淳的家。

李悌淳领着朴达来到司令部的时候，已是凌晨。

正如李悌淳说的，朴达脸盘小，肩膀宽，有点不匀称，看他的外表，不像个风云人物，果然像个山村樵夫。但他那注视着我的犀利的目光，却是不同一般的。

“我是多么想见到您呀！”

这就是朴达说的头一句话。这句毫无修饰、脱口而出的见面语，使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真诚，觉得一股热流涌上了我的心头。

朴达说，他在吉州坐牢的时候，就开始梦想着和我们见面。起初，他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同时为了扩大组织，来到吉州在造纸厂建设工地上做工，没想到在那里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牢。在狱中，他偶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一张报纸，在上面看到了我们的部队挺进长白地区打击敌人的消息。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渴想着我们。出狱后，他为了跟我们接上关系，曾挑着货郎担子走遍了鸭绿江沿岸几乎所有的村子。

“说真的，今天能见到将军，实在是大幸啊！”

朴达高兴地又一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有力地摇晃着。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我对他说，“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到白头山后，你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国内代表。”

“我算什么代表啊，不过是个甲山乡巴佬嘛……要是到了吉州、城津、咸兴等大城市，那些搞什么运动的人，对我连睬都不睬呢。”

他的言行举止，粗粗看去倒真像个地道的“甲山乡巴佬”。但是，我却从他的谦逊淳朴中看到了一个巨人般高大的形象。因说道：

“哪里有只是大城市才能出杰出人物的道理呀？我从李悌淳同志那儿听到了甲山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许多反日爱国活动。国内有很多有骨气的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递给他一杯开水，让他喝了暖暖身子。可他只喝了一口，就急着要汇报国内情况。真是个浑身是劲儿的热情充沛、令人佩服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同朴达开始了正式谈话，谈了很多问题。一开头，由朴达介绍了当时的国内情况和甲山地区的革命运动。他讲的要点大致如下：

就国内情况而言，可以说革命运动进入了衰退时期。重建党的运动似已泄了气，农民组合运动也已收缩。搞运动的人经不住镇压，逃到山上过起了隐遁生活。有力量重整旗鼓吗？没有。即使鼓起勇气重新站起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路线。总不能盲目地起来作战吧。许多人只盼着保全性命。虽然有一些人没有失掉勇气，继续奋斗，然而，他们仍没有丢掉搞宗派的恶习。不仅上海派、俄罗斯派等派系仍存在，而且还存在着咸南派、咸北派，甚至同一个咸南派里还有咸兴派、洪原派、端川派等。他们互相争吵，你攻我，我攻你，徒托空言耗费精力，反而给群众造成思想混乱。

“在国内革命运动中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正确的领导。换句话说，没有一条令众人信服的路线，更没有能制定出这种路线的人。所以，在端川发生农民暴动的时候，派人到共产国际去要求过帮助和指导，但都一无所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依靠谁呢？”

概括起来，从朴达的话中可以知道，国内革命运动亟待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我们在谈话中谈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使命和性质问题。

朴达神色严肃地说，他要不揣冒昧地问我一个问题，要我不要见怪。他说：

“现在，国内革命者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金日成将军虽是朝鲜人，搞的却是中国革命；金日成部队虽是由朝鲜人组成的，却属于东北抗日联军。对这种说法，应当怎样理解？希望直接听到将军的解答。”

正如李悌淳说的，朴达的确是一个异常坦率直爽的人。

我不得不给朴达作了长时间的说明。

新闻出版界指我率领的部队叫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六师，所以国内革命者有这种疑问，是必然的。但是因此就认为我率领的部队完全是中国军队，那就大错了，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所谓东北抗日联军，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东北地区各种抗日游击队联合的军队。它包括着共产党系统的中国人游击部队、救国军系统的中国人反日部队、由朝鲜共产主义者组织和指挥的朝鲜人抗日游击队。这是一支为了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统一步调而联合起来的国际联军。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解放各自的祖国这一相同的目的、东北这个共同的活动舞台、通过历史形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和相同的处境，所有这一切，使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武装力量实现了这样的联合。联军毕竟是根据自愿原则产生的，因此，抗日联军尊重各民族军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打着联军的旗帜，一面支援中国革命，一面以解放祖国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完全保持着朝鲜民族军队的本色，独立地进行活动，致力于朝鲜革命。我们的军队从建军时候起，就是为实现本国的解放和本民族的自由而斗争的朝鲜民族军队，这是住在满洲的所有同胞都知道的。我们到中国人多的地方去就叫抗日联军，到朝鲜人多的地方去就叫朝鲜人民革命军。

有个时期，有一些人凭仗一国一党制原则非难朝鲜人搞朝鲜革命，企图侵犯和践踏我们民族军队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利。后来，共产国际指出，朝鲜人民搞朝鲜革命并不与一国一党制原则相矛盾，并向我们

提出建议，要我们从抗日联军分离出来独立地进行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留在联军里。如果我们另起炉灶，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就会减弱，我们进行活动也会不方便。中国人也不希望按民族分裂联军。现在，我们保持的联军体制，是朝中两国战友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的血肉关系的纽带，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这是国际反帝联合行动的楷模。只要我们的自主权利不受侵犯，中国人也不表示拒绝，那么，我们决定今后继续保持这一体制。如有可能，还想跟蒙古民族军队和苏联军队组成抗日联军进行作战。

朴达听了我的说明，脸上露出了开朗的笑容。

“啊，原来如此，我却白操了一份心！如果金将军的游击队是属于中国军队，那就无须寄予什么期望；可是现在听了您的说明，我的勇气陡然增加百倍了。”

“你这样高兴，我也很高兴。既然提到了，我就告诉你，对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日本军队虽然是强敌，但决不是无敌的军队。我们打算以白头山为据点，把光复祖国的战争扩大到朝鲜国内去。解放祖国，是时间问题。我们正积蓄着由我们自己光复祖国的力量。要记住，其中也就有朴达同志领导的甲山工作委员会呐。”

在我们的谈话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祖国光复会的问题。

朴达对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扩大和加强这一统一战线的各项措施、《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宗旨，表示了绝对的支持。他说，祖国光复会是规模巨大的组织，其目的是崇高的和带有普遍性的，

所包罗的力量广泛而雄厚，跟过去的新干会或槿友会等左右合作的民族团体根本不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我们的所有方针和措施表示了完全的支持。譬如对祖国光复会的名称和纲领的一些条款，他就持有跟我们不同的见解。

他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着斗争，但是我确信，不论怎么说，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看了祖国光复会的名称和十大纲领，总觉得它远远地离开这一共产主义纲领的要求，后退到民族主义界线内去了。换句话说，似乎抛弃了最高纲领，只提出了最低纲领……"

看来，朴达很担心我们会受到非难，怕有人说我们抛弃了斗争的最高目的，倒退到机会主义立场，不是采取积极的斗争方式而选择了妥协性的改良主义运动。对此，我觉得他也没有摆脱"烟斗老头"最初所具有的那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于是，我向他解释说：革命并不是只靠几个共产主义者的力量进行的，只有让各阶层广大群众总动员起来，我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你也知道，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不只是工人、农民和共产主义者，而是全民族都在受压迫，都在水深火热中呻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所有渴望朝鲜独立的力量都团结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来。你对祖国光复会的名称有意见，其实，这是能够把任何阶层的人都吸收进来的最恰当的名称。现在，有些人认为，给一个团体起名，也必须加进诸如"革命"或"赤色"这样的词。这是左倾的一种表现。我

们给泛民族性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加上了祖国这个词，为的是表明这个团体是为全民族利益奋斗的组织，而不只是为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奋斗的组织。

朴达说，他经常跟城津、鹤城、吉州、端川、北青等地方的人接触，互相交流经验，他觉得他们搞地下活动有些冒冒失失，粗心大意。譬如说，在城津，农民组合的人在端阳节参加摔交比赛，也都头扎红巾，坐在一边，以示他们跟无组织的群众有别。在摔交场上，如果自己的人斗不过对方，就凭他们人多势众，不管胜败如何，接二连三地派人出场比赛；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故意惹是生非，大吵大闹，来显示赤色农民组合的威力。而坐在发奖席上的便衣警察便乘机掌握农民组合的骨干分子，然后顺着这条线索去逮捕，去一网打尽。

当时，一些地方的组织在同乡校的关系中也犯了左倾的错误。乡校是地方士绅祭祀儒教始祖孔子的封建色彩浓厚的团体。它定期举行仪式给人授予掌议、校监等名誉职衔。这个团体的成员互相见面问好的时候，尊称某掌议、某校监以示礼遇。由于它是宣扬封建儒教伦理道德的团体，当然是无须鼓励的，但也不应公开加以反对或者想一下子打倒它。

然而，有些受左倾毒害的青年，借口反封建，作出鲁莽的行动，把爷爷戴的掌议帽烧掉或撕碎，被老年人用长烟袋之类打了一顿。老人们大发雷霆，骂共产党是一群不知道三纲五常、目无尊长的败家子。

从中渔利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在乡校祭祀孔子的时候，指令郡守也来参拜，为的是证明共产主义者无视老年人，而日本官厅

则不然。敌人就是如此巧妙地利用乡校来反对共产主义力量。

于是我说道：“让我再说一遍，并不是因为用什么‘赤色’或‘革命’这样惹眼的词汇起了团体的名称，工作就会顺利进行，组织的革命性就会自然而然得到保持的。祖国光复会组织可以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用各种名称建立。比方说，工人组织劳动组合，农民组织农民组合，青年组织反帝青年同盟或共产青年同盟，总之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据我们了解，国内各地有叫做振兴会的御用团体，它吸收了不少群众。要争取各阶层群众，就要打入这样的团体。我看，只要打进去把那里的群众争取过来实现革命化，那么，就可以按照《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的精神，把这些团体的性质逐步改变过来。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只要有利于我国革命，不管它是带什么名称的组织，都可以不加限制。”

朴达听了我的话，才翻然悔悟。

“唔，我明白了，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运动方式确实有问题。”

我通过同朴达的谈话，发现国内革命者的思想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最大错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疏远和排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这是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具体研究而囫囵吞枣的赶时髦的共产主义者和经院式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普遍的左倾偏向。

我再次强调，对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再没有比争取民族解放更大的事业了；离开了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并且说：

“我们所说的民族的概念，不仅包括着工人、农民，而且包括着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热爱创造性劳动、热爱获得了解放的祖国的未来的各阶层群众。这就是民族总动员的标准，是加入祖国光复会的标准。我们要根据这一标准，把能够为朝鲜的自由和独立而尽力的人都发动起来。只有在自主独立思想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主张不依靠外部势力，认定必须而且能够用本民族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独立的思想基础上，全民族总动员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拯救朝鲜的命运。”

朴达虽然在思想和实践中犯了不少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大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虚心地接受了我们的主张。

我向朴达建议：要把甲山工作委员会置于祖国光复会之下，作它的下级组织，并把名称改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朴达欣然地表示了同意。

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在把祖国光复会的组织扩大到国内方面应执行的任务及其具体办法。我们有时就在屋外升起篝火，一边烤火，一边谈话。在朴达停留密营期间，我还同他讨论了在国内扩大党组织、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打入敌人统治机关、保护国内革命者的安全以及联络方法、联络地点、密码和联络员等许多问题，并就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取得了完全的共识。

在同朴达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坦率真诚、洒脱大方和对待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他直言不讳，认为好就说好，认为不好就说不好。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心里不以为然，嘴里却说好；明明是自己不喜欢的，却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说自己也喜欢。人应当始终说真话，不怕得罪人。要有勇气，是黑的就说是黑的，是白的就

说是白的。可是也有不少人并非如此，他们看上司的脸色，往往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甚至还望风使舵，曲意逢迎，趋炎附势。对上级如此投其所好的人，是奸臣，不是忠臣。奸臣的舌尖是容不得真实存在的。

朴达则真诚坦率，自己不如意的就直率地说不如意。老实说，我被他的这种品质完全迷住了。我想，人的魅力并不在于外表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或者天花乱坠、显赫一时。最单纯、平凡、朴素和直率，这才是人所具有的魅力之所在。

共和国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郑准泽，是小市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又是屡遭宗派分子政治迫害的干部，他在我面前，一向是直言不讳的。他在执行经济政策中，只有能做到的，才说能做到；不可能做到的，决不说能做到。举例说，他要是觉得我有可能听了不符合实际的报告而对某个生产指标产生不正确的看法，就来找我，即便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四五个钟头，也一定要向我准确地报告实际情况。因为有他的帮助，我一直如实地正确掌握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搞好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据说，古时候选拔人材，第一、选拔名门望族，第二、选拔相貌英俊者，第三、选拔言语恭顺者。因此，出身卑贱、身材矮小、言语直截了当的人，即使有再大的能耐，也很难登第入选。

我的外祖父曾告诫说：“取人，不要看他的门第、财产、相貌和言语，而要看他的能力和为人。”

见了朴达，我不由得想起了外祖父的这番告诫。朴达外表朴实温

厚，内里却坚毅刚强，有主心骨。他不会弄虚作假，一向直爽豪放，诚实忠贞。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永志不忘的人。

“将军，请您相信，我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永远同您一条心，为光复祖国而战斗到底。对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工作，请您放心。”

朴达留下这句话，就跟我分手了。不消说，他按照对警察许下的诺言，到李悌淳的村子去买了一车满洲产的黄豆，回去分给了他们。

1937 年 1 月，在朴达的主持下，甲山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把该委员会改组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并决定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作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纲领。会议商定了贯彻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具体措施，并且就把组织从甲山地方扩大到道和全国、严防一切宗派主义因素侵袭同盟内部、严守秘密、教育盟员、发行机关刊等许多当前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把甲山工作委员会改组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这是在祖国光复会运动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又一件大事。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成了把祖国光复会的组织扩大到国内腹地去的一个据点。

自从甲山工作委员会改组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后，甲山地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机关刊《火田民》上刊载介绍我们的路线的文章，分发给下级组织，使得我们的路线和方针很快地渗透到甲山等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一带，祖国光复会的下级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壮大。反日斗争的怒火空前炽烈地燃烧起来了。

1937年5月，我再次同朴达会晤。由于崔贤部队挺进茂山方面，甲山一带的形势一时变得十分险恶，国境一带又布下了森严得水泄不通的警备阵。可是，朴达这次也哄过了警察，勇敢机智地离开自己的村子来到了我们的驻地。

我们就国内形势和工作情况，再度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听了朴达对国内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我们都感到很满意。由于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先锋战士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推进。祖国光复会组织，不仅覆盖了包括甲山地区在内的两江道一带，而且远远地扩大到了城津、吉州、端川和洪原等东海沿岸主要地区。斗争方法也更加巧妙老练了。

我们给朴达看了战斗中缴获的两挺轻机枪。朴达手摸着轻机枪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然，我在这次会见国内同志时也感到，他们看问题还没有摆脱只着眼于国内运动的局限性，缺乏把视野扩大到国际范围，综观世界的能力。因此，为了帮助他们扩大眼界，我不惜花费时间给他们讲了我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从我们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讲起，一直讲到国际上的各种事件，使他们从这种联系中考察朝鲜革命问题。这是为了积极开展国内反日斗争而必须做的工作。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十分动荡的。

在欧洲大陆，由于西班牙国内战争，形势十分紧张；在非洲大陆，由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引起了骚乱。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占，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个比西班牙国内战争更大的问题。西

班牙国内战争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性的战争，但它毕竟是属于内战范畴的一个事变而已。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占，却是一场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的侵略。问题在于英、法等所谓强国助长了这一武装侵略，特别是国际联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使埃塞俄比亚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侵略的牺牲品。

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和德国纳粹政权的出现，是意大利赖以进行强盗式侵略的国际背景。希特勒一上台就致力于大德意志帝国的建设。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虽然对希特勒政权的出现感到不安，但又支持其反共政策，对之作出很大的让步，企图把德国的战争机器变为抵制共产主义的壁垒。法西斯德国从中受到鼓舞，于 1935 年 1 月吞并了萨尔，同年 3 月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原来该和约规定德国应支付巨额的赔款，不准拥有十万以上的陆军，坦克和飞机自不用说，连一千吨级以上的军舰都不准拥有。但是，希特勒德国片面废除了这些条款，发表了《国防军编成法》，宣布要实行征兵制，建立包括三十六个师五十五万兵力的常备军。戈林则宣布了德国空军的正式成立。纳粹德国的这一切活动，成了怂恿和鼓励意大利公然进行武装侵略的重要因素。

意大利为了制造侵略的借口，针对埃塞俄比亚挑起了许多军事冲突。

在意大利加紧准备大规模武装侵略的紧急情况下，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埃塞俄比亚就此向国际联盟提起诉讼。而国际联盟却不予以重视。在国际联盟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英、法两国不愿意拿不大触犯自己利益的殖民地问题与意大利闹对立。埃塞俄比亚再三呼吁国际联盟出面仲

裁。据说，埃塞俄比亚皇帝到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总会去流着泪要求过帮助。埃塞俄比亚还照会非国际联盟成员国的美国，要求美国行使其影响力；但是，制定中立法推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根本就不予理睬。

1935 年 10 月，意大利不宣而战，突然侵入了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的军民虽然全力进行了抵抗，最后还是被打败了。

国际联盟不仅对意大利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而且明知英、法两国在表面上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而幕后给意大利提供武器，却装聋作哑。正如俗话所说，蝲蛄也是站在螃蟹一边的。国际联盟威信扫地了。

说起来，始终一贯被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侵略工具利用的国际联盟，给强者撑腰，是不足为奇的。国际联盟刚成立，就公开庇护根据“委任统治制”重新瓜分殖民地，露骨地推行反苏政策。国际联盟曾怎样厚颜无耻地庇护过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世界的良知始终记忆犹新。国际联盟没有制止法西斯德国吞并萨尔，没有制止德、意两国对西斑牙的武装干涉，甚至连一纸抨击德、意两国侵略行径的声明都没有发表过。这个肩负着维持世界和平使命而出现的国际联盟，后来不仅默认了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而且实际上纵容和帮助了这一侵略。

法西斯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日益专横跋扈，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国际联盟无所作为，这一切都向共产主义者清楚地证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依靠主体的力量自主地进行就不能取得胜利。

我再次同朴达会晤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迫在眉睫的时候。

“华北事变”把中国的华北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天下。“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充军备、准备战争。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日本应确保其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同时应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这是全面侵略中国、向北发展反对苏联、并伺机向南进攻的战力方案之一。

朴达等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十分认真地听取并赞同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我在预料日本帝国主义不久即将挑起中日战争的前提下，给国内革命者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适应形势的变化，把力量组织好，因势利导，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对朴达说：“日本的动态很不寻常，他们迟早会在中国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将给我们的斗争打开有利的局面。当然，他们是会为了战争加强掠夺和压迫的。但他们的后方却会出现许多漏洞。日本把战线拉得越长，我们也越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地开展活动。因此，朴达同志，你要做好准备，主动地应付新的形势。”

我又说：“要让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积极开展工作，团结更多的反日力量，为举行暴动做好准备。”

我还交给朴达一项特殊任务，要他把普天堡市街的略图画好，并详细侦察敌人的国境警备部署情况，火速报到司令部来。

朴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送来的略图和敌情报告，为保证普天堡战斗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普天堡战斗后的第六天，我派通信员通知朴达再次来会面。但是

因为我临时率部急速开往间三峰方面，未能见到他。普天堡挨打以后，朝鲜总督府召开紧急会议，调遣咸兴七十四联队、长白县驻军和国内警察，准备对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讨伐”攻势。

这年 7 月，我再次通知朴达前来会晤，但不料又未能见面。只有李炳璇一人带着朴达被捕的消息，前来报告了国内革命运动的详情。我托李炳璇帮助我们同明川、城津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谋求会面，同时交给了他在国内组织生产游击队的任务。

后来，朴达从拘留所中被放出来，李炳璇向他转达了我交下去的任务。

1938 年 6 月，在敌人变本加厉破坏国内革命组织的困难情况下，朴达为了征求我们对善后措施的意见，曾在长白一带的密林里跑了一个多月，但他没有找到我们。当时我们在临江、蒙江一带活动。我是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才得知这件事的。

日寇警察处心积虑地要搜捕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领导骨干，惠山警察署的朝鲜人警副崔铃就带领便衣警官、自卫团甚至消防队，企图追捕朴达。

朴达和金铁亿由于金铁亿的堂兄金昌泳的告密，于 1938 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被捕。不久后，李龙述(李庚封)也被逮捕了。

敌人这次对朴达施加了难以想象的严刑拷打。他们急需弄到的是我们司令部的位置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成员的名单。但是，他们的拷打不管多么残酷，意志坚如钢铁的朴达始终没有屈服。敌人给他判了死刑，后来因证据不足减为无期徒刑。

刽子手们的残酷拷打，严重地摧残了朴达的肉体。脊椎骨被打折，

大腿骨被打碎。但是朴达的信念丝毫也没有发生过动摇和变化。他在监狱里拖着残废的躯体，奇迹般地熬过了七八年的岁月。其艰难程度，我们的后代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解放后某一天，我得到通知，说朴达还活着，已经出了汉城西大门监狱。他被担架抬着出了监狱大门，留在汉城由他夫人加以护理。医生诊断他的病是脊髓炎，后来由医学博士崔应锡重新检查，诊断说是脊髓结核。朴达被送到汉城大学医院就医。

我派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事务局局长专程去汉城把朴达接到了平壤。他从前一夜能走几百里地，是个像檀木一样结实壮健、血气方刚的汉子。而那一天，当他叫人背着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简直认不出他来。拷打把他变成了下半身瘫痪、皮包骨头的废人。他那瘦骨嶙峋的躯体小得像个小孩子，似乎一手就能把他举起来。

朴达张开两臂抱着我扑簌簌地淌下了眼泪。他说，他活着见到了我，已经死无遗恨了。

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身体，下了犹如宣告死刑般令人惊骇的诊断。没有一个医生说有挽救的希望。事实上，朴达出狱时就已经有死神在紧紧地尾追着他。

我把他的住房安排在我家的旁边，为了救活他采取了具体措施。凡是听说有特效的好药都拿来给他使用，凡是人们称为神医的名医都请来给他诊治。每天早晚上下班时我都去看望他。有一年听说南浦牛山庄有头奶牛，我们便买来挤牛奶给他吃。经过了三年的激烈战争，在朱乙休养所另辟了一个“朴达阁”，专门供他疗养。朴达在朱乙疗

养的时候，我还派飞机经常从平壤给他送去他喜欢的新鲜蔬菜。

“要早日治好病，帮助将军做点事……”这是朴达后来在病榻上常常说的话。他为重新站起来做了最大的努力，医疗集体也尽了最大的诚意，然而这一切到底无济于事，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

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情危重连动都很难动的情况下，仍然费尽苦心，力求为党和革命作出一点贡献。记得是 1949 年，朴达在牛山庄休养所疗养的时候，听说果木园里因为没有给苹果包上纸，遭受了病虫害。于是，他发动当时所里来自南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和休养所的职工，开始了给苹果套纸袋的工作。朴达自己也把一块木板放在胸前，做了苹果纸袋。

战后，他在朱乙治病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天，他坐着我们送给他的三轮车到附近农村去，发现当地因为没有种党叫种的稻种，稻穗有很多是瘪的。他把秕子多的稻穗装在信封里叫人送到党中央来，报告了不认真贯彻党的农业政策的现象。

听了他的报告，我在某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像朴达这样躺在病榻上不能动弹的人都能发现党的政策得不到认真贯彻的现象，感到十分心疼，向党中央提出了报告，而地方干部为什么就不了解这种情况呢？后来，听说咸镜北道党委会委员长亲自去找朴达做了自我检讨。

当朴达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维持不了多久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开始写作，写有助于教育青少年的文章。我听到这个情况，就立即去找他，劝说他不要这样劳神受苦。

他却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说道：

“我能活到现在，是托了将军的福，我应该为革命做一点事，这样，我心里才能舒坦，也才能多活些日子。我没有完成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负责人的任务，就被日寇警察逮捕，成了一个如今白吃国家饭的废人。可是我很想接着完成当年接受的革命任务，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愿想多少贡献一点力量的，请您千万不要拦我。”

他接着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眼失明，还为革命写出了长篇小说嘛。我可还有两只亮眼睛，写字还有什么不能的呢。当然，我没有写作能力，杰作是写不出来的。”

他在多年来给他当手脚、给他当护士的忠实爱人玄今善和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写出了题为《祖国比生命可贵》的手记和描述甲山地方共产主义者斗争情况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曙光》。他那倾注心血像刻印一般一笔一划书写的字字句句，洋溢着他对革命火一般炽热的忠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许许多多的读者给他送来了读后感和感谢信，说他的作品是他们生活上离不开的伴侣。朴达从读者的来信中受到鼓舞，陆续写出了很多作品。

有一天，他用尺子把自己的床量了量宽窄，然后把记下了尺码的纸张交给老伴说，要是照这个尺寸给他打一张矮桌，就可以把它横放在床上写字了。

几天后，一个木匠给他精心地打好了一张书桌。朴达摸着桌面，对老伴说：

“桌子打得非常好，你要把它保管好，等我歇好了，再用它开始写字。”

但是，这张桌子，朴达一次也没有用上。他那颗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怦然拼搏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读到他逝世的讣告，全国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

我们在朴达的家里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在私人家里举行这样的会议是史无前例的，会议决定为朴达举行国葬。

出殡时，我跟着灵柩同行。我在白头山同朴达分手时未能远送他，一直深感遗憾，在这要跟他永别的时刻，我想多送他一程。路上，我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手帕都完全湿透了。像金策[16]逝世的时候那样，我又吃不下饭了。哪怕仅仅是一次，倘若我看见朴达生前在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用自己的腿阔步行走的样子，也许我的心里不致于如此悲痛吧。

此后，我们把他解放前用过的房子——普天郡云兴里的旧居照原样恢复起来，并在房前立了朴达的铜像。这可能就是在我国为革命者立的第一座铜像。

朴达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失去了双翼，却仍然不屈不挠地为革命搏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好战士。特别是在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白头山以后，他是最早实现了抗日武装斗争和国内革命一元化的当之无愧的国内革命者的先锋，是为我们做的工作最多、受的苦也最多的国内全权代表。正因为有了许多以朴达为榜样的优秀战士，我们在解放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也能迅速地建立了党，建立了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

二　国内党工作委员会

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共产党，这是朝鲜革命者的一贯愿望，是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开展抗日革命斗争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期间贯彻执行了自主的党的建设方针：吸收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的优秀先锋战士扩大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

抗日革命的主力——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建党工作中成为负责进行组织、思想准备的主导力量。随着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的领导职能和作用的加强而积极开展的建党工作，从政治上有力地支持了武装斗争，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扩大了抗日的群众基础，成为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朝鲜革命引向大高潮的强大推动力。

由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们推进的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到了30年代后半期，成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之无愧的主流，形成了它的正统。

我们的建党工作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复杂而艰难的过程。这是同我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困难有关系的。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建立自己的党的斗争过程中，不得不付出了

特别昂贵的代价，绕过直路而走了远路，经受了苦不堪言的最大痛苦和考验。我们除了殖民地国家的抗战战士在建党时普遍都经受的困难外，还由于在别国做房客的特殊情况，经受了别国共产主义者未曾经受过的考验和苦楚。

前面已经讲过，1928 年共产国际取消了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并指示重建党，而且还根据一国一党制原则要求在满洲和日本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驻在国的党。

有些人认为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接受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因而顺从大势，选择了加入别国的党，以等待良机到来的被动道路；有些人则对共产国际的主观主义做法感到不满，与此背道而驰，有段时间在不把党的关系转到驻在国党的情况下，继续按照过去的做法进行了运动。可是，只靠过去的做法分散地进行活动的这些人未能维持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共产主义者根据需要，把党的关系临时留在别国的党，是可以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的运动，同时也是以阶级联系为前提的国际的运动，因此，进行这一运动的战士们超越国籍暂时加入别国的党，这从哪方面看，都是不足为奇的。

共产国际总部在莫斯科的时候，在那里工作的许多国家的不少共产党领导人和政治流亡者，都在保留着本国党籍的情况下，暂时

在苏联共产党组织里过着党的生活。

问题在于共产国际取消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母体组织，使他们落到了不得不忍辱做房客的处境。

正因为如此，我们当初就没有认为共产国际的做法是妥当的。但也没有因此就神经过敏地闹别扭或做出抛弃运动本身的那种自暴自弃行为。我们把共产国际采取的措施看作是暂时的，并为了靠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建立新型的党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斗争。

我们首先在共产国际提出的原则所容许的范围内不断摸索适合我国革命实际的途径，同时推进了建立自己的党的准备工作。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先锋战士们参加的建设同志社的成立，可以说是建党工作的起点。

但是，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在东满和北满进行活动的30年代前半期，我们的建党努力对国内腹地还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虽然在那个时期我们已在稳城、钟城等豆满江沿岸的国内几个地方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但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建立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区还是在东满。于是我们着力加强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同时在与间岛各县党组织的密切联系下不断扩大了我们的党组织，培养了将来在国内广泛建立党组织所需要的骨干分子。

1936年5月，我们在东岗会议上讨论了根据南湖头会议精神深化建党方针以及贯彻这一方针的措施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了在国内积极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基础的任务，讨论了为此建立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吸收革命斗争的骨干分子以扩大党组织的问题。

当时东岗会议着重强调了如下问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不能局限于游击队，也不能只以中国东北一带作为舞台，而在国内腹地也要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基础；过去只在豆满江对岸国境沿线的部分地区

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而今后要在国内广大地区建立党组织；为了统一领导国内的建党准备工作，要建立国内党工作委员会。

建立国内党工作委员会，这是为了加强党对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领导而迫切需要的。

为了根据实际很好地建立负有如此重大使命的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就必须同熟悉朝鲜实际的国内共产主义者坦率、细致地交换意见。

这时，朴达来到我们密营，这成了交换意见的好机会。建立党组织，这是我和朴达谈话的中心主题之一。

在讨论过祖国光复会问题之后，我同朴达就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认真交谈了小半天。

我一提在国内不仅要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还要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想法，朴达就很惊讶地问，是什么样的共产党组织？

我认为他这一问是很自然的。因为朝鲜是共产党已不存在的国家；是一切重建党的企图都变成泡影，战士们为此付出的可歌可泣的劳苦和热情，只作为铁窗中的凄凉回忆留存的国家；是结社的自由早已被法律禁止的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是可能的吗？看来，朴达好像抱着这种疑问，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我回答说，要建立我们的共产党，朝鲜的共产党组织。他又问：

“对在朝鲜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共产国际有什么想法？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是否准许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管什么共产国际准许不准许呢？在国内建

立我们自己的党组织嘛，这还非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准许不可吗？”

朴达歪歪脑袋说：

“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都受它的领导和监督，我们怎么可以不经共产国际准许就随便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呢？共产国际会容许我们这样随便吗？”

朴达确实还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革命是自己愿意才干的，并不是得到什么人的指令或准许才干的。请问，朴达同志是有谁支使你才开始干革命的吗？是得到谁的准许才建立了叫甲山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吗？”

“不是。”

“那么，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得到了谁的准许吗？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呢？……”

朴达无话可答了。

“马克思和列宁未经任何人的准许，就建立了党，而我们就不许那样，这是说不通的。共产国际已在 1928 年 12 月提纲中向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了重建党的任务。按照提纲明确提出的，我们要在国内建立我们的党组织，对此，谁敢非难呢？共产国际也不能非难。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批准不批准的问题。这完全是属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自主权的问题。我们家里的事，由我们家里人处理就是了，何必问外人该怎样处理呢？朝鲜革命的主人，无论如何是我们自己嘛！”

朴达这才说他的想法太肤浅了，便积极赞同了我们的立场和提议。

“我的想法确实太幼稚。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就是朝鲜革命的主人

这一点，却一直以为由共产国际左右各国革命呢。将军，如果在国内建立了党组织，那么这个党组织该属于哪里？接受哪里的领导呢？”

“国内的党组织要属于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并接受这个党委会的领导。在目前朝鲜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特殊情况下，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起着对整个朝鲜革命执行领导职能的参谋部的作用。我们的党委会的活动，能得到武装力量的可靠保护。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宪兵警察统治，剥夺了在朝鲜重建党的一切可能性。为重建党东奔西走的斗士们，现在大部分都被关在监狱里。未被敌人破坏的，只有得到武装力量保护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对整个朝鲜革命执行领导职能的理由，也就在这里。

“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起到朝鲜革命的参谋部的作用，这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归结。历史要求我们完成这种使命。将要成立的国内党工作委员会是会受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保护的。”

“现在没有什么可问的了。”朴达微笑着说。

我们立即开始讨论与建立国内党工作委员会有关的实际问题。

朴达在讨论时也先提出了问题。看来，他好像经常是首先提出问题然后投入论争。

“目前在国内正在谈论首先建立党还是首先建立群众团体的问题。咸兴一伙人主张应该首先建立党，而端川和洪原的一伙人却固执地说，只有首先建立群众团体，然后通过实际斗争才能建立党。”

“朴达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什么成熟的看法。从常识来看，好像该先建立党……可这也不能肯定。”

朴达认为产生这种争论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 12 月提纲。这个提纲的原题是《关于朝鲜的农民及工人的任务的提纲》。共产国际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工人、农民团体中积极开展工作，努力从新干会等新旧民族解放团体中争取斗士，极端重视党在思想上的团结，尽一切方法尽早重建并加强和发展朝鲜共产党。有些共产主义者误以为这个提纲提出了同时建立党和组织群众团体的问题，因而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依我看，这个问题不能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决定先后次序，要看具体条件和实际，这同 12 月提纲的主张有什么相干呢。根据条件，可以先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就先建立党组织，可以先建立群众团体的地方就先建立群众团体，不就可以了吗？只要有三个具备了党员条件的人，就可以由这三个人建立共产党小组。但是，如果连一个具备了党员条件的人也没有，那么就可以先建立群众团体，在那里培养共产主义者，然后建立党组织。当然，党和群众团体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分离开来考察。但是，不要忘记，不管先后次序如何，共产主义者必须在群众中全力培养党的后备队。只要有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先锋战士，就随时可以建立党组织。”

朴达问，我要建立的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将执行什么职能。

我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

……国内党工作委员会是统一地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负责建立

国内党组织的地区性领导机构。由于执行统一领导职能的参谋部还不存在，所以现在国内运动未能克服分散性和自发性这两个致命弱点。为了把在国内分散活动的爱国志士和共产主义者组织成一支力量，在他们之间建立联系，就要有能够执行这一任务的领导机构。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就是这样的机构。将来成立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准备让朴达同志参加。朴达同志应执行这个委员会派遣的国内全权代表的任务。我很想同分散在国内各地的斗士们一一相见，可是现在还没有时间那样做。我希望，朴达同志现在回去首先同咸镜南道、咸镜北道等各地的革命者会晤，然后积极推进吸收他们建立国内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朴达听后，神情严肃地说：

“这可是对我过分的信任了。不知我是不是那个材料。我的不足之处可不止是一两个啊。”

朴达的坦率，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信任。

那时，我们召开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议，组织了以我为负责人，以金平和朴达为委员的国内党工作委员会。朴达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当地执行人，承担了主管在甲山地区和国内其他各地建立党组织的任务。

朴达支持了我们提出的工作程序，在国内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将来成立党中央机关，宣布党的成立。

会后，朴达请求我说，国内革命者的工作方法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可资他们参考的要领，就全都告诉他。

我提出了首先应该改掉流亡者式的工作方法的意见。

“现在国内同志们的活动，用的是流亡者式的工作方法。这是有

百害而无一益的方法。白天藏在山里，夜里悄悄地下山，和人们见面。这样一来，组织成员们就怕被敌人监视，不愿意和他们见面。用流亡者式的工作方法是不可能扩大组织的。

“今后，从事敌后地下活动的同志要有个职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要立即丢掉流亡者式的工作方法。”

朴达听完我的话，红着脸说：

“其实，我也是用流亡者式的方法做工作的。对付敌人，我们只想到正面冲突，却没有想到有时还需要运用迂回的方法。”

我们停止正式的谈话，又闲谈了一会儿。

我对他说，人们都兴穿皮鞋、留分头、拄文明棍，装扮成现代人的时候，讨厌旧习的朴达同志却剃了光头，能不能把其中缘由告诉我。朴达回答说，搞劳动组合运动的时候，被抓到警察署，警察就抓住他的头发直往墙上撞，他一气之下就把头发剃光了。我觉得朴达的这种做法很机智。他说，如果将军要求的话，可以重新留分头或推平头。

“那就大可不必了。剃光头是朴达同志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看，现在没有必要恢复了。”

“要是将军不反对，我就要保留光头。谁能担保今后就不再被警察抓去呢。”

后来，朴达真地在警察署和监狱里受了很多折磨。

我问他，如果对革命有益的话，愿意参加警察考试不？他睁大眼睛，惶惑不解地望着我说：

“您不是叫我当警察吧！”

“如果革命需要，警察也可以当当嘛。可是，我不想让你变成警察。警察的帽子戴不戴无所谓，只要设法取得派出所的信任就行。”

朴达会意地微笑着说：

“我跟警察们相处得不错。可没有想到参加警察考试。这次回去试一试。”

第二年春，朴达真地应考了。

在考试之前，朴达去找派出所的首席警察装模作样地说：

“首席大人，我也想当个警察。首席大人你看怎么样？我够不够格？”

首席一听，抑制不住兴奋，忽地站起来说：

“你这是当真？”

“可不是真的。要不是真想当警察，还能来找首席大人吗？”

“当警察，你是满够格的。搞得好，还能当上这个派出所的首席呢！”

“我怎么敢占您的宝座呢。哪有那么无礼的事啊！”

“不，只要有朴达你这样的人悔过自新，成为忠实的帝国臣民，那我就为大日本帝国甘愿让出宝座。你的志向很好。快投考去吧！”

朴达把自己要当警察的事大大传扬开去，然后大咧咧地去报考警察，答案却写得马马虎虎，结果没有合格。他按照我们的脚本演了一场漂亮戏。日本人在秘密文件中写他的经历时加了一段“昭和 12 年(1937 年)3 月，自愿报名参加咸镜南道招考警察的考试，在甲山警察署应考，落第。”

朴达由于参加了招考警察的考试，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当地派出所的金警察说朴达是报考过警察的好人，甚至多次为朴达的身份作了保。朴达就这样装作对他们忠顺的样子，实际上把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

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对坚持我们提出的自主的建党方针，在国内大力推进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是在朝鲜共产党被解散后分成几派进行的重建党运动的单纯的延续或反复。在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的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是同共产国际直接主管的重建党运动和赤色工会国际企图通过赤色工会运动实现的重建党的运动，有着根本区别的完全自主的重建党的运动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

进入30年代，共产国际对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对重建党的运动开始予以一定的关注。这是因为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成为越来越危险的势力。

在共产国际内，就在朝鲜重建共产党的问题，库西宁和其他一些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谈论的关于建立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提案。更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国际关于在朝鲜组织以反日为目的的民族革命党的意向的，我想是杨松在《共产国际》上写的关于在满洲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文章。他写道，间岛的目前局面要求为扩充中国共产党组织，更多地吸收革命的中朝工人、农民，同时建立朝鲜民族革命党；这个党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为反日和朝鲜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这个新党的创立者应该是共产主义

者，这个党在性质上应该是反日统一战线式的党。这种主张，可以说是代表共产国际的见解和当时在共产国际的中国党务工作者的见解。

但是，根据我们独立自主的判断和决心，我们解决了在朝鲜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和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我们同时推进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但没有把两者混淆起来。这是因为党决不能代替统一战线组织，统一战线组织也并不就是党。

当时，有些独立运动者曾试图建立一个以民族唯一党的名义吸收左和右一切政治力量的像中国国民党那样的政治团体。

我们一面建立国内党工作委员会来推进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一面用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

当然，共产国际在这以前也曾从各方面试图在朝鲜重建党。

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于 1930 年 9 月发表的《关于朝鲜的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提纲》(世称《9 月提纲》)着重指出，在重建共产党方面建立革命的劳动组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就依据这个《9 月提纲》，努力组织革命的劳动组合(赤色劳动组合)，以此为群众基础推进了重建共产党的工作。

第二年 10 月，作为赤色工会国际的下属组织，在上海的泛太平洋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世称《太劳 10 月信函》的《致朝鲜的泛太平洋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者的紧急文告》中敦促组织革命的劳动组合，以此为群众基础重建共产党。

赤色工会国际系统的这些文件同1931年5月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世称库西宁意见书的《关于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书》一样，都是直接论述在朝鲜重建共产党的问题的。

1934年6月，在莫斯科以朝鲜共产党发起人小组名义发表了《朝鲜共产党行动纲领》，这也可以看作是为了在朝鲜重建共产党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万恶殖民统治在持续，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日甚一日，但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仍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的共产党事件、组织朝鲜共产主义者同盟事件、重建朝鲜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朝鲜通报会议事件、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委员会事件等，都是这个时期在国内各地进行的重建党的运动的一部分。

也曾有过以中国为根据地进行的重建党的运动。ML派和汉上派以中国的吉林一带为中心组织党重建筹备委员会、重建党的中央干部会、党的重建同盟、党重建整理委员会等来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

在日本也以东京为据点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赤色劳动组合、赤色农民组合运动，也可以看作是重建党的运动的一环。从早期的合法形式转为地下运动形式即非法形式的赤色劳动组合和赤色

农民组合的主要斗争目的，也是重建共产党。

在国内和国外开展的重建党的运动，大部分依然是上层运动，未能完全摆脱旧运动形式、事大主义倾向和派别观念。尽管有这种局限

性，但我们还是以历次的重建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为了在国内建立新型的党组织而作出了努力。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找出过去的赤色劳动组合、赤色农民组合的关系，在那里组织我们的党支部，而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1937 年 5 月下旬，我们在白头山根据地召开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增强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建立党组织工作和革命运动的领导，采取了措施。会上总结了国内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就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方面的任务和途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那时，我特别强调了在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和党的生活中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吸收在国内分散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加入党和其他各种革命组织，根据党组织不断扩大的现实要求，很好地建立党组织领导体系的几个途径。

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在促进朝鲜人民革命军向朝鲜境内挺进，发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和国内革命斗争方面，成为一个明显的里程碑。

在那以后，我们派遣了以帮助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工作为使命的政治工作队。1937 年夏秋，以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金平和权永壁、郑日权、金周贤、马东熙、金正淑、白永哲、李东学、崔景和、金云信、李昌善、李景云、李炳璇等为成员的政治工作队被派到北部朝鲜各地，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个工作队称为北鲜政治工作队。北鲜政治工作队以实现北部朝鲜革命化的方法直接帮助了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我们给北鲜政治工作队队员们分配了政治工作区域。当时，这种政治工作区域叫做政治区。政治区分成一号政治区、二号政治区、三号政治区、四号政治区、五号政治区等。政治区的区域范围主要由金平和我讨论设定。政治区是由东海岸到西海岸逐个建立的，编号也由东到西依次编定。

北鲜政治工作队队员们到各自的工作地去可以亲自做组织、政治工作，也可以通过自己培养的优秀工作员，间接地进行工作。

以李东学为负责人的北鲜政治工作队一个小组，为打下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基础创造有利条件，于 1937 年初由李悌淳陪同到甲山郡云兴面一带农村传播反日爱国思想和张贴朝鲜独立的布告和檄文，进行了群众宣传后，迅速回到了部队。

分担了三水郡一带工作的马东熙组、池泰环组也接连进入国内开展机动灵活、周密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了岭北地区的民心。

我们为了给朴达提供方便，给他派去了一名年轻的通信员，名叫孙长福。

我嘱咐孙长福到了国内要在日本官厅的户籍簿上登记，装成在朝鲜生长的。朴达带着孙长福到警察派出所去向首席警察假惺惺地说：

"首席大人，你祝贺我吧！"

首席莫名其妙地望着两个人。自从朴达应警察考试后，首席对朴达非常亲热。

"你有了什么喜事了？"

"可不是，天上掉下了个弟弟！"

朴达得意地把站在他后面忸忸怩怩的孙长福拉到前面，用整个派出所的人都能听到的大声说：

“我一直因为没有一个弟弟而长吁短叹，这下我爹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

“那么说，这个小伙子是你爹给你结的把兄弟啦？”

“哪里是什么把兄弟，是我爹在吉州的时候搞外遇生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生母死后成为孤儿到处流浪，风闻我在甲山，就这样找我来了。从今以后就由我来照料他。”

“啊，白得了这么个儿子，你爹的本事可真了不起呀！”

首席警察的话引起了警察们的哄堂大笑。首席警察高兴起来，没有挑剔什么，就给他办了手续。

朴达在户籍簿上把孙长福登记为朴永德。从那时起孙长福就开始了地下活动。

不料，几天后发生的意外的事件，使甲山地下组织的工作受到损失。有个强盗闯入甲山郡云兴面大中里的一家农户抢走了二十圆钱。这个强盗为了隐匿自己的犯罪行为，假装成山上下来的人。当时，人们把游击队员称作“山里人”，把游击队工作员称为“山上下来的人”。发生了强盗案的时候，偏巧朴达为了指导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的工作去过大中里。由于这个巧合，朴达就背上了“山上下来的人”的嫌疑，被警察逮捕了。当时，警察探知有个从吉州来的叫李炳璇的人出入朴达家，便想把他也一并抓起来，可是李本人不在，扑了个空。

李炳璇是曾在吉州参预过赤色农民组合事件，前一年同金永国一

起来到甲山的。金永国参加游击队后，李炳璇在普天面的一个木材所挂上名，领导了那一带的民族解放同盟组织。那天，日寇警察把朴达家的孙长福误认为是李炳璇，便闯进他家去想抓他。可是一看他年纪太小，确认他不是李炳璇，只好空手回去了。

当时，我们向长白和国内派了很多政治工作员，如果单靠从朝鲜人民革命军内抽调就满足不了这个需要。要想满足需要，至少要有相当于一个团人数的政工人员，可是，游击队又不能丢开军事活动去专搞政治活动。于是，我们选拔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长白地区地下组织成员和曾在东满一带参加革命组织做过很多群众工作的训练有素的同志派到国内去。同时，长白县祖国光复会组织也有很多工作员通过李悌淳那条线进入了国内。

派遣政治工作员的工作是由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金平主管的。

当时，金平的职位是七团政委。他是曾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专管敌后工作的得力的政治、军事干部，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他不仅在30年代前半期，而且进入后半期也给了我的工作很大的帮助。金平是我在抗日革命时期最爱护和信任的政治、军事干部中的一人。

虽然后来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敌人逮捕，受了苦，在政治生活中有过一点波折，但对我们的忠诚却没有变。金平多次参预过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和党委会的工作，在我们加强同国内革命者的联系，把武装斗争扩展到国内，大力进行全民抗战准备的时期，他亲自主管过这一工作，所以，对当时的事情，他比谁都知道得多。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秘密的政治工作，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的就不少。他回忆的每个

细节、事件和年代大体都准确。我认为，他留下的记录，为丰富我们党的革命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金平在游击队里坚持斗争直到祖国的解放，那该更好了。我至今也忘不了曾那样忠实地辅佐了我工作的白头山时期的金平。

被派到国内去的政治工作员们深入到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已有的组织和个别共产主义小组中，积极地开展了建立党组织和扩大

祖国光复会网的工作。

由于政治工作员们的积极活动，“白头山风”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渗入到国内人民中去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内同胞对朝鲜人民革命军有了正确的认识。有很多人为了参加朝鲜人民革命军，找到白头山来了。

我们为了在国内建立党组织，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吸收在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组织里受到锻炼的优秀盟员组织了国内党小组。历史家们把这个以朴达为负责人的小组称为“三人组”。“三人组”的使命是一面起到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一面又起到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母体组织的作用。

朴达扩大党组织的工作方法中，我觉得特异的是建立无名党组织。所谓无名的党组织，是指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在实际上秘密开展各种革命活动的党组织而说的。这种组织在祖国光复会内也有。

建立无名的地下革命组织，是在敌人的镇压达到顶点的时候建立组织的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定组织的名称，也不开会，只是个别碰头，给予教育，传授斗争方法，分配任务，所以，即使有人被捕，也不致使其他成员受牵连。

朴达和我们分手回到甲山后，为了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献出了全部身心。他按照我们制定的方针，把甲山和三水一带建设成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原种场，并以此为据点，把活动线逐步伸展到其他郡和其他道。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地区选为最适合于建设成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原种场，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说三水、甲山，人们都知道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哪怕被流放到三水甲山……”人们谈话中爱说的这句俗语，就是因为这个地区是出名的流配地而产生的。李氏王朝时，受封建朝廷的迫害，被流放到这一地区的没落两班贵族的后代大都成为火田民或矿工，过着最底层的生活。“韩日合并”后，为了谋生拥到盖马高原一带来的流民，也都挖树桩、烧草木，吃力地种了火田。从阶级角度看，这一地区居民的成分，可以说基础很好。

这一地区的地势也好，是便于进行游击活动的高原地带，从本世纪初就成为义兵和独立军拿起火绳枪，抱着誓死保国的决心出没的战场，也成为掩护革命者的朝鲜最大的藏身之地。被剥夺了合法活动权利的革命者，为找隐身之处，从北部朝鲜的几乎所有地区聚到这一带来了。有志之士不仅从朝鲜境内，甚至从北间岛、西间岛和西伯利亚也来到这一带。

据朴达说，20 年代中期曾在平壤崇实中学领导过罢课的四名反日运动者来到三水、甲山一带，吸收火田民组织了研究社会主义的小组，成为这一带社会主义运动的先河。后来，一些曾在东海岸各地尽心从

事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运动，被迫流亡的人，和他们一起建立了青年同盟、农民同盟、前卫同盟等组织。

仅上述情况，就使三水、甲山地区充分具备了成为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原种场的条件。

甲山工作委员会，起初没有什么特定的名称。从 1934 年 5 月起，首先吸收了李庚封，接着争取了金铁亿，后来又接连吸收了沈昌植和其他一些人，进行过反对强迫种植亚麻的斗争、反对迷信的斗争和反对早婚的斗争。过了两年左右，他们才知道都是组织成员，于是给这个无名的组织起了甲山工作委员会这个名称。

我们根据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上述经验，后来在关于如何做党支部工作的文章中肯定了这个方法，并在 40 年代前半期指示到国

内去从事小组工作的同志们活用这个方法。

一位组织成员在解放后回忆说：

“我加入一个什么组织，可是因为保密，我不知道那个组织的名称和内容。”

一位甲山生长的革命者说，他只是读了朴达叫他背着人看的秘密书，替他跑了腿，日寇法院却判他重刑，关在监狱里，直到祖国解放才出狱。这些人可能就是没有特定名称的组织的成员。

朴达把三水、甲山一带变成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原种场之后，开始选拔在那里培养出来的优秀组织成员派到邻郡和邻道。朴达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到派遣地去打下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朴达按照我们的方针，让他们一定要有适当的职业。有了一定的

职业，才有合法的身份，这样既能很好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也能克服流亡者式的工作方法，在群众中牢牢地扎下根。

茂山郡一地，朴达就派遣了五六名工作员。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下属组织普天面宣德洞反日会负责人蔡应浩，也在那时被派到茂山郡，同政治工作员们取得联系，一面进行旨在保障游击队后勤物资的经济募捐工作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一面加紧进行了建立生产游击队的准备工作。“惠山事件”后，他把延吉、和龙一带定为流亡地，出没于茂山地区坚持不懈地把林业工人吸收到组织里。

朴达把朝鲜民族解放同盟青年部负责人李龙述和李炳璇派到咸镜北道南部各郡。我们关于国内革命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的方针通过他们传达到城津赤色农民组合领导人之一的许圣镇。据说，许圣镇宣誓坚决遵循我们的路线斗争到底，并为了和我见面找到甲山来，却扑了个空。那时，我们正在临江、蒙江一带，收拾“热河远征”的残局。

朴达一面建立党组织、扩大祖国光复会网，一面还大力进行了加强我国革命的军事力量的工作。

李炳璇来到密营的时候，我通过他交给了朴达吸收国内党组织成员和祖国光复会青年骨干分子建立生产游击队的任务。

朴达在组织生产游击队时首先利用了伪自卫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保卫乡土”的名目下大大扩大自卫团，提供武器训练团员。如果把生产游击队员全都安插到自卫团里，他们既能练好枪法，又能得到敌人的信任，一旦有事，不就能揭竿而起把枪口对准敌人吗。朴达根据这种想法，利用自卫团副团长的职位，把符合敌人规定的入团年龄的

大部分生产游击队员都安插到自卫团里，让他们占据了领导地位。

他为贯彻我们的关于建立北鲜反日游击队的方针，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从北部朝鲜一带迅速扩大和发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出发，提出了以国内党组织成员为中心建立北鲜反日游击队的构想。从茂山、甲山到赴战岭的岭北广阔大地，是适于开展游击活动的理想之地。

那时，我对国内同志们说，要建立北鲜反日游击队，我将特别选拔可以成为部队领导骨干的优秀游击队员派去，你们要以他们为原种，扩大队伍，进行训练。七团的崔一贤被任命为北鲜反日游击队队长，朴达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如果没有发生朴达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其他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捕入狱的不幸事件，北鲜反日游击队就会按计划顺利建成的。

国内党组织成员在金周贤别动队被派到国内的时候也积极地帮

助了他们的活动。

朴达在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大肆逮捕国内党组织成员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成员的杀气腾腾的环境下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为了隐秘地保存已建成的基层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网，从各方面作出了努力。

国内党组织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成员由于“惠山事件”而经受的考验，金平向我作了具体的通报。

我一接到这个通报就马上派马东熙和张曾烈到国内去了。但是，这个计划好的挽救措施，由于马东熙和张曾烈到处寻找朴达时被敌人察觉而遭逮捕，没能取得效果。

因此，这回又把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金正淑派到大镇坪去了。这时，朴达在端川、北青、洪原、新浦等东海岸地区进行扩大组织的工作后已回到大镇坪，正在重整处于困境的组织。金正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朴达，并向我们汇报了和他会面的情况。

我们接到这个汇报后，向甲山地区派了以白永哲为负责人的联络小组。白永哲一面进行游击队活动，一面还做过很多国内工作。他曾在偶勒洞设了密营，在各地做粮食工作，马东熙和张曾烈被捕后，被调回部队。

白永哲一进入国内就被警察盯上了。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朴达、金铁亿、李龙述一行。朴达一行和联络小组一起来到白头山。我们交给他们重整被破坏的革命组织，把国内革命引向新的高潮的任务后，重新派他们到甲山地区。

和朴达一行一道进入国内的白永哲，在東薪地区进行工作时和日寇警察遭遇，腹部中弹，他用手顶住漏出来的肠子与敌奋战，终于被敌人抓住。日寇警察迫使他跪在土坑里，对行人说他是“共匪”，往坑里扔石头把他活埋了。挽救朴达和国内党组织的斗争，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敌人为了逮捕朴达，到处布置密探和叛徒，搜遍了所有的山。

朴达作为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帮助我们为在国内建立党组织，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在国内建立党组织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在推进国内建立党组织工作方面，金平、权永壁、金正淑等政治

工作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新坡、丰山、狼林、赴战、兴南、新兴、利原、端川、虚川等北部朝鲜一带和长白一带，克服重重困难，经受严峻考验，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党组织，紧密地团结了共产主义者。

由于我们党的先锋战士们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党组织迅速扩展到国内广大地区。甲山、新坡、丰山等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一带和阳德地区以及平壤、碧城等西部朝鲜一带的许多矿山、煤矿、工厂、农村、渔村、城市，也陆续成立了革命组织。曾以赤色劳动组合和赤色农民组合运动沸腾起来、后来消沉下去的地区，重新兴起了革命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运动。重建、重编过去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的过程，就同建立党组织的过程相一致。党组织网和祖国光复会组织网远远超过北部朝鲜的范围，扩大到汉城等中部朝鲜一带和庆尚道、全罗道境内以及济州岛，甚至越过玄海滩扩大到日本。

在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是在同长白和临江一带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密切联系下推进的。在长白、抚松、临江一带的朝鲜人居住区也建立了党组织。党组织还扩大到东满和南满一带。通过在全国、全民族范围内有力地推进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把曾经分散活动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了起来，使党进一步加强对整个朝鲜革命的领导。

我们建成了全国的所有党组织都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强有力的党组织体系。随着从最高领导机构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到基层组织支部的井然有序的党组织领导体系的建成，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基础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我们在抗日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巨大的成果，是不亚于我们占据白头

山后在鸭绿江和豆满江沿岸地区取得的军事胜利的政治胜利。我们为建立党组织而进行的浴血斗争，不仅成为早日实现祖国解放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成为胜利完成自主的建党事业的强大基础。

由于派别斗争、理论的贫乏和实践能力不足，一直被人疏远和轻视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在抗日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开始有力地开拓自己的新的道路了。

三　转战白头山麓

我们挺进到白头山以后，长白地区的东边道特别是其北部地区，就成了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治安当局感到最头痛的“治安不良地区”。

日满军警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东边道。报上接连不断地登出了有关长白地区骚扰事件的消息。一直被认为是“治安良好”地区的白头山麓，顿时变成了一锅粥。

日本侵略者从侵占满洲的初期起，就一直为把朝鲜和满洲变为称霸亚洲的战略基地，而对东边道的治安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东边道是中国北洋政府时期划定的东北地区三省、十道中的一个行政区，包括现今的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各一部，面积相当大。东边道只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毗邻，无论是从实现“鲜满一体化”的政治角度来看，还是从它拥有取之不尽的地下资源和森林资源的经济角度来看，都是日本和满洲的政界和实业界甚至军界都特别重视的主要地区之一。

我们完全掌握了这一带的北部地区之后，沿着鸭绿江两岸朝下游发展，不间断地开展了军事政治活动。敌人为之大惊失色，急忙以在满洲全境(包括东边道在内)实行持久治安为借口，制订了“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伪满政府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年治安肃正计

划纲要”。其中规定北部东边道(包括长白、临江、抚松、东岗、辉南、金川、柳河、通化、集安等县)是最重要的防范对象。伪满政府在中央设了“东边道复兴委员会”，在通化设了“东边道复兴办事处”和“东边道特别治安维持会”，同时，又建立了以伪满国军最高顾问佐佐木为首的“通化讨伐司令部”，开始了确保北部东边道治安的“冬季大讨伐”。

我们人民革命军部队在西间岛一带天天发出的枪声，密如蛛网的白头山密营和以地下光复战线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最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军部的神经。

东京已经责令殖民地朝鲜的最高统治者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军大将和满洲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关东军司令官植田陆军大将密谋彻底消灭抗日武装部队，维持治安的紧急措施。于是在朝满国境上的小小的海关城市图们的日本领事馆分馆密室里举行了臭名昭著的“图们会谈”。不久前还是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的南次郎，刚就任朝鲜总督，就与植田密谋“讨伐”朝鲜游击队的问题。仅此可见，他们是多么害怕游击队。

继南次郎和植田的秘密会谈之后，他们的随员关东军宪兵队司令东条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局长三桥也进行了会谈，通过了以加强国境警备、开展大规模的共同“讨伐”作战、完成西间岛一带集团部落化为主的旨在扼杀抗日武装部队的所谓“三大政策”。东条和三桥还进一步议定了加强双方联合行动的具体措施。

“三大政策”的中心是 1936 年的“冬季大讨伐”，其主要攻

击目标就是我们司令部所在地白头山。

“冬季大讨伐”与从前作战的不同点是，由开进满洲的驻朝日军和满洲关东军的混成部队进行“讨伐”。战术是用大兵力形成包围圈，配合以篦子梳头式地搜遍山山谷谷的新的篦梳战术，其目的是要在这年冬季全部消灭抗日武装部队。

抱着如此阴险的目的，朝鲜总督府把“维持治安和加强国境警备”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增强了国境警备力量，扩充了防御设施，从日本帝国的国家预算中拨出了巨额的追加款项，并向驻朝日军、特设国境警备队和国境一带的各警察部队下达了大举出动的命令。

关东军也对东边道予以最大的关注，加紧准备“讨伐”作战。

形形色色的“讨伐”部队大批拥人以白头山为中心的鸭绿江、豆满江沿岸的国境一带。朝鲜南部的警察部队调往北部山区，驻在齐齐哈尔的关东军部队朝白头山南下，驻朝日军第十九师团各部渡过了鸭绿江。日满警察部队和伪满军“讨伐队”也向我们扑来。鸭绿江沿岸又增加了许多警察官派出所，到处关卡林立，江面上电话线纵横交错。从这个时候起，连警察官的老婆也都被调出来练习打靶。从前只有牛车、马车、雪橇才能行走的白头山一带崎岖的山路上，出现了大炮轮子和辎重卡车，密林里到处都出现了杂乱的马蹄印。

从这年初冬起，白头密林遍地都布满了“讨伐队”。敌人扬言“要以这次‘讨伐’为终结，决定性地确立治安”，开始对白头山一带的密林进行了大搜查。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日本侵略军之间的新

的决战即将在白头山麓拉开序幕。

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首先敌我力量众寡悬殊，而且敌人的主力是有航空队支援的精锐部队。敌人调动了行政、经济、警察等所有部门，而我们除有人民群众的秘密支援外，没有什么可以调动的。

按一般的军事常识和经验来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主动采取进攻态势是不可设想的。但我们逾越常规，采用了以进攻为主的新战法，迫使敌人陷入了守势。1936 年 11 月，我们在黑瞎子沟密营召开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总结了南湖头会议以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工作，并讨论制定了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巩固和发展白头山根据地的措施。

我们的基本战略是用思想上和战术上的优势压倒敌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我们在大力提高指战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把大部队活动和小部队活动适当地结合起来，运用诱敌伏击、出其不意的奇袭、积极的防御、切断敌人的退路、分割敌人各个消灭等等积极而机动灵活的战术，使每一仗都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机动灵活的作战，使敌人的“冬季大讨伐”从开头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开到鸭绿江沿岸的初期，敌人曾以为我们在这里也像一些反满军一样熬不过一个冬天。其实，他们估计错了，他们越加紧“讨伐”，我们越不退缩，更深深地隐蔽在密林里，以神出鬼没的战术，在白头山周围和鸭绿江沿岸国境一带更加猛烈地开展军事政治活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白头山根据地。

在这年冬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许多次战斗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黑瞎子沟战斗、红头山战斗、桃泉里战斗和鲤明水战斗。

在黑瞎子沟入口处进行的战斗，是用先发制人的打法预先挫败了敌人偷袭扫荡战的防御战。

“冬季大讨伐”一开始，敌人就饱尝了失败的苦味，于是一方面加强军事攻势，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的密探企图刺探我军司令部的位置。

敌人的“冬季大讨伐”刚开始，我就带领主力部队转到黑瞎子沟密营方面去驻守。有一天，吴仲洽带了几个队员到前方哨所执行警戒任务，抓来了两个农民装束的可疑的人。经审讯查明，他们原是敌人派来的密探。当他们偷偷摸摸地穿过树林朝密营接近的时候，早就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的我军哨兵手疾眼快地逮捕了他们。他们假惺惺地说，他们是被日本鬼子逼得走投无路了，才来投革命军的，希望让他们能见我一面。因为他们的形迹十分可疑，搜了他们的全身，从一个人的裤腰里搜出了一把磨得雪亮的小斧头。这种小斧头是特务机关特制的杀人凶器。审讯结果判明，带斧子的是乔装成行商干了多年密探活动的穷凶极恶的特务，另一个则是老实的庄稼人，是被迫给特务带路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探我们的准确位置，给随后跟上来的“讨伐队”打信号。据他们的招供，敌军是日满混成“讨伐队”，其中一支由二道岗开拔直奔黑瞎子沟，另一支取道十六道沟马家子西北进逼我军密营，一有密探信号，就立即开始进攻。密探还招供说，驻会宁的空军将用飞机来支援地面部队的“讨伐”。他的供词，同我军侦察小组得到的情报完全一致。不过，敌人还没有完全形成对我军的包围圈，只

是通过密探大致嗅到了我军司令部位置，便调动罗南第十九师团的日军“讨伐队”和驻二道岗的伪满军“讨伐队”，企图打进黑瞎子沟，突然袭击我军司

令部和主力，以除他们的“心头之患”。

形势十分危急，于我很不利。在敌人一面搜山一面向密营进逼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在密营附近有利的地点打击敌人，然后悄悄地跳出包围圈，在三浦洞乘着黑夜再一次打击回窜的敌人。

黑瞎子沟的南段是一条深深的峡谷，有一处像瓶颈一样窄长，是敌人主力进攻我密营的必经之路。峡谷两边是陡峭的巉岩绝壁，这是连善于爬山的野兽也难于攀登的地方，是最有利于把敌人圈在小胡同里加以消灭的再好不过的战场。

我命二连和四连分别在西北高地和东北高地打埋伏，并在峡谷深处虚设一座阵地，派几个队员在那里虚张声势，装做我军主力在那里守卫。接着，派出诱敌小组，趁黑打入敌阵，通宵扰乱敌人，拂晓撤回，地上要留下杂乱的脚印，给敌人制造有我大部队走过的假象。

傍晚时分，诱敌小组潜入了敌阵。这天夜里，天气特别寒冷，但我下令不准生火，以免暴露目标。诱敌小组最后留下许多杂乱的脚印，退到了虚设的阵地。没过多时，那里升起了好几堆篝火，响起了嘈杂的歌声。这都是为了诱敌深入，我们预先安排好的。

做斥候的敌军骑兵队尾追我们的诱敌小组进入了峡谷，他们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到了篝火升腾、人声嘈杂的我军“阵地”。他们立地停下，聚成一堆，望着我军“阵地”嘀咕了一阵，接着由一个骑乌黑马

的骑兵策马朝峡谷入口奔去，后面跟着两个骑兵。

约莫过了半个钟头，那几个骑兵斥候带领长长的步兵纵队来到了峡谷。每个步兵队的前头是骑马的军官，腰挎着长长的发亮的军刀。这正是罗南十九师团所属的部队。而靖安军的军官都没有骑马，跟士兵一样徒步走来。最后边是一群马匹，背驮着拆卸的迫击炮。别的峡谷也有敌人拥来。显然是要形成包围圈。我们只有一百多人，而敌人的“讨伐队”却比我们多五倍。

在这场战斗中打败敌人的关键之一是争取时间。趁敌人的包围圈还未完全合拢，必须先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然后隐蔽地转移到包围圈外边去。我决定用处决密探的枪声作为信号，抢在敌人的前面，先打击敌人。

随着我的信号枪声一响，我军枪声大作，敌人顿时乱成一团。大部分敌人来不及听到他们上司的攻击命令，就被打死了。装了炮弹的炮未及发射就被炸翻了。黑瞎子沟的峡谷，立时变成了敌人的墓穴。

我们打扫了战场之后，在夜幕的掩护下立即隐秘地撤出了峡谷。

正如我所预料的，侦察小组送来敌情报告说，敌人的增援部队叫逃回去的败兵带路前来追击，看到天黑了，就停在一处准备宿营。我命令吴仲洽夜袭敌人。吴仲洽立即组织了约有一个排兵力的袭击组，因为夜袭是不需要很多人的。

吴仲洽带着袭击组悄悄地接近了敌人的宿营地，抓了一个在树下打盹的敌军哨兵，简短地问明了敌情。如果不搞清敌人宿营篷的配置，贸然打进去，就有可能伤害被强迫拉来的民夫。这个俘虏还挺乖觉，

问什么答什么。他老实招供说，最当中是日军，外围是伪满军，最外边一圈是鬼子们当作挡箭牌安排的老百姓。他还说，站岗放哨的全是伪满军，从朝鲜过来的日军都生起篝火，把被打湿的鞋袜脱下来挂在篝火旁烘烤，此刻都睡着了。

吴仲洽把袭击组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三人为一组，乔装成巡逻兵，然后对答着哨兵的口令，顺利地进到了宿营地的当中。接着，每个小组分别对着日军的宿营篷，出其不意地开始了射击。

被枪声惊醒的敌人，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似的，顿时乱作一团，胡乱开枪，打死了不少自己人。整个宿营地一片混乱，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我们的袭击组伺机迅速撤离敌宿营地。这天夜里，敌人通宵达旦自相残杀，伤亡惨重。死里逃生的敌兵也未能保住性命，大都冻死了。因为来不及穿上鞋子披上皮外套就逃窜的敌人，是熬不过白头山酷寒的。

敌人的宿营地尸体狼藉，残兵败将无法运走这好几百具尸体，只好光把脑袋砍下来盛在麻袋里，装在马车上仓皇逃走了。

这场战斗之后，我们在鸭绿江右岸的许多地方又打了一些漂亮的胜仗。11 月 20 日，对敌人的“讨伐”基地之一的长白县十四道沟进行了袭击战，几天后又偷袭十三道沟桃泉里上村消灭了不少敌人。我们一些小分队在十五道沟和十九道沟进行了政治军事活动。

敌人在黑瞎子沟入口处和其他—些地方多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两三个月来再也没敢靠近白头山一带。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停止了“讨伐”。敌人要争得喘息的时间，准备进行新的“讨伐”。我们提高警

惕，加强了警戒，严防密探潜入，同时采取了从军事上压制敌人的新的战术措施。

从此，寂静来到了白头山麓。

利用这个机会，我把长白县十九道沟的区长李勋叫到密营里来，给他讲解了有关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则和方法，还同带来了支援物资的十七道沟群众进行了谈话。同朴达、朴寅镇的会晤、《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的公布、祖国光复会组织的迅速扩大，这一切都使我们至今还深情地回忆着1936年底至1937年初白头山地区的冬天。

在我追忆的人中还有长白县十九道沟的农民安德勋。当时，长

白县一带广泛流传着许多把我们描述得神乎其神的传说，甚至说金日成一摸松球，松球就能立地变成子弹。就在这样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勋。

我们刚刚跨进安德勋家的门坎，这位对这些奇闻特别好奇的人就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令我们十分为难的问题。幸亏他是把下屋里的金平当成了队长，只顾跟他谈，我就无须介入了。他们的一问一答是饶有风趣的。

“听说将军不仅能预卜三日的天气，还能预卜更遥远的将来，是真的吗？”这是安德勋向金平提出的头一个问题。

“当然是真的喽。”金平煞有介事地坦然回答。

安德勋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听上村的老人们说，将军他无事不睁眼睛，有事才睁眼睛。这话可当真吗？”

“是的，可以当真。没事儿的时候，将军闭目静思，他一睁开眼睛，可就有大事儿啦。”

“听说将军他善用缩地法，也是真的吗？”

“也是真的。他用缩地法，把山野大地打起皱来，风驰电掣，纵横驰骋，忽东忽西，神出鬼没。”

“听说将军是古代的洪吉童[17]都望尘莫及的神出鬼没的将帅，果是名不虚传哪。”

虽然一概是荒诞的问答，但因为问话和答话的人也都那么郑重严肃，我根本没有勇气打断他们的对话，只好听任他们说下去。不过，使我感到惊疑的是金平，他平素是那么老实正直，而现在却一反常态，口口声声都是荒诞不经的回答，脸上却没有一点尴尬不自然的神色。

安德勋问金平说，你见过几次金将军？将军现在在咱们村子里吗？金平仍然毫不踌躇地回答说，经常见到将军，将军现在就在这个村子里。

我趁房东出去时，轻声责备金平说，干吗要说那些无稽之言。金平却咧嘴笑道：“人民群众相信传说，我们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老百姓说我们朝鲜有天降的神将，是从他们盼这样的神将下来为我们光复祖国的渴望出发的。如果老百姓都深信确有天降的神将，他们就会抱着祖国定会光复的信心跟着我们走，就会更加踊跃地投入抗日大战。”

他接着说：“我们的朝鲜同胞已经开始这样想，不管日本鬼子多么耀武扬威，我们朝鲜民族也有神通广大的将军，所以不用怕日本鬼子，只要跟着金将军打下去，就能争得朝鲜的独立。老百姓的这种想

法，可不是对司令官同志个人的崇拜，而是对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绝对的信赖和期望。人民群众希望这样，我们何必硬要否认，令他们失望气馁啊!”

听了金平的话，我心想，一定要更加大胆更加灵活地开展军事活动，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期望。

正如金平所说的那样，人民群众从有关我们的传说中得到了很大力量。许多热血青年，听到朝鲜有使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将军，都满怀信心，争先恐后地参加了人民革命军。坦率地说，我们的确沾了这些民间传说很大的光。

后来，安德勋也加入了人民革命军。他也和其他队员一样，作战很英勇，不幸在蒙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当时由于情况不允许，只能用枯叶和积雪匆匆地埋葬了他。从此过去了漫长的年月，李致浩还一直很痛心地回忆着这件往事。

进入了新的一年——1937年,敌人重新开始了对我们密营的攻势。

日本昭和天皇看到企图一举消灭在满洲和朝鲜北部国境一带出没无常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计划成了泡影，就批准军部的建议，把自己的侍从武官四手井任命为特别使臣，到人民革命军的游击活动蓬勃开展，“治安”陷于一片混乱的鸭绿江沿岸国境一带视察了一个多月，并同朝鲜总督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驻朝日军司令官小矶共谋加紧“讨伐”人民革命军的对策。侍从武官领了天皇敕命，从东京乘飞机飞过鸭绿江上空来到前沿，随之，敌人空前地强化了对人民革命军的“讨伐”。

敌人对红头山密营的奇袭“讨伐”，就是在这时候进行的。当时，革命军后勤部正忙着准备过春节，我们的主要战斗部队都在前沿阵地——地阳溪和黑瞎子沟的密营，只有我跟警卫人员留在红头山密营。后来由于不得已的情况，春节前两天我也离开了红头山密营。

我先到红头山和横山之间一条山沟里的多谷岭密营，看望和慰劳了金鼎富，然后去白头山最后方的密营。《三千里》杂志谈到的我和金鼎富会见，就是在这里的事。

这个亦名白头山最后方密营的横山密营，有为病弱儿童团员保养身体的原木房、有为李桂笋、朴顺一等身体虚弱有病的人治疗的医院、有朴永纯的修械所和朴洙环的缝纫队，患了心脏病的魏拯民当时也在这里疗养。“烟斗老头”等秘书处的人也来到这个被称作天穹之下第一村的密营工作。

我先了解了密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然后召集金平、权永壁等军政干部举行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会议。

会议首先总结了黑瞎子沟军政干部会议以后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军事政治活动，接着讨论了彻底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当前斗争任务，其中着重讨论了战斗部队向桃泉里、鲤明水一带和抚松地区进行战略策略性转移的问题和进军国内的时机问题。后一个问题日后在西岗会议上又进行了更具体的讨论。会议接着讨论了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组织体制的问题，成立了以权永壁为书记、李悌淳为副书记的长白县党委员会和李悌淳为负责人的祖国光复会长白县委员会。

这个会议，是对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保卫白头山根据地，尤其对我国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魏拯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横山过的春节，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朴永纯用罐头盒子做压面机压出淀粉冷面招待我们，就是这年春节的事。缝纫队包了饺子，医院做了汤面，此外横山人还拿出各种山珍野味，置备了丰盛的筵席款待我们。

后来，魏拯民常常回忆着在横山密营同我一起吃过淀粉冷面的1937年春节，极力赞扬朴永纯出众的才干。

每当想起1937年春节的时候，我眼前就浮现出名叫乔邦信的中国人警卫队员。那天，他吃了十五个饺子后又吃了两大碗冷面。乔邦信共五个兄弟，他们在地阳溪同一天同时加入了革命军。乔邦信排行第五，所以我们都叫他“小拇指”。

有一次，“小拇指”手受了伤，我用刮脸刀给他作了手术。没有用麻醉剂，他一定是疼痛难忍的，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伤口没有痊愈，他解手不能用自己的手解裤腰带，每次都由我替他解和系裤腰带。他的鞋子湿了，也由我帮他烘干。有一天，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到安图县五道扬岔开会，由于叛徒告密，我们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乔邦信舍生忘死，英勇奋战，才使我们脱险。但他的一个哥哥

不幸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在横山欢度了春节，第二天刚刚回到红头山密营，望远哨那边就响起了枪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只有李斗洙连队的几个人和负

责护卫我的机枪班战斗员。而敌人的兵力少说也有五百多人。加上，我们的望远哨发现敌人时，敌人已经快爬到可以压制我们的望远哨高地。

我立即命令队员火速占领南边的山脊，并叫李斗洙连长命令望远哨的队员立即撤回，把路让给敌人，撤时一定要顺着刀刃山脊撤，而且要叫敌人看见。这个山脊像刀刃一样险峻，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山沟，被厚厚的积雪埋没。只要把敌人诱上这条通路，我们就可以利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地势，狠狠地打击敌人。红头山南边的山脊，又是一个战术性的支撑点，可以清楚地俯瞰并消灭顺着刀刃山脊扑过来的敌人，要是敌人退却，还可以把敌人赶进峡谷全部加以消灭。

按照我的命令，望远哨的队员们把敌人诱上了刀刃山脊。

这样，刀刃山脊和南边山脊之间的峡谷，就成了埋葬敌人的名副其实的陷阱沟。

我们能够取胜的又一个原因，是李斗洙连长照我的命令往南边山脊的斜坡泼上水，使其变成了冰坡。因为有这个冰坡，敌人一个也未能爬上我们占据的棱线。

这次红头山战斗，按一般的军事常识说来，是根本不可能打胜的。尽管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还是歼灭了敌人的一大部分。而我军，只有李斗洙连长一人受了枪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去了。

战斗结束后，我一面派夜袭小组去搅扰敌人的宿营地，一面采取了向抚松方面转移的措施。因为我考虑到，敌人虽然被打退了，但他们一定会带着增援部队卷土重来的。我们兵力太少，继续在这里作战，

是很不利的。这时候，悄悄溜走，才是上策。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撤退的时候，从峡谷入口方向传来了我们游击队的冲锋号声，紧接着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是吴仲洽的队伍在狠揍敌人。吴仲洽听群众说敌人的“讨伐队”已向红头山方面开拔，立刻就想到了司令部的安全，于是不顾一切地飞步赶来，路上遇见我派的夜袭组，便同他们一道打进敌人的宿营地，横冲直撞，把死里逃生的残兵败将干净彻底地消灭掉了。然后他派韩益洙来问我要不要他们到红头山来，我指示他们按原计划行动，因为敌人对红头山的袭击已经完全失败了。可吴仲洽还是不放心，又再三了解了司令部的安全确有保障，才放心地回黑瞎子沟去了。吴仲洽的确是对我很忠实的同志。

在红头山战斗时，被抓来给日军运东西的二道岗一位农民，被迫参加了收尸。他在多年后见到我们考察团时说：

“那时候，日本军队到我们村里来挨家挨户都抓去一个人给他们扛东西。这样被抓去一趟，我们大都受了冻伤，有的人还冻掉了十个脚指头。头一次被抓去的时候，真叫人害怕，被拉到战场爬在地上的时候，全身都冒冷汗。可是，每一场仗，都是游击队取胜，我们心里不知有多高兴，累也不觉累了。一到鬼子们逃跑的时候，可就苦了我们了，鬼子叫我们拖他们同伴的尸首，这是最讨厌的事。光说红头山战斗吧，鬼子的尸首不知有多少，没法都用担架抬，就把死鬼子的绑腿都解下来，拴在尸首的脖子上拖着走。”

有一次，我会见过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代表团，其中有个身高九尺的新闻记者，在会见席上他一言不发，只顾作记录，午餐时才突然开

口吐出了心里话。他说，金主席是以“白头山猛虎”而闻名于世的，因此他一直以为我是个很可怕的人，可是这次见了面，才知道我非常仁慈和蔼。他接着坦白地说，他是那次红头山战斗时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日本军的少尉，那天夜里遭夜袭时，多亏他出去查岗，才幸免于难。可就因为他保住了性命，被宪兵队抓去毒打了一顿。他一气之下，辞掉军职，当了记者。

参加红头山战斗的敌军，是日满混成“讨伐队”。在战斗中被打死的全是日军，伪满军被打死的却没有多少。

日军军官们问伪满军军官们，为什么在战斗中被打死的全是日军，而你们却安然无事？难道游击队的子弹长了眼睛吗？这是不可能的，可见你们跟游击队有私通。于是为了出气，把他们狠狠地打了一顿。

我们在红头山能够打败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说那是我们所有指战员的强大精神力量。

必胜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我们的精神。今天我们把它称为“白头山革命精神”。

正因为我们面对着几倍几十倍的敌人，不惊慌，不灰心，抱着必胜的信心，以百折不挠的斗志，自我牺牲的精神，进行了斗争，所以，无论何时何地碰到什么样的敌人，我们都没吃过败仗。

证明我们抗日游击队员的胜利信心和百折不挠的斗志有多么坚定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当时我们有一个设在岩洞里的医院，那里有李斗洙、李桂笋、朴顺一等几名伤病员，由宋大夫负责给他们治病。这个医院，名为医院，实际上既没有药，也没有手术刀，十分简陋，但却洋溢着“白头山革命精神”。

伤势严重的朴顺一，是第二师的军需部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他的脚开始溃烂。普天堡战斗后，我给他们送去了粮食、夏季军装、鞋子以及药品、罐头等战利品和多种物资，并且写信鼓励他们一定要战胜病魔，早日在战场上重逢。朴顺一看了这封信，当场就拿出他用罐头盒子自制的小锯子，对同志们说要用自己的手锯掉开始溃烂的脚。宋大夫和其他同志都竭力劝阻，说服他再想想别的办法。但是，朴顺一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甚至批评对他表示怜悯的同志太软弱。

他说：“我已下定决心，用我的手锯掉我的脚。实现这一决心，只需同志们给一点点的帮助，把我的脚抓牢一点就行。我要早日治好伤，早日回到革命岗位去。”

他用那把老打弯的洋铁片小锯，开始锯他的脚，为了减轻痛苦，唱着革命歌曲，花了整整六天的时间，终于锯掉了那只开始溃烂的脚。脚锯掉了，人也昏倒了。幸亏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

这年初冬，他们搬到更深的山沟里，搭起草棚继续治病养伤。后来，这个草棚医院不幸被敌人的“讨伐队”发现了。最先看见敌人来袭的就是朴顺一，他为了保护战友，死死抱住企图生擒他的敌人，大叫着“讨伐队来了！”滚下了悬崖。

为了革命，自己锯掉自己的脚，保存了珍贵的生命；而为了保全战友的生命，又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战斗在白头山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啊！

当时出去打柴的李斗洙，听了朴顺一告急的喊声，立即躲起来了，但李桂笋等几个人被俘，其余都牺牲了。李斗洙成了一只孤雁，战友没有了，草棚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开始了孤苦伶仃、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整整六天没见一粒粮食，第七天偶然发现了李桂笋平时做饭时顿顿节省下来的两碗黄豆。黄豆吃完之后，就只能以野猪草充饥，勉强维持生命。衣裳全破了，披着一条破麻袋片，忍受着白头山的酷寒，像原始人一样在当地里啃着草根树皮延命，其艰苦是难以言状的。一群乌鸦常落在他身边的树枝上哑哑聒噪，甚至轮番掠过他的头顶用翅膀扑打他的脸，看他死没死。

埋在灰里好不容易保护下来的火星也熄灭了，李斗洙自己也觉得了此一生是上上策了。但是，当他决心结束生命的瞬间，想起了我们要他们早日痊愈争取在战场重逢的嘱托和朴顺一为保护战友抱着敌人跳崖的壮举，心中自语道：

“我没有权力去死。自杀，是对舍身救我的同志的背叛。要活下来重上战场，这是司令官同志给我的命令，我没有权力违背这条命令。”

从此，为了活下来，李斗洙作了殊死的斗争。在那没吃没穿，犹如大海上一座孤岛一般的深山里，他孑然一身，奇迹般地坚持了三个月又二十天。

同李斗洙一样，朴顺一和李桂笋以及所有牺牲的战友，都是像白

头山一样巍然屹立的不死鸟。他们虽然都变成了一杯泥土，但他们的精神却像白头山一样永远傲然挺立。

红头山战斗以后，我们连续进行了桃泉里战斗和鲤明水战斗。

红头山战斗以后，我率主力开到了长白县下岗区。在敌人于白头山附近一带重新集结庞大兵力进行大规模搜索战的情况下，要组织新的战斗，是有必要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别处的。我率主力开往下岗区，是一个战术性的转移，目的在于分散敌人的“讨伐”力量，给敌人造成混乱，然后彻底粉碎敌人的“冬季讨伐”。本来，我们跟南满同志们已经约好，过了春节就跟他们会师。

部队一到腰房子附近的村庄，我就命令部队宿营，并向桃泉里派出了侦察小组。侦察小组在路上碰见了带着敌情报告前来找我们小分队的桃泉里地下组织成员。据他报告，靖安军部队被我们大小部队相配合的战术拖来拖去，白白地跑了一冬，如今气急败坏地要寻我们司令部决一死战。

要从腰房子到桃泉里或崔令监沟去，就必须经过一条长满白桦树、槠树和没顶的芦苇、杂草、荆棘的小径。我们就是从这条小径上到桃泉里上村去的。当时，传令兵崔金山误入灌木丛，被刺扎伤了眼睛，闹出了一场乱子。假如把敌人诱到这条足有三十里长的小径上来，敌人就势必排成一列纵队走，那么埋伏在路两旁的我军主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分割开来，各个予以歼灭。

我们决定先用小分队的诱敌战把敌人拖来拖去拖到筋疲力尽，然后用大部队的伏击战全歼敌人。于是，我把吴仲洽叫到司令部来，交

给了他把敌人诱到那条小径上分割消灭的任务。诱敌小组一发现敌人的纵队，就朝敌人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地开始了猛烈的射击，然后迅速地撤出战斗，朝我军埋伏的荆棘丛小径退却。敌人不知是计，径直追上来。从生的荆棘，对没有经过山地锻炼的敌人来说，是同铁蒺藜一样难对付的障碍。敌人被这荆棘丛阻挡，一列纵队自然被截成了好几段。埋伏的我军朝着被分割的敌人断断续续地喷出了火焰。敌人惊慌失措，东跑西窜，却无路可逃，终于个个被击毙，雪地上到处是腥红的血污。几百名敌军，中了我们分割消灭战术的计，遭到了覆没，幸存的敌人丢下许多死伤的同伴仓皇逃遁，退到桃泉里去了。

桃泉里的地下组织报告说，敌人准备连夜逃回去，唯恐我们黑夜偷袭他们。

要从我们的集结地赶到桃泉里大路上去，至少要走两个小时。要想叫敌人在那里多耽搁一些，直到我们到达那条大路为止，就需要制造什么借口，拖延他们开拔的时间。于是我指示桃泉里地下组织，要想方设法拖延给敌人做晚饭的时间。

桃泉里地下组织为了使我们能提前赶到埋伏地点，便故意拖拉着，迟迟不给敌人做饭。敌人焦急不安，催促快做。区长郑东哲(地下组织的成员)对他们说，靖安军大人来一趟很不容易，我们岂敢怠慢，容我们好好准备，盛情款待。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人去舂米、杀鸡，故意拖延时间。这样，到了黑夜，敌人才动身上路。这时候，我们早已在路两旁打了埋伏，等敌人已有半个小时了。

在这场伏击战中，我们全歼了这支靖安军。

在荒草遍地的台地上，敌人的尸体狼藉，游击队员从敌人的尸体上只摘下枪支和弹药，从从容容地撤出了战场。听说，敌人运走他们同伴的尸首，调用了二十四头牛，每架牛扒犁各装九具尸首，拉到十三道沟去了。从此以后，群众常说："每架牛扒犁装九具，二十四架牛扒犁共装多少具？"以此表达了他们高兴的心情。

桃泉里战斗以后，我们的部队便转到富厚水去了。在这里，我们同南满同志们会师，同他们联合起来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这是彻底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最后一场战斗。

由于敌人倾注全力筹划并进行的"冬季大讨伐"遭到惨败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连战连胜，长白大地完全变成了我们的天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军事上压制朝鲜人民革命军，阻止我们革命军挺进国内，孤注一掷，倾注了全力，但每每都遭到了惨败。他们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我们，中伤我们，便到处散布"匪贼魁首"、"共匪头目"等恶言恶语，但都未能得逞。到头来，他们一筹莫展，大发悲鸣，说我们游击队战术灵活，能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升天入地，无以对付。

日满军警面对着我们变幻莫测的战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敌人最怕我们的"罗网战术"。他们在他们的出版物和日常训练中都一再强调千万不要落入人民革命军"罗网战术"的陷阱。说一旦落入"罗网"，任谁都无法活命。这种恐惧心理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日满军警中。

所谓"罗网战术"，是日满军警对朝鲜人民革命军最典型的游击战术之一——伏击战的称呼。他们说的"罗网"，就是意味着天罗地网，意味着陷阱。

敌人在 1936 年底至 1937 年初的“冬季大讨伐”中遭到惨败以后，大肆谈论了他们的“讨伐”经验，也谈了许多他们因我们的“罗网战术”吃了大亏的事例。

伪满的警察杂志《铁心》1937 年第 5 期刊载了混成旅团军事教官石泽写的《谈金日成游击队的奇袭战》、《此次讨伐有感》，以及后来的座谈会纪实《谈讨伐体验》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石泽承认“罗网战术”是完美无缺的。他写道，从这次讨伐来看，游击队的战术大体上是“罗网战术”；他们不仅在兵力比我们少的时候用这个战术，兵力多的时候也用这个战术，这是他们惯用的战术；今年 2 月，在抚松县城西南大夹皮沟附近，我军与金日成游击队遭遇，虽一致英勇奋战，也未能取胜，大都光荣战死，这首先是因为中了游击队“罗网战术”的计。他接着指出，此类事例尚可举出许多。最后他敲响警钟说，要警惕落入“罗网战术”的圈套。

对我们的游击战术，看来共产国际的学校也很重视。抗日革命战士朴光鲜常常回忆说，在共产国际的学校里，干部们经常谈论必须重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游击战术。当时，苏联有一些由共产国际办的学校，满洲地方的共产主义者称之为共产国际学校或共产国际大学。这些学校，吸收世界各国革命组织推荐的学员和共产主义者，对他们进行政治军事教育。朴光鲜也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

朝鲜人民革命军在长白大地上发出的枪声，大大震惊了朝鲜总督府首脑、驻朝日本军警、日本本土军政界头目和资本家。他们听了我们的枪声都大惊失色，提心吊胆，而我们的人民群众则欢欣鼓舞，兴高采烈。

我们在长白地区开展的军事活动和连续不断的胜利，为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祖国开辟了道路，巩固了朝鲜革命的实际主力——我们革命军的地位。

我并不认为我们在长白进行的战斗是震惊世界的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在世界战争史上，曾有过多少杀伤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著名的战役和大决战！而我们每次进行的战斗所投入的兵力只有几百名，杀伤的敌人也只有几百几千而已。但是，我们却抱着很大的自豪感回忆着这些战斗。我们所重视的是革命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扬的革命精神。人民革命军的意志压倒了敌人。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胜利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重视在长白一带进行的浴血战斗的原因。

四　朴寅镇道正

1936 年 12 月，在祖国光复会机关刊物《三·一月刊》创刊号上，登载了以《天道教上级首领某氏亲自拜访我光复会代表》为题的一则简讯。文中说：在国内外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天道教委员某氏，满怀着爱国热情，访问了作为祖国光复会代表的我；他赞成我们的纲领和一切主张，还表示了要动员一百万名天道教青年党党员参加争取朝鲜独立的圣战的意向，又保证将来要和祖国光复会取得更密切的联系。

这则消息中的某氏，就是朴寅镇道正。当时为了保密不得不姑隐其名。短讯的文字虽不过几行，但其间却包含了曲折深刻的原委，那是写一本书也道不尽的。要想了解朴寅镇道正为找寻我们而前来白头山密营的内情，就必须同该杂志同时登载的一篇有关爱国青年不断加入我军的文章联系起来看。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祖国西北各地热血沸腾的青年爱国勇士们，每天以七八名为一伙，渡过鸭绿江、豆满江来参加金师长部队。……他们对朝鲜国内的地形、道路以及各地情况都了如指掌，因此，他们自愿做武装队伍的先锋队，站在挺进国内的最前头。”

我们开到国境地区，记不清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新昌洞的时候，有几个本村的青年找我们来申请入伍。于是，我下指示说，申请入伍

者既是国境地区的青年，倘若身体没什么异常，就全都收进来。对此，李东学却摇着头说，其他几个青年倒可以吸收，那个丰山出身的“天道教迷”，可得考虑考虑。还说，搞统一战线也当有个分寸，怎能让信天道教的宗教迷也随便参加到革命军里来呢。

我让李东学去把那个村民们管他叫做“天道教迷”的青年领来见我。一个衣着褴褛但脱尽了俗气的清秀小伙子，跟着李东学疾步走到我的面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双眼皮的眼睛和咧着嘴笑时裸露的金牙。他的名字叫李昌善，生于丰山郡川南面瑟里，因为同岭北地方的天道教道正朴寅镇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在后者的教育和影响下，成了天道教的青年党党员。由于他是朴寅镇赏识的一个才子，因而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和盯梢。他的导师朴道正因在丰山郡领导“三·一”运动而坐了好几年牢，被当作重要监视对象。日寇警察把装有巡查记录的小箱子挂在朴道正家的屋檐下，以巡逻为名，每周一次到他家来，定期检查他的动向，每月还由首席警察亲自来察看一次。这种时刻不断的令人讨厌的监视，甚至波及到李昌善身上了。来到朴道正家的警察，每次都不放过对他家的察看。后来，李昌善征得导师的同意，终于迁居到日寇军警不怎么缠磨的长白地方。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李昌善的入伍。而李东学却像受到不公正的裁判那样，赌气地说道：

“司令官同志，一个宗教迷还能当好游击队员吗？劳动青年有的是，何必收那样的天道教迷，玷污我们部队的清名？”

我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责备了他：

“你的眼睛，可真是莫名其妙啊。李悌淳是个得力人材，这一点你很快就能看出来，可这个人同样是宝贝，你却看不出来。你倒不是斜眼，可有时竟看得这么歪。”

“马克思不也说过宗教是精神鸦片吗？那个天道教迷还算得上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若不造成忧患，就可算幸运的了。”

他对宗教徒的偏见，确实是过分的。我不得不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了。

我说：“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精神的鸦片烟这一论断，不应该作极端而片面的解释；这一论断，说的是要警惕被宗教幻想所蛊惑，而不是说要排斥一切宗教。只要是爱国的宗教徒，就无论谁都应该去携手团结。你要知道，我们的游击队是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首要使命的爱国武装力量，是不仅为工人和农民、而且为全体朝鲜民族而奋斗的人民军队。当然，在游击队里起骨干作用的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但并不因此就要排斥其他阶层和其他力量；即使是宗教徒，如果他愿意，也要毫不犹豫地把他吸收到我们的武装队伍里来。现在，你还不知道我们交上什么好运，如果利用那个青年的关系，就能在甲山、丰山、三水地方的天道教徒中播下祖国光复会的种子，进而把岭北的广阔大地变成我们的天下。今后，你就会知道那个青年的价值的，要好好对待他，爱惜和保护他。”

至于李东学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了我的话，我是不大清楚的。

新昌洞的人们给李昌善起的外号“天道教迷”，在他入伍后人们仍然这样呼唤。这个外号包含的不是同志友爱精神，而是一种不友好

的嘲弄和轻蔑。李昌善每听到喊这个外号的时候，就皱起眉头，毫不掩饰地现出反感。

那一次，在密营里开了祝贺新队员入伍的娱乐会。新老队员轮流唱歌，娱乐会开得很热烈，老队员们为新队员把全部本钱都抖搂出来了。新队员们也兴致勃勃地不断来到前面大显歌喉。不料这个好不容易举办的娱乐会，却因主持人的失言而乱了套。轮到李昌善上台的时候，介绍词出了严重过错："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在新昌洞入伍的'天道教迷'同志唱的歌吧。"一听主持者如此不三不四的称呼，李昌善马上火了，甩手就退了场。

为这件事，部队里议论纷纷。责备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娱乐会主持者：又不是老队员，把新队员叫"天道教迷"，岂不是太荒唐？捉弄人也该有个限度啊。

有些人则认为李昌善是小里小气的人。他们说，叫叫外号有什么关系？被指名的人，不唱歌就退出场去，那娱乐会还成个什么样子！为了参加革命军离开家的人，连那么一点雅量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心胸这么狭隘，怎能当一个战斗员。

对娱乐会主持人和李昌善两个人发出的不同议论，最后就转到了如何一般地对待宗教徒和具体地对待天道教徒的问题。我不得不对全体指战员明确解释我们对天道教的看法和立场。

天道教，是我国固有的民族宗教。

崔济愚把天道教称为东学，表明了与"西学"(天主教)的截然不同，只看这一点，也能清楚地知道天道教所具有的民族性质。

天道教在其基本思想和理念上，是爱国的、进步的宗教。该教提出“辅国安民”“广济苍生”的口号，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天道教教徒们高呼这样的口号，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建设万民幸福快乐的理想社会，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把这样的民族宗教，只看其宗教之名而不问其实，就不分皂白地加以排斥，还把它的教徒诬蔑为“天道教迷”，这难道是对的吗？

我这样对天道教的爱国爱民的理念和天道教徒的爱国斗争作了解释之后，还就对待天道教徒时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和统一战线政策，重新作了明确的说明。从此以后，李昌善那个“天道教迷”的外号就销声敛息，而代之以“金牙”这样一个新的称号。这“金牙”二字，后来在游击队里竟像真名一样固定下来；而本人也顺水推舟，把自己的姓改成“金”，名字改成“甲夫”，叫做“金甲夫”。直到他为做政治工作而奔走的时候，也用这个假名进行了活动。

李昌善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博学多闻，聪明颖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尤其擅长于歌舞和相声，所以每当开娱乐会的时候，几乎他一个人包打天下。他待人和蔼，即使同初次接触的人，

也很容易结识。他过于坦率，可又有点个人英雄主义。

有一次，那是他入伍后只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担任部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的金平来找我说，“金牙”说了，是不是该到了起码把他晋升为政治指导员的时候了？当时，“金牙”所属的政治指导员，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都不怎么高。对早先当过天道教青年党干部的“金牙”来说，接受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上级的领导，是件委屈的事。

我把李昌善叫来，说明了他还不大了解的政治指导员的优点和功绩，同时给予了他必要的忠告。

我对他说："你将来不仅能做政治指导员，还能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学生也曾从小学学起；同样，得力的军政干部也必须经过见习和基础训练阶段。迄今为止，你当朝鲜人民革命军，已经通过了见习阶段；从现在起，你要经过做得力的政治工作员的阶段了。你知道吗？我批准你入伍的时候，就打算把争取天道教徒的工作交给你的，那就是说，你的工作范围不是一个连队，而是要做一个把成千上万的天道教徒都引导到祖国光复会队伍里来的政治工作员，将来要成为更大的政治干部。回头我就让司令部的组织科长金平和宣传科长权永壁等同志做你的讲师，你要学好政治理论，学好群众工作方法和地下工作经验；最重要的是学好人民性工作作风。你还应该牢记，谦虚是一个人最高尚的美德，你不仅要把革命前辈而且把同辈和后辈也都当作老师，做一辈子的学生。如果能这样，我担保所有的人都会尊敬你、拥护你的。"

过不多久，我们把他从战斗连调到司令部的政治部里来。从这时候起，"金牙"对内做七团宣传干事，对外则作为联络天道教的政治工作员进行活动。后来，他把宣传工作移交给别人，成了专业政治工作员。

李昌善在吸收朴寅镇等北鲜地区许多天道教徒参加祖国光复会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通过李昌善，事先了解了朴寅镇和天道教的内部情况，还同天道教徒们进行了接触。

朴寅镇在天道教教会里，是享有相当地位的人物。他的道号叫文庵，自从 1909 年加入天道教以来，担任过各级教职，到 1932 年做了智源布的道正。当时的天道教，在全国共设了二十九个布，其中的智源布主要包括丰山、三水、甲山、长白等地，是全国最大的布组织之一。朴寅镇又称岭北道正。他的父亲曾参加全琫准[18]率领的南接军，是当年为争取甲午农民战争胜利而积极斗争的东学党[19]重要成员之一；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对数十万卷入者的大屠杀一开始，他就背井离乡，从全罗道躲到了遥远的岭北地区。

朴寅镇的父亲常常像讲故事似地给他讲天道教教祖和自己的反抗生涯，这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对于朴寅镇来说，“三·一”人民起义，是对他的意志和信念的最大考验。他在丰山郡组织独立万岁示威，站在前头引导一千多名群众冲进官厅时，中了敌人的枪弹，身负重伤。

那以后，朴寅镇在咸兴和西大门监狱，受过三年的牢狱之苦。但是这种严酷的狱中折磨，也没能扼杀他内心深处的信仰和反抗意志。出狱后，朴寅镇同独立军携起手来，接连三四年奔走各地，全力以赴地支援了他们。不幸的是他看到独立军无能为力，被驱逐到别国境内，只好在流泪叹息中送他们远去。接下来，他就设法寻找一处能较少碰见日寇的安身之地，结果举家来到丰山郡川南面的深山沟里，兴办了传教室和夜校，对李昌善等村民宣传天道教教义，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操。然而，这个山沟也未能成为他的真正避难处。每逢周末和月末，那些不速之客定期进行的家庭访问，使得他不能

不再度转移。后来，他就迁到长白县城的新街。

李昌善还给我们讲了对了解朴寅镇很有用的一件趣事。

朴寅镇二十九岁还未结婚，有一次到邻村去相看一个姑娘，双方都见了面之后，媒人老太婆问了他的意向。朴寅镇回答说不反对。可是做丈人的老汉却默不作声，只是衔着小烟袋吧嗒吧嗒地吸烟。过了好一阵子，老汉才挑战似地冷言问道：

“你今年二十四岁，这事的确吗？”

一辈子不懂说谎的朴寅镇，却不知媒人把他的年龄向对方瞒了五岁，便照实回答说是二十九岁。媒婆的嘴里发出了一声哀叹。

那是早婚时代，小伙子过了二十岁还没娶亲，人家就怀疑他是残疾或是呆子，所以做丈人的老汉一听二十九岁，就立刻皱起了眉头，是很自然的。朴寅镇因家境贫寒，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姑娘的父亲向朴寅镇发出听来像炸弹似的宣布，说是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快到三十岁的光棍汉。

朴寅镇觉得眼前发黑，但鼓足勇气忿忿地追问道，你说说，我没长鼻子还是没长眼睛，你这个老爷子反对我，到底为什么？

那老汉十分难为情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别的都挺好，缺点就是你岁数太大，比我女儿大十一岁；如果我忽略这一点，许她订婚，只怕传出丑闻：把女儿拉扯大了，竟嫁给一个老光棍儿。

朴寅镇听了这种解释也没有退让，硬逼着说：如果只是这么几点理由，那我就一定要娶上你家的女儿；虽然我岁数大，可还从来没握过一次女孩子的手，一个纯洁后生岂能得到老光棍的待遇呢！不答应

订婚，我就决不罢休。你老放明白，如果实在不吐口，那我就把你的女儿装进口袋里扛走；还是请痛快答应好了。

这时，姑娘的哥哥微笑着暗示道：你要是实在想娶上我的妹妹，就拿出一千圆来吧。一千圆钱，在当时是好大的数目，相当于二十多头牛的价钱。这对于连一头小牛犊都不趁的朴寅镇来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朴寅镇却一口咬定：只要你答应嫁女儿，这钱就保证拿出来。老汉没说的了，像相面先生似地留神观察了后生半天，终于答应他们订婚。

从此，朴寅镇就摆脱了老小伙子的处境，成了这家的女婿。当然，一千圆钱，根本没成什么问题，要钱不过是打探他有没有主心骨罢了。我们也估计到，朴寅镇是一个有骨气、有自尊心、朝气焕发、斗志昂扬的人。我们通过同“金牙”的谈话所了解到的朴寅镇其人，是有某种感动人的因素的。

把李昌善派到天道教方面去做政治工作员，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一就绪，我就对他说，我们和天道教徒同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朝鲜人，又是把“斥倭”、“辅国安民”当做最高奋斗目标的贫贱民众的朋友，因此，要携手团结，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还特别强调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双方派代表聚集一堂进行认真的协商。说罢我就打发他去朴寅镇那里接洽。

过了三天，“金牙”就回到了密营。

朴寅镇对我们提出的联合起来进行反日作战的建议表示同意，还要求我们派代表去和他们进行协商。

我准备去同朴道正进行会晤，可是有一些情况不允许我离开密营。当时，南次郎和植田之间的“图们会谈”刚结束。由于敌人开始进行“冬季讨伐”作战，人民革命军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许多密探也配合“讨伐”攻势，红着眼睛来加害于我们。

战友们坚决阻止我，说是为了保证新建密营的安全，也为了保证我自身的安全，司令官亲自出马要慎重考虑。因为那时刚发生过密探潜入我们司令部附近的事件，所以大家的神经未免过于敏感。

于是，我不得不把金平和李昌善两个人派去同朴寅镇进行协商。金平从小无论什么事都做得很拿手，是个老练的实干家。他小时候在私塾里学了五六年汉文，学得很到家；及长，进学校受了正规教育；加入人民革命军后，还在培养游击队指挥员的随营学校受到了军政教育。他还有当教师的经历，所以把他和李昌善一起推荐为这次的协商代表，可以说是考虑到了他对天道教方面的知识和政治工作经验的。

朴寅镇和我们代表之间的会谈，是在长白县十七道沟王哥洞的天道教长白宗理院院长李铨化家的内屋里举行的。

金平先给对方看了由我署名盖章的介绍信，并转给他们《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然后便就同天道教合作问题开始进行认真的协商。

朴寅镇对于我们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何种政权的问题，抱有极大的关心。他既反对复辟旧韩国的王权，又反对效法俄国建立苏维埃式政权，也不赞成把人称“亡命政府”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加以合法化。

就此问题，金平按《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第一条规定作了具体的解释，那就是要根据全体朝鲜人民一致的意志，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人民代表，建立一个以代议制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对此，朴寅镇直言不讳地吐露了自己的疑虑。他说，按照《十大纲领》的明文规定建立民众政权，我倒绝对赞成，就怕祖国一旦光复，到了该建立政权的时候，就违背诺言去建立苏联式的共产政权。

当时，苏联正进行肃清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这在邻国人民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金平接着强调说，光复后，即使搞过抗日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掌了权，也不建立苏联式的共产政权，正如《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所指明的，我们在获得独立的祖国土地上将建立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主的政权，是民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是维护并代表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各阶层爱国同胞利益的人民政权。说到这里，为了证实上述主张的可靠性，他还讲了我们在间岛游击区把苏维埃政权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的事。

朴寅镇说，他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没有什么异议；如果这一纲领和宣言不是用来作宣传的，而是我们一定要付诸实践的真实意志，那么，他们天道教徒们也愿意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事关重大，不是他一个人能单独决定的，还需要跟同仁们和天道教中央教领崔麟协商后再作答复。他还委婉地提出一个请求：在他去见崔麟以前，能否帮他安排访问一次密营，以实现同我的会晤？金平说，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要求。

朴寅镇并没有轻率地说出决定性的意见，只提出些附带条件，作了不肯定的回答。显然，他是准备见了我之后才要作决定的。虽然如此，会谈还是富有建设性的。

第二天，朴寅镇又杀猪、又做打糕，召集五十多名长白宗理院男女教徒，设盛宴欢迎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代表。他还让天道教青年党党员站岗，开娱乐会表演了洋溢着爱国精神和斗争热情的节目。会上，房东李铨化唱了一支歌，就是安重根为击毙伊藤博文而去哈尔滨时禹德淳为他唱过的《碰到了，碰到了，碰到了敌人……》，唱得十分悲壮，催人泪下。这一切都使金平深受感动。

朴寅镇走访我们密营，是 1936 年初冬。记得他带来的人们中，有一个就是李铨化。他们都穿了黑色长袍，长袍上没有飘带，而缀有两个纽袢。原来天道教教徒们有这么一种讲究，要穿上纽袢醒目的长袍，好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朴寅镇一见我，就对邀请他访问密营表示了衷心的谢意。

“我真没想到能如此顺利地见到将军。可是，对于为独立而战的你们，我们竟连一支枪、一文钱都没给过支援，实在感到惭愧。”

光凭这句话，我们也足以看出他是个十分谦虚礼让而又有良心的人。我对他开诚布公地说道：

“我们是把心看得重于金钱和物品的人。支援几文钱或几条枪固然是好事，但我们更重视的是热爱祖国的赤心。我听说，道正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你这一片高洁的心，就是给我们增添了几百倍的力量。是呀，在这乱糟糟的年代里，能有像你这样恪守爱国节操

的人，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喜悦。”

“将军过奖了。”朴寅镇说，“其实我没有资格受到这样的评价……”

他被日本人的反动宣传所蒙骗，曾经一度把为光复大业而艰苦奋战的人民革命军误认为是“匪贼团”，对此，他向我表示了真诚的道歉。

于是我对他说：相互不了解，就会产生误会，也会产生敌意；我们不在乎这些，重要的是着眼未来，请先生把过去的事权当白纸一张，让我们同心同德为将来着想吧。你们听我们代表说过，我们为了把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憎恨日寇的各阶层同胞都团结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日大战，今年春天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如果不反对祖国光复会的纲领，就让那些有良心的天道教徒也都参加抗日大战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能取得胜利；不团结而四分五裂，就不能光复祖国而只能招致失败，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沉痛教训。在甲午农民战争的高潮时期，如果全面指挥湖西地方北接军的崔时亨及时接受指挥湖南南接军的全琫准联合作战的建议，不阻挠进攻汉城，历史就会两样的。东学党起事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阶层爱国力量没有团结一致进行斗争，而是分散在各地各行其是。因此，要争取反日圣战的最后胜利，光复祖国，就必须全民族团结起来，以联合的力量进行斗争。民族团结，是全民族戮力抗战的最英明的方策，是通向大捷的道路。我们觉得只靠天道教徒单独的力量，不能使“斥倭”成功，也不能谋求“辅国安民”；同样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若是孤军奋战，也难以争取朝鲜独立，

只有把其他爱国力量也团结起来，才可望胜利。因此我们都要做一条拧成民族大团结这股“丹心绳”(朝鲜舞名。表演时每人各执一条彩色绳子围绕一根柱子旋转，缠为一根绳柱，表示团结一心，叫做丹心绳——译注)的绳子，团结在祖国光复会周围才好。

朴寅镇说，祖国光复会的成立宣言和纲领，可谓十全十美，将军的意见也完全正确，因此他表示一定说服天道教中央的崔麟，让全国三百万教徒都尽快加入祖国光复会。说起来，在严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天道教教坛上，本来是赋予中央以绝对裁定权的；但从实际上看，实现这种裁定权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天道教中央的上层都腐败堕落、蜕化变质了。

我向朴寅镇坦率地吐露了自己的见解：如果能争取到这一步，那就太好了，但最好还是不要对崔麟寄予很大的希望。从他最近的行动和发表的文章来看，他走的是与历届天道教教祖截然不同的道路；他背叛了东学的理念，也背叛了民族，已经沦为敌人的奴婢了。

朴寅镇很吃惊地问我对崔麟怎么这样熟悉。他还坦率地说，实际上，他们天道教徒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已对崔麟的奇异变化感到不

快，他自己也对他抱有怀疑。

崔麟是参与过制定“三·一”运动独立宣言的人。他为“三·一”运动的发起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为此，他还尝过坐监狱的滋味。但他出狱后，得到第三代教祖孙秉熙的推荐，登上天道教教领地位之后，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就开始出现了“转向”的征候。

崔麟认为，果真以天道教的最高纲领“后天开辟”实现“地上天

国”，就必须巡访世界各国，观察东西方政局，探索切实而合理的改革方案。他用一年时间周游了世界之后回来说教说，在现时状况下，朝鲜从日本的殖民奴役中摆脱出来取得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因日本的势力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张，所以天道教徒们不应同日本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冲突，而以搞“自治运动”为上策。

要保护天道教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就必须参政，这就是从崔麟的嘴里说出来的主张。

“崔麟虽然做了总督的伴郎，”朴寅镇道，“但他却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天道教和天道教教徒，因此绝大多数教徒都没能觉察到这话是伪善的。我也信了他的话，一直把崔麟偶像化了。是去年夏天吧，宗理院院长李铨化到汉城见了他之后，回来说看崔麟布置房屋、说话行事，都和以前大不相同。可是我没有亲眼见见，现在还不想把他定为叛徒。我想借这次去汉城的机会，准备和他碰一下头。不久就将在汉城召开天道教中央大会，那时候我也去。如果他的变质属实，我们就该跟他一刀两断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主意去行动。”

朴寅镇就这样斩钉截铁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在这次谈话中还就国内外形势、民族主义运动的现状、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过程、祖国光复后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交换了意见。

我和他的谈话，可以说是不分昼夜。休息的时候，我还让客人们看了我们部队的生活情况。

朴寅镇说，我们人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很高，超出了

他的预料；队员们个个英姿焕发，朝气蓬勃；营房盖得整齐美观，周围收拾得也很干净；作息时间很紧凑，军人们很守纪律，就像正规军一样。他对此表示了敬意和钦佩。他对我们密营地区的绝妙山势也赞叹不已，说游击队密营的山水能给人一种进入庆尚道梁山千圣谷的错觉。那道山谷，是创立天道的崔济愚曾两次修过道的地方。据传，千圣山内院庵里有一个故事，说是有名的《花王戒》的作者薛聪的父亲元晓大使，曾给一千多名唐僧教了赞扬佛陀万条善行的《华严经》，使他们都成了圣人。东学的始祖就在那史意深远的地方修了道，创立了东学。

朴寅镇兴奋地说，单是看到我们在白头山树林里为光复祖国而修道，制定了比《华严经》和《东经大全》更迫切需要的民族复兴大经纶《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对许多青年进行军事教育的情景，也感到浑身是劲。

来到我们密营，最叫朴道正大为震惊的是，我给他提供了坚持清水奉奠的机会。

天道教里有教徒们务必遵守的五项功德，即咒文、清水、侍日、诚米、祈祷等。所谓清水奉奠，指的是供一铜碗清水做祈祷的礼仪，这在天道教世界是连一天都不得忽略的必修课。清水象征着天地的根本，凝聚着教徒们不忘天地恩德的誓言。崔济愚过修道生活时，每天供三次清水，沉浸在冥想之中，甚至在他被处以枭首的最后时刻也不曾中断，从此，天道教徒们就把象征始祖灵血的清水奉奠当作传统的法事。我念华成义塾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看过崔东旿、康济河等天道

教徒们一到晚九点，他们就召集全家人供清水的情景。

夜晚，我同朴道正一起继续闲聊，等到九点，就突然想起供清水的时间，让传令兵盛一碗清水来。清水碗准备好了，我就把它小心地放在粗糙的原木桌子上，招呼道正一声，该举行清水奉奠了。

“这是白头山圣地的水，真对不起，不是铜碗而是搪瓷碗。请您快供清水吧。”

我这么一说，朴寅镇就惊愕地望着我说：

“使不得，我住在不崇拜天道教的将军的军营里，岂敢供清水？”

“据说，在东学党起事时，东学徒们在沙场上也供清水、诵咒文。道正先生严守几十年的规矩，怎能因来到我们密营就违背呢？请放心，快诵咒文吧。”

朴寅镇作为客人讲礼节，坚决推辞，但我却一力劝他说，《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也阐明了要保障人的人格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在无神论者面前，就使信仰精神格外强的道正先生中断平时的必修课，这岂不是我们对不起你吗？

朴道正终于供上清水，端坐着背诵了二十一个字的咒文。他一连背诵三次后，喝了一口水，就以肃敬的容色说道：

“白头山谷的清水，真是非同一般。今晚用我们祖宗喝过的水做了清水奉奠，这事真叫我永生难忘。我做梦也没想到像将军这样的武人，如此尊重我们的宗教习俗。实在是不胜感念啊。”

这样看来，朴寅镇平时分明也和其他被反共思想所沾染的教徒一样，认为共产主义者是无视、排斥、憎恨宗教及其一切规矩的。

有一年，旅美朝侨金圣洛牧师访问解放了的祖国时，我在午宴上劝他做饭前祈祷，金圣洛牧师也感到惊讶。他想必在这样想：一位共产国家的主席，怎能还关注一个宗教徒的饭前祈祷呢？也许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吧。

说起来我劝金圣洛牧师做祈祷，既不是要显露什么豁达大方，也不是要宣传我们不反对宗教，这只不过是出自一种纯粹的人道主义感情，也就是说，作为主人要对客人讲应有的礼节，让一生笃信基督教的他，回到祖国也可以无拘无束地遵守教规。

在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或肥皂泡似的许诺。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不曾蹂躏过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不曾镇压过宗教徒。如果说在共和国的政权下，也有受到制裁或政治磨练的宗教徒，那就只有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和民族叛徒而已。

解放后，一些地方也有过因宗派分子歧视宗教徒、敌视宗教而引起社会议论的事例，但这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是按照中央的组织意志行事而发生的弊端。

解放初期，直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祖国解放战争[20]以前，我国还是有许多礼拜堂和寺院的。那会儿，我到七谷一看，那里也照旧保留着我在彰德学校时见过的礼拜堂。现在人民大学习堂坐落的平壤南山岗子，当时也有过两座大礼拜堂。可是自诩为“上帝”使者的美国人，却驾着飞机来把这些建筑物都给炸毁了。十字架、圣像和《圣经》都被烧成灰或埋没在废墟中。有佛像的大殿和庵堂也蒙受了炸

弹洗礼。教徒们本身则变成尸体到阴间去了。

可见，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破坏了礼拜堂，屠杀了教徒。“上帝”没能制止这种野蛮暴行。正因为如此，战争期间我国人民当中出入礼拜堂的就逐渐减少。我们的宗教徒感到再不需要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天堂了。教徒们由于认清了宗教在开拓人的命运中不起任何作用，便自动放弃宗教信仰，变成了以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人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配者这一原理为基础的主体思想的信奉者。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募集资金急于兴建礼拜堂，而兴建了住宅、厂房和校舍。我们的后代当中，没有一个认为信仰“上帝”或佛爷就能享福、能上天堂的青少年。他们之所以没成为宗教徒，也没加入宗教团体，理由就在于此。

我们现在也不把宗教看做是坏事，也不虐待宗教徒。国家反而出钱给他们兴建教堂，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几年前，在综合大学历史系里还新开设了宗教专业，培养着宗教专家。和别的国家一样，我国也以法律切实保护一切宗教团体和宗教徒的活动。

据说，南朝鲜有相当多的宗教徒。其中，也有不少在争取民主、统一、和平三条战线上积极斗争的爱国者和革命战士。

目前在南朝鲜和海外的朝鲜人宗教徒中，联共爱国人士大量增加，这也不是因为他们信奉《共产党宣言》。联结我们和他们的纽带，是爱国爱民族的思想感情。

这种纽带在本世纪30年代也曾有过。只要有爱国爱民族的精神，不论任何阶层我们也都能同他们携起手来，这是《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

所阐明的统一战线原则。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同朴寅镇携手合作的。

有些人曾歪曲我们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说这是使宗教徒落入统一战线这一罗网的一种花招。这种谬论，无论怎样大肆宣扬，也没有人相信它。联结我和吴东振、孙贞道、崔东旿、康济河等宗教人士的交情，是以纯洁的爱国爱民族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不是从某种策略出发的。我从未想过要把他们变成马克思的信奉者，也从未想过让他们充当共产党的伴郎。我只不过是真诚地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人格、人权罢了。

那一次，朴寅镇道正供了清水、做了祈祷之后，坦率地说他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也绝非偶然。当时他突然望着我说：

“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请教您。就像我们崇拜‘上天’那样，将军，您也有崇拜的对象吗？如果有，那是什么？”

我认为朴道正的这一询问，是对我们信任的表示，于是我便竭诚地回答说：

“当然，我也有像神一样崇拜的对象。那就是人民。我把人民看做天，像侍奉上帝一样侍奉人民。是的，我的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人民。世上再没有像人民群众那样全智全能、具有强大力量的存在。因此，我便把‘以民为天’当作我一生的座右铭。”

朴寅镇听完我的回答，意味深长地说：他到白头山大有成效，虽然稍微晚一些，但现在终于认识到真正的“上天”是什么，它在哪里。他还说，天道教始祖崔济愚的“人乃天”思想和我们的想法有相通之处。他为此感到十分满意。

朴寅镇道正和他的一行在三天逗留期间，还参观了我们的出版所和缝纫所，观看了实弹射击，也观看了游击队员的文艺演出。

他说："我活了五十年的岁月，但到了这里才第一次目睹和明白了我从未见到从未明白的东西。真是神奇得很呢。老实说，我被这个密营完全迷住了。现在，我对我所应当做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也下定了决心。我这就要去找崔麟，办理把所有天道教徒都吸收到祖国光复会里来的大事。如果这件大事办不成，那就让我属下的岭北八个宗理院的天道教徒全都参加进来。同时要尽一切努力，动员全国百万名血气方刚的天道教青年党党员，扛起枪来在将军麾下从戎。请您相信我的决心。"

这就是朴寅镇离开密营时留下的话。

朴寅镇访问密营回去后，积极地进行了吸收天道教徒加入祖国光复会的工作。他在把长白的天道教徒团结在光复祖国战线的同时，还在 1937 年 8 月亲自到三水宗理院，同当地宗理院院长赵完胁、长白宗理院院长李铨化等人进行协商，积极促进了和我们的统一战线。

当时"金牙"积极帮助了朴寅镇。朴寅镇请求我们培养出像李昌善那样能辅佐他工作的人材，为此早就把七八名青年派到我们部队来了。天道教青年党丰山郡代表李景云，也是在这个时期加入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

朴寅镇照他跟我们所说的那样，在那年 12 月，为了参加天道教中央大会赶往汉城。

如果崔麟告密或施行恐怖，朴寅镇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因此，为了既帮助他谈判又保护他的安全，我让李昌善带领我的传令兵金

凤锡，一直把朴道正安全地护送到汉城。

朴寅镇一到汉城，就听到一些令人气愤的消息：在此期间，崔麟把他在明伦町的洋房住宅弄得富丽堂皇，说什么要实行“为独立的自治”就必须同日本和解，还把巨额的天道教储金捐给总督府做“国防献金”。尽管如此，朴寅镇还是竭力抑制住义愤，耐心地说服他。

然而，崔麟却摆出了一副目中无人的姿态。

朴寅镇愤恨不已地谴责说，现在你搞的捐款把戏，是违背独立圣业、出卖祖国、背叛民族的可耻行为，这只会带来进一步增强日本国力、延长朝鲜被奴役的结果。

他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拿在手里冲崔麟挥动着说，争取朝鲜独立的真正道路不是捐款，而是在这一纲领里；我们要走的唯一的道路，就只有这一条道路，因此我们的教徒应该加入金日成将军组建的祖国光复会，同朝鲜人民革命军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大战。

崔麟看了半天《十大纲领》后以劝戒的口吻说，不用着急，金日成要奔的目标是大海，我要奔的目标也是大海；走向大海的道路有各种各样，有大路，也有小路。现在可不是闹嚷嚷地沿着大路走的时候；万事得有个适度，现在只是刷好杯子就行，水是随时都有盛的。

朴寅镇同崔麟吵过架之后，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家。他同崔麟决裂了，于是很快地组成了吸收丰山郡内天道教徒参加的祖国光复会丰山支会，紧接着又在甲山、三水、惠山、长白等地，也吸收天道教的骨干成员来建立了祖国光复会支会。这些支会把许多天道教徒和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朴寅镇影响下的祖国光复会组织，给我们密营

送来了很多支援物资。朴寅镇本人也为此事匆匆忙忙地出入惠山和丰山，有一次，他甚至亲自弄十来张兽皮送来，以便游击队在露天宿营时做垫子。当时我的战友们看到那些兽皮，都对朴寅镇赞不绝口。

住在地阳溪的朴寅镇的弟子当中，也有租种金鼎富的几千坪土地，为生产支援人民革命军的粮食而默默无言、汗流浃背地种庄稼的。知道这些耕地上打出来的粮食流入我们密营的，只有朴道正一个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也为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积极参加了后勤物资的搬运工作。

为我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不分昼夜地献身奋斗的朴寅镇，于 1937 年 10 月受“惠山事件”的牵连，不幸被日寇警察逮捕。

敌人大约摸到了朴道正的斗争情况和他同我们的关系，所以威胁他说：你和金日成游击队老早就串通一气，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还有，你在国境两岸，纠集不纯分子秘密结社，企图变革国体，这我们也很了解。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你从金日成将军那里接受了什么指令，你们的组织都部署在什么地方。

但是，朴寅镇却闭口不言。

敌人知道朴寅镇的气节和意志是不屈服的，于是就拿天道教教义来刁难他说，你们的教会认为人上无人，人下无人，人就是“上天”；那么，你们把视如上天的人以抗日独立为借口随便驱上战场，白白地流血，这难道不是对教义的背叛、对人伦的侮辱吗？

朴寅镇面对敌人的这一派胡言乱语，大声呵斥道：

“侮辱人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你们就是蹂躏了我们天道教宗旨的万恶的罪人。你们不是把成千上万的朝鲜的‘上天’像牛马一

样牵到屠场去吗？在军警挥舞枪刀的地方，我们白衣民族的鲜血汇成河流，活着的人抱恨终天，这些你们不也是很清楚的吗？那么，你们说说，是谁犯了罪，是谁该受审判？我们决不饶恕那些蹂躏朝鲜国家神圣天道的、屠杀了无数平民的强盗。我们也不能承认那些不法强盗编造出来的所谓国体。因此，我们三百万教徒要同两千万同胞一道，奋起投入浴血抗战。如果我这一腔热血能成为烧毁你们帝国的星星之火，我即使变为一堆泥土也感到光荣！”

他这番严正的声讨，使敌人战栗不安。敌人恼羞成怒，给道正老人施加了非刑拷打，把他折磨成身不由主的残废，使他又得了重病，濒于死亡的境地。

敌人意识到朴寅镇生命危在旦夕，只好借病予以假释。

朴寅镇在卧病中迎来了 1939 年的春天，临终前，他使出浑身力气，对忠心耿耿侍候了他的夫人说道：

“在这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我却感到很幸福。这是因为，我保持了水云大神师后代的本色，有意义地结束了人生历程。我朴寅镇作为朝鲜的男子而生，又作为朝鲜的男子而死去。等祖国解放了，你就领着孩子跟着金日成将军去吧。”

朴寅镇一向钟爱的一个弟子接到他弥留的通知，就跑到他的病榻前。朴道正一见他，就让他唱自己平时喜欢唱的《顿多尔拉里》。据说，《顿多尔拉里》这个歌名，是“黎明必将到来”的略语。这支歌表达了这种信念：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重新过上和平生活的一天必将到来。

丰山大地隔着厚峙岭与北青毗连，从本世纪 30 年代初起，这里民间广泛流行《顿多尔拉里》的歌和舞蹈。据说，自从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在朴寅镇的指导下积极支援游击队以来，丰山地区地下组织每当组织支援工作时，就常常用《顿多尔拉里》，跟敌人打马虎眼。

此刻，忠实的弟子照朴道正的吩咐唱起了《顿多尔拉里》，但因喉咙梗塞唱不下去，终于呜咽啜泣起来。

弟子一边高喊“道正先生！”“道正先生！”一边抽泣不止。朴寅镇握着弟子的手，低声说道：

“只要有金将军健在，只要有白头山的革命军，我们白衣同胞就一定会盼来黎明的那一天。你们将生活在百花盛开的‘上天’的国度里。现在，我已能看得见那一天，还看得很清楚。”

朴寅镇道正在联共救国的道路上，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是抗日革命培育出的爱国志士之一。

解放后，我每当怀念朴寅镇的时候，就常常去看望他的夫人和子孙。1992 年夏，我会见抗日革命烈属的时候，听说他的夫人年过九十还依然健康，于是我便下了邀请她的指示：要是走不动，就请你们背着来。道正的老夫人一下车，居然没有让人背，自己走着来到我的跟前。

她没有像其他烈属们那样叫我“将军”或“领袖”，而叫我“上天”。

我说，这样叫可不行，她却不听我的话。

“我在梦境里还见到过‘上天’哩。”

这是只有在朴寅镇的夫人嘴里才能有的称呼和告白。此时此刻，

我想起当年同朴道正会晤时的往事，不由地感到眼圈发热。

曾经从各方面积极帮助过朴寅镇的天道教青年党党员、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李昌善，可惜因白头山酷寒所致的冻伤而去世。我记得他是在 1938 年冬冻死的。最近，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李昌善内弟的相册中，发现了一张令人又惊又喜的照片，是李昌善在作为天道教青年党党员进行活动时同结义兄弟们的合影留念。照片中也有信念和意志的化身——李仁模。看来，李仁模是朴道正的许多弟子中的一个。

可见，朴寅镇又是培育出举世罕见的爱国者的恩师。

五　民族宗教——天道教

朴寅镇是有名的宗教人士，在把他争取过来做我们革命的同路人方面，我们对天道教的认识和立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是对天道教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或者是对这个宗教抱有偏见和敌意的人，是根本不会同朴寅镇进行协商，也不会气度恢宏地进行把全国几百万天道教徒团结在祖国光复会旗帜下的工作。

既然谈到了宗教，我想在这里进一步阐明一下我们对天道教的看法和立场。对于东学的宗旨和它的发展历史，我也有很多话想说一说。

我认为，了解某种主义、主张和教义的渠道和方法是因人而异，多种多样的。

最先给我介绍马列主义的是书，而最先使我接触基督教的则是教堂。我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教堂，这已经在前面讲过。我在那个教堂里第一次看到了宗教仪式，也第一次听到了牧师宣讲基督教教义的说教。崇实中学出身的我父亲和七谷教会长老与教育者我外祖父，对耶稣教义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念彰德学校的时候，七谷就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康良煜[21]先生也是基督教徒。

我父亲的知心朋友孙贞道、吴东振、张哲镐、金史宪、金时雨等，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我小时候就处在崇奉耶稣的信徒们的

包围之中。我小学时的同学中也有很多崇拜耶稣的人。那时候，还有很多宣传基督教的书在民间流传。这种环境给我提供了了解基督教的条件。

我了解伊斯兰教(回教)的经过则与此不同，是同一段令人发笑的趣事有关的。让我第一次尝到伊斯兰教滋味的人，是我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马金斗，他是个伊斯兰教徒。他胃口好，常常不顾宗教的戒律，到饭馆去喝酒吃猪肉。他到饭馆去总是找个不惹人注意的背旮旯的座位，一边吃喝，一边不安地频频左顾右盼。因为要是被人发现他喝酒吃猪肉，他那伊斯兰教徒的面子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会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

我同马金斗下过几次馆子，才知道伊斯兰教是忌酒忌猪肉的。我在中学时期了解的有关伊斯兰教的常识，都是在同他的接触中获得的。

我开始对天道教感兴趣，是听了有关甲午农民战争的英雄绿豆将军(全琫准的外号——译注)全琫准的事迹以后。我父亲在给我讲爱国先烈们的事迹时，总是把绿豆将军的名字同洪景来[22]、李俊[23]、安重根[24]、洪范图等排列在一起。不过，那时候我对全琫准，只知道他是甲午农民战争的主要人物，是个作战英勇，至死没有屈服的英雄好汉，别的就不大知道了。因为那时候我还小，父亲没有给我讲更多的事。

第一个给我详细介绍绿豆将军的生平和甲午农民战争全貌的人，是康良煜先生。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对天道教也有极渊博的知识。我听了他条理分明的讲课后，开始把甲午农民战争同天道教联系起来看了。

东学党起事的悲惨结局和绿豆将军的壮烈牺牲，使我对把朝鲜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封建朝廷的事大主义和软弱无能，对日中两国的野心和干涉朝鲜内政，禁不住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我认为，东学党起事才是灿烂地装点了我国近代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历史的大事，从这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勇士们才是对近代朝鲜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给予了巨大影响的雄鹰。甲午风云中的英雄全琫准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星一样留在我的心田里。

我对天道教的认识，在华成义塾读书时又加深了一步。义塾有很多天道教信徒。塾长崔东旿先生是天道教第三代教祖孙秉熙的弟子。这是他的儿子崔德新[25]在其回忆录中已谈过的。塾监康济河和他的儿子康炳善也都是虔诚的天道教徒。华成义塾有很多学生能把《东经大全》和《龙潭遗词》等东学经典背得滚瓜烂熟，以卖弄自己有学问；也有很多热忱的读者，常携带着天道教中央发行的月刊《开辟》，根据东学的观点谈论朝鲜的农村如何，李敦化的文章怎样。

崔东旿严禁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却鼓励学生阅读《东经大全》和《开辟》。历史教师缺勤的时候，塾长常来代课，他讲历史，无一例外地都讲东学史。他总是和东学联系起来分析和评价我国近代史上的所有激动人心的事变和事实。崔东旿从天道教教义出发大力提倡国本、民本和人本三本主义，这三本主义跟孙文的三民主义有类似地方。

崔东旿先生在给我们讲的许多有关天道教的故事中，最精彩的是对崔济愚的介绍。崔济愚号水云，是天道教的创始人和第一代教祖。

崔东昨介绍了崔济愚的经历和创立东学的经过后，对我们特别强调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对东学的创始人崔济愚先生，都尊称为水云大神师，希望同学们也要对他使用尊称，称做水云大神师，不能‘崔济愚、崔济愚’这样直呼他的名字。”

据崔东昨说，9 世纪时我国著名的学者孤云崔致远是崔济愚的老祖宗。崔济愚的父亲崔鋈也是才思敏捷，出类拔萃的人物。他著的《近庵文集》是当时著名的诗集。

崔济愚六岁丧母，十六岁丧父，从此近二十年，浪迹全国，摸索从苛政、流弊中拯救国家和百姓的途径，终于在 1860 年 4 月创立了对我国近代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的天道教教义，成了东学的创始人。

崔济愚把天道教称为东学，以便和被称为“西学”的天主教相对，突出它是生活在东方的朝鲜人所信仰的哲学。

崔济愚活动的时期，是我国因强权政治和党派斗争，导致民生凋敝，国力严重衰败的时期。反对封建暴政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加上连年的饥馑和洪水灾害，社会政治混乱达到了顶点。由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致使生灵涂炭，民权惨遭蹂躏，两班和庶民间的身分等级和阶级对立也达到了极点。几百年来维持着李氏王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变成了阻碍国家中兴和社会发展的桎梏。

几百年来一直闭关自守的东方国家朝鲜，成了贪得无厌、疯狂扩张领土的列强所垂涎的侵略对象。欧美列强以天主教为先导，伺机侵略朝鲜半岛。

实际上，“是日也放声大哭”的序曲早在那时就奏响了。在这种时候，真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的时代先驱努力探索新的思想和理念是必然的。崔济愚作为这些先驱的代表，创立了以“人乃天”、“辅国安民”为基本宗旨的东学，并且积极开展了广泛传播这一教义的传教活动。

崔东昨每当宣传天道教的时候，就像打出一条横幅标语一般，总是先说：

“诸君，要了解东学，就要先看看它的口号‘辅国安民’！”

有一次，塾长突然问我：

“对外，要辅助国家对付外来侵略，此乃‘辅国’；对内，则驱除暴政，保百姓平安，此乃‘安民’。这是多好的天道！成柱，你对‘辅国安民’有何看法？”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如果天道教提倡‘辅国安民’，那我就支持这一宗教。”

这是我的真心话。当时，共产主义思想虽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但我毫不犹豫地表明了对东学的支持。“辅国安民”，这是凡有理智的人都渴求的。

崔东昨嘴边挂着微笑，满意地望着我，说：

“反对‘辅国安民’，就不是朝鲜人喽。共产党提出的世界革命的口号也许不错，但是这个‘辅国安民’才是为我们国家和倍达民族(指朝鲜民族——译注)迫切需要的口号，水云大神师确实是一位灵验的伟人。”

我在华成义塾时期对天道教的认识，还是一种没有联系实际的狭

隘、生硬、浮浅而片面的认识。我联系实际深入研究东学是从吉林时期开始的。在探索朝鲜革命新的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一般人已大体上疏远了被历史否定的各种主义和主张，但我们并没有虚无主义地对待过去的理念和运动。我们反对盲目地照搬现成的理念和别人的经验，同时又虚心地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

卡伦会议前后，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统一战线问题作为主要的战略任务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应当团结哪些力量，排斥哪些势力，孤立哪些人？这个问题处处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每当讨论统战对象的时候，宗教问题总是同民族资本家问题一样成了不可忽视的中心话题。

同基督教一样，天道教是我最重视的宗教之一。我们之所以重视天道教，注视其教徒的活动，是因为它作为朝鲜的民族宗教，在其宗旨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爱国爱民，其传教范围很广，渗透力也很强。

《东经大全》同《资本论》一样，钻研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它文字艰深，难以理解。崔济愚所叙述的关于宇宙自然现象和事物的神秘奥妙的文字，玄之又玄，文意似明不明，若隐若现，不可捉摸。解放后曾在天道教中央任职的金达铉也承认水云大神师的文字艰深难解，他说，如果水云大神师的文字像柳麟锡的檄文那样通俗易懂，东学是肯定会多吸收几十万教徒的。

在帮助我了解天道教方面，引我入门的是杂志《开辟》。《开辟》这刊名是从“后天开辟”这句天道教主要教义中摘取的。它发行了几十期，始终保持了它作为综合性政治时事杂志的性质，为民族的启蒙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这个杂志的民族主义色彩很浓，但也刊载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是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新颖的有革新意识的大众杂志。那个时候，天道教青年党的组织不仅分布在朝鲜的北部地区，而且在东满、南满以至北满的哈尔滨一带也都有它的支部，因而《开辟》在满洲大地上拥有很多读者。

我在《开辟》上读到了我在吉林时期熟识的论敌申日镕的文章。他完全沉迷于20年代中期的农村问题中。他发表在《开辟》杂志上的论文《农村问题研究》是颇有理论深度的。

《开辟》还刊载了许多介绍世界各国风情的文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孤榆树或五家子读到的一篇题为《南满周行》的游记，是李敦化写的。他在这篇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满洲地区的自然风光，中国人的生活风俗，抚顺煤矿工人的悲惨处境和我国独立运动者的活动情况。据这篇游记说，南满地方的人有特异的风俗：人死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并不掩埋，而是放在露天里；不到七岁的孩子死了，就用草帘把尸体裹起来吊在树上。

《开辟》杂志刊载的各种文章中，对读者的影响最大的是鼓吹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其中有题为《朝鲜民族独有的优越性》、《高句丽国民的气概和努力》、《天惠特多的朝鲜地理》。杂志还经常刊载有关朝鲜的历史、地理、自然风景、地方特色及物产的文章。《八道代表夸八道》也是其中之一。

《八道代表夸八道》写的是朝鲜八个道的代表各自夸本道的故事。它的中心思想取自某个实学思想家对八道人的气质所作的评价。文章

的梗概是这样：平安道人出来夸平安道，说平安道人的气质是“猛虎出林”，气概犹如“出林的猛虎”，但从不记仇，胸怀坦荡；外号叫“赵赖皮”的人代表咸镜道出来夸咸镜道，说咸镜道人的脾气像“泥田斗犬”，就是说像在泥沼地上厮咬的猎狗一样咬住一口就死不肯放，他接着一转话头，说祖宗山白头山就在咸镜道，滔滔不绝地夸起本道的优越来。《八道代表夸八道》就是这样把八道人的特点描绘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

《八道代表夸八道》从头到尾都是妙趣横生的故事，能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骄傲感。

据有关部门了解，《八道代表夸八道》这篇文章，刊登在 1925 年 7 月号的《开辟》杂志上。最近，我找到这本杂志，把它又重读了一遍，跟半个世纪以前读的时候一样，仍有新的感受，确实是一篇饶有风趣的好文章。

《开辟》杂志还刊登了《外国人访朝印象记》。德国、法国、中国、日本、美国、俄国、英国等许多国家的人以《才艺属世界第一》、《三大惊叹》、《礼仪天下第一》、《朝鲜的四大美》、《对朝鲜的七大信条》、《自然美，人情美》、《对朝鲜人的印象》等为题，简短地记述了访朝印象。把从外国人的视角上看的朝鲜，再从朝鲜人的视角上看，玩味外国人对朝鲜的感想，的确是心旷神怡的事情。

杂志《开辟》在谈到朝鲜人所说的朝鲜的骄傲时指出，“驯良性天下第一”、“健康上的优越点”、“伦理道德无与伦比”、“将来世界的模范民”、“毫不残忍暴戾的朝鲜人”。

题为《朝鲜的东学党和中国的国民党》的一文也引起了读者群众的兴趣。作者指出，在东洋天地，胸怀改革社会的大志进行奋斗的集团只有中国的国民党和朝鲜的东学党，并骄傲地说，崔济愚比孙中山早四十年创立了东学。

据我的记忆，在《开辟》的笔者中撰文最多的是天道教中央的编辑科主任、《开辟》的编辑李敦化。李敦化号夜雷。他是很有才华的理论家，在对东学的教义作理论上的整理和哲学上的解释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我认为，他通过《人乃天要义》、《新人哲学》、《水云心法讲义》、《天道教创建史》等著述，在传教活动中建树的功绩，应在天道教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我自从成了《开辟》的读者以后，不知不觉地对李敦化产生了兴趣。给我较详细地介绍了夜雷先生的是朴寅镇。他对夜雷怀有相当的好感，甚至劝我同他会晤。然而，当时我在山上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要同住在汉城的李敦化见面，是不可能的。解放后，听说他住在阳德做天道教工作，可是我因为没有时间，始终没能见到他，只是通过天道教青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达铉间或听到有关他活动的片断消息。对于他最后的情况，金达铉也不清楚。只是后来据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汇报，1950 年秋，他跟着北上的人民军一直撤退到慈江道，在那里没过多久，不幸遭到美机轰炸牺牲了。

失去了李敦化这样的才子，对喜爱他的杂志《开辟》的老读者和天道教教徒来说，不能不是一件令人悲痛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看李敦化的政治观点，好像不属于少壮派革新势力，而属于保守

的稳健派。但是，他的著述主张坚持民族性，保持民族的荣誉，提倡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位热爱祖国和民族，一身清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宗教徒。

我同康炳善经常交谈《开辟》杂志的读后感，就东学的地位和教义进行过争论。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中，康炳善是对天道教了解最深的人。他极端信仰共产主义，但对他曾崇尚过的东学思想和天道教组织仍有很深的感情。康炳善的故乡昌城以及义州、碧潼和朔州等地方有很多天道教教徒。康济河、崔东旿、孔荣等，都是在平安北道地区的天道教里负有重任的爱国志士。本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康炳善通过天道教这一关系，在平安北道地区扩充了许多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

同大多数天道教少壮派革新势力一样，起初康炳善对天道教从东学党起事直到在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估价上，基本上是绝对化的，认为只有通过天道教才能解决一切开拓民族命运的大小事情。可以说，这就是我和康炳善之间就天道教问题进行争论的主要焦点。

当然，我完全承认东学在反对封建和外来侵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建树的功绩，也承认东学的民族性和爱国爱民精神。但对主张只有依靠东学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我是不能赞同的。后来，康炳善自己也通过实践斗争克服了认为天道教万能的观点。30 年代前半期，他同张蔚华一起在抚松做地下工作；30 年代后半期，他作为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在北满开展

积极的活动，后来被警察逮捕入狱，英勇就义。

东学信徒提倡的“人乃天”的思想，即把人比作上天加以尊重，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观念，仍把人当神看，因而未能克服理论上的牵强附会。

创立东学的崔济愚和他的继承人第二代第三代教祖都主张天道教是儒教、佛教和仙教三教综合，换句话说，是把多种宗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合而为一的最后的真理，因而它绝不是和天主教一样的异端宗教。

天道教的理论家们后来把前辈们主张的单纯的三教综合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把东学作为民族宗教，宣扬了它固有的特点和独创性。

天道教的一位革新派理论家，在主张天道教教义的独创性的同时，全面否定了从前所有宗教的各种教义，诸如佛教的寂灭说、仙教的玄妙说、基督教的天堂说、儒教的天命说和其他各种迷信与偶像的虚伪性，并竭力主张除人以外一切都不存在的“神人一体”、“人乃天”的教义，说人就是佛、就是仙、就是神、就是天。

“神人一体”、“人乃天”，这就是东学的基本思想。

天道教主张“上天”即整个宇宙是靠叫做“至气”的某种特殊力量形成的。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可又是物质的和精神的，大自然、人和神都是由“至气”造就的。

东学的“至气说”主张“至气”是世界的起源，是万物的根源。这个“至气说”，是主张一切物体都有灵魂的灵魂说的一种，可以说它是属于泛心论的。

天道教根据这一“至气说”，认为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像“上天”一样有灵魂。也就是说，人是世上万物中具有最优越的灵魂的特殊存在。

如果承认灵魂说，就要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人不是按着自己的意识和意志过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而是在灵魂的支配下只能沿着命里注定的某种人生轨道生活下去。灵魂说最后必将陷入宿命论。宿命论决不能导出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的理论，也不能得出自己命运的主人是自己本身，开创自己命运的力量也在于自己本身的真理。

东学展示的未来社会的前景，也不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的目标。他们说，只要靠非暴力斗争布德于天下，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神仙一般的人，到那时候就可以建成地上天国。他们认为，只要人们经常念经，不断反省，自重自爱，实现良心化，就能达到神仙化。

一句话，“人乃天”的思想，不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是以唯心论为基础的思想。

天道教由于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理论上的不成熟，在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中未能起到主导作用。这就是我们不支持东学万能论的主要论据。

我们就是以这种观点来对待天道教的，但我们更重视的是它的积极的一面，认为天道教无论在其宗旨上还是在其实践上都是能够在统一战线的大道上同我们携手共进的。

天道教把建设地上天国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从前的宗教认为世

界是无边的苦海，是无法拯救的；而天道教则认为能够开辟这个世界，建设成天国。由此出发，天道教把“后天开辟”当作自己的主要使命之一，开展了称之为“精神开辟”、“民族开辟”、“社会开辟”的三大开辟的实践运动。

东学的理论家们主张，天道教不同于出自纯粹的信仰，把来世的幸福和死后上天国作为目的的基督教；不同于把伦理修养和摄取知识作为教化的根本，重视实践道德，主张政教一致的儒教；也不同于以为人人都能成佛，以慈悲为基本宗旨的佛教。

他们还说，倘若佛教是“静态”的，基督教是“动态”的，那么，天道教是比基督教还要“动态”的；若说佛教是理性的一面偏多，基督教是感性的一面偏多，那么，天道教则是这两方面兼容并包的。

天道教的教义反对盲目崇拜上天，主张要相信人，它不像别的宗教那样推崇天和神是超自然、超人的存在，宣扬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是上天制定的。鉴于这些事实，我们认为天道教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主张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进步的宗教。

当然，我在制定我国革命的主体路线时，对各种现成的理论和运动都予以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天道教作为民族宗教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但是，我们彻底依据对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国革命所处的环境和前期运动的历史分析，在充分考虑到我们的民族传统和阶级力量对比的科学基础上，创立主体学说，探索了我国革命的前进道路，制定了与之相符合的战略和策略。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靠“上天”的帮助或根据

什么“天命”来进行革命的，而是抱着相信和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的理论上的主见和信念，走上了斗争道路的。

祖国光复会成立以后，就如何看待天道教的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朴寅镇道正访问我们密营的前后时期，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东学就更加关注了。朴寅镇访问密营后，我们就更有把握地推行了同天道教教徒搞统一战线的方针。

回顾起来，天道教从自己的宗旨出发，为了反对外来势力，争取国家的独立，建立国民政权，保证民生安全，以实现“辅国安民”，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布德天下”，“广济苍生”，建立和平的世界、地上天国，展开了实际斗争。

东学的主义主张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精神和对侵略势力的反抗精神，所以博得了贫苦大众和没落贵族的支持。东学主张废除一切贵贱差别的思想的广泛传播，对把贵贱差别绝对化的封建儒教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巨大威胁，是对封建特权阶层的严重挑战。正因为这种缘故，东学的创始人、第一代教祖崔济愚，被扣上左道乱政之罪名，于 1864 年 3 月在大邱被处以死刑；第二代教祖崔时亨，不顾李朝封建政府的残酷镇压和追捕，继续秘密地全力普及东学，扩大组织，并作为甲午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之一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后来也在汉城被处死。

第三代教祖孙秉熙，遵照东学创始人的旨意，把东学命名为天道教，并成为后来的“三·一”人民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受尽了日本刽子手的残酷镇压和迫害。历届教祖的生平清楚地证明，天道教

从创立以来，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贯是爱国爱民的。

被天道教称之为东学第一革命的甲午农民战争，无论在其规模或激烈程度上，都是19世纪后半期我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达到了最高峰的农民战争。

甲午农民战争并不是由天道教上层集团筹划或根据他们的指令发动的，而是由于农民不堪忍受腐败无能的封建特权阶层的专横和野蛮掠夺，而奋起反抗的一种暴烈的行动。这场反对政府的农民战争，是由全琫准等农民起义领袖发动和领导的，与东学上层集团毫无关系。起义领袖们高举“制暴救民”、“斥洋斥倭”、“辅国安民”等东学思想的旗帜，利用自己所属的东学组织，同各地的东学布组织取得联系，把古阜农民起义(古阜民变)扩大和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农民战争。

甲午农民战争是在 19 世纪为亚洲反帝民族解放斗争敲响了晨钟的历史事变，是和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印度的西帕依起义一起，并称为当时亚洲著名的三大起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

后来由于日中两国军队的介入，甲午农民战争遭到了失败，但分散到各地去的农民军，成为反日义兵运动的主力，继续进行了救国抗战。

这次甲午农民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东学革命，它不仅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留下了巨大足迹，而且对东方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影响。我国的一位历史家从全世界的角度上考察东学革命的意义时评价说，在朝鲜发生的东学革命，是进入20世纪以来把世界卷入大动乱之中的所有世界性事变的开端。他写道：“如果没有发生朝鲜东学党的革命，就不会有中日两军的战争；如果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打胜

了，俄国就不可能伺机入侵满洲；如果俄国没有入侵满洲，就不会发生俄日战争；如果在俄日战争中俄国没有战败，奥匈帝国就不可能把自己的羽翼扩展到巴尔干半岛；如果奥匈帝国没有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不会发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如果没有发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就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就根本不能设想俄国罗曼诺夫皇帝的垮台，也就看不到红色俄国的诞生了。啊，东学党，你间接地做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你是工农俄国的产婆。”

赞美东学思想的人认为，东方的近代化就是由东学迈出第一步的。

天道教势力在“三·一”人民起义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人民起义的主力军当然是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及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发动这一起义的代表中有基督教徒、佛教徒和天道教徒。最初发起这次起义的是天道教，全国三百万天道教徒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示威斗争。可见在这一反日斗争中天道教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

天道教的这种坚决的反抗精神，就是使我们重视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主要因素之一。

天道教是朝鲜的土著宗教，其宗旨和主张新颖，反抗精神很强，礼仪方式简单，经营方法简便，富有平民性。

共和国内阁第一任邮电相金廷柱常常赞扬东学是朴素的民族宗教。在我们组建抗日游击队的时候，他加入天道教，步步晋升，升到了天道教青年党中央执委。他对天道教的教义造诣很深，知识渊博。

金廷柱是个很有风度的天道教徒。他见到我，很爱说笑话。

“首相同志，您整天办公，该多累呀。现在听我讲个故事，解解乏吧。”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就这样打开话匣子，讲一通故事。有一次，是一个节日，他来看我，对天道教夸赞了半天。

他说：“我们天道教可有一股香喷喷的酱汤味儿哪。”

我问他酱汤味儿是指什么说的，他说只要看看“清水奉奠”就能明白。据他说，天道教举行“清水奉奠”时，对坐势不加限制，既可以盘腿而坐，也可以竖起双膝而坐，又可以撇腿而坐，这种自由在别的宗教里是决不容许的。

解放后，我同金达铉也多次交谈过宗教问题。他常常回忆日寇统治时期在天道教组织里活动时所经历的种种事情。随着交谈次数的增多，我们两人就超越首相和天道教青友党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建立了友情关系。他对我无话不谈，连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也直言不讳。

有一天夜里，过了十二点，他来到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办公楼要求和我面洽。当时我是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可见这是1946年的事情。

深更半夜，没有预先通报就突然来找我，这使我感到很惊疑，甚至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非告诉我不可的非常事故？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讲的不是什么公事，而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拜托。这使我更加吃惊。

他走进我的办公室，一时不好意思开口，踌躇了半天，才拿出勇气说道：

“请原谅我这个老朽言语不知高低。我不揣冒昧地想拜托您一件

事：能不能给我弄一点人参、鹿茸这类补药？”他说罢，又低下头去，不敢直视我，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这位委员长老人怎么了？我这样想着留心一看，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我指着椅子请他坐下来，亲切地问：

“先生常夸身板硬朗，今天怎么突然要起补药来了？”

“老实说，我是因为镇不住老婆才这样啊。不久前，我挑了个年轻女人续了弦，可她欺人太甚。……将军，请帮我一下吧。”

“我会帮助你，叫你夫人再也不敢轻慢你就是了。”

金达铉听罢笑容满面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我弄到人参和鹿茸给他送去了。

一年后，金达铉又来找我说：

“托将军的福，我七十岁抱了个儿子啦。我屋里的高兴得不得了。到我家宝宝出生一百天时，特请将军光临百日宴。”

“真是大喜事啊。世道好，喜事也找上门来了。你的邀请，我欣然接受。请转告你夫人，我祝贺她生了宝宝。”

金达铉这次也笑眯眯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孩子满百日那天，我应邀到了金达铉的家。他的夫人准备了丰盛的筵席，向我鞠躬，说：“托将军的福，我家开出了幸福花。”那天晚上，她乐得总是合不拢嘴，笑盈盈地招待客人。

战争时期，我在慈江道别午见到了金达铉。我们一起吃着冷面，谈起了天道教。

那天，金达铉说，诚米是惟独天道教才有的优越的教规，它是天

道教的主要财政来源。事实上，天道教的历届领导人，除了崔麟等几个人以外，绝大多数都不贪名利，生活过得很俭朴。他们常常为财源不足而苦恼。据说，天道教是不给神职人员发薪金的。不发薪金就办教会，确是不容易。

听说，南朝鲜的天道教徒们有一度把《开辟》杂志社的印刷厂改造成剧院，用办剧院所得的收入充当教会的财政。在中央大教堂里开的两个婚礼场计时收费，也是补充财源的主要手段。尽管这都是于事无大补的事，但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却也是不得不为之的。

我们不顾天道教上层的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重视同天道教徒建立统一战线的又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它的绝大多数教徒是反日爱国的，其阶级成分主要是贫民和穷苦农民。

本来，天道教是从以农民为主的农民运动开始的，其宗旨也是农民性的。当时我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极微弱的阶段，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的工人阶级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东学运动以农民为基础开展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和理所当然的。但是，东学运动并不仅仅是为农民而进行的运动，而是同时代表了城市贫民、小商人等所有穷苦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是坚决排斥和反对外来侵略者，强烈要求国家现代化的全民族的反侵略爱国运动。

"三·一"起义失败后，天道教上层集团丧失斗争精神，只是消极地进行了保持民族性的传教活动和理论活动；有些上层人物，像崔麟这样的人，坐了三年牢，出狱后便堕落成了亲日派。但是，基层的广大教徒群众，不顾上层个别人物的叛变，不顾日寇霸占下的艰苦环

境，仍为继承天道教的爱国传统竭尽了一切努力。这是我们重视同天道教建立统一战线，并确信能够实现的基础。

天道教运动的革新派领导人，为了把这一运动同国内其他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了同国际革命携手合作，东奔西走，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标榜天道教是“贫贱民众的忠仆”，是“规模不同、性质相同的共产党”，希望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25 年 10 月末，李敦化以朝鲜农民社理事会的名义申请加入赤色农民国际，就是其例证之一。

朝鲜农民社是 1925 年 10 月于汉城成立的，是天道教青年党领导的农民组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工农政权诞生，“三・一”人民起义后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天道教青年李敦化、郑道俊、朴来弘等人以研究和宣传天道教教义，发展朝鲜新文化为目的，于 1919 年 9 月创建天道教青年教义讲演部，成立了带有革命色彩的我国第一个青年团体。这一团体不久改名为天道教青年会。青年会建立了自己的言论机构开辟社，1920 年创办了政治时事杂志《开辟》，并设立了少年部，为丰富朝鲜少年儿童的情感，根据人乃天主义提高其伦理上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1923 年，天道教青年会发展成为天道教青年党，它是把实现“后天开辟”，建立“地上天国”作为奋斗目标的天道教的先锋组织。

青年党建立了井然的组织体系，中央有本部，府和郡有地方部，面和洞有基层组织“接”。它提出了党组织发展的三年计划，开展了积极的传教活动，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大批贫贱阶层的青年入党，扩大

了自己的队伍。特别是在未受东学党起事影响的礼成江以北地区，天道教青年党成了影响最大的一支教派势力。

据 1935 年出版的《天道教青年党史》一书称，当时，天道教青年党的地方部在国内外共有一百多个，其中百分之七十在朝鲜北部，占压倒优势，其中尤以平安道最多，有四十个。当时的平安道包括现在的慈江道、平壤市和南浦市。据说当时的平安道，没有一个郡没有天道教青年党的地方部。

天道教势力的绝大多数分布在朝鲜北部地区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当时我们重视同天道教建立统一战线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一”起义后，天道教革新势力也密切配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为扩大自己教派的势力，更积极地开展反日爱国斗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天道教第三代教祖孙秉熙逝世后，天道教少壮派革新势力于 1922 年 7 月组建了高丽革命委员会，努力重整天道教，在以滨海省和伪满洲为中心的海外和国内进行了积极的活动。高丽革命委员会后来改组为地下革命组织——天道教非常革命最高委员会。

在天道教非常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活动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向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发出呼吁，要求给天道教革命活动以政治上的支持，提供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并为其实现进行了积极的活动。据说，他们还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利用西伯利亚赤塔附近的三个金矿区，采取雇佣工人的形式，两年培养一千来名军人，进而组建有十五个混成旅的高丽国民革命军。为实现这一计划，天道教的秘密组织曾呼吁工农苏维埃政府积极提供援助。

1924 年初，天道教革新势力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进行了交涉，有关这一外交活动的历史资料至今还保存在我们的档案库里。

当时，崔东曦在致片山潜的信中先问了共产国际对朝鲜革命和朝鲜事态的发展有何看法，然后要求他们毫无偏见地积极支援朝鲜革命。

据说，天道教还有过这样的计划：在朝鲜一旦发生革命，向东要和日本的社会革命力量携手，向北则要同苏俄和共产国际取得密切的联系，形成朝鲜、日本和俄国三角关系，进行连锁式的活动。

如上所述，天道教革新势力不顾守旧派的阻难和仇视，为同国际革命携手进行武装斗争，作了各方面的努力。

天道教革新势力为了以渊源于东学运动的爱国爱民的热情和对现实的愤懑开展反日斗争，作出了百般努力，但未能取得什么成果。加上，“三·一”起义失败后，天道教内部的激进派和稳健派严重对立以至分裂，日本帝国主义又企图巧妙地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激进派以防止分裂为名，走上了妥协道路，结果，天道教革新势力被阉割了，反日运动逐渐蜕化变质，变成了某种改良运动。在上层集团落入民族改良主义，露骨地表现出亲日的情况下，天道教逐渐丧失了初创时期的革命性。

但是，天道教的一些地方组织及其绝大多数教徒和青年党员，还是继续建立了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缺乏明确的斗争策略，没有统一领导他们进行斗争的领导力量。

正当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白头山，发表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

几百万天道教徒热烈拥护我们的《十大纲领》。他们抱着梦寐以求的启明星将从白头山升起的希望，在祖国光复会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天道教这样赞同我们的统一战线，广泛加入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这是我们根据对天道教的公正评价和充分理解，积极主动地作出了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以爱国爱民、反对外来势力为宗旨的天道教组织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同天道教在思想、宗旨，主义和主张上有一定的差别，在运动的出发点上也不是没有不同之处，但我们从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血统这一大义出发，紧紧地携起手来了。那时候，我深切地意识到，脱离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能存在的，在重视阶级利益的同时，还必须重视民族利益。

正是这种共同性，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同过去站在反共第一线上的崔德新求得了和解。

我和崔德新都过了七十岁才见了面，但是一点也没有夙敌之仇，怀着在崔东旿先生的训导下培养爱国精神的心情，激动地见了面，完全超越共产主义和天道教在宗旨上的差别，作为同一民族、同一血统的人，亲切热情地进行了交谈。

前不久，我发表了可称为《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之后身的《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本世纪30年代，当我们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同朴寅镇携手合作的时候，我们民族至高无上的任务是光复祖国，而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今天，我们民族最高的理想，

是把被分裂的祖国变为统一的祖国。我们消灭外来势力，恢复民族主权的斗争，受到曾高举过“辅国安民”、“斥洋斥倭”旗帜的东学徒天道教人的热烈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祖国的分裂，我们民族经受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种种苦难。这不是由于民族本身的过错而招致的自律性悲剧，而是外来势力强加于我们的他律性灾难。因此，我们怎么能不反对外来势力，大声疾呼民族统一、民族自强和民族大团结呢！

正因为如此，朝鲜的北方和南方以及侨居海外的所有爱国的天道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都在为终止外来势力强加于我们的分裂的悲剧，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进行着斗争。

我们在满洲原野和白头山进行历时二十多年的抗日武装斗争，其目的不是谋求一己的安逸和荣华富贵，维护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全民族。

民族之上不会有神，也不会有什么阶级或党派的利益，只要是为了民族，就没有不可逾越的深渊和壁障。这就是今天朝鲜的北方和南方以及旅居海外的所有朝鲜人的共同意志，是体验越来越深刻的现实。

今天，我仍然这样想，如果实现了为民族奋斗终身的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理想，七千万同胞在统一了的祖国疆土上世世代代过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不正是东学烈士们所盼望的世界——地上天国吗？

作为民族魂而气壮山河的东学的宗旨、天道教的宗旨，是民族的骄傲。天道教的先烈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人民的忠诚精神将在我们民族史上永放光芒。

六　游击队离不开人民

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决不能成为强大的军队，也不能成为战争的胜利者，这是我们在抗日革命时期切身体会到的真理。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日子里，我们一贯主张“鱼离不开水，游击队离不开人民”。把这话概括起来的口号，就是“拥军爱民”，亦即人民拥护军队，军队热爱人民。

我们在白头山打仗的时候，人民是多么积极、忘我地支持和援助了我们，这在前面已经提过。

在古往今来的游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拥军支军热潮，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什么使我国人民成为拥军和支军的主体，从而生死不渝地支持和援助了人民革命军呢？

答案首先应该从我们军队的性质即人民性上寻找。我们人民革命军是由人民的子女组成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军队，是为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人民怎么会不拥护不支援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要军队的组成和使命具有人民性，人民就都誓死拥护和支援它。纵然挂上了“人民”的牌子，如果作风不正、军纪紊乱，那么人民还是不会喜欢这样的军队的。只有真心热爱和尊敬人民，全心全意地维护人民利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坚决拥护和支持。

朝鲜人民革命军具备了这一切品质。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风，其核心是爱民。人民革命军的每个指战员都从人民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认为有人民，才有自己；有人民的幸福，才有自己的幸福。他们为人民的喜悦而喜悦，为人民的悲苦而悲苦，其理由就在这里。因此，脱离了人民，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存在本身就没有了意义，没有了价值。脱离了人民，我们游击队就无法维持其存在。

从开始游击战争之日起，我们就把人民的怀抱当作我们生活的乐土，把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当作我们赖以生存的乳汁。

我们游击队的母体本来就是人民。人民是我们的父母，人民是我国革命的铜墙铁壁。

因此，对我们来说，军民一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军队是否得到人民的热爱和支持，不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曾重视这一点，就会像敌人常说的那样变成“沧海一粟”，被赶来赶去，最后分崩离析的。

我们在进行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深感有必要把可作革命军队行动准则的关于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思想用明文规定下来，于是专门制定并公布了一个《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

制定条例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我们革命军的人民性，把爱民思想法律化，并坚定地保持下去。

人民革命军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它具有不亚于正规军的武力和井

然有序的军事编制，因此单靠指挥员的命令、指示和习惯做法是指挥不了那么多的队员的。

30 年代中期，是敌人在西间岛为防范人民革命军的影响而加紧建立集团部落、倾其全力大搞所谓“匪民分离”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择手段地离间游击队和人民，企图切断人民支援军队的通路这一游击队的生命线。为此，凡是能给人民革命军的形象抹黑以及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封锁革命军的事，他们是无所不为的。

我们的军队是决不搞盗匪行为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是敌军根本无法相比的有道德的军队，这一点敌人也很清楚。但是，他们却诬蔑我们革命军为“盗匪”。这不仅暴露了他们要破坏我军政治、道德威望的本心，而且暴露了他们的奸诈性。

我们把军民一致看作自己的生命线，而敌人则死心塌地策划“匪民分离”。

日本帝国主义甚至把马贼团犯下的罪行也转嫁于我们身上，以图抹杀我们人民革命军的人民性。要恢复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而被颠倒了的革命军形象，并把它提到最高水平，就需要进一步发扬我们军队固有的人民性。要高度地发扬人民性，就要把我们对这方面的要求以明文固定下来。

曾经割据满洲各地的独立军团体在军民关系上，既留下了好的印象，但也留下了不少不好的印象。人民对义兵和独立军有些不好的印象，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军民关系上没有严格遵守应有的道义，给人民摊派了过重的经济负担。有些独立军指挥员——譬如正义府的某中

队长那样——以军费和独立运动捐助金的名目，筹集大量的钱财，毫无顾忌地中饱私囊，用于个人享乐。

日本帝国主义甚至把这类恶行也拿来诽谤和诬蔑我们人民革命军。他们不分独立军和人民革命军，说什么凡是打着独立旗号的都是些抢掠人民财物的强盗。为了洗掉敌人硬抹在我们身上的污垢，我们也需要更明确地规定我们军队的人民性本质。

我们制定暂行条例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同部队里新队员急剧增加的情况有关系的。

朝鲜人民革命军决不打可能使人民受损害的仗。敌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利时就躲进村庄凭依民房进行抵抗；而我们无论情况多么不利，也决不那样做。

1934 年初夏，我们部队在进行罗子沟战斗之前，开到了三道河子村。敌人为了阻止我们部队挺进罗子沟，出动大批兵力向村庄袭来。为了避免村民受苦，我立即命令部队把敌人引诱到三道河子村外，在野地里给予迎头痛击。因为我们这样做，敌有生力量有一半给放跑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止一次地碰到过。

人民革命军即使在村子里暂时落脚，也决不仗着自己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战的军队就居功自傲。他们刚一解下背囊，就给房东挑水、烧火、扫院子、劈柴禾，司令官也不例外。我们经常教育指挥员要身体力行，给队员们作出实际榜样来。

朝鲜人民革命军从它的前身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时起，就把热爱和帮助人民作为队员们的本分和最重要的纪律；可是在我们挺进到白

头山地区的初期，在一些新队员当中却多次发生了损害军民关系的不光彩的事情。

当时，我们部队的新队员有农村青年，有过去的反日部队成员，也有从伪满军哗变过来的士兵。这些出身各异的新队员，起码的训练也没来得及经过，于是就往往出现与革命军传统相违背的行为，损害了部队的威望。

有一次，我们部队暂驻十九道沟六铁炮洞。我在李老人家住宿，李老人让一个来帮他秋收的侄子向我行了礼。这个青年小伙子穿一双新鞋，腿上缠了新裹腿，显然是为秋收做好了准备的。我跟他交谈，谈得很有意思。他能说会道，不管是什么事情，他都能用一两句话就突出它的特征，谈得有声有色。可是，他出去了一会儿回到屋里时，我一看他的新裹腿和新鞋，都变成了旧的，脸上神色也不大好。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支支吾吾地不肯回答。

我指示金正弼排长去具体地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金正弼去了，回来不胜激愤地报告说，有一个从伪满军哗变过来的士兵强迫这个青年换了裹腿和鞋；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却对排长的批评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

“他辩白说，军队为老百姓在山里受苦，老百姓慰劳慰劳军队难道不应该吗？这种事在伪满军里是家常便饭。”

排长的报告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过去，霸占了别国的侵略军头子们允许他们的部下在占领地杀人、抢劫、强奸、掳掠，那确乎是不胜枚举的。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甚至把随军慰安妇带

到战场去。在欺压老百姓方面，伪满军并不比日军逊色。一个曾在那种军队里混惯了的士兵，拿旧鞋换老百姓的新鞋，他自然不以为怪了。但是在我们人民革命军里，却是决不可以放过去的。特别是从爱民这一铁的原则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违纪行为。我只好代表革命军向李老人赔罪说：

“老人家，这事全怪我们没有教育好。请您权且把它只当作不肖儿子的过失，海涵宽恕吧。”

李老人急忙打断我的话，说：

“你这么说，就让我更不安了。常年累月在山里打仗的军队，这么点子事，还有什么宽恕不宽恕的呢。”

从那以后，我们和李老人就更亲密了。我们每到十九道沟，就一定去拜访六铁炮洞的李老人，向他问安。

我们的队员们常到这个村子去做后勤物资工作。有一次还弄来了两只鸡。那时，魏拯民旧病复发，来到我们部队养病，我便指示队员做清炖鸡给他吃了。可过后弄来了鸡的队员却说，鸡主当时怎么也不肯收钱，只好就那样拿来了。我一问是谁家的鸡，原来又是那位李老人家的。这个队员虽有很多后勤工作经验，可是这件事却办得不够妥当。

我带着后勤部队那个队员的排长，去找李老人。那天，老人正在打场，我们帮了老人一阵后，我就叫排长拿出十块钱，对老人说：“没能及时付鸡钱，实在对不起。”当时一只鸡的市价是一元五角左右，两只鸡付三元钱就行了。可是我想补贴一点老人的生活，就格外多给了他些。不成想，这反而惹恼了老人家。

“我要是收了这钱，就不是朝鲜人了。常言说，黄鼠狼也有脸面，我这个老头子难道就不顾体面啦？”

“老人家，还是收下吧。我们不知道那是种鸡，春天要抱小鸡的，结果用了，要是知道的话早就会还给了您的。这不是把您家的生活底子都给拿走了吗？”

我们好说歹说终于把钱塞到老人手里。

这件事勾起了李老人不少思绪，他用衣袖揩了揩眼角，话就打两年前说开了：

有一天，他猎取了一只鹿，卖给了一个有钱人家。不料一群军警听到这个消息，拥到他家来，用枪立逼他交出钱来，否则就枪毙他。没法儿，他只好忍痛把卖鹿的钱全都交给了他们。从那以后，老人一听说军队，就连连摇头。可是，后来他看到我们的同志尊重老百姓，便想为了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所以他一听说我们的同志要想弄到乌鸡，就作为一点心意，把种鸡给了我们的同志。他说那不过是表示一点心意，却收了那么多的钱，心里不安，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当百姓的本分。

听老人这么一说，我们甚至想到是不是太无视了老人家的心意；可是一想到酬谢人民心意的传统纪律，我们是不能白白地领受老人心意的。

有些新队员往往不这样想，他们把人民对革命军的无私支援看作是应当的，便不顾百姓的生活处境，动辄轻率地对待支援物资。

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以举 1936 年秋天在药水洞发生的黄牛事件。

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长白县十九道沟地阳溪的山沟里，由于缺

粮陷入了困境。一天，到药水洞去捡干菜叶子的两个新队员回来了，喜气洋洋地牵来了一头大黄牛。一了解，这头牛原来是当地农民听说游击队员们用干菜汤充饥，特意送给我们的。

两个队员说，起初没肯收下，可是农民们坚持说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硬把缰绳塞在队员的手里，他们只好把牛牵来了。

那边锅里水已经开了。队伍好几天没沾一粒米，不仅是新队员，连老队员和指挥员也都高高兴兴，认为能饱吃一顿好久没吃过的牛肉汤了。我想到队员们将要喝一碗干菜汤当作晚饭时，也很想下令马上把牛宰了。可是，我看到望天哀鸣的大黄牛身上的装饰品，立刻改变了主意。精心制作的牛鼻环、用红布条缠得很漂亮的笼头、黄铜铃和铜钱，这一切都标明牛主人对牛的珍爱之情。于是我把队员们集合起来，对他们轻声说：

“还是把牛还给牛主吧！”

那两个牵牛来的队员愕然了，怔怔地望着我。其他新队员也收敛笑容，现出了很失望的神色。对已经和饥饿搏斗了好多天的他们来说，这道命令实在太意外了。我耐心地劝导了那些新队员：

我们为什么要把牛还给牛主呢？皆因为这头牛是农民的宝贵财产。你们看牛主是多么爱惜他家的牛啊。这个铜铃一定是他家代代相传的。还有那些铜钱，说不定是这家老大娘出嫁时串在小钱包上一辈子爱惜的东西。我们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来表示她们对牛的爱护之情的。我们要把牛还给原主，还因为药水洞农民的很多农活都要靠这头牛来做。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单单因为是人民的诚意，就把牛宰吃了，

那会怎样呢？牛主和常借用这头牛的邻居们，从明天起就得做原来牛做的活儿。原该由牛拉的东西就要由人来背，原来由牛翻耕的地就要由人用镐头和锄头来翻，那会多么辛苦啊。想到这些，我们宰吃了这头牛，心里会舒服吗？你们也大都是贫苦农民的子女，该想想流汗受苦的父母。

听了我的这番话后，牵牛来的两个队员开始感到了内疚，噙着眼泪说他们错了，请求处分。我们没有处分他们，而派他们到药水洞去还了那头牛。

当时，部队收了新队员，我就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使他们受到一定的锻炼，再分配到连或团去。一次收几十名新队员的时候是不好这样做的，可是一次收三四名的时候，哪怕是几天，我总是把他们带在身边。这样，就能了解新队员的家庭情况、觉悟程度、性格和爱好，可以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

1936 年 10 月前后，有十多名木材所工人同时参加了我们部队。我从他们入伍之日起，就把三个年纪最小的队员带在身边。

有一天，他们下了岗，在回来的路上从农民的地里擅自摘来了每人一背囊带皮的玉米。他们说，部队口粮紧张，连我也用大锅清水汤充饥，实在看不下去，所以想摘下玉米来好好招待我一顿。令人惊愕的是他们干了侵犯人民财产的违纪行为，却以为是部下为司令官尽道义。

我理解他们是为司令官着想，但不能领受他们的心意。我对他们说：

“你们的好意，我很感谢，不过今天你们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未经主人许可，就摘来了三背囊玉米，哪里还有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啊!”

有个长得挺结实的小队员代表他们三个说：

“我们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艰苦奋斗的军队，三背囊玉米还能算得了什么。过去，我们村子为独立军甚至捐献了金银。要是有为几穗玉米就产生意见的农民，那他就无异于亲日派了。”

他们各自都说了自己的想法，从态度上根本看不出悔过的意思，而且还摆弄为光复祖国而战的功劳呢。如果不纠正他们这种错误观点，就很难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闯出什么祸来。

我不得不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说服他们，然后命令这三个新队员把摘来的玉米全数拿回去放在农民的地头上，并且让一个连长跟他们到现场去了。

过了好几个钟头也不见他们回来。我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故，便带领传令兵到那个玉米地去了。只见他们把玉米穗放在地头，正坐在那里呆想呢。

我问连长为什么这样都坐在这里。他回答说正在等着这地的主人来。

我环视了一下队员们，他们的眼圈都发红了。我不禁想起了在八道沟小学念书时读过的《三字经》里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本来是善良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人的根本确实是美好的。

回宿营地的路上，我对三个新队员再次强调说，要从今天的事中吸取教训，今后要更加热爱人民；我们要是随随便便地对待人民，人民就会不理睬我们。哪里还有比被人民唾弃更可怕的事呢？对一个干革命的人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失去人民的爱护。如果我们失去了人

民的爱护和支持，那么我们到底依靠谁去作战呢。

那天夜晚，他们直到睡觉连一句话都没说。于是我握住一个年纪最小的队员的手，问他为什么不说一句话，是不是为白天的事想不开？

“不是的。是因为想到我们的军队真是好军队。我再也不做那种事了。”

他泪汪汪地发誓要做一名受人民爱护的好游击队员。

损害革命军形象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军民关系上。

团级以上的指挥员当中产生了这样的倾向：兵员一增多，就不深入下层去进行指导，而只管下达一般性的指示，不大和士兵打成一片。有些指挥员甚至说，现在部属增加到几百人了，军装和食宿都应该按级别有所区别，弄不好，极端军事民主就会滋长起来，无法统率队伍了。

而一些新提拔上来的基层指挥员，则往往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仿佛自己做了什么大官似的。

1936 年秋，我们在长白地区进行活动的部队从十四道沟附近出发向密营方向开始夜行军。出发前，我委派了斥候队，告诉他们行军时应注意的事项，特别强调了决不要吸烟。夜行军吸烟，就等于自行向敌人暴露目标。

当队伍正绕过一个山嘴的时候，忽然从先头部队那边飘来了一股烟味。我想一定是哪个队员趁后尾的司令部看不见的机会抽起烟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把连长们召集起来一了解，出乎意外，吸烟的并不是普通队员，而是两名连长——李斗洙和金泽环。他们老实坦白带头违反了夜行军禁止吸烟的指示。平时，他们不管做什么事，

必先卷起烟来叼在嘴上，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我严肃地告诫他们说：

“今天在这里，我不想冗长地向你们谈禁止吸烟的必要性。如果昨夜敌人发现了你们吸烟的火光或闻到了烟味，向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那部队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进行的抗日战争，可以说是在意志和纪律上的较量，是要解放自己祖国的革命意志同要将永久强占别国合法化的侵略野心之间的尖锐对抗。在这一对抗中，我们连战连胜，正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和纪律比敌人的意志和纪律强，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比敌人优越。不过，要是在我们的队伍中经常出现像你们这样意志薄弱的人，那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意志薄弱的军人，纪律松懈的军队，在战斗中是必然要失败的。你们或者以为自己是特别爱吸烟的人，其实爱吸烟的人在普通队员中也多得很。你们想吸烟的时候，他们也想吸烟。可是昨夜行军普通队员中却没有一个吸烟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们在搞特殊。在严守纪律上不能有什么特殊，可你们却搞了特殊。如果容许这样做，那就等于容许指挥员享有特权了。我们根本不承认特权。如果承认了特权，下级就不相信上级，势必有害于官兵一致和拥干爱兵。你们说，你们的错误严重不严重？”

李斗洙和金泽环说，他们的错误确实严重，甘心接受任何处分。

“当然可以给你们处分，不过，那是一种简单的方法。我衷心劝告你们不要重犯这种错误。你们就把这一劝告当作处分吧。”

那天，我给了李斗洙一项任务，要他做“禁烟团团长”。

就在这个时期，团政委金平的传令兵提出了极端的、无纪律的上

下平等主张，搅混了部队内的空气。这个名叫许范俊的传令兵有了点年纪，参加武装斗争也较早，是个老队员。他原先是我的传令兵，金平说他动作太迟缓，不适于做司令部的传令兵，便把他调了个个儿，派自己的传令兵李权行到司令部来接替了他。

许范俊被调到金平所属部队后，有时跟指挥员顶嘴，惹起是非。据说，派给他联络任务，有时就不老实接受，出言不逊。指挥员们忍无可忍，向上级汇报了他的问题。这种问题如果放任不管，上下之间的友爱就会出现裂痕，拥干风气就有可能逆转，所以我们讲明道理，批评了许范俊。

正是充分考虑到上述几个理由和我们人民革命军的新发展，我们才下决心制定并公布《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记得那时候，金周贤说这是部队挺进到白头山后的第一个新年，决不能马马虎虎，便东奔西走忙着办年货，所以该是 1936 年底的事。金平拟出草案交给了我。我觉得有些不足，于是重新拟定了十五个条款，因为还有待补充、完善，所以命名为暂行条例。

《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详细地规定了我们革命军的性质、使命和指战员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

我们在这个条例中特别注意的是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问题。这一点只要看看其每个条款都强调我们革命军的人民性就很清楚了。

“本军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这是条例的第一条。

在规定我们人民革命军的组织原则的第二条中，也阐明了我军是由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真正朝鲜人民的革命军队。

阐明军民关系的条款指出：

“本军把‘鱼离不开水’这一真理铭记在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军民团结一致，为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关于官兵一致的条款为：

“本军的指挥员和士兵本着拥干爱兵、官兵一致的精神，自觉地遵守纪律，保持优良作风。”

暂行条例中还有这样的条款：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用作抗日战争的经费，并用其一部分来救济贫苦人民；与愿意同朝鲜人民革命军协同作战的部队和同情本军的国家及人民建立联合战线。

暂行条例还规定了人民革命军的军事编制、司令部任免各级指挥员的权限、入伍条件、入伍及退伍手续、处分的范围等。

此外，暂行条例还规定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旗、徽章和帽徽。

暂行条例的宗旨是明确的。那就是丝毫也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军民拧成一股绳，官兵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便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人民渴望的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

贯穿暂行条例的基本精神是爱。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爱人民、爱士兵、爱指挥员作为铁的原则。

据我的亲身体验，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是指思想感情的一致性，

它是不可能单靠什么原则、什么规定而实现的。要实现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军队和人民、指挥员和士兵、上级和下级之间就要有互相爱护的情义。从心底里互相爱护，互相亲近，互相尊重，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义，才能成为把思想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强力粘合剂。

这么看来，《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不是为监督和管制人而制定的规则或法律文件，而可以说是以火热的情义把军队和人民、指挥员和士兵联结起来的爱的法典、爱的宪章。

我们公布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后，让所有指挥员和士兵都切实遵守了这个条例，于是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就更加紧密，成为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我们的指挥员和队员，哪怕有饿死冻死之虞，也决不随便侵占人民的财物。偶因不得已，在无法征得居民同意的情况下挖走几个土豆，就把道歉的信和多于市价几倍的钱，裹好了留在地头或土豆窖里。

朝鲜人民革命军一开进村庄，首先想到的是帮助老百姓，根本没想受人们的招待。我至今难忘我们部队驻在长白县二十道沟某村时的事情。

我那时也住在村里最穷的一家小草房里。这家年过六旬的老夫妻抚养着一个小孙子，爱之如命。他们说儿子放木排时死于非命，儿媳妇也闹伤寒病死去。因家中没有青壮劳力，草房多年失修，以致屋顶腐朽漏雨，土廊台坍塌，乱糟糟的不像个人住的地方。第一天，我带着传令兵到村后的山上去打来十来捆狗尾草，新苫了屋顶，土廊台也给他们修好了。

到了深夜，忽然从鸡窝传来了鸡扑打翅膀的声音。我怕是黄鼠狼来叼鸡，赶忙探出头去往外看，只见房东老两口正打着松明在捉鸡窝里的鸡。我问老人为什么深夜捉鸡，他回答说有紧要的用场。他家鸡窝里只有三只鸡，白天我们曾听到过母鸡下蛋的叫声，这时他捉了两只，一只是公鸡，另一只是肥胖的母鸡。接着，房东老人又用绳子绑了鸡腿，把母鸡扔进厨房里，把公鸡夹在腋下走出了柴门。不知有什么事，老大娘也跟他出去了。过了两三个小时，仍不见他们回来。

我睡意全消，一直坐在土廊台上等他们回来。天快亮的时候，才见他们回到家来。那只公鸡仍在老人的腋下，而老人的神色显得非常沮丧。

"老人家，您怎么才回来，到哪儿去来？"

老人把公鸡放在廊台上说：

"别说了。全村五十来户人家我都去过了。"

我着实纳闷，便问二位老人家有什么事这样通宵奔波。

"听说你们队长就是金日成，我连夜找他的住处，可哪里都没有找到，只好这样回来了。"

"您为什么要找他的住处呀？"

"我是想把你们昨天的辛苦报给队长，我们老两口向他施个大礼。你们给我家帮了大忙，我们怎么能不表表心意呢。一只鸡值不得提，可我们还是想用来招待队长的，可是……"

老人首先去找的是上村的一个地主家。他以为队长嘛，理应住进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他接着去找了村里第二个大房子，那是二地主的家。然后，又挨家挨户找遍了全村五十来家。老人谈了深夜打门的

经过，说全村人都瞧不起他这个无依无靠的穷老头子。

“倒也是，我们老两口这个熊相，怎么好意思见队长啊。可是他们也太过分了，有的人还拿我开心，说队长不就住在你家吗，怎么到这儿来找呀。”老人说着望了望我，“我说，你们的队长究竟住在哪一家？”

看来，房东老人找遍全村回来后，还是根本没想到他要找的人就住在他家里。我看到房东老人那么着急，便把我的身分照实告诉了他。

可是他却不相信我的话，说根本不可能有那回事。

老人说：“过去独立军来往这个村子的时候，一个中队长就住进村子里最大的房子，宰牛喝酒，可你们的队长怎么能住进这样龌龊不堪的小草房呀。再说，队长大人怎么能给人家苫屋顶，修土廊台，喝高粱米粥喝得那么香呢？”他气恼地说，“你也一定是瞧不起我们，隐瞒队长的住处。”

第二天听了传令兵的话，老人才相信了事实。我们费好大口舌才劝止了他们，离开了村子。

这类事我们也遇到过不止一次。

《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在巩固军民关系方面，确实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在队伍内没有培养热爱人民、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么，在那人民革命军的命运和我们的生存时刻受威胁的严峻考验的日子里，我们也许经不起重重的困难，把革命中途而废了。

《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公布后，我们革命军的官兵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们的指挥员都习惯于和队员们同甘苦共患难了。队员们喝粥，指挥员也喝粥；队员们在雪地上铺一层落叶睡觉，指挥员也那样做。

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从司令官到排长——都彻底反对吃“小灶”。

“大灶”、“小灶”，本来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里产生的。在国民党军队里一当上军官，就不吃普通士兵吃的大锅饭，而另起小灶吃特供的饮食，这被看做是应当的事。而严格区分上下，绝对优待上级，绝对薄待下级，这在日军里尤其突出。在日军里，只要当上伍长，就可以任意对下级士兵施加舔脚板、舐皮鞋等野蛮的体罚和处分。

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却从没有允许吃“小灶”。有了“小灶”，就要出现受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这种特殊阶层和吃大锅饭的广大队员之间就势必产生裂缝。口头上侈谈人人平等，而在伙食上却设置区别助长不平等，那么有谁会拥护和跟随这样的伪善者呢。

我们严格遵守了这样的原则：所有指挥员，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在何时何地处于何种情况，一律和普通队员同吃一锅饭。全体人员同吃一锅饭，这成了决不许违反的人民革命军的军纪和伙食制度。

吃、穿、住大家都一样，所以有义务照料队员的指挥员，实际上往往反而比队员吃得少、穿得差，住处也不如队员好。

我们现在仍反对吃“小灶”。还在很早以前，有个时候首都和地方的不少饭馆另开辟个小房间，干部来了就在这里加以特别招待。尽管中央多次指示不要搞小房间，但是服务行业的人却顽固地搞了“小灶”。这就招致了在缺乏人民性的干部中助长特殊化的后果。有些干

部，当下级人员把他们请到小房间或贵宾室去时，竟把这看作是应当的，想受到特殊待遇。我们不赞成“小灶”。因为如果留着“小灶”，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歪风邪气。“小灶”里只会出资本主义思想，如果照旧保留，党和人民之间就会产生裂痕，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有可能动摇。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坚如磐石，也同我们党没有官僚化、我们没有允许“小灶”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朝鲜劳动党制定并实施的一切政策，都是以人民性为基础的。人民性是决定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因素。我们通过亲身体验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把人民性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党和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效劳，不仅不是人道主义，而且是反人民性的露骨表现。

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良好的军民关系、同志关系和上下关系。那里只存在高压、欺骗、纠纷、对抗、盲从和迷信。可悲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就是在士兵之间也找

不到互相爱护的人类美好天性。

“要先吃掉，我不吃你，你就会吃我。”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中军官对士兵灌输的人生哲学。根据这一哲学，除“我”以外的一切的存在，都是敌人和捕食的对象。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新几内亚战线的日军士兵断了粮，就杀人吃了人肉。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里，今天也在军人中推行“你吃我，我吃你”这种野兽式的生存方式。

在实行《朝鲜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巩固的

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传统，今天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更加全面地得到继承和发扬。

我们的人民军军人把爱护和帮助人民当作最大的喜悦。今天，军队帮助人民，人民支援军队，这是在我国到处可见的普遍现象。

正如在报纸和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我国的许多姑娘自愿找上门去做荣誉军人的眼睛和手脚。我看着这些日益盛开的军民一致之花，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人民军里，官兵一致的传统也更加巩固了。

今天，我们人民军指挥员们像爱护自己的子女和亲兄弟一样爱护士兵。献出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战士的英雄指挥员也很多。战士们把连长叫做大哥，把政治指导员叫做大姐。我们人民军的基本战斗单位——连队中的上下关系就是这种血肉关系。

我们国家有着可以向全世界夸耀的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军民一致、官兵一致。

这一强有力的武器，用任何军事科学和技术也制造不出来，只有真正的爱才能造得出来。

七　良民保证书

我们派金正淑到桃泉里去，是在 1937 年 3 月西岗会议前夕。

那年，各地组织都向我们伸手要人。李悌淳、朴达、权永璧、金在水等也都要人。我们派金正淑到桃泉里去，是对这种要求的一个回答。

如果说把李悌淳的新兴村和朴达的大坑村连接起来的地下工作线，是在咸镜北道全境和咸镜南道东部地区扩大我们的地下组织网的通路，那么，把桃泉里和新坡连接起来的地下工作线，就可以说是向咸镜南道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向国内腹地扩大我们的组织网的通路。桃泉里地处长白县下岗区的中心位置，无论在下岗区一带和包括临江县在内的南满广大地区扩大祖国光复会网方面，还是同这些网取得联系方面，都可以作为中心据点。

桃泉里对岸的新坡，是便于同我国工人大军集中的兴南工业区取得联系的地方，是向东海岸南部地区和国内腹地扩大地下组织网的踏板。

我们所以特别重视新坡，是因为我们发现它具有比较容易地开辟国内地下工作线通路的可能性。

张海友(张孝翼)就在新坡。有些找到我们密营来的人说，张海友坐牢后好像堕落成了一个小市民。这不过是那些不大知道新坡地下工作内情的人主观的判断而已。我已通过权永璧的汇报，知道张海友没

有堕落成小市民，而正在进行革命斗争，他已和金在水取得了联系。

张海友本是深受独立运动者宠爱的人。过去他和我父亲有密切的联系，经常来往于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和流亡者集结的苏联滨海省。他一来我家，都要在我家住一两夜。我至今难忘，每当这时，我父亲就和他同桌进餐，请他喝杯酒的情景。

我听说过他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曾因牵连独立运动案而被捕坐了牢，可是不知道他被判的刑期，也不知道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者转向共产主义运动者的经过。解放后，我才得知他的原刑期是七年，由于昭和天皇即位日施行“恩赦”，只坐了两年牢就被释放了。

不管怎么说，富有革命运动经验，且在私人交情上也和我很亲近的张海友在新坡，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是个很好的兆头。据后来通过桃泉里的地下组织了解，他只是脾气变得有点别扭，内心则依然如故。只要和张海友沟通了，就能开辟有效的国内通路。

派谁去做张海友的工作？派谁去才能较容易地开辟这条大有希望的国内通路呢？

为了选拔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我和金平都动过不少脑筋。七团政委金平，兼管派政治工作员的秘密工作。

有个雪糁降落的夜晚，我把金平叫到宿营地的篝火旁。当时，我们翻越多谷岭正朝着抚松县杨木顶子密营北上。由于连续不断的交战和冰天雪地上的行军，金平瘦长的脸显得更加消瘦。

“选定了开辟新坡通路的人没有？”

我重提了几天前提过的问题。那天，金平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

答，可是，这次看他的表情好像满有把握似的，他说：

“选好啦。我看，黑正淑最合适。”

他的回答，使我微微一愣。因为他选的和我想的，不谋而合。

“黑正淑”是指金正淑说的。当时，我们部队里有三个名叫正淑的女队员：张正淑、朴正淑和金正淑。有人喊“正淑同志”，常常三个正淑同时回答。这往往引起人们愉快的笑声，但在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不方便之处，还容易引起一些混乱。于是战友们就把三个正淑分别叫做“呼呼正淑”、“蓝正淑”和“黑正淑”。

“呼呼正淑”是张正淑的外号。她干活、行军，总是气喘吁吁的，战友们便抓她这个特点给她起了这个外号。有些抗日战士回忆说她得这个外号，是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虎虎有生气。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有理。给朴正淑起了“蓝正淑”的外号，是因为她入伍时穿着蓝色裙子。金正淑的外号也是因为她在游击区时直到参军，只穿着仅有的一条黑色裙子。

我想知道金平选定金正淑的理由，便委婉地表示疑问说：

“她能担负起开拓新坡的重任吗？”

“我在延吉县八道沟做党务工作的时候，正淑在我的领导下做了共青同盟工作。无论做什么事，她都一丝不苟。再说，她还有做女兵连政治工作的经验。就是不知她本人的意愿如何……”

对金平的看法，我也有同感。但直到那时，我并不是完全了解金正淑的为人的。她到我们部队来只有一年时间。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过了亡国民的生活，又经过互不相同的途径投入了革命斗争。

我第一次听到金正淑的名字，是在小汪清马村的时候。一群小演艺队员从王隅沟北洞来到汪清。他们像麻雀一样喋喋不休的谈笑中不时地提到尹丙道和金正淑。这群蝴蝶般的孩子们对自己的儿童团辅导员十分信赖，非常喜欢。

在那以后，由延吉县儿童局长调任汪清县儿童局长的李顺姬，常常回忆起金正淑。尹丙道也时而谈起她。无论到哪个村子，都能遇到一两个叫“正淑”这个名字的姑娘，这个很常见的名字就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把众人对金正淑的说法综合起来，就可以知道她是个胆大无畏、坚忍不拔，而又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姑娘。我在汪清的时候，对金正淑所了解的大体就是这些。

延吉县儿童团演艺队来到汪清时，我给他们送去四十条红领巾作为礼物。听说，那时任八区共青同盟委员兼县儿童团演艺队负责人的金正淑收到这些礼物，深为感激。

在马鞍山密营的四连成员中，金正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左倾分子随便扣上“民生团”帽子的人。但是左倾分子们硬把她分配到“民生团”嫌疑分子的连队去了。我认为，他们的居心是：你也是朝鲜人，管你有无嫌疑，应当和犯了“罪”的朝鲜人在一起。

金正淑却欣然接受了这个令人不快的做法。她决心要和那些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的战友们同生死共命运。她和“民生团”嫌疑分子在同一个兵营里食宿，却从不以此为耻。

我通过后来的生活才了解到，这个外貌平凡、身材矮小的普通女队员受全连爱戴的理由。

金正淑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为别人可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金正淑，就是她的人生。她总是为别人牺牲自己。分到一点吃的，就又分出一些给比她身体魁梧或年纪小的队员。吃正淑的饭吃得最多的，可能就是四连一排的鬈发小队员，他在家时是正淑的弟弟基松的小伙伴。夜阑人静的时候，金正淑还为男队员们缝补军服和鞋。

为同志和共同事业献身的精神，这就是金正淑性格的核心，又是她的为人的魅力。

我从来自延吉的林春秋、金正弼、朴洙环等队员那里多次听到这样一件事：当反“民生团”妖风席卷全东满的时候，有个小姑娘每天偷偷地给在能芝营被关在牢里受苦的“民生团”嫌疑分子送进食物，多亏这个小姑娘，那些冤枉的受难者才免于饿死。这小姑娘就是金正淑。如果给“民生团”嫌疑分子送吃的事实被发觉，她也难免被扣上“民生团”帽子。

我初次见到金正淑是在三道湾游击区，但详细地听到她的经历和她的苦难家史是 1936 年春在漫江。有一天，我写好在东岗会议上要作的报告，以轻松的心情巡视岗哨，走到了江边。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勾起乡愁的清脆歌声，我寻声向上游走去，只见有两个女队员在柳树丛中正在用水冲刚洗过的衣服。其中的一个就是金正淑。

那天，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金正淑的家乡是咸镜北道会宁，在她五岁或是六岁那年，她们全家离开家乡迁到了满洲。

会宁人们夸耀她们的家乡为咸北之名胜。这个曾以六镇之一而闻名的要冲，在抗日革命时期，却作为日军罗南十九师团七十五联队队

部和飞行队驻扎的军事要冲，标记在我们的作战地图上。

今天会宁人为他们的家乡出了罗云奎这样的影坛才子和赵基天[26]这样的著名诗人而感到骄傲。他们自豪地说他们的家乡是有名的白杏产地。人们在百花盛开的春天访问会宁，就能饱览整个城镇掩映在白杏花丛中的美景。

可是，金正淑在这样风光宜人的家乡只生活了几年。当她开始懂事的时候，映入她眼帘的却是马贼到处横行的北间岛荒凉的山野。

金正淑的父母兄弟姊妹，相继离开了她的身边。她的父亲是位独立运动者，曾被敌人逮捕受过严刑拷打，加上长期风餐露宿，受了严重的冻伤，终于酿成重病，早年与世长辞了。临终，他叫心爱的小女儿正淑打开窗户，眨巴着泪水湿润的糜烂的眼睛，眺望着南方天空，说：

“我死，也想死在朝鲜，即使变成一把泥土，也想变成朝鲜的泥土。可是，看来这个心愿也无法实现了。你无论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不要忘记我们朝鲜。要为朝鲜顽强奋斗啊！”

金正淑十四岁那年，把整个间岛变成血海的侵略者闯进她住的符岩洞，烧毁了村庄，残酷地杀害了她的母亲和嫂子。

嫂子给她留下的只有还不会迈步的婴儿。从此她开始为侄子讨奶。她抱着哭个不停的侄子挨家挨户讨奶，为讨奶，有时甚至要到十多里外的邻村去。

后来，金正淑也不得不同这样苦心抚育的侄子告别了。她要到游击区去的时候，接受了地下工作任务拟往八道沟矿山的哥哥金基俊硬把孩子从她的怀抱里夺去了。金正淑原本想把孩子带到游击区去的，

可是她哥哥怎么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因此只好把启程推迟了一天。

第二天凌晨，“讨伐队’突然闯进了村子。枪声一响，她不顾一切地抱起侄子就往山上跑，想径直奔向游击区。可是她哥哥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责备她说，你的革命觉悟还不高，要干革命，就得首先为革命着想，只为自家人操心怎么能干革命，孩子你就别担心了。

哥哥抱着哭叫的孩子，头也不回地往山沟跑下去。他嘴上说得硬，可是抑制不住涌出的泪水，怎么也不忍心回头看妹妹一眼。这竟成了他们兄妹的永别。

在那以后，金正淑再也没能见到哥哥和侄子。哥哥在矿山做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在严刑拷打下牺牲；侄子却下落不明，成了消逝在云雾中的小鸟。她身边仅有的骨肉基松弟也在符岩洞为了掩护向三道湾游击区转移的藏财村人民，吹号引诱敌“讨伐队”时中弹牺牲了。

金正淑在解放后也常噙着眼泪怀念弟弟。而在街上看到十多岁的孩子，就暗自叹气说，我那侄儿还活着，也该有那么大了。

同金平谈话后，我把金正淑叫到司令部来。

“金在水同志通过通信员多次要我们再给他们派些善于做地下工作的人。他虽是个精明强干、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人，可是他管辖的地方很大，看来有不少困难。他特别为妇女工作搞不上去，而十分着急。要吸收妇女参加地下组织，就要做好控制着她们的老年人的工作，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你要以桃泉里为据点，领导下岗区的妇女工作，同时还要积极帮助金在水同志工作。

“把下岗区的工作搞上去后，就要渡江到新坡去同张海友携起手

来，在三水地区建立强有力的地下组织网。还要在兴南、咸兴、北青、端川、城津、元山等东海岸地区的工业城市和农渔村迅速地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网。

“到国内去开展秘密结社活动，这比在人民革命军保护下在长白进行群众工作，要危险得多，也困难得多。你要特别留神，把工作做好。

“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碰到困难，就要依靠同志，依靠人民。”

这是我派金正淑去桃泉里时，对她说的一段话。

桃泉里已经从1936年夏末起就有了我们的工作线。据郑东哲说，当柏林奥运会的消息传到桃泉里山村的时候，有个叫金远达的陌生“赌徒”出现在下岗区，在年轻人中煽动赌博。他对赌徒们说的话，主要是奥运会马拉松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是朝鲜人，可是在发奖时旗杆上升起的却是膏药旗。

这个身材矮小，聪明敏捷的年轻“赌徒”，就是我们派去的政治工作员金在水装扮的。过去他有着像惊险小说情节似的那种特殊的斗争经历。

王隅沟苏维埃首任会长、延吉县党委书记、东满特委组织部长……这就是他在30年代前半期的主要经历。

然而，却发生了险些把他一帆风顺的人生航程打乱的一场风波。东满特委转移到罗子沟去的时候，他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被敌人逮捕拉到宪兵队去了。敌人强迫金在水和朱明写转向书，要他们当帮凶，并交给了这样的任务：

你们不要向任何人说被我们逮捕过的事，而要继续做特委的工作，

也要继续建立革命组织。对此，我们将一律不管。只要你们经常地向我们提供新吸收的组织成员名单就行了。

敌人以为终于使特委级干部转了向而兴高采烈。可是，金在水是为了重新干革命，假转向，假宣誓的。他夺取了敌人的秘密文件和工作经费找到东满特委去如实地汇报了事情的始末。晚些来找特委的朱明却按敌人的指示欺骗了组织。为此，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金在水得到了宽恕，可是被开除了党籍。他不仅失去了政治生命，在道德上也被埋葬了。他一朝失去了一切，被逐出斗争队伍，单身蛰居山沟，后悔自己生不如死的假转向，过着烦闷的日子。

在革命队伍里，把处在任何逆境中都坚守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和意志，保持精神道德上的纯洁性，当作最大的荣誉，最高尚的美德。在革命者的心目中，假转向也被公认为不能容许的罪恶行为。这是因为即使是假转向也会给敌人提供进行反动宣传的条件，给真叛徒提供叛变的先例和辩白的余地。就是革命者的良心和节操没有变，但在敌人面前宣布转向，却是不值得赞扬的。

金在水天真地认为只要瞒过敌人活下来继续干革命就行了，然而却违背了革命者的崇高道德规范。他在烦闷中听到我们在马鞍山焚毁“民生团”嫌疑文件，完全取消了一百多人的“犯罪”嫌疑的消息，便找我来说，愿意通过实际斗争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时，金在水捶着自己的胸脯倾吐苦衷说：

“处决还是饶命，这就随您的意吧。不过，我是愿意干革命的，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

我相信了金在水。我交给他地下工作任务，把他派到下岗区去了。我们深信他不会再给自己的历史留下污点。他在组织面前老实坦白，就是他具有革命良心的明证。我相信了他的这种良心。金在水因一时没想通，犯了假转向的错误，可是他既然认识到和体验到那是多么不光彩的罪恶，就会宁死不再选择可耻的道路的。

金在水用假名字经由天上水进入了桃泉里。起初，他为了解李用述介绍说是可靠人物的郑东哲、金斗元、金赫哲(金秉极)等人，而摆开了赌场。论赌博，下岗区一带没有人能胜过他。他打牌时总是要戴上套袖，手疾眼快地摆弄纸牌，巧妙地骗过人。出了九分或双十，他还洋洋得意地哼起《渔郎谣》来。

不知内情的老年人们叫苦说，那个叫什么金远达的二流子把年轻人都给教坏了。可是在他们叫苦不迭的时候，在赌场上却成立了革命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成为祖国光复会长白县下岗区委员会的骨干组织。由于金在水的积极活动，截至 1937 年初，以桃泉里为中心的下岗区几乎所有的村子都成立了祖国光复会组织，后来还组织了生产游击队。

被派到桃泉里去的金正淑首次同金在水接头的地方，就是李用述的家。天上水的人们管他家叫“安谷家”。他家是八兄妹同堂的少有的大家庭。就在这家里成立了祖国光复会天上水支会。这家的老四李用述担任了支会长。

我们得到过这家的很多帮助。我们的许多同志出去做地方工作的时候，每次都到他家来添了不少麻烦。从 1936 年末到 1937 年夏，我先后三次去过他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家靠种

火田勉强糊口度日，可是他家人都心地善良厚道。

李用述的大哥受金在水的托付，给我们刻了两个部队公章。这些公章我们用了很长时间。

金正淑在“安谷家”住了半个来月，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一面帮助支会工作，一面准备做地下工作。

金正淑用严玉顺的名字，假装成从茂山搬来的移民到了桃泉里。

紫色短袄、藏青色华达呢裙子、长筒布袜，这就是“茂山家谢媛吉”严玉顺同桃泉里人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装束。成镜道人称年轻女人为“谢媛吉”。

桃泉里是离新坡对岸有三十里左右的一个山村。据在桃泉里土生土长过了二十多年的魏仁灿说，第一个开拓了这个地方的是在“韩日合并”后从朝鲜迁来的独立运动者们。

直到 30 年代初，桃泉里还在独立军的势力范围内。后来，在国内参加过农民组合运动的先觉们集体地流亡到这里之后，在桃泉里一带共产主义思潮就占了优势。从 1936 年下半年起，人民革命军小分队经常出入这一地区，给人民灌输了革命思想。桃泉里及其周边布满了祖国光复会组织网。

由于人民革命军来往频繁，游击队在桃泉里及其附近连战连胜，这一地区的人民声势大振，斗争热情沸腾。而敌人却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敌人恐惧状况。

桃泉里学校前面有一股泉水，水凉得炎夏喝也觉得冰牙。日本警

察听到这个泉水特别好，为了查明其原因，称了称这里泉水的重量，发现比别地的水重，便说：

“怪不得桃泉里的小子们眼睛乌溜溜的，都是些游击队小子。”

区长郑东哲听说日本警察要填平这股泉水，便向警察说：

“这水是过往的游击队喝的。他们知道了泉水被填埋，不会向你们追究责任吗？”

于是，敌人就没敢填平这股泉水。

总之，桃泉里是群众基础好、革命力量很强的地方。

金正淑白天忙着干农活儿，晚上就挨户串门认识村里的人，然后记他们的名字，记哪家是北青家、甲山家、兴南家等等。据她后来说，她在一个星期内，把村民的名字和哪家叫什么家全都记住了。金正淑把这平凡的事看做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第一道工序。

“教师担任了一个班级，首先就按点名册记学生的名字，不是吗？这样，才能深入到学生中去嘛。我想政治工作员和教师没有太大的不同。不认识名字，还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吗。”

这是她结束桃泉里的工作后回来向金平说的话。

金正淑遵照司令部的指示把工作中心放在妇女工作上，积极地和她们接触。直到那时，桃泉里还没有妇女的组织。大多数妇女只埋没在家务事里，没见过世面。加上老人们对她们的管束也非常严。间或有些妇女到夜校门前探头，想念点书，老人们就大叫大嚷，好像出了什么祸事似的。

金正淑断定在桃泉里加速妇女革命化的关键，是做好老年人的工

作。老年人比起感受性锐敏的青年，在各方面都保守，他们只是哀叹命苦，却根本不去想开拓自己的命运。不使老年人觉醒起来，就做不好把年轻一代组织起来的工作。金正淑为老年人和妇女的问题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在吉林、孤榆树和五家子一带的工作经验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在进行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边托洛茨基”老人是个暗礁。不说服这位老人，就无法实现五家子革命化，无法建立起组织来。我们争取了“边托洛茨基”老人之后，才在那里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孤榆树的玄河竹也曾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对象。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每到孤榆树，都先到他家去问安，转达母亲的问候。

金正淑本来具有尊敬老人的品性。听了她在桃泉里做老年人工作的经验，我感到很自然，没有感到她的工作是有意做作的，而是很自然的感情流露。

金正淑对待人，没有把他们作为工作对象或教育对象对待，而是作为普通人来对待。就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要同争取的人交往，她也没有把对方放在被教育者的位置上或者把自己放在教育者的位置上，而是像亲密的邻居一样平等相待。在这过程中，她就受到人民信任，成了人民的女儿和亲密邻居。这就是金正淑作为地下工作员的重要特点。

我也通过一生的实践切身地体会到，要深入人民群众，首先就要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子女、人民的忠仆和人民的朋友，同时要把人民看

作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和自己的老师。如果以人民的老师、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和统治人民的领导者自居，就不可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也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人民是不会给这种人敞开大门的。

金正淑就是过路时在哪家暂时歇脚，也决不坐在哪里歇一会儿就走，总是帮那家劈柴、打水或舂米。她对村民的赤忱，真可以说让石头也能开出花来。在这过程中，老人们也开始非常愿意亲近她了。桃泉里革命化的突破口就是这样被打开了。

有一次，刘哥洞的一家地主把患了热病的做饭丫鬟扔到山中草棚去了。可是，谁也不敢去照料那个可怜的女孩子。金正淑得知后，毫无顾忌地到那个草棚去和她同吃同住，精心护理。

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有的赶到草棚去劝阻她说，为一个没有得救希望的孩子冒这份险值得吗？万一被传染上，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司令部交给的重大任务该怎么办，谁负这个责任？就是护理她，也千万不能和她同吃同住。

金正淑笑着安慰他们，说：

“你们放心回去吧。因为怕死，连个孩子都救不活，那怎么能光复祖国，拯救人民呢？我的命是为拯救人民豁出来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人们终没能劝金正淑离开草棚。

金正淑终于救活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桃泉里的人们开始称金正淑为“我们的玉顺”了。他们家里有了一条腌青花鱼也请“我们的玉顺”，给孩子办百日也先请“我们的玉顺”来。金正淑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了不可缺少的女儿、孙女和姐姐。

金正淑在无微不至地关照村民生活的同时，还对为加速下岗区革命化东奔西走的金在水的安全予以深切的关注。那年 2 月，金在水给祖国光复会各组织分发我们在山里发下去的《三·一月刊》，身上只剩下最后一份时，被敌人发现了。他被抓到警察署去，当时他装成目不识丁的傻子，缠着敌人说：

“这书是上山打柴时捡的，我想用它卷烟抽，你们干吗抢去？快还给我。”

敌人认为他可能是傻子，便放了他，可是在背后继续查他的身分。

金在水曾以金远达的假名字来往于下岗区一带，后来把住处迁到桃泉里本村的李孝俊家，为了装成李孝俊的堂兄，改用了李永俊这个假名。

金正淑和金在水研究了一下叫敌人不再暗地调查的有效办法，最后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敌人证明李永俊是白痴。第二天，按他们编的脚本，李孝俊家发生了一场轰动全村的风波。

李孝俊的年轻妻子竟用棒槌捶打寄居在她家的光棍“大伯子”李永俊，把他撵出了家。她大哭大闹，说傻大伯子老把家什偷去赌博，让她家变成了穷光蛋。

正当妻子在家大闹的时候，李孝俊跑到警察署去告发说，因为我那只会赌钱的傻堂兄，我快要倾家荡产了，并哀求他们务必从户口上勾掉堂兄的名字，把他撵走。

这边那“傻大伯子”却又带着一本《三·一月刊》，大摇大摆地到警察署去求情说：“老爷，这是你们喜欢的书，我白送给你们，求

你们千万不要让我那孝俊弟和弟媳打我、撵我。”

警察看到《三·一月刊》，瞪圆了眼睛，问他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金在水回答说，在过去游击队和日军交火的三浦洞战场捡到的，并说：

“那天你们抢去的那本书，其实也是在那里捡的，那天我撒谎说，是在我们村的胞胎山上捡的。”

警察吹胡子瞪眼地大发雷霆，金在水却从衣兜里掏出一只怀表傻笑着说：

“那儿，满地是怀表、自来水笔、钱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要是把那个地方说出来，那些东西不就全都落入别人手里了吗？只要老爷们不许我堂弟把我撵走，我就把那个宝地告诉老爷们。”

单凭这一点，警官们就相信李永俊的确是白痴了。

据说，从那以后，敌人就停止了对他的暗地调查。

郑东哲、柳荣灿、金赫哲、李哲洙等桃泉里的先觉和革命群众，为金正淑的地下工作和她的安全，尽了一切努力。他们甚至定期地渡江到新坡去弄报纸来给金正淑。郑东哲给新坡的组织成员杂货店老板订阅费，老板就以自己的名字订报纸。他把报纸随到随送，有时就当包装纸包起商品送去。所以，金正淑就能定期地看到《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了。

每有红白喜事，郑东哲总是把金正淑请去，安排她趁这个机会同游击队工作员或外地来的地下组织联络员接头。

1937 年夏天，郑东哲为生了男孩摆酒席请客，参加的有刚从游击

队里派来的“蓝正淑”(朴正淑)等几个政治工作员和地下组织成员多人，还有警察、区长和密探。

为了彻底伪装工作员，以避免敌人监视，郑东哲让他们互相磕头施礼。金正淑也按惯例和朴正淑互相磕了头。她跪在“蓝正淑”面前磕头说：“请受我一拜”。区长郑东哲为这件事，从几天前就让金正淑练习了磕头。

金正淑每夜到井边去练习顶水罐走路，端午节前还练习了几夜打秋千。

她把这一切看作是具备女地下工作员素质的必修课。

金正淑认为实现桃泉里革命化的关键是提高群众的觉悟，把他们吸收到革命组织里来。她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积极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在这过程中，不声不响地培育出了领导骨干，并以这些骨干建立了反日青年同盟和妇女会。这个平静的山村终于变成了我们强有力的活动基地。金正淑在所到之处都用拥军爱兵思想教育了人民群众，同妇女会会员和青少年一起，筹备支援物资送到部队去。她支军教育搞得特别好，连从山东迁居桃泉里的中国人也都发动起来，给人民革命军送来了支援物资。儿童团员们还到各地战场去搜集了子弹。

支军运动的最高形式是参军。金正淑同祖国光复会下岗区委员会委员们一起，从通过组织了解的骨干分子中选拔有条件的青年，动员他们参加了人民革命军。据郑东哲的回忆，那时在下岗区参军的青年多达一百多人，仅在桃泉里一个村就有金赫哲、柳荣灿、李哲洙、崔仁德、韩昌凤等十多名青年参了军。

我国革命的第一代人韩昌凤，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率领一个团奋不顾身地强渡了洛东江，并在攻占、坚守对岸高地方面建立了特殊的军功。

曾受过金正淑指导的腰房子妇女会会长尹於福，是有三个孩子的妇女。她背着两岁的孩子跋涉八十多里路来找我们的密营硬要参加游击队。

当时群众参军热情非常高，有些人把儿子送进游击队后，修假墓上坟，说儿子已经死了。敌人对游击队家属进行严密监视和残酷迫害，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来瞒过敌人。

金在水分发《三·一月刊》被发现后不久，我们为帮助金正淑在新坡的工作，派崔希淑到腰房子去了。金正淑就把对桃泉里等下岗区地区的妇女会、青年会和少年会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崔希淑，她自己则集中精力做了新坡的工作。

金正淑在新坡的工作，是从做张海友的工作开始的。

当时，张海友在新坡地区同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成员一起进行着反日革命活动。这个时期，桃泉里区长、祖国光复会特殊会员郑东哲同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成员张海友、林元三、徐载逸有了交往，思想感情上开始互相沟通了。

徐载逸是洗衣工，他投身于组织的工作，还执行了同金正淑取联系的任务。

为了具体地了解张海友和他的组织的动向，金正淑让郑东哲同张海友的组织的成员林元三结拜了把兄弟。她通过郑东哲事先做了充分

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开始直接同张海友接触了。

金正淑在石田服装店后屋第一次会见了张海友。那天，她给张海友转达了我的亲笔信。

“原来金日成将军就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金成柱，我张海友将像拥护亨稷先生一样拥护将军。”

我接到张海友表示了这种决心的汇报，确信金正淑在新坡的工作定会成功。

张海友不是那种凭年龄和资历自命不凡，或心胸狭隘，小里小气的革命者。他是个只要是主持正义的，就无条件地支持和拥护，不为私人感情所支配，为大义和大业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一切的人。

不久后，张海友以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成员组织了祖国光复会新坡支会。同一个时期，他在金在水和金正淑的领导下，在石田服装店后屋以三水共产主义者工作委员会为母体，成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直属新坡地区党小组。

成立祖国光复会支会的集会是在光鲜照相馆举行的。照相馆的二楼修整室，是金正淑经常利用的秘密联络场所。

经营光鲜照相馆的李舜垣是祖国光复会新坡支会的骨干成员。他在汉城摄影讲习所毕业后，回到新坡开了照相馆。李舜垣不仅摄影技术很高，而且平易近人，深孚众望，所以，让他出面做人的工作是很方便的。

他拍下许多敌方资料给我们送来了。有一次，他还拍下有助于人民革命军向国内进攻的新坡全景照送来。在他家修整室里还油印了很多传单。他爱人是忠实助手，默默地帮助了组织的秘密工作。

除了光鲜照相馆外，金正淑还把石田服装店、泉水边冷面馆、新坡客店、瓷器商店、水碓房等新坡的许多地方定为秘密联络或秘密工作场所，隐秘地来往于这些地方进行了地下工作。这些地方既是组织成员的接头和联络地点，同时又是收集和保管支援物资的场所。

起运支援物资的主要秘密地点是水碓房，这儿离邑镇有一段距离，是个敌人不大注意的地方，所以，保管和起运物资很方便。这家主人的一个亲戚是放排工人，因此，把支援物资送往鸭绿江对岸时，很容易得到他的帮助。水碓房主人和放排工都是祖国光复会会员。

我们通过新坡收到了很多支援物资。十三道沟物资不多，所以长白县下岗区的各组织也要到鸭绿江对岸的新坡去购买大部分支援物资。

新坡地区的各组织给游击队送来的粮食、布等大量支援物资，大部分都是经水碓房联络站和五函德客店用木排或渡船运过鸭绿江的。五函德客店是个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建立的特殊分会。

金正淑在桃泉里和新坡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的时候，曾去过白头山密营和三水，还前往新兴、兴南、北青、端川等东海岸地区去，深入地做了这些地区革命者的工作。

阿安里和五函德的秘密联络站主要用作向外地派工作员的据点。金正淑在阿安里分会负责人的家里派了到赴战、长津、新兴、兴南等地去的地下革命组织成员；以五函德联络站为据点，派了到甲山、北青、德城、端川等地去的地下革命组织成员。她派魏仁灿工作组到兴南工业地区去建立地下革命组织，也是在阿安里据点派去的。

金正淑忙碌地来往于分散在新坡各地的那么多秘密据点，积极地

扩大了革命组织。她绝没有只利用固定的据点。她常常改换装束，巧妙地交替利用了各种形式的秘密联络站和工作场所。她这样做，既有助于伪装组织，也有利于自己的安全。

金正淑从桃泉里回来后，我问过她：听说新坡的警察眼睛都像枭眼，你用什么法子，没有暴露自己？你出入新坡街市几十次，没被敌人捉住，而随意进行活动，秘诀是什么？

金正淑只是微笑着，讲了她在新坡被密探盯梢的经过。

“我在新坡渡口下船正往街里走，发觉有个戴破旧草帽的人跟在我后面。起初，我没想到他是盯梢的，可是我走进街里后，他仍跟在我后面。我觉得有些可疑。那人在一家饭馆前抽起烟来，他抽的不是旱烟，却是香烟。我一看，就更觉得可疑了。穷苦农民哪抽得起香烟呀。”

金正淑牵着密探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最后进了集市。她看到有个面熟的妇女背着孩子，头上还顶着一个大筐，便飞快地把那个筐接过来顶在头上。这么一来，那个密探就丢失了目标。

“我没被密探或警察逮捕，是因为有责任感。要是被敌人抓住，不就没法完成司令部交给的任务了吗，我一想到这，胆子就大起来了。而且，群众又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我。”

金正淑的这番话，也是她对自己在桃泉里、新坡地区工作的总结。使她能够胜利完成艰巨的敌后工作任务的重要秘诀，就是责任感和深深地扎根于群众。她在敌后地下工作中所发扬的惊人的创造精神，也是出自于这种责任感。为了不给她过重的负担，我们在派她到桃泉里的时候，只交给了她有关政治工作的任务，没有给她别的任务。但是，

金正淑在全力进行政治工作的同时，还随时收集部队所需的敌军事情报送到司令部来。

她发动桃泉里和新坡的地下组织收集了许多情报资料。郑东哲、张海友、林元三等革命者给她提供的情报特别多。

郑东哲是情报工作的能手。他和警察署长、海关关长、面长等敌统治机构的头头们结拜把兄弟，和他们称“兄”道“弟”，巧妙地套出了敌人的秘密。在他们这帮把兄弟中，不仅有十三道沟官厅的头头们，还有新坡派来的高等科便衣警察。郑东哲常常摆酒席请他们喝酒，还为那些喜欢抽大烟的官吏有意地安排他们抽大烟。

祖国光复会下岗区委员会会员打进了敌伪机关，仅在十三道沟警察署管辖内，就打进了两三名祖国光复会特殊会员。敌伪基层行政单位任用的区长和十家长也大都加入了革命组织。

林元三利用替靖安军团部抄写文件的机会，收集了大量的军事秘密。他一发现革命军可资参考的作战图或统计资料，就飞快地把它抄在纸上，揉成纸团扔进废纸篓里，等到晚上烧废纸时，再把它拣出来送给组织。

光鲜照相馆和石田服装店还常常成为收集敌情资料的据点和联络站。祖国光复会新坡支会会员中，还有在面事务所或金融组合等敌伪机关当文书的。他们经常收集敌情资料集中到光鲜照相馆或石田服装店，然后向组织通报。间三峰战斗时，金正淑就是通过这一地区的秘密联络站，详细地调查和搜集金锡源部的动向并及时通知了司令部，为人民革命军的战斗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金正淑发动组织成员侦察了在新坡一带部署的敌军警兵力、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情况，亲自确认了鸭绿江的宽度、深度、流速和渡江及撤离的有利地点，还绘制出必要的略图送给了我们。

在总结桃泉里的工作情况时，我高度评价了金正淑的这一创造性努力。我问她为什么要调查渡江和撤离的有利地点。她回答说，因为她想到我们革命军终会有一天要攻打新坡。

1937 年夏，金正淑被敌人逮捕了。

桃泉里妇女会员为我们的出版所弄到的一些纸捆被靖安军发现了，这就成了祸根。这时，金正淑镇静地辩解说，这些纸捆是她受郑东哲区长的嘱托买来让她们保管的，是准备做居民登记簿的。她的理直气壮的态度和有条有理的回答，使敌人大为恼怒。理屈词穷的敌军官，气急败坏地说，看你一点不害怕，能说会道，一定是革命军的间谍。便不由分说地把她绑起来，押往他们的部队本部所在的腰房子。

金正淑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便给组织写了遗书。

“请你们放心，我将要死去，但组织一定会活着。这两块钱是我的全部财产，请用作组织的资金。”

用铅笔写的遗书和两块钱经她被扣押处的房东老大娘传到邻居，再经郑东哲传给了组织。

组织上发动组织成员进行了紧急营救活动。桃泉里的组织成员组成代表团到靖安军部队本部去强烈抗议他们非法逮捕了无辜良民，并要求立即释放。

桃泉里组织成员的抗议终于发生了效果。靖安军部队本部借口部

队转移把金正淑移交给十四道沟警察署了。

郑东哲出面交涉，又把金正淑从十四道沟警察署移送到十三道沟警察署。十三道沟警察署是高一级的一级警察署。所以把金正淑移送到十三道沟警察署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地解决了。

桃泉里就在这两个警察署之间，金正淑光着脚，两手被反剪着，在警察押送下经过桃泉里是在刚过晌午的时分。村民们看到“茂山家谢媛吉”，被警察用枪托推搡着押走，个个义愤填膺，满眼含泪目送着她。有个老大娘拿着一双草鞋跑到大路上给金正淑流血的脚穿上，厉声责骂警察：

“你们这些坏蛋，我们的玉顺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走无辜的人？你们说玉顺是共产党，要是玉顺是共产党，那我就要跟共产党走！”

郑东哲当即跟上去，和十三道沟警察署长交涉释放金正淑。警察署长答应他说，如能交出五百份良民保证书，就承认金正淑是“良民”，释放她。警察署长要这么多的保证书，是为了留下凭证，以便上级追究时好推卸责任。实际上，这个要求就是要他上天摘星星，无法办到。可是郑东哲不久真地把五百份保证书放在署长的桌上了。署长着实吃了一惊。当时谁也不愿在担保有“逆贼”或“共匪”嫌疑的“不稳分子”为“良民”的保证书上轻易盖手印，这是群众的普遍心理。原来警察署长考虑到同郑东哲的“友情”，为顾全面子，答应他只要交出良民保证书就释放她，可是他心里以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办成了有五百人盖了图章或手印的良民保证书，这确实是个奇迹。

怎么办成的呢？桃泉里只有二百多户人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地

下组织成员。不管组织如何发动起来，那些比组织成员多好多倍的非组织成员也不会都追随别人冒着危险在保证书上轻易盖章的。

使那么多的人毫不犹豫地在良民保证书上盖章的是，人民群众对金正淑的无限热爱和支持。换句话说，是比强权和金钱更有威力的人民的绝对信赖和支持创造了这种奇迹。

金正淑从敌人的魔爪中摆脱出来，一回到桃泉里就被村民团团围住。她脱口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哎哟，可把我饿坏了。大姐，快给我饭吃吧。”这是只有在一家人之间才能说出的毫无拘束的话。如果她没把桃泉里人们看成一家人，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

解放后，林元三在任兴南市人委委员长的时候，有一次趁来平壤开会的机会，同曾在桃泉里、新坡时的旧友张海友、郑东哲一起访问过我家。当时张海友和郑东哲在中央担任要职。任民主党平安南道委员会委员长的金在水也和他们一起来了。那天，金正淑为他们包了饺子。当时的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桃泉里——新坡时的往事了。

金正淑噙着眼泪感怀深切地回忆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死里逃生的往事。她突然说，她被拘押在腰房子的时候，本来是完全能够逃脱的，可是没有那么做。她说：

“其实干掉一个看守脱逃是不难的。可是，我不忍心那样做，想到我被关押的那家房东老夫妻的可怜状况，怎么忍心干掉看守逃走啊。我看着他们老夫妻心想，我逃出去容易，可我一走，这家老夫妻将会如何？保证我是好人的郑区长又将如何？桃泉里的地下组织和人民将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受到多么残酷的迫害。我想到这里就打定了主意，

宁可牺牲自己也一定要保护组织和人民。那天，我心情平静地睡了一夜。我打定了要牺牲自己的主意，心里就塌实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这就是“茂山家谢媛吉”在桃泉里——新坡时期的风貌。

多亏了良民保证书，金正淑从逆境中得救后，有一段时间继续在桃泉里地区和国内进行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司令部来了。她归队时，祖国光复会桃泉里支会成员柳荣灿也和她一起来找我。他由金正淑介绍参加了游击队。1944 年，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训练基地忙于做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柳荣灿在用船搬运盖野营地建筑所需的材料时，不幸在黑龙江溺死了。

金正淑每有机会就回忆他说，柳荣灿是她终生难忘的恩人。

金正淑离开桃泉里的时候，决心要跟她来的不止是柳荣灿一个人。妇女会员们也哭着缠磨她，一定要跟她来。

有个妇女会员直到金正淑翻越胞胎山，还缠磨着，不肯回家。

金正淑怎么也说服不了这个妇女会员，最后把自己的银戒指给她戴上，把她的红腰带解下来系在自己的腰上。这条用毛线织的腰带是她由金正淑介绍加入妇女会的那天，为了做纪念，亲手织出来系在腰上的珍贵饰物。

“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愿意带你走，是情况不允许我带你走。我将把这条红腰带永远带在身上，直到它剩下最后一根线为止，决不忘记你们亲爱的桃泉里的人们。”

那个妇女听到她深情的话，就不再纠缠了，转而哀求金正淑无

论到哪儿去，都要捎个信来。

她回到部队后按自己的诺言经常把那条红腰带系在军服上衣里边。我和她结婚后，才知道那条红腰带的来由。

金正淑身上一直系着那条象征群众温暖关怀的红腰带。她的灵魂从没有离开过人民。

我有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金正淑怎么能受到那么多的人的爱戴和支援，完成了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呢？

如果金正淑没有真心热爱人民，那么当她处于危险的时候，人民就会根本不理睬她的。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人民的人，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头，是得不到人民的真诚帮助的。金正淑由于她热爱人民，因而得到了她那么爱惜和保护的人民应有的报答。这么看来，盖有五百人印章的良民保证书应该说是证明她是人民的真正忠仆的永恒的证书。

金正淑离开桃泉里后过了半个多世纪的 1991 年秋天，我在两江道地区进行现场指导的时候，访问了她献出全部身心开拓的新坡。尽管流逝了漫长的岁月，可是有关她的地下活动的革命文物却完好地保存着。新坡人们对史迹地及其每件文物的精诚珍重，确实是令人叹服的。

那天，讲解员们带我到每个印有金正淑足迹的史迹地，具体地介绍了她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不少我不大知道的事件和细节。

我望着仍旧立在鸭绿江畔的凶险的炮台，心里想到金正淑为了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曾冒过很多险，也曾多次闯过千钧一发的关头。

夕阳徐徐西下的时分，我前往车站，回头望着新坡市街，不知是怎么的，禁不住产生了一种依依难舍的心情。

注　释

[1]　南湖头会议：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193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在中国宁安县南湖头举行。在会上，金日成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挺进到边境地带，把斗争舞台逐步扩大到国内；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建党准备工作。——第 15 页

[2]　罗云奎（1901～1937）：20 世纪 20 年代朝鲜的电影导演、演员和电影文学作家；先后创作了故事片《阿里郎》等十八部电影文学剧本，导演了二十多部电影，在二十五部影片中扮演了主角。——第 47 页

[3]　《壬辰录》：17 世纪初，以当时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描写了壬辰卫国战争（1592～1598）时期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第 55 页

[4]　尹瓘（？～1111）：在 12 世纪初击退女真侵略者的战争中立了功的武官。——第 72 页

[5]　金宗瑞（1390～1453）：全罗道顺天人，在阻止女真族入侵、加强国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历任刑曹判书、礼曹判书、左议政等职；曾参加记载高丽王朝（918～1392）历史的《高丽史》（共一百三十九卷）和《高丽史节要》（共三十五卷）的编纂。——第 72 页

[6]　南怡（1441～1468）：15 世纪中叶著名的青年将领；26 岁任兵曹判书；在惩罚经常侵犯和骚扰西北边境一带的女真侵略者的战争中立了功。——第 72 页

[7] 甲申政变：朝鲜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1884 年 12 月 4 日，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派发动政变，组成新政府，发表了施政纲领，但在第三天就归于失败。这起政变亦称 1884 年资产阶级革命。——第 100 页

[8] 檀君：朝鲜民族的始祖。5011±267 年前（1993 年测定）生于平壤，在东方建立了第一个古代国家朝鲜（后称古朝鲜）。檀君陵在平壤市江东郡。——第 117 页

[9]《温达传》：高句丽人民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主人公温达因家境贫寒，被统治阶级视为“傻子”，备受蔑视和虐待；后来同被赶出王宫的公主成亲，专心磨练武艺，成了将军，在击退倭寇的战斗中英勇善战，立了大功。——第 117 页

[10]《新日》：金日成主席于 1928 年 1 月在中国东北抚松创办的朝鲜第一家革命报纸。——第 203 页

[11]《布尔什维克》：朝鲜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的机关刊物。1930 年 7 月在中国东北卡伦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周报。——第 203 页

[12]《农友》：1930 年秋，在中国东北怀德县五家子创刊的月刊，是农民同盟的机关刊物。——第 203 页

[13]《东医宝鉴》：集 16 世纪以前朝鲜高丽医学成果之大成的医书（共五篇二十五卷），由著名医学家许浚自 1596 年至 1610 年撰写，1613 年出版。——第 223 页

[14]“惠山事件”：日本军警为镇压朝鲜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者，分别于 1937 年秋和 1938 年在鸭绿江沿岸一带进行的两次大逮捕事件。——第 223 页

[15] 新干会：1927 年，由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合作成立的统一战线组

织，其纲领为巩固全民族团结，试图动员民族全部力量争取朝鲜独立。因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和内部的改良主义倾向，于 1931 年 5 月被解散。——第 226 页

［16］金策（1903～1951）：咸镜北道金策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人，无限忠于金日成主席的革命战士，曾多次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入狱。1932 年参加朝鲜人民革命军，任指挥员。祖国解放后，投身于党、人民政权、正规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各项民主改革；历任平壤学院首任院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产业相等职；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前线司令官，为战争胜利进行了忘我奋斗。——第 248 页

［17］洪吉童：朝鲜中世纪小说《洪吉童传》的主人公，在书中被描写为具有千变万化的神奇法力、见义勇为的人物。——第 283 页

［18］全琫准（1854～1895）：甲午农民战争（1894～1895）的领导人，青年时代同父亲一起当过私塾老师。他把全罗道古阜农民反对封建统治集团的暴动发展成农民战争，后来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就义。——第 303 页

［19］东学党：由 1860 年左右创立的民族宗教——东学的信徒组成的团体。东学为对抗西学（天主教）而创立，是东方即朝鲜的学问的意思。东学党人在 1894 年甲午农民战争（亦称东学党起事）中起了主要作用。——第 303 页

［20］祖国解放战争（1950 年 6 月 25 日～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人民抗击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的外来侵略者和李承晚傀儡集团武装进攻的正义战争。——第 314 页

［21］康良煜（1904～1983）：平壤市万景台区七谷人，是爱国战士、著

名政治活动家。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作为教师和牧师开展了爱国的教育与宗教活动。在出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期间，为新朝鲜的建设、政权机关的加强和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后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为国家的富强发展和提高共和国的国际威望，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作为北朝鲜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为贯彻统一战线路线进行了忘我奋斗。——第 323 页

[22] 洪景来（1780～1812）：1811～1812 年平安道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第 324 页

[23] 李俊（1858～1907）：咸镜南道北青人，爱国烈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组织“共进会”等团体，为恢复国家主权进行了活动，是国债偿还运动的主要人物。1907 年，作为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前往荷兰海牙，参加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野心，呼吁各国支援朝鲜独立，但未能如愿，遂在会场上剖腹自尽以表抗议。——第 324 页

[24] 安重根（1879～1910）：黄海道海州人，反日爱国烈士；从 17 岁起研究军事学；作为西友学会会员从事过教育活动；1907 年底，到俄国滨海省去作为反日义兵指挥员进行活动；1909 年 6 月，率领义兵攻打咸镜北道庆兴的日本守备队；1909 年 10 月，在哈尔滨站击毙以“北满视察”的名义到满洲的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第 324 页

[25] 崔德新（1914～1989）：金日成主席念过书的华成义塾塾长崔东旿之子。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后流亡中国。解放后，曾在南朝鲜历任军长、外务部长官、驻西德大使等职，朴正熙掌权时期流亡美国。后定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任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

委员长、天道教青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第 325 页

[26] 赵基天（1913～1951）：咸镜北道会宁人，革命诗人。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后，迁居俄国，毕业于鄂木斯克高尔基师范大学。祖国解放后归国。1947 年以在金日成主席的革命历史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普天堡战斗（1937 年）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史诗《白头山》；此外还创作了以解放后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军民英勇斗争为题材的《土地之歌》、《朝鲜在战斗》等许多诗篇。1951 年任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第 372 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